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夏文库 第一辑

著作卷

杜建录 史金波 主编

西夏番姓大族研究

陈玮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ISBN 978-7-5490-1413-2



9 787549 014132 >

定 价：69.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夏学文库

第一辑

著作卷

杜建录　史金波　主编

西夏番姓大族研究

陈玮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番姓大族研究 / 陈玮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7
（西夏学文库 / 杜建录，史金波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490-1413-2

Ⅰ. ①西… Ⅱ. ①陈… Ⅲ. ①姓氏—研究—中国—西夏 Ⅳ. ①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0710号

西夏番姓大族研究

陈玮 | 著

策　　划 | 刘　琛　鄢军涛
项目负责 | 鄢军涛
责任编辑 | 李浩强
封面设计 | 苏金虎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西安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372千
印　　张 | 23
版　　次 |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8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413-2
定　　价 | 6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西夏学文库
编委会

主　任：陈育宁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牛达生　史金波　白　滨　孙宏开　孙伯君　孙昌盛
孙继民　汤晓芳　刘建丽　杜建录　李华瑞　李范文
李进增　李　蔚　佟建荣　沈卫荣　杨　浣　杨富学
杨　蕤　林英津　罗　丰　周伟洲　周　峰　波波娃
胡玉冰　荒川慎太郎　　段玉泉　贾常业　聂鸿音
索罗宁　梁松涛　韩小忙　景永时　彭向前　薛正昌

主　编：杜建录　史金波

编　务：于光建　张笑峰　杜维民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
编

百年风雨　一路走来

——《西夏学文库》总序

一

经过几年的酝酿、规划和编纂，《西夏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和读者见面了。2016 年，这一学术出版项目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7 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在“十三五”开局的第二年即开始陆续出书，这是西夏学界和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硕果。

自 1908、1909 年黑水城西夏文献发现起，近代意义上的西夏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20 世纪 20 年代至 80 年代为第一阶段，该时期的西夏学有如下特点：

一是苏联学者“近水楼台”，首先对黑水城西夏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龙果夫、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学名家，出版了大量论著，成为国际西夏学的“老大哥”。

二是中国学者筚路蓝缕，在西夏文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结合汉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开展西夏语言文献、社会历史、文物考古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王静如出版三辑《西夏研究》，内容涉及西夏佛经、历史、语言、国名、官印等。1979 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

三是日本、欧美的西夏研究也有不俗表现，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西夏语言文献和党项古代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四是经过国内外学界的不懈努力，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西夏学界推

出《西夏史稿》《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物、文献、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西夏学呈现出三大新特点：

一是《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西夏文物》（多卷本）等大型文献文物著作相继整理出版，这是西夏学的一大盛事。

二是随着文献文物资料的整理出版，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无论是俯首耕耘的老一辈学者，还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都积极参与西夏文献文物的诠释和研究，潜心探索，精心培育新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在西夏文文献的译释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激活了死亡的西夏文字，就连解读难度很大的西夏文草书文献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对西夏历史文化深度开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举凡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风俗、科技、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文物等，都有新作问世，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宁夏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成为这一时期西夏研究成果出版的重镇。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纂的《西夏研究丛书》《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编纂的《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是上述成果的重要载体。西夏研究由冷渐热，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已悄然影响着同时代宋、辽、金史的研究。反之，宋、辽、金史学界对西夏学的关注和研究，也促使西夏研究开阔视野，提高水平。

三是学科建设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后更名西夏学研究院）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西夏学作为“绝学”，予以重点支持，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北方民族大学也将西夏研究列为重点。西夏研究专家遍布全国几十个高校、科研院所和文物考古部门，主持完成和正在开展近百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包括国家社

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西夏通志”“黑水城出土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大词典”“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

研究院按照教育部基地评估专家的意见，计划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为抓手，加大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力度，推出重大成果，同时系统整理出版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也在继承传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加强西夏学学科建设、深化西夏研究、推出创新成果的计划。这与甘肃文化出版社着力打造西夏研究成果出版平台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三方达成共同编纂出版《文库》的协议，由史金波、杜建录共同担纲主编，一方面将过去专家们发表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另一方面重点推出一批新的研究著作，以期反映西夏研究的最新进展，推动西夏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

作为百年西夏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作为新时期标志性的精品学术工程，《西夏学文库》不是涵盖个别单位或部分专家的成果，而是要立足整个西夏学科建设的需求，面向海内外西夏学界征稿，以全方位展现新时期西夏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气象。《文库》分为著作卷、论集卷和译著卷三大板块。其中，史金波侧重主编论集卷和译著卷，杜建录侧重于主编著作卷。论集卷主要是尚未结集出版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因为已公开发表，由编委会审核，不再匿名评审。著作卷由各类研究项目（含自选项目）成果、较大幅度修订的已出著作以及公认的传世名著三部分组成。所有稿件由编委会审核，达到出版水平的予以出版，达不到出版水平的，则提出明确修改意见，退回作者修改补正后再次送审，确保《文库》的学术水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设立了专门的基金，用于不同类型著作的评审。

西夏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原来人员构成比较单一，学术领域比较狭窄，研究方法和学术水准均有待提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加强西夏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是提高西夏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我国现有的西夏研究队伍，有的一开始即从事西夏研究，有的原是语言学、历史学、藏传佛教、

唐宋文书等领域的专家，后来由于深化或扩充原学术领域而涉足西夏研究，这些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们给西夏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和新的科研气象，为充实西夏研究队伍、提高西夏研究水平、打造西夏学学科集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资料蒐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方面，俄罗斯、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西夏研究者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文库》尽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特别请作者，特别是老专家在各自的著述中撰写“前言”，深入讲述个人从事西夏研究的历程，使大家深切感受各位专家倾心参与西夏研究的经历、砥砺钻研的刻苦精神，以及个中深刻的体会和所做出的突出成绩。

《文库》既重视老专家的新成果，也青睐青年学者的著作。中青年学者是创新研究的主力，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代表着西夏学的未来。也许他们的著作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是他们为西夏学殿堂增光添彩的新篇章，演奏着西夏研究创新的主旋律。《文库》的编纂出版，既是建设学术品牌、展示研究成果的需要，也是锻造打磨精品、提升作者水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库》是中青年学者凝练观点、自我升华的绝佳平台。

入选《文库》的著作，严格按照学术图书的规范和要求逐一核对修订，务求体例统一，严谨缜密。为此，甘肃文化出版社成立了《西夏学文库》项目组，按照国家精品出版项目的要求，精心组织，精编精校，严格规范，统一标准，力争将这套图书打造成内容质量俱佳的精品。

三

西夏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夏王朝活跃于历史舞台，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繁荣。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西夏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兼容并蓄、互融互补、同脉同源的见证。深入研究西夏有利于完善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对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繁荣有着重要意义。西夏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更精准地阐释西夏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特色、贡献和影响，把相关研究成果展示出来。《文库》正是针对西夏学这一特殊学科的建设规律，瞄准西夏学学术发展前沿，提高学术原创能力，出版高质量、标志性的西夏研究成果，打

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品牌，增强西夏学话语体系建设，对西夏研究起到新的推动作用，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资源宝库。在甘肃厚重的地域文明中，西夏文化是仅次于敦煌文化的另一张名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自西南地区北上发展时，最初的落脚点就在现在的甘肃庆阳一带。党项族历经唐、五代、宋初的壮大，直到占领了河西走廊后，才打下了立国称霸的基础。在整个西夏时期，甘肃地区作为西夏的重要一翼，起着压舱石的作用。今甘肃武威市是西夏时期的一流大城市西凉府所在地，张掖市是镇夷郡所在地，酒泉市是番和郡所在地，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重镇。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为西夏瓜州监军所在地。敦煌莫高窟当时被誉为神山。甘肃保存、出土的西夏文物和文献宏富而精彩，凸显了西夏文明的厚重底蕴，为复原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甘肃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根脉，是西夏文明繁盛的一方沃土。

甘肃文化出版社作为甘肃本土出版社，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早在20多年前就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院前身）合作，编纂出版了《西夏研究丛书》。近年来，该社精耕于此，先后和史金波、杜建录等学者多次沟通，锐意联合编纂出版《西夏学文库》，全力申报“十三五”国家图书出版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践行着出版人守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衷心希望这方新开辟的西夏学园地，成为西夏学专家们耕耘的沃土，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

史金波　杜建录

2017年3月



序

宗族是具有血缘联系的共同体，它贯穿于党项社会和国家的全部过程。因此，在对西夏社会历史的探索与研究中，党项宗族研究乃是基本而重要的课题，漆侠先生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在漆师的指导下，我曾写过《论党项宗族》一文，本要顺着先生的思路继续下去，没承想继而连三的文献整理课题打乱了既定的思路，一直没能再拣起来。令人欣慰的是陈玮掌起这个接力棒，坚持了下来。陈玮的硕士学位论文以《西夏皇族研究》为题，他在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以《西夏番姓大族研究》为学位论文选题。他利用西夏学研究院学术活动的间隙，多次向我谈起继续硕士期间的研究，并讨论诸多细节问题。2016 年，甘肃文化出版社拟以《西夏学文库》为题，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我向陈玮约稿，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充实修改，作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第一批出版成果。

陈玮学术起步较早，大学期间就围绕地方历史文化，发表《成都城墙小史》等文章，研究生期间，在广泛涉猎文献资料的同时，很快进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并获宁夏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入复旦后，得到明师指点，进步很快，先后荣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国家奖学金、复旦大学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光华自立奖学术科研类一等奖、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一等奖、复旦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迄今在中外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一部，承担教育部基金项目、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和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后更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后，即确立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西夏文献专

题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西夏社会历史解读的“三步走”战略，联合国内相关单位和专家，先后推出《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承担50多项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国家和教育部基金课题，出版《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等数十种文献研究著作。硕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也以西夏文献和黑水城汉文献整理研究为主，有的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同时，支持有创新的历史研究选题，陈玮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夏皇族研究》就是历史选题之一。

近代意义上的西夏学是从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的，最初研究人员构成比较单一，学术领域比较狭窄，主要局限于文献文字研究，经过俄、中、日几代学人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西夏文献整理研究是西夏学的基础和“传家宝”，这一点必须坚持不懈。当然，西夏学要发展，不能局限在文献整理考证上，应在此基础上，加强理论指导和方法创新，加大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一方面研究者走出去，拓宽视野，主动融入古代文明、丝绸之路等领域，陈玮就是其中的践行者；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历史学、语言学、藏学、敦煌学的专家加盟，这些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们势必会给西夏研究带来新的学术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气象。百年西夏学的发展，研究者从过去的单兵作战发展为国家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多学科的团队作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和《西夏学文库》的编纂出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借陈玮《西夏番姓大族研究》出版谈一点感想，由衷祝愿他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

杜建录

2017年7月6日午夜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西夏的族群结构与族群认同 001

第二节 番姓大族与西夏社会 007

第三节 前人研究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016

第四节 本书结构安排 041

第一章 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 043

第一节 猕猴种、西羌别种、北魏皇族后裔：唐代党项拓跋氏之身份认同 043

第二节 西羌与扶风窦氏：唐代党项窦氏之身份认同 055

第三节 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唐后裔、党项人：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李氏之身份认同 059

第四节 番人、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唐后裔、北宋宗室：西夏嵬名氏之身份认同 075

小结 095

第二章 从藩镇到皇朝：西夏番姓大族的权力构建 098

第一节 杖节把斧：党项拓跋氏、窦氏、野利氏与唐中央及夏州、邠宁藩镇 098

第二节 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节度使称号之政治内涵 137

第三节 权豪驭政：定难军节度使家族与本镇职官系统 162

第四节　历史记忆与权力合法性塑造：李继迁、李元昊政治谱系之建构　199
第五节　胙土分茅：西夏番姓大族之封爵　204
第六节　鸿渐于干：西夏番姓大族的文武仕途　211
第七节　威柄所向：西夏番姓大族的权力斗争　222
小结　234

第三章　政治化的西夏番姓大族信仰　239
第一节　梵音西来：灵夏党项与丝路佛教　239
第二节　佛教王权观与西夏皇室的舍利崇拜、佛王传统　250
第三节　积德累仁：西夏番姓大族的佛教宗教实践及宗教权力结构　262
第四节　绍休圣绪：祖先崇拜与西夏皇室权力展演　274
第五节　河清社鸣：祥瑞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279
第六节　星旗电戟：星象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291
第七节　派衍天潢：天崇拜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304
第八节　九龙高卧：龙崇拜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313
小结　324

结语　331

参考文献　340
后记　351

绪 论

第一节 西夏的族群结构与族群认同

辽、西夏、金、元诸王朝给公元 10—14 世纪的中国史注入了浓厚的北族和边疆政治色彩。这四个王朝“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①。西夏的统治民族即中原史籍所记载的“党项”,其语音为“弥”,西夏人译为汉字“番”。杨浣先生指出:“党项人及其西夏政权,蒙古人称之为 Tangut(唐兀剔),吐蕃人称之为 Mi-nyag(弭药)。Tangut 可能源自党项人的自称 ldong(董),本义是下部董氏。最先应该是吐谷浑人,然后才是北魏的汉人把它转写为‘党项’的。这里增加一个词尾-ng 表示的是族群复数的概念。与之同时或稍晚一点,突厥人把它转写为 Tangut。词尾-ut 同样也是表示族群复数的概念。这一翻译方式,先是被契丹人所接受,继而被女真人获得,最后传到了蒙古人那里。吐蕃四大族姓之说出现较晚,‘董’可能是吐谷浑语词‘党项’的单数形式。”②

党项、弭药、唐古特都是中古时期汉语人群、鲜卑语人群、吐蕃语人群、突厥语人群、蒙古语人群对党项语人群的称呼,对党项人而言都是外来族称。木仕华先生指出:“‘弥药’作为党项羌人中一部的族群自称,历经漫长的历史变迁,加上吐蕃帝国时期的区分强化,几乎等同于党项羌人的统称。”③邓茹萍也认为弭药为

①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② 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8 页。
③ 木仕华:《弭药(Mi-nyag)新考》,《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18 页。

党项人的自称。[①]但弭药是否为党项人最早的自称呢？“弭药”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内徙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有学者指出“Mi”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nyag”则是“(身份)低下”“不干净”或“污秽”之意，[②]Mi-nyag是“下(贱)人”或“下等人”的意思，当为吐蕃对其征服的党项人的贱称。弭药既然是一种污名性族称，党项人最初当不会采用。

党项人最初的自称应为弥，即藏语中“人”之意。《唐拓跋守寂墓志》云：“名王弥府君洎附，授大将军、宁府君矣。时逢季代，政乱中原，王教不宣，方贡殆绝，天降宝命，允归圣唐。”[③]《隋书·吐谷浑传》云：“八年，其名王拓跋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④]周伟洲先生认为墓志中的“拓跋弥”即《隋书·吐谷浑传》的“拓跋木弥”，“弥”省译为“木弥”，与党项自称有关。[⑤]从墓志来看，早在隋代就有党项拓跋部首领名为弥。波塔波夫指出：“氏族的或部落的名称，其本身常常是来源于首领、族长等个人的名字。”[⑥]罗新先生认为：“按照中古北族的传统，部族重要首领的名称，往往变成整个部族的代称，而部族首领的名称，又往往来自他的官号。”[⑦]他进一步指出中古北族部族得名的机制是：“部族首领的官号，成为人们称呼该首领的名称，又成为外部世界(与该部族相对应的其他游牧部族及农耕社会组织)称呼该部族的主要名称，经过一段时间，起于他称的这一名称最终为该部族内部所接受和认同，从而凝固成为该部族的正式名称。”[⑧]吐谷浑、拓跋均乃中古时期的北族政治体官号，吐谷浑即从官号升为部族政治体名称。拓跋木弥作为党项拓跋部首领，在政治上奉吐谷浑为主，成为吐谷浑的名王。他的名字“拓跋”即是一种官号，“木弥”或“弥”也有可能是一种官号，二者组合在一起共同来修饰“名王”这一官称。“弥”这一官号遂成为党项拓跋部人的自称，进而成为所有党项人的自称。

吐蕃王朝兴起后迅速东进，在对党项人的征服战争中了解到党项人的自称Mi，由于在军事上获胜，便对党项人的自称加上nyag以表示蔑视。Mi-nyag成为

---

①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② 《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九卷《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2页。

④ 《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4页。

⑤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苏联]波塔塔夫：《论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的本质》，《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3页。

⑦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⑧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吐蕃人对党项人的称呼。党项内徙唐陇右道、关内道后，绝大多数党项部落在地理区域上与吐蕃相隔绝。但是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不断在军事上进逼唐关内道，占领唐陇右道，内徙关内道、陇右道的党项部落受到吐蕃强大的政治、军事影响，依违于吐蕃与唐之间，逐渐接受了吐蕃对党项的他称弥药。吐蕃王朝崩溃后，在原唐陇右道、关内道吐蕃占领区的吐蕃部落大部分没有返回藏地，依旧生活于当地，与党项、吐谷浑部落形成了混居局面。在经历了长期的混居后，加之同样的经济形态，在西北地区的吐蕃与党项族群边界模糊。北宋初年，宋琪曾上书谈道："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俗多有世雠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①]一些党项上层人物还熟通吐蕃文字，《宋史·夏国传》记李元昊在少年时"晓浮屠学，通蕃汉文"[②]。李元昊称帝后，为独尊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将西夏境内的党项人统一称为番人，以"番"这一族称取代了弥和弥药。克平指出，番作为西夏自称族称泛用于所有西夏文献，弥药的适用范围不见于官方文件、法典、记述，仅见于诗歌中。[③]但"弥药"还见于西夏文字书，如《文海》云："番，弥药也，番人之谓。"[④]《同音》云："番，弭药人。"[⑤]但毕竟在绝大多数的官方典籍中，"弥药"已不再出现。"番"成为西夏官方确定的西夏境内党项人的新族称。

在中原汉文史籍中，党项往往与羌相关联。在最早记载党项的《隋书》中，"党项"仅出现了两次，"党项羌"则出现了八次。杨浣先生指出："当使用'羌'来对'党项'做补充或限定说明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族群'的背景可能更为复杂、历史更为久远。"[⑥]党项内徙后长期居于汉地，不少党项上层人物进入到中原王朝的官僚系统，逐渐接受了"党项羌"这一族属观念。但在李元昊称帝后，西夏官方将西夏境内的党项人统称为番人，弃用了"党项羌"这一名号。虽然在《文海》中还记有："番，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⑦]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官方典籍中，"党项羌"已不再出现。"羌"这一族群符号在西夏境内成了吐蕃人的专属之物。

杉山正明先生指出："西夏这个国家，虽然是以藏系党项为立国的中坚，但却是一个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羌族和吐谷浑之外，又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回鹘和汉族的多种族国家。在同为异族的混合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复合国家和复合社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8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③ [俄]克平：《西夏国名及西夏人发祥地考述》，《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第122页。
④ 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⑤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55页。
⑥ 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⑦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48页。

会方面，大致和北魏至隋唐时期存在的‘拓跋国家’、契丹和金国具有相似的结构。”[①]傅海波认为：“党项人从人种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较小的种族集团。”[②]党项在内徙前族群结构比较单一，但在内徙后与灵州、夏州和突厥、铁勒、吐谷浑、沙陀等游牧部族杂居，吸收了不少这些游牧族的人口，以至于在晚唐时被唐人称为杂虏。定难军时期，党项人、粟特人、吐谷浑人在夏州都比较活跃。西夏的番族中还有鲜卑人后裔。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境内的“‘鲜卑’已经从一个族称演化成番族的一个姓氏。西夏时的鲜卑氏和旧时的鲜卑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他们和番族长期的共同生活，已经成为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他们的语言也已经是番语。进入番族的鲜卑人以鲜卑为姓”[③]。

《天盛律令》规定：“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实行。”[④]可见番人、汉人、吐蕃人和回鹘人是西夏的四大族群。西夏还将汉人区分为原居汉人和归义汉人。西夏首崇番人。《天盛律令》规定：“一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若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⑤]在西夏番人眼中，番人和汉人各自聚族而居，具有明确的族群边界。西夏诗歌《大赞歌》云：“天降众生，历时弥远。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聚群而居，有夏有汉。夏汉同功，日月昭然。”[⑥]

西夏官方非常注重保持番人和汉人的族群边界。西夏番文、汉文《杂字》将番姓、汉姓分列两节，西夏番文字书《文海》收录有大量番、汉姓氏，番姓被注为“族姓”，汉姓则被注为“汉姓”。番姓和汉姓成为西夏官方和民间识别番人和汉人的基础。西夏官方还按番汉来划分一些官僚机构和职业群体，如番汉大学院、番汉学士、番汉学子、番汉乐人、番汉僧人等。这些官僚机构和职业群体都是番前汉后，体现了番人在西夏的优越地位。甚至连饮食也有番汉之分。番人以其血缘、政治优势而视汉人为蛮，吐蕃人为戎羌。

---

①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等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②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③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④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⑥ [俄]克恰诺夫著，王颖译：《“他山之作”——11—12世纪远东国家使节交往的文献资料——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西夏的碑刻、儒家经典、佛经基本上是以番汉两种文字刻写，而西夏的吐蕃人、回鹘人又各有其语言文字。在这样一种多语文社会，不少番人、汉人都具备双语能力。《天盛律令》颁律表所记载的编纂官员中，就有精通汉文的番人“译汉文者西京尹汉学士讹名□□”“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府通判芭里居地”①。讹名□□、芭里居地以番人身份担任汉学士，还负责将《天盛律令》番文本译为汉文本，既表明番人的上层官僚精通汉文，也说明西夏官方欲以精通汉文的番人精英来掌控对王朝经典从番到汉的阐释权。

埃德蒙·R·利奇指出：“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中，都有彼此作为派系对立的亚群体。这样的亚群体或地位相当，或有高下之分。使用共同的语言是一个亚群体表达其一致性的一种方式。”②他还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政治体系包含了说不同语言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在一个等级中按三六九等排列的话，那么语言状况可能明显是不稳定的，而且厕身高等级的语言群体往往会同化低等级的语言群体。”③西夏长期尊崇番人、番语文、番礼，既是西夏王朝的基本国策也是西夏国家政权鲜明的政治特色。金臣斡特剌就曾谈道：“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独能保国数百年。”④汉人虽然是西夏的第二大族群，但是毕竟为番人所统治，而且汉人在仕宦、经商、耕作、生活诸方面都会与番人密切接触，因此汉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世代学习番文，在服饰等风俗上也逐渐番化，以至于南宋使臣楼钥在金中都见到西夏汉人使臣时，认为西夏汉人使臣奇装异服，完全不类汉人。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前近代的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流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受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② [英]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等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8页。

③ [英]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等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9页。

④《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页。

⑤ 楼钥谈道：“夏使二纲，一贺正，一遣使，皆以正子为正使。戴金冠，制作甚工，朱袍蹀躞，状貌甚伟。副使衣冠如丽人。三节皆不入见，椎髻被发，小巾尖帽，皆夷服也。”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一一九《北行日录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07页。

的共同体的胚胎”[①]。吴叡人认为:“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②]

番文对西夏灭亡后唐兀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承载单位,“人们被引导通过文化的形态特征来识别或区分承载文化的族群”[③]。元人把唐兀人分为蕃河西和汉河西,可见在唐兀人这一族群中存在着番人和汉人两大亚族群,但无论是蕃河西还是汉河西,它们都是唐兀人。在唐兀人这一西夏遗民群体中,除了番人和汉人外,还有沙陀人后裔。在刻于元初的沙陀人后裔小李钤部的墓志上就刻有西夏文,可见在元代唐兀人中西夏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甚至是族群身份的识别符号。唐兀人的形成既是蒙元官方对西夏遗民身份界定的结果,也是西夏遗民基于对西夏王朝,对祖先在西夏故地生活的历史记忆,以及对西夏文的延续使用所产生的对西夏认同的情感,自发凝聚而成的结果。

弗雷德里克·巴斯指出:“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必须稳定,从而使体系所依赖的互补性差异能够在密切的族际接触时得以维持。”[④]唐兀人在元代长期使用西夏文,用西夏文刻印了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仅在中原流传,还在西夏故地的河西走廊流传。甚至到16世纪的明代中期,在保定的西夏遗民群体还在坚持使用西夏文。可见西夏文是元代唐兀人的重要文化特征。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⑤]。迁徙中原的唐兀人一直保有对西夏故地的历史记忆,很多唐兀人都以河西、武威、灵武、宁夏为籍贯,并自号贺兰或以贺兰作为书堂名。小李钤部家族还有人归葬肃州。元廷对唐兀上层官宦的封爵多命以夏或宁夏。这些都表明元代唐兀人是在多种族西夏遗民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

---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43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9页。

③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

④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

⑤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第二节 番姓大族与西夏社会

宗族是内亚游牧族群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狄宇宙认为:“高流动性和低密度使内亚游牧和半游牧族群形成典型的宗族群,当中又以个别单位为最小的社会单位。这种社会组织产生出合一的政治单位——就是进行生产、防御、移民和战争所需的家族和部族,并且由贵族所领导。”[①]早在吐谷浑统治时期,党项羌即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大部落,尤以拓跋氏为雄长。这些自称为弥,被汉语人群称为党项的部落联合体长期处于分离性社会状态。巴菲尔德指出:“在内陆亚洲游牧民中,分散化的结构要多于精神上的建构,它被那些为世系、氏族以及整个部落提供领导权以及内部秩序的固定首领所强化。”[②]在党项部落联合体中,“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③]。党项八大部中每一部里的核心部落与小部落之间可能并无实际血缘联系。巴菲尔德认为在游牧世界中,“‘实际上的’血缘关系(基于血统原则以及通过婚姻或收养而形成的关系)只有在部落的小单位中才是经验性的证据:核心家庭、扩大了的家户以及当地世系。在氏族与部落联合的更高水平上,维持着一种更具政治根源性的关系,在其中,谱系关系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④]。

唐初吐谷浑势微,党项诸部纷纷投附唐朝,细封步赖、被赐姓李的拓跋赤辞等党项大酋均官拜羁縻府州刺史、都督。拓跋赤辞所在的党项拓跋部已产生了宗族组织。《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唐朝在劝降党项拓跋部时,拓跋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⑤]。此后,原处于吐谷浑统治圈中的党项羌诸部,由于吐蕃东进,纷纷由松州迁徙至唐陇右道北部诸州及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境内。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进占河陇,于唐初内徙的党项诸部再次向东迁徙,逐渐聚居于灵、庆、夏、银、绥、延、盐等

① [美]狄宇宙著,田欢译:《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②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草原游牧世界》,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49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

④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草原游牧世界》,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49页。

⑤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2页。

州及河东地区。

党项内徙后，各大姓部族以居住地域为基础形成部落集团，安史之乱后留居陇右的党项部族则由吐蕃统治。《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内徙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①。其中六府部落居住地域不详，东山部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②。平夏部则以拓跋部为主，《新唐书·党项传》云：“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③仆固怀恩之乱后，唐廷为防止党项与吐蕃勾结，采纳郭子仪建议，将东山部大部迁往绥州、延州，小部分留居庆州，至北宋时这里还有出于野利氏的蕃官。迟至晚唐，在鄜延地区已形成以原东山部中的野利部为主体的南山部，《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④南山部与平夏部成为晚唐时最大的党项部落集团，双方曾在唐宣宗朝联合抗唐，至唐末逐渐合流，组成夏州党项，奉平夏部拓跋氏为主。吐蕃王朝崩溃后，河陇政治秩序失序，原为吐蕃统治的陇右党项成为河西走廊的一大政治势力，原处于抗击吐蕃最前沿的灵州党项也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双方组成西路党项。进入五代，灵州党项出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资治通鉴》云：“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⑤灵州党项与夏州党项成为五代时期最大的两个部落集团，原河东北部的党项部族则由辽朝统治。《新五代史·党项传》描述此时的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⑥。

李继迁起兵抗宋后，积极利用夏州党项大族势力。《宋史·夏国传上》记李继迁在地斤泽之战战败后，“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继迁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遂与弟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夏州”⑦。拉铁摩尔指出在游牧族群社会中，“由于部落采取的是父系氏族制和异族通婚制，男人不能娶具有相同始祖的部落女子为妻，因此与他们一代一代的找寻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3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8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高祖天福四年正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197页。
⑥ 《新五代史》卷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2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6页。

新娘的部落之间存在一种交叉的亲缘结盟”[①]。史称李继迁子李德明“诸母甚多”[②]，李继迁正是利用这样一种亲缘结盟得以聚集军事力量。杉山正明即指出西夏是“凭借部族联盟扩大军事力量，以此为‘杠杆’达成再增长人群的再联合”[③]。

李元昊称帝前后极为重视党项大族，积极利用党项大族势力构建西夏国家政权。《续资治通鉴长编》云李元昊“每欲举兵，必率酋豪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④]“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伪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发兵以银牌，召酋长而受约束”[⑤]。李元昊本人的禁卫军及西夏监军司的部队都由党项大族的武装力量构成。李元昊在背宋发动边境战争前，“悉会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并入”[⑥]。

杜建录先生指出：“西夏建国后仍长期与豪族大姓联合专政。”[⑦]王天顺先生指出：“西夏政权是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强宗大姓的联合专政，这个统治集团的成员和众多宗族的家长及军事首领们构成西夏国家的统治阶级。”[⑧]史称元昊逝后，“其大酋误移赏都、埋移香、热鬼浪布、野也浪啰与没藏讹庞议所立”[⑨]。谅祚即位后，“方幼，三大将分治其国”[⑩]。三大将分别是三个番人大族的政治代表。宋人曾谈道：“朝廷岁赐谅祚金帛，四族常分其半，首领入贡，辄贸易图利，故四族盛强。”[⑪]此四支番人大族与皇族一起共享北宋岁赐金帛。秉常即位后，西夏政权由皇族、后族和其他大族联合执政。史载：“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⑫]秉常被梁太后囚禁后，“大酋数辈

① [美]拉铁摩尔著，牛出出译：《亚洲内陆边疆：防御帝国与征服帝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真宗景德四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5页。

③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等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04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45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仁宗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⑦ 杜建录：《论党项宗族》，《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⑧ 王天顺：《〈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仁宗庆历八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2页。

⑩ 《宋史》卷二八八《程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76页。

⑪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六《谥曰康穆程公神道碑铭并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04册，第408页。

⑫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各怀去就，上下汹乱”[①]。

西夏番人具有明晰的宗族观念。《文海》释“宗姓”云：“此者宗姓也，宗号也，分别姓类用之谓。”[②]西夏番族又有大姓宗族和小姓宗族之分。《天盛律令·官军敕门》云：“一国内官、军、抄等子孙中，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若违律小姓袭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官、军、抄当赐大姓，大姓情愿，则允许于共抄不共抄中赐亲父、亲伯叔、亲兄弟、亲侄、亲孙等五种。”[③]西夏的番姓大族中，有不少世代悠久，如“皇族嵬名氏即由隋唐时期的党项拓跋氏演变而来。从正史记载中可见，党项拓跋氏自隋唐至五代，再至宋朝建立西夏，虽转徙千里，朝代更替，但其家族绳绳继继，传承有序，脉络清晰，仍不失党项族根本”[④]。

西夏的番姓大族，除嵬名氏外，还有“野利、没藏、没移、芭里、骨勒、骨匹、乃定、如定、鲜卑、西五、都罗、兀啰、令介、北却、讹六、讹力、酩布、平尚、千玉、播杯、卫慕、嵬立、嵬迎、讹命等，单音节姓有讹、罔、梁等”[⑤]。这些番姓大族广泛分布于西夏的京畿与地方，在京畿为官贵，在地方为豪强，同时在军队和僧侣集团中势力庞大。

在唐代的党项大族中，平夏部拓跋氏一族世袭银州下辖的羁縻州静边州都督府都督，成为唐朝在蕃蕃将。开元年间的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在具有突厥政治背景的六胡州之乱中为唐廷战殁，此后拓跋氏逐渐在唐代西北边防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士族名流进入《元和姓纂》。安史之乱后，内徙党项诸部如庆州破丑氏、野利氏、把利氏多依违于唐与吐蕃之间，唯有银夏一带的拓跋氏始终效忠唐廷。

在夏州党项中，除拓跋氏世袭担任羁縻州长官外，还有窦氏家族世袭担任长宁州都督。[⑥]窦伯岁自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至唐僖宗乾符年间一直以长宁州都督兼任夏州左厢子弟兵马使。夏州左厢子弟军，顾名思义由夏州本地的军将及官健之子弟组建成军，但考虑到由出身党项羌之窦伯岁担任该部最高军事指挥官，该部应为蕃汉混编部队，甚至全由党项羌组成。

据统万城附近出土的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墓志，拓跋思恭之父李重建、李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神宗元丰四年四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66页。
②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43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
④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页。
⑤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⑥ 陈玮：《唐夏州党项首领窦伯岁墓志考释》，《统万城建城一千六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建之侄李仁宝、拓跋思恭的曾孙李光睿、李光睿之堂弟李光琏均娶妻破丑氏。宋太宗力行削藩后，李继迁起兵反宋，与其同起兵者的党项人除其弟李继冲外仅有破丑重遇贵。破丑氏在西夏建国后还有活动，如西夏陵区 M161 西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中记有“破丑氏”①。北宋知保安军刘拯曾“赂蕃部破丑”②。李继迁起兵后又与党项诸部酋豪如野利氏、罔氏互结姻娅，利用部族武装夺回定难军旧地，在宋廷妥协下重建定难军政权，又率军攻陷灵州，将夏州党项与灵州党项相统一。李德明在位后期，李元昊率党项部族武装夺取河西走廊，奠定西夏立国疆域。李元昊进军河西的原因除了拓展疆土、与辽争锋外，还在于想统一河西走廊一带的党项部族，其称帝后与辽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想招纳辽境内的党项部族。据汤开建先生考证，西夏凉州一带的党项大族计有卑宁族、都罗族、野马族、暨龙族、仁多族等。③

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将李氏改为嵬名氏，皇族嵬名氏与后族卫慕氏、野利氏、没藏氏、梁氏、罔氏成为西夏番姓大族中最具权势者，与其他番姓大族一同在西夏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继迁母、李德明妃、李元昊妃均为卫慕氏，史称卫慕氏为“银州大族”④。由于李元昊母卫慕氏族人卫慕山喜谋反，李元昊将卫慕山喜一族沉河，又弑杀卫慕太后及卫慕妃。在西夏文《杂字·番姓名》中记有卫慕，但在现存汉文及西夏文史料中极少见到姓卫慕者，可见李元昊诛杀卫慕山喜一族，弑杀卫慕太后及卫慕妃对卫慕氏造成了重大打击。

卫慕氏没落后，野利氏开始为元昊所信重。早在初唐时，拓跋氏与野利氏即共同驻牧于灵夏一带，关系紧密。《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云：“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州，拓跋、舍利、仆固、野利、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⑤元昊父李德明之母即为野利氏，元昊也娶野利氏为皇后。史载：“元昊之贵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谋，伪号大王。……刚浪凌即旺荣也。”野利旺荣、野利遇乞为元昊皇后野利氏族人，《涑水纪闻》卷五云：“拽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⑥皇后野利氏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九卷《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32 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330 页。

③ 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43—145 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94 页。

⑤ 汤开建：《唐李荃〈太白阴经·关塞篇〉西北诸道部族地理考证》，《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51—52 页。

⑥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88 页。

另一族人野利仁荣还创制西夏文字，后来被夏仁宗仁孝追封广惠王，西夏文《夫子善仪歌》对其创制西夏文字大加称颂。西夏王爵按《天盛律令》仅有皇族嵬名氏才能受封，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在元昊在世时就被称为大王，野利仁荣后也被追封为王，可见西夏时期野利氏一族权势炙手可热。元昊太子宁令哥亦娶野利旺荣女。但随着元昊族诛野利旺荣、野利遇乞，野利后在太子宁令哥弑杀元昊之乱中身亡，野利一族的身影逐渐消失于西夏政坛。至西夏末年，野利氏仅见于西夏边城黑水镇燕军司，如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记有“立文人夜利那征布”①。俄 Инв.No.4926—10 军籍文书记有“一抄野利□□”②。

没藏氏出于宥州。③在元昊末年的西夏宫廷动乱中，没藏氏开始崭露头角。没藏氏本嫁女于野利遇乞，野利遇乞被诛杀后，其妻为元昊收得，生子谅祚。史载：“没藏，大族也，讹庞为之长。”④谅祚之母没藏氏为没藏讹庞之妹，没藏讹庞先教唆太子宁令哥弑杀元昊，再率众诛杀宁令哥。元昊临终前遗言立其从弟委哥宁令，但此时番姓大族势力强大，元昊死后“其大酋误移赏都、埋移香、热嵬浪布、野也浪啰与没藏讹庞议所立”⑤。没藏讹庞力排众议，立己妹没藏氏所出之谅祚为帝。此后没藏讹庞任西夏国相十数年，还嫁女与谅祚，至谅祚成人后才被其族诛。谅祚并杀其后没藏氏。史载：“没藏，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⑥此后没藏氏较少出现于西夏政坛，但至西夏末年尚有没藏族人，如西夏文《大诗》刊刻题记同页卷尾文契记有“光定蛇年闰腊月二十三日为文契者没藏”⑦。光定蛇年为光定辛巳年（1221 年）。俄 Инв.No.5130《胜慧到彼岸要门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题记记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没藏法净缀文”⑧。

梁氏早在五代时期就与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结成了稳定的婚姻关系。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李彝谨祖父拓跋思恭娶妻梁氏。据《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李彝谨之父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女也嫁与梁氏。西夏立国后，没藏氏与梁氏结姻，谅祚在族诛没藏讹庞后，立没藏讹庞儿媳梁氏为后，生

① 陈国灿：《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27 页。

② 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报告，2011 年，第 135 页。

③ 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34 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902 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902 页。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208 页。

⑦ 聂鸿音：《〈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⑧ 聂鸿音：《俄藏 5130 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 年第 1 期。

子秉常。秉常即位后，梁氏摄政，以其弟家相梁乙埋为国相，又以梁乙埋之女为秉常后，生子乾顺。梁乙埋死后，其子梁乞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①]。乾顺在位初期，由第二梁氏摄政，梁乞逋为国相辅佐。《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宋神宗五路伐夏时宋将刘昌祚"与贼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战"[②]。梁乞逋号称大王亦显示了梁氏在西夏政坛的崇高地位。实际上秉常在位时期，西夏已形成番姓大族联合执政的政治局面，《梦溪笔谈》云："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乞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罔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③]秉常因行汉礼被第二梁氏幽禁后，"诸梁擅兵，大酋数辈各怀去就，上下汹乱，兴州左右新旧行邪造逆之臣与秉常故时亲党，各拥兵自固，斩绝河津，南北阻隔"[④]。西夏的番姓大族分裂为两大政治集团并延续至秉常复位后，其中势力最强的"梁氏与人多二族分据东西厢兵马"[⑤]。秉常死后，西夏皇位继承又面临番姓大族政治的干涉。史载："夏国自秉常身死，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⑥]乾顺仰赖梁乞逋支持即位后，依靠宗室嵬名阿吴及大将仁多保忠等将梁乞逋讨杀，第二梁氏不数年也随之殁去，后乾顺大封宗室为王，以皇族势力为依托肃清了后族的政治影响。乾顺以后的西夏皇位继承基本摆脱了番姓大族的干涉，太子以储君即位受到皇权的保护，名正言顺，如乾顺子仁孝、仁孝子纯佑之即位。但皇族的政治势力也随之膨胀，以至于纯佑为宗室安全所废，安全又为宗室遵项所废。

罔氏为银夏大族，李继捧、李继迁之母均为罔氏。夏仁宗仁孝又以罔氏为后。罔氏协助仁孝兴盛儒学，还曾赐银币与谏臣。史称："罔氏内教谨严，宫中莫敢犯；仁孝诸善政，多所赞成。"[⑦]在西夏后期，罔氏已成为政坛一大势力。据《金史·交聘表》，罔氏有任西夏殿前太尉、武功大夫、御史中丞、知中兴府者。除罔氏外，芭里氏也是西夏后期比较活跃的番姓大族，其源自唐代的党项把里氏。在夏崇宗朝，任得敬女任氏仰赖御史大夫芭里祖仁建言才得以成为乾顺皇后。夏仁宗朝还有芭里氏族人参与编纂《天盛律令》，还有许多族人担任出使金朝的使臣。

从上可见，西夏的番姓大族大都来源于唐五代的党项大族，如拓跋氏、野利

①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七，元丰四年十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8页。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66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元祐元年八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52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十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93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32页。

氏、破丑氏，其血脉流承极为久远。这些大族自公元7世纪至公元13世纪相继经历了党项羁縻府州时代、夏州藩镇时代、定难军强蕃时代、夏王国时代及西夏王朝时代，从部落豪族逐步转变为藩镇士族、王朝贵族。拓跋氏是这些大族中的佼佼者，但在党项羁縻府州时代及夏州藩镇时代，其仅仅是众多党项大族中封爵与官职兼具的突出者，并不具备对其他大族绝对的权力支配能力，拓跋思泰在六胡州之乱中被党项人击杀即说明了这一点。安史之乱后吐蕃大举东进，效忠于唐廷的党项大族以其部族武力融入唐西北边境藩镇武力中，或成为藩镇下属边州刺史，或担任藩镇武职军将。在镇压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中，拓跋氏脱颖而出，第二次被赐予李唐皇姓并成为定难军节度使这一方面大员，党项大族对藩镇的渗透以其掌握藩镇的最高权力而达到顶点。此后李氏（拓跋氏）长期世袭定难军节度使，至宋太宗削藩时其对党项诸部族的政治影响力已如日中天，是党项诸大族中唯一具有皇朝赐姓、王爵、节度使官衔、世袭领地的汉化高级官僚世家，其对夏州党项诸部进行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也来源于此。

李继迁起兵反宋后，此前独立的灵州党项被纳入到定难军势力范围内，灵州党项与夏州党项合流，西夏的番姓大族即来源于这两支党项地域集团。夏州党项大族在李继迁统治后期及李德明统治时期，大都迁徙至兴州及其附近。西夏立国后，番姓大族以其封爵与官职攫取了西夏的大部分国家权力和财富。由于疆域拓展，大族的分支从强蕃时代的国都兴州又逐渐迁徙至河西走廊的绿洲城市。从朝堂到边镇我们都可以见到大族的身影，这些大族在朝堂上往往互为奥援，在地方军队中凝聚为坚固的集体。如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文书入手，我们不仅能看到番族大姓在边境城市黑水镇燕军司的生活状态，还能看到由同族士兵组成的大量军抄。如俄 Инв.No.8371《天庆戊午五年军籍签署画押》记载了由六个军抄组成的一军，此军首领为梁吉祥盛，除梁吉祥盛以首领兼任一抄正军外，其他五抄正军中有三抄正军为梁氏族人。[①]这样在此军中，梁氏族人所组成的军抄就占了四个，这四个军抄的辅主也大都为梁氏族人。另如俄 Инв.No.4791《应天丙寅元年军籍》中，嵬移黑水盛为一军首领，此军由四个军抄组成，除嵬移黑水盛以首领兼任一抄正军外，其他三抄中有二抄正军为嵬移西铁缚、嵬移小狗有。[②]这样在此军中，嵬移氏族人所组成的军抄就占了三个，这三个军抄的辅主也基本为嵬移氏族人。再如俄 Инв.No.4791《应天己巳四年军籍》中，嵬移舅讹为一军首领，此军

① 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报告，2011年，第88页。
② 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报告，2011年，第98页。

由三个军抄组成，除嵬移舅讹以首领兼任一抄正军外，其余两个军抄的正军和辅主均为嵬移氏族人。[①]因此西夏基层军团的构成并不像佐藤贵保所说的“‘军首领’率领的军团不必由同族构成的可能性比较大”[②]。

西夏番姓大族还将势力伸入僧侣集团，将僧侣集团紧密地与番姓大族政治相联系。在西夏皇族中，夏神宗太子德任曾避位为僧。在西夏的国师中，有出于皇族的嵬名思能在甘州兴建卧佛寺。另一出于皇族嵬名氏的德源为奉敕译经的讲经律论国师，译有《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等持集品》。出于皇族的国师还有至觉国师慧护，译有《集毕一乘元明心义》，并散施此经。他还抄写佛经《安立总集》，并参与编撰《佛说阿弥陀经》。出于大族西壁氏的有大度民寺的法显国师鲜卑宝源，他曾重校《金刚经》。还有在榆林窟二十九窟供养像中出现的真义国师鲜卑智海。黑水城还出土有《鲜卑国师劝世集》《鲜卑国师贤智集》。在西夏的德师中，有出于皇族的嵬名德照，其官衔全称为“节亲主、德师、中书、知枢密事”[③]。《天盛律令》规定国师、德师均为西夏皇帝之师，嵬名德照以德师之职兼任中书、知枢密院事，可见番姓大族僧人与西夏政治的紧密联系。另有一高僧嵬名广慧参与国师白智光主持的译经，其地位应不低于德师。在德师以下的僧官中，也多有番姓大族。如俄Инв.No.5130《胜慧到彼岸要门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题记记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没藏法净缀文”[④]。可知没藏法净任高级僧官出家功德司正副使。又《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有“修塔寺小监崇圣寺僧正赐绯僧令介成庞”[⑤]，令介为西夏番族大姓，令介成庞担任崇圣寺高级僧职。另如西夏文宫廷诗集中《大诗》卷末题款中记有“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师傅座主骨勒善源”[⑥]。骨勒善源以高级僧官番三学院百法师傅，兼任刻字司头监，而刻字司为西夏官方印刷机构，可见僧官与西夏文佛经的印制关系紧密。在僧官以下的普通僧人中也多有番姓大族，如黑水城出土的一份僧人名单记有嵬名师、嵬移师、没息慧智。嵬名、嵬移、没息均为西夏番族大姓。

---

① 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报告，2011年，第104页。

② [日]佐藤贵保：《西夏军“首领”——以两件黑水城文书为根据》，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5页。

③ 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音同〉研究之二》，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④ 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⑥ 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第三节 前人研究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一、对西夏番姓大族身份认同的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西夏番姓大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辨这些大族的族源族属。陈学霖先生认为西夏“在二百年的历史里，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与宋、辽、金、蒙古竞逐，而它的民族亦不与华夏认同”①。从现存史料来看，西夏番姓大族中对于本宗族具有明晰身份认同意识的，基本上只有皇族。西夏皇族具有对番人、羌人、鲜卑人的三种认同观。

关于西夏皇族对番人的认同，史金波先生指出：“在西夏文资料中西夏嵬名氏自认为是番族，对番族的认同感非常明显，也没有发现番族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不同民族来源的迹象，这种民族心理因素对确定族属也非常重要。”②西夏皇族自认为番人最突出的表现是西夏皇帝自称为番天子。榆林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榜题外墨书三行：“南方阁普梅那国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山，当为修福。”③陈炳应先生认为南方阁普梅那国中的阁普即瞻部，“这当与党项语缺鼻韵尾有关”。梅那国来源于西夏番人的自称——弥药，为同一名称的不同音译。④史金波先生也指出“所谓‘南方阁普’即前述南瞻部洲，‘梅那’即minyak。在藏文文献中称建立西夏的主体民族为minyak，即木雅。‘梅那国’也是以族称国”⑤。可见西夏皇帝自居为弥药国弥药人的天子。

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番文诗歌《颂师典》中的“我处皇族不间断，弥药皇储代代传”反映了西夏皇族“应是弥药人中的一部分”⑥。他还指出西夏史诗《夏圣根赞歌》中的弥瑟逢王应为李继迁，汉语称之为继迁，党项语或藏语称之为弥瑟逢。瑟逢即藏文史籍《贤者喜宴》所记载的斯呼，《安多政教史》所记载的斯呼凯久。“从藏文史籍看，这个西夏第一王是弥药人中杰出的一员”⑦。

---

① 陈学霖：《八十年来西夏史研究评议》，氏著《宋史论集》附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482页。

②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⑤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⑥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⑦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9页。

关于西夏皇族对羌人的认同，20世纪末陕北出土的《拓跋守寂墓志铭》云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①]。《通典》卷一八九《边防五·西戎一·序略》曰：“西羌出自三苗，盖姜姓也。”[②]另外据《全唐文》卷一六《赠拓跋思泰特进制》，拓跋守寂之父拓跋思泰为“党项大首领故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工节洫等一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③]。《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④]因此拓跋氏具有对羌人的认同意识。

周伟洲先生指出：“从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和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党项拓跋氏（即西夏皇族）无论在语言，还是生活习俗，如发式、服饰、婚姻、葬俗、复仇方式、信仰等方面，都与党项族的其他氏族部落一样，与古代羌系民族更为接近，其族源于汉魏的西羌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⑤]韩荫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泛称居于青藏高原的居民为羌族，党项和吐蕃都被认为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和吐蕃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具有血缘关系。拓跋氏在党项八大氏族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⑥]李范文先生认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明指拓跋赤辞为羌酋，具体而言为党项酋长。[⑦]陈炳应先生指出甘州西夏忠武王庙中的神像被“羊首餙冠”，用以祭祀夏神宗遵顼之父齐国忠武王李彦宗，反映了西夏王族对羊的崇拜。“考虑到‘羌’字从‘羊’和我国羌人的一些后裔仍在盛大节日中饰羊头的风俗，可以说，西夏皇族也是出于羌族的。”[⑧]戴维理亚认为：“西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夏州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西夏的始祖当时属于西羌的别种。”[⑨]

克恰若夫认为羌是党项和吐蕃的共同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同时植根于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之中”[⑩]。张云则认为吐蕃与党项的族源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党项与藏史传说中的董氏部落有关，他从藏语中考证了早期党项八部的音译原型。

---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九《边防五·西戎一·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25页。

③ 唐中宗：《赠拓跋思泰特进制》，《全唐文》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5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

⑤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⑥ 韩荫晟主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 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李范文西夏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⑧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⑨ [法]戴维理亚著，聂鸿音译：《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⑩ [俄]克恰若夫著，小卫译：《西夏王国中的藏族和藏族文化》，王尧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它们都是董氏(ldong),也即党项部落,或与之有亲缘关系的部落名称。”[①]他认为拓跋源于藏史传说中董族(ldong)四大相族之一的托举董(Thog-rgyud-ldong)。“藏语 rgyud 意为‘传承,族类,种属’等,‘托举董’即‘托族(系)董’或‘托氏董’。‘拓跋’即‘Thog-pa’(意即‘拓族人’)的音译。”[②]

关于西夏皇族对鲜卑的认同,唐嘉弘、王忠、吴天墀、汤开建、周新华、邓如萍、吕建福均认为西夏皇族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其中唐嘉弘认为李元昊为拓跋赤辞后裔,而拓跋赤辞属于鲜卑族系。吐谷浑的拓跋氏源于北魏拓跋氏,而党项羌中的拓跋部即吐谷浑的拓跋氏。[③]他还指出历史上的拓跋氏有鲜卑拓跋氏、党项拓跋氏、西夏拓跋氏和吐谷浑拓跋氏。这四支拓跋氏“均由‘鲜卑·匈奴’族群的拓跋氏增殖裂变,演化而成。他们都曾建国于群羌故地”[④]。王忠认为党项拓跋氏源于南凉秃发氏。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曾‘率兵西济河,逾积石,抚有群羌’。后来受吐蕃役属的多弥国‘号难磨,滨牦牛河’。‘难磨’即‘南凉’之‘南’,与樊尼建国的地望亦合。以藏文字母拼写的 Nam 语文书即记载西夏传说,‘Nam’当即‘难磨’的对音,陶慕士也谓 Nam 即南凉之‘南’,是西夏先祖即出自多弥”[⑤]。

吴天墀认为西夏王室祖先拓跋守寂在《元和姓纂》中被记为鲜卑族。拓跋氏在党项族中形成统治地位与吐谷浑慕容氏、西秦乞伏氏、南凉秃发氏等鲜卑政权在羌族地区立国类似。在党项内部有统治族拓跋氏与被统治族羌人的区分。西夏风俗多沿袭北方民族。党项拓跋氏“弭药”之称号源于北朝鲜卑贵族之命名“弭药”及“弭俄突”。明代《河西译语》中的党项语有大量阿尔泰语系成分。因此西夏皇族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⑥]

汤开建援引唐、辽、宋、元、明、清五朝史籍论证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他还考察了拓跋鲜卑流入羌族部落的过程以及党项拓跋氏与羌族的关系。他认为拓跋鲜卑的一支建立了南凉政权。南凉灭亡后,秃发(拓跋)鲜卑进入青海湖西,臣属于吐谷浑政权。隋朝末年,吐谷浑势衰,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诸部东迁,在今川北、甘南形成了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此后,党项羌各部在拓跋氏的领导下逐渐建立西夏。他指出党项羌并非纯粹的羌族,而是由鲜卑和羌人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拓跋鲜卑是党项羌的统治者,因此拓跋氏

①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②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③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 2 期。
④ 唐嘉弘:《再论西夏拓跋氏族的族属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⑤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 年第 5 期。
⑥ 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 年第 1 期。

被称为羌酋。拓跋氏的羌化使时人对其为鲜卑的印象逐渐消失，因而史书多称拓跋氏为羌。[①]汤开建在之后进一步论证不仅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整个党项都源于鲜卑。他认为西夏史诗《夏圣根赞歌》中的石室乃大兴安岭嘎仙洞鲜卑石室，漠水则指粟末水即今黑龙江上游。唐代新罗党项城及金代女真人唐括氏表明党项人早就居于东北。东北民族如鲜卑、契丹、渤海大氏均有八部，高丽也有八牧，因此作为东北民族的党项也有八部。党项的大量风俗都与鲜卑相似，鲜卑族姓在党项族姓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都表明党项源于鲜卑。[②]

邓如萍认为："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③]克恰诺夫认为党项拓跋部可能自源于拓跋鲜卑的秃发鲜卑分离出来。[④]吕建福认为西夏的主体民族由羌、浑两大民族组成，党项拓跋氏源于吐谷浑拓跋氏。[⑤]

关于党项拓跋氏究竟源于羌族还是鲜卑，自宋元以来即有不同意见。胡三省认为"拓跋起于鲜卑之裔，自谓托天而生，拔地而长，故以为姓。此后魏所本者也。昔唐时党项诸部，亦自有拓跋一姓，我朝西夏，其后也""元魏之拓跋氏起于代北，党项之拓跋氏起于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项拓跋之后也。宝元、康定之间，凭陵中国，嫚书狎至，使其出于元魏，亦必张大而言之，而未尝语及者，非其所自出也"[⑥]。清人石韫玉认为："拓跋氏，汉西羌之别种，而见于载籍，则自晋建元元年爵拓跋猗卢为代王始。《北史·魏本纪》：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遂以为氏。隆安间，拓跋称帝，历晋、宋、齐、梁，享国日久。迨高洋族魏，子姓遂微，间有散处于幽、朔间者。越三百三十年而拓跋复兴，岂其苗裔欤？"[⑦]

---

①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修订版见氏著《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8—30页。

② 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修订版见氏著《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31—71页。

③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Dunnell, R.W. Who are the Tangut? Remarks on Tangut Ethnogenesis and the Ethnonym Tangut.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 no.1 (1984): pp.78—89.

④ [俄]克恰诺夫著，王颖、张笑峰译：《唐古特国的起源问题》，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⑤ 吕建福：《羌浑并为西夏主体民族考》，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5—136。

⑥《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高祖天福四年正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197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4页。

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激烈论辩。李范文力辩唐嘉弘、汤开建之观点，认为元昊自称北魏后裔是为先世伪造历史。拓跋赤辞虽然与吐谷浑主结为姻亲，但他并不是吐谷浑拓跋氏。西夏国号白高国与鲜卑所谓白虏、白部胡无关，是指党项人的祖居地白龙江流域。[①]他在《西夏通史》中进一步指出："西夏文《杂字》和西夏人撰写的汉文《杂字》，把西夏皇姓嵬名（纳箕）列入番姓首位。而鲜卑拓跋氏在汉文《杂字》中称昔壁氏。用西夏文译成的唐代类书《类林》中，鲜卑的西夏译文为脖膰，即汉文《杂字》番姓之昔壁。在唐代就已融入番族的鲜卑人以昔壁为姓，而西夏皇族姓嵬名而未姓昔壁，这证明党项拓跋氏并不是鲜卑拓跋氏。"[②]

周伟洲对吴天墀、汤开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他认为弥俄罗突多为高车（铁勒）人姓氏，并非鲜卑姓氏。《河西译语》所反映的西夏语虽然有大量北方民族阿尔泰语系成分，但那是由于党项内迁后，在夏州与大漠南北的北方诸族长期接触所导致的结果。史籍对同属鲜卑族的吐谷浑、乞伏氏、秃发氏等向西北的迁徙都有明确记载，但现存文献史料及文物都没有记载鲜卑拓跋氏于何时、何地迁入党项羌的原分布地。[③]他以新出唐《拓跋守寂墓志》所云拓跋守寂远祖为"弥""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力证党项拓跋氏出于西羌。[④]史金波认为党项语属汉藏语系缅语族，而一般操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属羌系民族，而包括西夏王族嵬名氏（拓跋氏）的番族都把番语视为自己的民族语言。[⑤]

西夏后族中，野利氏、都罗氏在他者看来具有对吐蕃的认同意识。《资治通鉴》记后唐康福"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⑥]。《旧五代史·明宗纪》记有出使后唐的吐蕃野利延孙。《册府元龟》记有后晋泾州节度使张彦泽曾俘获西蕃大首领野离王子罗暇独。《五代会要》记有凉州吐蕃首领野利闾心。汤开建先生指出："拓跋、野利（耶律）原本均为东北民族，但迁居西北羌地之后，同时经过了'羌化'过程。拓跋氏'羌化'程度较浅，较多地保持了原来民族的特色，而野利氏则彻底地'羌化'或'吐蕃化'，故在当时人看来，野利氏已是一彻头彻尾的'羌族'或'吐蕃'。"[⑦]五代时期庆州的野利氏则保有自身为戎虏的非汉族群意识。《野

① 李范文：《再论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李范文西夏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279页。

②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③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⑤ 史金波：《西夏境内民族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九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9035。

⑦ 汤开建：《西夏"秃发"考》，氏著《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8页。

利阿胡碑》记后唐时的庆州野利氏“身出虏塞之名……故镇将李延玉出自戎虏，心怀忠赤。久效劬劳，气雄蕃府……故镇将野利李延玉虽居戎虏”①。庆州野利氏家族的这种非汉族群意识在北宋初年仍然保持。《大宋宁州□□□静难军押衙充龙泉镇副使承父公勋故为父母建立碑文并序》云庆州野利氏家族“虽即长居戎鲁，是五百年中间，生文郎义之难，比武即世上绝名”②。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野利氏源于契丹。戴维理亚认为：“在1037年，正是一个姓‘野利’的契丹人和西夏王合作创制了西夏国字。”③聂历山认为歌颂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师典》“根据这首诗的内容来判断，西夏文字的创制者姓‘伊利’，这似乎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野利’较吻合。因为野利本属契丹姓氏，因此可以推想，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也可能是契丹人。但我在一份记录纯粹的党项人名字的西夏文文书当中，也看到了‘伊利’这个姓氏，颂歌中所记载的契丹姓氏‘伊利’，党项人也读作‘野利’。大概，由于汉语中无r这个读音，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就把党项姓氏‘伊利’和契丹姓氏‘野利’相混同，将两者都写作‘野利’”④。

赵振绩指出：“野辞氏、野利氏、野乱氏、野律氏，可能均为耶律氏之异译。”⑤聂鸿音先生也认为西夏文字创制者野利仁荣来自契丹。他指出歌颂野利仁荣的《颂师典》中的“天上文星出东方，带来文字照西方”中的“东方”“很可能是指当时契丹人统治的燕云十六州一带，那里在西夏人看来正是东方。可想而知，契丹公主和野利仁荣等一班契丹族重臣来到党项人中间，无疑会使党项人了解契丹的社会组织制度”⑥。

罗新先生指出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由官号与官称组成。“官号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因而官号就有与‘姓名’一样的标志个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个政治名号）成为他的新身份标志。其中一些领袖人物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他所领导的政治体（部族）的名称，即史籍中的族名。”⑦在内亚政治史上，俟利被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都用为官号，如柔然有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

① 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② 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③ [法]戴维理亚著，聂鸿音译：《凉州西夏碑考》，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④ [俄]聂历山：《西夏语文学》，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⑤ 赵振绩：《契丹与西夏族系之关系》，宋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32集），兰台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

⑥ 聂鸿音：《释“大”》，氏著《西夏文献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⑦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俟利蔼焉力娄阿帝、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突厥有伊利可汗。罗新先生认为:“突厥和回鹘政治体中的 el-il,继承自草原古老的政治传统。作为官号的 el-il,不仅见于柔然汗国,也见于拓跋早期的鲜卑历史。拓跋鲜卑穆帝名‘猗卢’,‘猗卢’应当是穆帝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凝固成为他个人的名字。这个‘猗卢’,就是 il-el 的音译,当然也可能是带有后缀的 illig-ellig”①。

野利,即“俟利”的不同译写。如同“俟利”一样,“野利”也是一种官号。《册府元龟》记有西蕃大首领野离王子罗暇独。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时,途经鞑靼九族,“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②。《辽史·国语解》云:“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③可见鞑靼将于越这一官称用作官号来修饰王子这一官称。野利也当为修饰王子这一官称的官号。这样党项野利氏的族名即来源于内亚政治史中的传统官号俟利,最早应是在吐谷浑时代被吐谷浑可汗授予的党项首领官号。野利仁荣应为党项人而不是契丹人,很难想象一个契丹人在初到西夏后就能熟通党项语言、创制西夏文字,还形成了庞大的宗族势力,与皇族一起执掌西夏朝政。其实不仅拓跋、野利是一种官号,甚至连党项也可能是一种官号。《旧唐书·百济传》云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④。党项位于中原王朝之西陲,新罗远在海东,新罗为何以党项命名城市,实在让治史者百思不得其解。汤开建先生认为新罗党项城是党项的文化遗存,但中韩两国史籍都没有记载党项曾居于韩半岛。罗新先生认为中古北族政治领袖的官号会逐渐成为该领袖所在部族的族名,“同样的道理,这些政治名号还会沉淀在地名等其他专名上”⑤。夫余、高句丽、新罗都曾采用源于东胡的亲属称谓 aka-akan 来作为本国本族的官称。⑥党项也有可能是内亚政治史上的一种官称,被新罗所采用,进而成为新罗的地名。

《宋史·吐蕃传》记宋太宗时,“知西凉府左厢押蕃落副使折逋喻龙波、振武军都罗族大首领并来贡马”⑦。汤开建先生考证此处之振武军为凉州振武城,认为西

①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40 页。
②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4111 页。
③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35 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330 页。
⑤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⑥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52 页。
⑦ 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氏著《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44 页。

夏的都罗族出于凉州的都罗族。[①]佟建荣认为都罗为凉州吐蕃部族，在凉州被西夏占领后进入西夏。[②]宋初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时途经九族鞑靼，记有都啰啰族。汤开建先生认为“这都罗罗族很可能就是吐蕃抑或党项融进鞑靼族的部落”[③]。

从上可见，学界对于西夏番姓大族的族源族属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尚没有对西夏番姓大族身份认同意识的不断转变进行分析、探讨。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在历史长河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吐谷浑统治时期，党项拓跋氏与其他党项人一样都自认为是弥人，这从拓跋部首领拓跋木弥的名字即可看出。在党项内徙后，拓跋氏又认为自己属于三苗之后的西羌别种。安史之乱后，党项拓跋氏自称北魏拓跋之后。唐末拓跋思恭被赐姓李氏后，至五代宋初定难军李氏既称本家族为北魏拓跋之后，又自居为陇西李氏。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向北宋请求赐还夏州，以继续祭祀本宗拓跋氏。但李德明在位时曾对北宋使臣谈到自己是蕃夷。李元昊称帝后以北魏拓跋之后进行政治宣传，但从现存及出土的西夏本国文献资料来看，西夏皇族对番人这一人们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西夏灭亡后，入元的西夏皇族后裔李恒一支又自居为陇西李氏。

这样看来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在身份认同上经历了从羌到汉，再到番的历程。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在身份认同上的不断转变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罗新先生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说，历史是共同体的想象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因此讲述历史的权力是共同体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被讲述的历史理应服务于共同体当前的政治利益，那些不能服务于当前利益的历史论述就退出中心，要么永久消失，要么隐藏起来等待发掘。随着历史被反复讲述，原有的想象面临着被继承、被强化、被抛弃、被改造等不同命运。”[④]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意识，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段，借助各类历史书写来阐释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这样一种阐释自己是谁的历史书写，是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受外部政治环境的刺激而萌发的。

姚大力师指出：“某个特定的人群如何在与‘他者’接触的互动和互动的经历中逐渐塑造或重新塑造有关自身的历史记忆，而这一主观‘建构’过程又怎样从

①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54页。

② 佟建荣：《西夏姓氏考论》，宁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3页。

③ 汤开建：《河西回鹘、河西党项与河西杂虏诸问题考释》，氏著《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3页。

④ 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第10页。

形式与内容各方面影响了该人群集体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①]本文即力图梳理西夏番姓大族的历史记忆与其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以为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身份认同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在不同历史时期自我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扬弃，另一方面又暗示了其与中原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紧密与疏离。党项拓跋氏由于在唐初内属，被唐廷封爵拜官，其更多地深入汉地社会，接受了汉地知识系统中《隋书·党项传》对其族属的界定。此后由于其加速士族化，至晚唐时已自居为拓跋鲜卑之后。至北宋初年，定难军李氏又自居为华夏，这种华夏认同在李元昊建国时被扬弃。与此同时，党项这一汉地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族名也被李元昊所废止，西夏的党项人统一被称为番人、番族、弥、弥药，西夏皇族嵬名氏也成了所谓“弥药皇储”。总之，本文拟从安史之乱后的政治气氛、中古时期的士族社会环境、唐宋变革期夏州地域风气、唐王朝崩溃后边地民族与地方藩镇的杂糅等诸多角度深入讨论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

二、对西夏番姓大族权力构建的研究

1. 对西夏番姓大族权力构建的概括性论述

学界对西夏番姓大族权力构建的概括性论述主要有吴天墀《西夏史稿》[②]、史金波《西夏社会》[③]、乔幼梅《论党项的宗法封建制》[④]、宋东侠《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⑤]、王天顺《〈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⑥]、杜建录《论党项宗族》[⑦]、杨茂盛和陈春霞《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⑧]、郑彦卿《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⑨]。

吴天墀认为：“作为西夏贵族领主的党项部落首领拥有的社会势力，曾是西夏王室大力争取合作的对象，他们之间的权力地位本来是差距不太大的。但元昊一经做了所谓‘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之后，他为在西夏王国里确立

① 姚大力：《“族裔”认同与中国民族史研究》，孙静著《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序，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⑤ 《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⑥ 《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⑦ 《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⑧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2期。

⑨ 《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尊严无上的地位，根据‘兴法建礼’的政治需要，把国内大大小小的贵族领主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①]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宗族首领为主组成的贵族地主，是西夏王朝权力的核心，也是土地和牧场的占有者。”[②]西夏“贵族首领还拥有自己的武装。西夏的兵制是建立在豪族武装的基础上，每次对外战争，都向强宗大族点集军队”。“建国以后，仍长期实行党项贵族联合专政。西夏的宗法传统、世族权利的延续使西夏保存着更多的贵族特权。”[③]

乔幼梅认为党项强宗大族是西夏的统治基础。“强宗大族组成党项的贵族统治阶级，其中最为强大的是李继迁族系以及与之有姻亲关系的没藏氏和梁氏。他们族大人众兵多，长期控制着西夏的政权，从中央机构到州郡、十二监军司这些地方政权机构全都被他们把持，并且世代继承，形成世官世禄的局面。”宋东侠指出西夏是在党项强宗大族的支持下所建立，西夏统治者依靠大族豪右在于倚赖其武装势力和经济实力，他还归纳总结了西夏统治者笼络大族豪右的具体措施。王天顺认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𗼇𗥤𗂧𗍫𗤁𗏁𗫂𗡶)的一些律文反映了党项宗族土地所有制情况，《律令》对党项宗族的利益重点保护，体现了宗族家长的政治特权和世袭垄断。“西夏国家政权脱胎于氏族宗族组织。在其立国的二百年中，宗族对于西夏社会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西夏的宗族组织始终牢固地存在着，由强宗大姓世袭官、职、军始终是西夏政权的主要方式……西夏虽行科举取士，但宗族世袭之制未改，尤其地方行政权力把持在宗族家长手中，必然和取士任官相抵触。中央军政要职更为皇族及其姻族等贵族所把持。”他指出宗族势力是西夏国家封建化的阻碍，西夏始终未改变中央与各部酋帅分割武装力量的格局。

杜建录指出宗族存在于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整个发展过程，党项宗族既是军事实体亦是经济实体，在经济实体内包含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大小首领虽然是世袭的部族头领而非西夏职官，但在西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外代表本部族，对内统领所属族帐，西夏政权正是通过他们实现对部族的统治，蕃部族帐往往只认首领，而不认官府。”“大大小小的宗族首领，实际上是各级军事首领……豪族大酋通过层层的军事组织，实现对所属部族的控制，并在族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和较高的威望。”杨茂盛、陈春霞论证了党项部族在宗族部族的基础上完成民族统一和国家建立，分析了李继迁及其子孙如何以正确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了统一党项与建立国家。郑彦卿则在部落宗族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6页。
②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③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5页。

的层面上论述党项的封建化进程，他从党项的宗族形态、对宗族的管理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变迁考察了党项的封建化，强调儒学的传播对党项宗族部落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的没落所起到的作用。

此外金宝祥先生在《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①]一文中指出从拓跋朝光至李元昊建国的二百余年间，拓跋一家成为诸部之长的军事首领，部落联盟形成，象征着党项国家的行将诞生。漆侠先生在其《辽夏金经济史》[②]中认为党项的强宗大族是西夏的统治基础，作为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各宗族的首领、贵族组成西夏的统治阶级，成为西夏宗法封建制的代表者。克恰诺夫认为西夏"皇族嵬名氏和皇属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根据汉式法律，贵族没有天生的特权，但一般认为，尽管法律并未授予许多党项氏族家庭额外的权利，然而保证其成员在朝中受到尊重和优待。统治阶级的核心由皇族及其亲党和更多的党项官僚组成，附属于他们的是富裕但无官职的'业主'地主和牧主"[③]。

邓如萍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指出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为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所创建，西夏的监军司体现了部落寡头政治集团的代表着与君主嵬名间的关系。[④]她在博士论文中还指出党项部落贵族对王朝的忠诚体现于西夏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约，这些契约关系都反映于《天盛律令》中。[⑤]

以上研究均指出西夏皇族与后族等其他番姓大族共同分享国家权力，西夏皇族在所有的番姓大族中占有至高的政治地位。但西夏皇族究竟为何能够长期支配其他番姓大族，西夏皇族在政治上的优势难道仅仅是由于嵬名氏把持了皇帝这一政治名号？笔者认为西夏皇族的权力演进与党项拓跋氏在隋唐，定难军李氏在五代，李继迁、李德明在北宋与外部政治体的互动具有密切关系。吴天墀先生即指出唐王朝在党项居住区设羁縻州"给党项各家族或氏族的首领们戴上'刺史''都督'一类的官衔。由于他们得到中央封建政府的任命和对其特权的承认，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在党项社会中的权威性"[⑥]。

党项拓跋部为何在党项部落联合体形成之初，就在党项八大部中具有雄长之位，这应与拓跋部的核心氏族拓跋氏与吐谷浑汗族的政治交往有紧密联系。吐谷浑可汗不仅封拓跋木弥为名王，还与拓跋赤辞结姻，给予了拓跋氏崇高的政治

① 《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 5 期。
②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③ 《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160 页。
④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⑤ Dunnell, ruth. "*Tanguts and tangut state of Ta Hsia.*" Ph.D.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44 页。

地位，使拓跋氏在党项诸大族中一跃而出。拓跋赤辞降唐后，被赐姓李，这在所有降唐的党项大首领中绝无仅有。拓跋思泰在六胡州之乱中为唐战殁，这在当时忠唐的党项首领中几乎是仅有的，并与叛唐的党项首领形成鲜明对比。拓跋思泰一支因此得到唐廷的高度重视，拓跋思泰之子拓跋守礼、拓跋思泰的弟弟拓跋兴宗、拓跋兴宗之子拓跋守义都长期居于长安，任禁军军官。从现存史料及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其他的党项大族居于长安并在唐中央任职。在唐末，拓跋思恭因勤王之功再次被赐姓，并成为当时担任藩镇节度使的唯一党项人，这使党项拓跋氏在其他党项大族中具有崇高的政治威望。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称帝之前所获得的各种官爵几乎都是北宋、辽封拜的，这些政治名号都形塑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大族中的政治名望。李元昊称帝后，历代西夏皇帝都使用官爵来分配皇族、后族与其他大族的政治权力。这些官爵都模仿自辽、北宋，甚至继承自唐。因此西夏番姓大族政治权力的来源应追溯自党项政治体与外部政治体的互动。本文拟对这种互动进行详细研究，以阐释西夏番姓大族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演进。

2. 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夏州李氏权力构建的考察

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夏州李氏家族权力构建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对拓跋氏、李氏家族人物墓志的考释以及探讨李氏家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有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①]，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②]，《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考辨》[③]，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④]，乔建军《榆林唐拓跋守寂墓及墓志》[⑤]，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⑥]《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部政权墓志铭考释》[⑦]，牛达生《拓跋思恭卒年考——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一》[⑧]，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⑨]《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

①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9—394页。
② 《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⑤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3—118页。
⑥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
⑧ 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27—435页。
⑨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后李继筠墓志研究》[①]《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②]

上列论著以考证李氏家族的具体世系居多，如邓辉、白庆元考证《李彝谨墓志》《李继筠墓志》所记“韩王”为虢王李仁福，称其为“韩王”是避后周郭氏之讳。又考证《李彝谨墓志》中的“思□”为拓跋思恭。周伟洲则通过考释《拓跋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破丑氏夫人墓志》讨论了党项拓跋氏的族源、迁徙、世系及党项羁縻州静边州都督府所在地等问题。他所考列的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表是目前最详备的隋至北宋初年党项拓跋氏、李氏家族世系表。他还考证《全唐文》所载《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中的李成庆为继拓跋思恭之后的第二任定难军节度使，李成庆与拓跋思恭、拓跋思谏、拓跋思孝为父子、叔侄关系。[③]杜建录则考证了《李光睿墓志》中所记载的“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这一职官内涵以及李光睿时期定难军的内政与外交。他还通过考释墓志指出拓跋家族的婚姻为蕃汉混杂、一夫多妻，还具有姑表婚的特点。

陈玮则指出从《李彝谨墓志》所载李彝谨祖父李重建所任官职可以看到中唐以后夏州党项与灵州党项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李彝谨及其诸子在定难军属州绥州所担任的自刺史以下的各种仕职，表明了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对辖内诸州的世袭性领有和政治支配权。他还考证李彝殷被后周赐予铁券，李光睿故后由司天监占定吉凶，确定朝廷的举哀日期。这种制度还延续至李德明时期。他还指出《李仁宝墓志》的行文集中体现了夏州李氏家族的门第阀阅意识，也体现了夏州李氏对其所属诸州统治的合法性渊源有自。李仁宝退隐后的生活反映了夏州李氏家族的高度汉化以及经济实力。另外杨浣《五代拓跋部世系与婚姻考论》[④]结合汉文典籍和墓志铭初步讨论了夏州李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吴天墀则认为拓跋赤辞之侄拓跋思头可能为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⑤]

周伟洲考察了定难军的成立、定难军在唐末与诸藩镇的交争、五代时期定难军与中原王朝的斗争及交往、北宋初年定难军的消亡与复兴、李继迁的崛起以及李德明对西夏建国基础的奠定。他认为：“唐末党项拓跋氏的崛起，成为割据夏州的一大势力。这就使拓跋氏从整个党项族中游离出来，成为统治上层。其所统治的夏州、宥州、银州、绥州地区，包括了汉、回鹘、西域胡及党项等族。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以党项拓跋氏为中心的割据势力，逐渐成为分散于各地

① 《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8—143页。
③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106页。
④ 《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⑤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党项部的中心；另一方面却又使党项拓跋氏一族高据于党项诸部之上，迅速汉化，与其余党项诸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五代至宋的史籍中，将党项拓跋氏及其所建之西夏与党项诸部分开立传的主要原因。”[①]杜建录师考察了定难军的建立及其对外关系，五代时期定难军与中原诸王朝的关系。他指出：“五代时期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与中原诸王朝的关系，以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为界，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拓跋政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为中原王朝捍卫西北边陲，后一阶段拓跋政权则基本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仅维持着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双方互不侵犯。”[②]杨浣考察了定难军与辽朝之间的关系。[③]

日本学者也多以李氏家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为视角展开研究，如冈崎精郎《五代期における夏州政权の展开》[④]、岩崎力《唐最晚期のタングートの动向——西夏建国前史の再检讨(三)》。[⑤]冈崎精郎在《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系统讨论了定难军在唐末五代的发展，考察了宋初国策对李继迁兴起的影响以及李德明时期定难军的经济、外交。岩文以《拓跋李氏のフ延路进出(フは阜に鹿)》《拓跋李氏势力の消长》两节重新审视了由李氏家族执政的夏州政权的在唐末五代的发展及其与李茂贞等中原割据势力的关系。另外岩崎力在《西夏建国とタングート诸部族》[⑥]中指出李氏(嵬名氏)家族在西夏建国时期为党项各部族之“盟主”，并对李氏家族于党项诸部族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从上可见，学界对拓跋氏、李氏家族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其家族成员的墓志进行考释，还原其家族世系；或以李氏家族与夏州地方政权、与中央朝廷之间的政治关系作为研究视角，缺乏对李氏家族内部形态及定难军内部权力构成的探讨，也没有强调藩镇政治对于拓跋氏、李氏家族发展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墓志的研究固然澄清了一些不为史籍记载的史实，如李仁福为拓跋思恭之子，李彝殷被后周赐予铁券，但这些墓志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值得进一步发掘，如墓志所体现的李氏家族成员在定难军内部的仕宦升臣，他们的华夏认同以及李氏家族与其所统治的党项羌的服属关系。还有一些李氏家族成员的墓志至今仍未研究，如

①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② 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③ 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77页。

④ [日]冈崎精郎：《五代期における夏州政权の展开》，《东方学》(第9号)，1954年，第19—30页。

⑤ [日]岩崎力：《唐最晚期のタングートの动向—西夏建国前史の再检讨(三)》，《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究纪要》第48号，2003年，第53—83页。

⑥ [日]岩崎力：《西夏建国とタングート诸部族》，《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究纪要》第14号，1990年，第1—43页。

《大宋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另外如新出土的《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后晋虢王妻渎氏墓志铭》《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北宋定难军管内都军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北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均有对拓跋氏、李氏家族成员的记载，或记其为定难军节度使，或记其为定难军属州官员。通过对该批史料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定难军李氏家族在定难军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李氏家族对夏州地域社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杜建录先生将唐末五代宋初的定难军节度使认为是党项拓跋部之首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笔者以为定难军李氏历五代至北宋初年已有意识地自别于党项羌，如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铭辞称其在任时“宣扬号令，慑服羌夷”①。《李光遂墓志铭》铭辞称其“慑伏戎夷，平凌雁碛”②。李光睿之子李继捧入朝献地后，宋太宗曾向其咨询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③可见这一时期的定难军节度使已经高度汉化，其身份应属蕃汉共主的夏州藩镇节度使，而不是党项拓跋部首领。

另外有许多学者认为党项拓跋氏由于黄巢之乱而兴起，如周伟洲先生指出：“居于夏州的党项拓跋氏集团，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的机会，借唐朝统治者之手，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④但拓跋思恭的崛起是否仅仅是由于黄巢之乱中央对地方局势失控呢？笔者以为还得从晚唐以来藩镇政治的模式出发来研究。崔瑞德即指出党项“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⑤。“以山西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国家和鄂尔多斯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政权，就是作为唐代边疆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⑥

前文指出党项首领窦伯岁终身担任夏州藩镇左厢子弟兵马使。与窦伯岁担任夏州藩镇军职相似，奠定定难军基业的拓跋思恭早年亦为夏州教练使。⑦党项

---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九卷《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4页。

④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⑤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⑥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⑦ 杜建录：《党项夏州建立前后的重要记录——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考释》，《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牛达生：《夏州建立者拓跋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第二》，《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

羌酋豪加入藩镇武力早在开元年间即已出现，如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丁未，党项鹘揽支来降，授果毅，借绯鱼袋与陇右节度驱使”[①]。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之叔拓跋兴宗曾为“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将”[②]。拓跋兴宗又曾任职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麾下，其《请致仕侍亲表》之《第二表》曾上言唐玄宗道：“陛下于愚臣过听，谓边将得人，则有陇右专知教练兵马使右骁卫将军蔺廷辉，材略冠军，智勇无对。今节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令摄使替臣。”[③]《册府元龟》还记有唐文宗太和元年八月“灵州奏部落游奕使拓拔忠义招收得部落五千余帐，于界首安置讫”[④]。游奕使亦为藩镇常见军职。

以上种种说明党项酋豪进入藩镇军事系统，掌握藩镇武力成为一种军事传统。拓跋思恭因为在教练使任上平定征防卒叛乱立有大功，《新唐书·党项传》称其于“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⑤]。新出《唐宁州刺史陈讽墓志》记陈讽兄陈调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为宥州刺史。[⑥]可见《新唐书·党项传》所云拓跋思恭于唐僖宗之父唐懿宗咸通末年为宥州刺史有误。“窃据”带有强烈的贬义，考虑到《新唐书》撰修时西夏已对北宋形成了巨大威胁，欧阳修、宋祁在描述西夏始祖拓跋思恭时很可能加入了官方意识和个人情感。实际上由节度使奏请朝廷诏命本镇军将为藩镇属州刺史是晚唐藩镇政治的常态，拓跋思恭担任宥州刺史应由朝廷诏许，而非“窃据”。

黄巢起义爆发后，由于夏绥银节度使诸葛爽尚在代北征讨沙陀，时任宥州刺史的拓跋思恭得以率夏州蕃汉兵勤王赴难。诸葛爽投降黄巢后，拓跋思恭被唐僖宗赐姓李并被授予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官衔，自此李氏经五代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世袭担任定难军节度使，坐拥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成为党项诸部中最具政治号召力的大族。李鸿宾先生曾指出定难军的崛起是由于晚唐时唐廷对党项势力的失控。[⑦]但据前文分析可知拓跋思恭是由于继承了党项酋豪加入藩镇武力的军事传统而立有军功，并借此担任夏州藩镇属州刺史。由于黄巢之乱本镇节度使诸葛爽在外，其又投降黄巢，拓跋思恭才得以由夏州藩镇属州刺史升为本

①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五《外臣部（二十）·褒异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88页。

② [唐]郑宏之：《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③ 《全唐文》卷三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056页。

④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七《外臣部二十二·降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14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⑥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⑦ 李鸿宾：《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镇节度使。即使诸葛爽没有投降黄巢，但随着他的移镇拓跋思恭也可以升任夏州节度使。因此拓跋思恭及定难军的崛起可以说是由于其遵守了藩镇政治的博弈规则及黄巢之乱的风云际会。

3. 对西夏皇帝及宗室权力发展的研究

对西夏皇帝权力发展的研究主要有白滨《元昊传》[①]、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②]、史金波《西夏名号杂考》[③]、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④]、钟焓《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⑤]、吴光耀《为李继迁辩》、《略论夏国创建人——赵元昊》[⑥]、李蔚《略论李德明》《论李继迁》《关于元昊若干问题探讨》[⑦]、陈育宁《评李元昊在西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⑧]、薛正昌《略论李元昊》[⑨]、吴小强《评李元昊》[⑩]、陆宁《元昊定制浅析》[⑪]、汪家华《论李继迁受封》[⑫]、孙昌盛和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⑬]、彭向前《谅祚改制考论》[⑭]、崔红芬、文志勇《西夏皇帝尊号考略》[⑮]、梁松涛《"圣明皇帝"为西夏仁宗考》。[⑯]

白滨概述了李元昊的一生，强调了李元昊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及其在创建西夏国家过程中的丰功伟业。指出李元昊的统一与战争给原来封建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些地区带来了落后与不利的因素。李范文根据西夏帝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西夏文佛经序跋、传世西夏碑铭，结合汉文史料考证了西夏帝号风角城皇帝、面壁城皇帝、明城皇帝、白城皇帝、护城皇帝、珠城皇帝、永平皇帝、仁净皇帝、大明皇帝。他在《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中还考证了西夏帝陵 2

① 白滨：《元昊传》，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

② 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6—99 页。

③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4 期，第 706—74 页。

④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4 期，第 15—20 页。

⑤ 《历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⑥ 《宁夏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第 47—51 页。《西北史地》1984 年第 1 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3 期，第 55—61 页。

⑦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第 29—35 页。《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80—88 页。《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第 34—41 页。

⑧ 《宁夏社会科学》1988 年第 2 期，第 82—88 页。

⑨ 《甘肃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第 91—94 页。

⑩ 《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第 36—42 页。

⑪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4 期，第 93—97 页。

⑫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增刊，第 50—51 页。《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第 78—80 页。

⑬ 《西北民族论丛》1984 年第 1 期。

⑭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 年第 4 期，第 50—7 页。《西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46—51 页。

⑮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第 9—13 页。

⑯ 《敦煌学辑刊》2008 年第 1 期，第 88—92 页。

号陵陵主为夏仁宗仁孝、8号陵陵主为夏神宗遵顼。[①]史金波分析了西夏皇帝姓氏嵬名的西夏语含义及构成,指出李元昊自称之"兀卒"为西夏语皇帝之义。徐庄、吴光耀指出李继迁抗宋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加速了党项族封建化进程。顾吉辰、吴天墀、汤开建则对李继迁的卒年进行了热烈讨论。钟焓通过分析西夏文《夏圣根赞歌》和藏文史籍《红史》所记载的李继迁称帝故事,指出李继迁被神化为西夏王朝的开国者。在《夏圣根赞歌》中,李继迁被塑造为天圣子与龙的后裔;在《红史》中则被塑造为山神或龙神之子。

吴光耀认为元昊在建国上效法汉制,经济上加强与中原的联系,文化上也学习汉族的优秀文化,对宋战争带有自卫性和阶级剥削性。李蔚指出李德明为西夏立国的奠基人,其与辽、宋和好,保境安民,进击河西,有利于党项民族进步和西夏社会发展。他认为李继迁初步统一党项诸部、重建夏州政权,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以及对宋贸易对于党项族独立和党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李蔚还分析了元昊建国的必然性,认为元昊统治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反映了皇权的集中与部落首领分权的矛盾。陈育宁指出李元昊在吸收汉族先进经济文化、推动党项社会发展等方面,以及他在建国称帝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对于西夏的建立和长久存在起了重要作用。薛正昌认为李元昊对于西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吴小强认为李元昊建国代表了党项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愿望和利益。陆宁指出元昊定制是"外蕃内汉"的封建化改革。

罗矛昆认为夏仁宗仁孝提倡文治顺应历史潮流,但削弱了党项人崇实尚武的民族精神,使西夏走向衰落。彭向前认为夏毅宗谅祚改制仿唐色彩浓厚。崔红芬、文志勇考证了西夏皇帝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的尊号,指出这些尊号是西夏封建化高度成熟的表现。梁松涛考证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出现的"圣明皇帝"为夏仁宗仁孝尊号。彭向前考证蒙元史料所记西夏皇帝为李王乃孛王之误,孛王乃西夏皇帝自称,借自回鹘语"佛"[②]。

另外伍纯初认为西夏王族姓氏的更改反映了西夏政权与中原政权势力的消长,是党项羌、西夏与汉民族文化交流、封建化的历史。[③]刘兴亮指出西夏皇室的婚姻以党项族的内部婚为主,与汉、吐蕃、契丹有着广泛的婚姻关系,具有礼制婚

①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② 《西夏"李王"为"孛王"试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天中学刊》2004年第4期。

俗与原始婚俗并存、婚姻的多元化与等级性并重，政治色彩极强等特点。[①]日本学者中嶋敏讨论了李元昊与野利氏家族的政治关系，分析了西夏君主权的特性。[②]刚崎精郎分析了李元昊实行秃发令的政治原因。[③]中嶋一郎对西夏皇帝及其国内政治也进行了研究。[④]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⑤]在论述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西夏政治形势和战争形势时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西夏皇族。克平"*Tangut (Xi Xia)degrees of mourning*"[⑥]依据《天盛律令》间接提到了西夏皇族的丧服制度。

对西夏宗室权力发展的研究主要有陈玮《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皇族》[⑦]《西夏皇族研究》。[⑧]陈玮对西夏皇族的封爵爵称、授受、等级、任官系统进行了考述，对西夏皇族政治特权、法律特权进行归纳研究，分析了西夏皇族的内争及其与后族的权力斗争。强调了作为皇权辅翼的西夏皇族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婚姻生活的阶级特点以及皇族社会生活与皇权的互动。另外李范文在《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释》针对一些宗室，如越王嵬名仁友、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进行了考证。[⑨]

通过对西夏宗室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皇族作为从本国皇室衍生出的庞大的继嗣性群体，与本国皇权紧密相连。在西夏立国初期，皇族大都世居京城，但随着西夏享国日久，皇族逐渐由京城流向地方，如沙州、西凉府及黑水镇燕军司，地域元素逐渐影响到了皇族的宗族结构，皇族中的地方精英开始出现在了基层社会。从皇族的政治生活来看，其所享有的特权超过本国任何一个番姓家族。封爵高低、任官大小、财富拥有数量成为构成皇族内部阶层等第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皇族成员进行授爵与任官，使其成为贵族世家与官僚世家，辅弼皇室掌握国家政权，积极影响国家统治秩序的构建。血缘、封爵、官位共同构成了西夏皇族跻身于西夏贵族阶层的政治基础。有夏二百年，在朝堂上，皇族官员冠盖如云，在军队中皇族军官被士兵景从云集。朝堂与地方府州均成为皇族政治活动的

① 《论西夏皇室婚姻的几个问题》，《西夏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74—81 页。

② 《西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西夏の李元昊と禿髪令》，《东方学》第 19 号，1959 年，第 77—86 页。

④ [日]中嶋敏：《东洋史学论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汲古书院，1988 年，第 433—445 页。

⑤ Е. Н. Кычанов. *Оу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ва*,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И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9.

⑥ Ksenia Borisovna Keeping, "Tangut(Xixia) degrees of mourni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4: 2 (1991), pp.1-63.

⑦ [日]中嶋一郎：《西夏国主の研究》，《龙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第 8 号，1987 年，第 175—177 页。

⑧ 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⑨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9—11 页。

场域，其政治空间也由朝堂、地方府州向国家军事领域扩展。在君主独裁政体下，皇权与皇族相辅相成。西夏皇帝为维护皇室利益和家族统治，在国家大典中制定诸多优惠皇族的政策，使西夏皇族以其天潢贵胄的高贵身份在西夏国内享受着法律特权和丰厚的物质生活。西夏皇族中的近支与远支社会地位和所享受的特权迥然有别又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等级差别。西夏的国家权力虽高度集中于西夏皇帝一人之手，但由于皇帝身为嵬名氏家族的最高"族长"，因而嵬名氏家族地位崇高，国、家一体，皇族事务成为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皇族成员掌握军国实权，对西夏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西夏皇帝通过《天盛律令》这一国家正法来限制皇族权势，以制度来约束皇族，加强对皇族的控制，以期皇族"忠君亲上"，避免激烈的宫廷政治斗争。但由于《律令》本身为西夏皇室用以维护其皇统延续和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其颁行反而扩大了皇族的社会影响，使皇族的发展与西夏王朝的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

从上可见，对西夏皇帝权力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对一些在西夏历史上具有特殊功绩的皇帝给予述评，如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仁孝。除钟焓利用西夏文《夏圣根赞歌》及藏文史籍对李继迁神性形塑的过程进行研究外，大都为利用传世汉文史料对政治事件的研究，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总的来看，对西夏皇帝权力发展还应的研究还应考察其构造政治谱系的过程，钟焓利用西夏文《夏圣根赞歌》及藏文史籍对李继迁神性形塑过程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即属于西夏皇帝构造政治谱系的研究。在众多番姓大族所组成的西夏社会中，皇族嵬名氏如何确保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及支配其他番姓大族，正可由其所构建的政治谱系来解释。埃德蒙·R·利奇指出："等级是生来就有的，阶层很显然是一种属于整个世系群而非个人的属性。因此一个个人如果想要人们承认他出身高贵，那么他要努力争取的就不仅仅是让他个人，而是让整个他的世系群获得承认。"①"最后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操纵谱系传承得到的结果。"在西夏末期出现的两次政变均由出镇地方的宗室王发动，发动政变的具体原因以及西夏宗室与皇室在政治生活中的互动也有待深入探讨。本文拟对西夏皇帝的政治谱系及西夏宗室与皇室在政治生活中的互动进行详细研究。

4. 对西夏后族权力发展的讨论

对西夏后族权力发展的讨论主要有白滨《论西夏的后族政治》②、顾吉辰《西

① [英]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等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8页。

② 《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63—70页。

夏后妃制度考述》[①]、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札记》[②]、李辉《试论西夏梁太后之族属问题——兼论西夏境内的"蕃化"汉人》[③]、王德忠《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④]、白雪《西夏后期的后族与政治》、[⑤]佟建荣《西夏后妃姓氏异译考论》[⑥]《西夏后妃宗族考》[⑦]。白滨论述了西夏景宗、毅宗、惠宗、崇宗、仁宗五朝后妃干政和外戚擅权的史实,分析西夏后族政治具有母后临朝,外戚擅权,后、戚矛盾长期存在,实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等几个特点,分析了后族政治对西夏社会的消极影响。顾吉辰则讨论了西夏后妃的婚姻制度、丧典制度以及后妃崇尚佛教及后妃擅权。汤开建考证了西夏梁太后的族属,指出其源出党项梁家族。李辉则认为梁太后为西夏蕃化汉人。王德忠指出没藏氏、梁氏专权时期的西夏对外交往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削弱了西夏统治阶级的力量,也使西夏在对外交往中面临困难局面,陷入孤立。白雪指出党项罔氏对夏仁宗推行汉化与善政有密切关系。佟建荣分析考辨了由于夏汉语音差异所导致的汉文史料中的西夏后妃中的党项后妃姓名讹误,她还进一步考证梁氏是党项化的银夏大族,没移氏则出于天都山一带。另外魏淑霞在研究西夏相权时指出西夏宰相专权反映了西夏皇族与后族之间的政治角逐。出身后族的宰相专权使后族势力达到顶峰。[⑧]黄振华在《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中指出黑水城的梁氏应出于梁太后一族。[⑨]陈炳应则认为野利仁荣与遇乞为同一人,遇乞为名,仁荣为字。[⑩]

从上可见对西夏后族权力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西夏后族对于西夏皇族独裁政治的干预,以及考证西夏后族的族属。这种干预在本质上是部落政治对皇权政治的挑战。在现存史料比较丰富的西夏后族中,属于西夏番族的有破丑氏、野利氏、没藏氏、罔氏,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对以上四族的个案研究。对于这些后族的汉学及番学修养的研究也尚付阙如。从史籍记载来看,虽然西夏建国伊始番姓大族就与华夏决裂,张扬本族文化,但诸大族毕竟受华夏文化长期浸润,不少大臣兼修番汉两种文化。如野利仁荣仿汉字创制西夏文,正说明其拥有较高的

① 《宁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2 期,第 70—75 页。
② 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403—449 页。
③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第 29—31 页。
④ 《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2 期,第 24—27 页。
⑤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⑥ 《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第 106—111 页。
⑦ 《西夏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28—33 页。
⑧ 《西夏相权初探》,《西夏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52—59 页。
⑨ 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13—318 页。
⑩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61 页。

汉学修养。野利旺荣也曾以汉文回书范仲淹。在闽宁村出土的西夏墓葬被认为是西夏初期京畿地区野利氏的家族墓地,[①]在这座墓地没有发现西夏文残碑,反而发现了一些汉文碑刻。这正说明野利家族以汉学见长。

三、对西夏番姓大族信仰世界的研究

沈卫荣先生指出:"西藏史家通常将西夏与印度、尼泊尔、于阗、蒙古等一起列为遵循佛陀释迦牟尼所传教法治理国家的佛国之一,自 13 世纪中期以来的大部分藏文史著中,西夏王室及其佛教信仰的历史通常是其佛教世界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学界对西夏番姓大族信仰世界的研究主要围绕西夏皇室的佛教信仰而展开。史金波先生考察了西夏皇室主导下的西夏佛教发展史。他认为在西夏政治生活中,"从部落首领上升为国王、皇帝的拓跋氏(嵬名氏),希望以自己的权威,绝对压倒各部落首领的平等要求。西夏皇帝需要释迦牟尼那种在佛教中说一不二的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君权。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提倡佛教,在客观上起到了扫除那些不尊重君权的思想残余的作用。佛教成了维护并发展西夏封建社会的一种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③]。"西夏统治者平时就信仰佛教,利用各种机会,广作佛事,起到自身信奉和对外宣扬的双重作用。若遇国家危亡,或身染重病时,则更把佛教作为解脱苦难的依托,求助于佛的保佑。"[④]他认为西夏皇室对佛教的倡导,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非常突出,"西夏的皇帝和皇后不仅直接提倡译经、印经,作种种法事活动,而且作西夏三藏圣教序和为某一佛经的译印而作的御制序也明显地比唐、宋历朝多。更为突出的是西夏的几朝皇帝和皇太后都以佛经的译者、校者署名于当时所译、校的佛经卷首。这样就把皇室和佛教的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西夏的皇帝、皇后尽管自己不一定亲自去译、校佛经,但他们形式上的署名,已经使他们从一般的倡导者变为主要佛事活动的实践者。这一点,在历代王朝中是极少见的。"[⑤]他还认为西夏早期统治者对佛教的理解受到儒学的影响,西夏后期统治者比早期统治者更加依托佛教,将佛教作为全民信仰大力推行。他还解读了《西夏译经图》,认为译经图中的西夏皇室成员为夏惠宗秉常及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闽宁村西夏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43 页。

② 沈卫荣:《宗教信仰和环境需求——十一至十四世纪藏传密教于黑水城地区的流行》,《黑水城两千年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2 页。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94 页。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197 页。

⑤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202 页。

其母梁太后。他们亲临译场主要是布施功德，并不是真正的译者。[①]他还考察了西夏后族对西夏佛事的参与，指出第一梁氏和第二梁氏皇太后“不仅是垂帘听政、手握朝政的政治家，还是信仰、提倡佛教的领袖”[②]。他又研究了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认为莫高窟第409窟的供养人为西夏皇帝。莫高窟西夏洞窟的龙凤藻井与西夏皇室密切相关，莫高窟大规模修建是西夏皇室所为。[③]

孙伯君梳理了夏仁宗仁孝时期的校经实践，研讨了夏仁宗校译佛经的宗教背景、校译规程、参与经师、校经原则和校勘重点。[④]崔红芬考察了西夏政权和佛教僧团之间的关系，指出西夏皇室参与西夏经藏的管理和补配。[⑤]她还梳理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与西夏皇室的关系，指出藏北昂仁寺的西夏皇族后裔或为废帝纯佑的后裔或为专门前往藏地学习佛法的皇族。[⑥]

彭向前考证西夏圣容寺为西夏模仿宋代在寺院宫观设置帝后神御之举，吸取吐蕃佛祖合一的思想而创建的。[⑦]牛达生认为西夏陵陵台实为佛塔，表明西夏皇帝逝后愿意被人当作佛来供奉，西夏皇帝视己为佛。[⑧]聂鸿音先生指出西夏陵出土的大量迦陵频伽昭示了西夏皇帝生前为佛。梁松涛、杨富学通过对西夏宫廷诗《御驾西行烧香歌》的考释，认为夏仁宗仁孝于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从兴庆府出发，抵凉州圣容寺烧香，驻跸张掖时行香大佛寺、马蹄寺，继之亲幸黑水桥，再西行至瓜州榆林窟。[⑨]苏航则在《御驾西行烧香歌》甲乙合校本的基础上，结合汉、藏文史料，重新讨论了诗中的西夏皇帝身份，认为该皇帝可能为夏桓宗纯祐。[⑩]

邓如萍认为西夏帝师的设立反映了夏仁宗于任得敬之乱后，“为在统治集团面前抹去自己脸上的污点和重获个人合法权威而付出的努力”。“在其御撰的大量佛经序言和发愿文中，仁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毕恭毕敬、一丝不苟的君主，一个虔诚的佛教行家里手，一个法与民（藏、番、汉）的有钱有势的保护人，一个在其

①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考》，氏著《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98—311页。
② 史金波：《中国妇女通史》（辽金西夏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354页。
③ 《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第四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1页。
④ 孙伯君：《西夏仁宗的校经实践》，《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⑤ 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⑥ 崔红芬：《文化融合与延续：11—13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58页。
⑦ 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⑧ 牛达生、贺基德：《西夏陵三题》，《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⑨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⑩ 苏航：《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帝师直接权威下所设大量佛教机构的诚惶诚恐而又至高无上的大头目。”[①]她还梳理了佛教与西夏君主政治的关系，指出元昊在西夏境内选定五台山是争取西夏佛教徒支持的重要政治行为。元昊的独立宣言暗含了对北魏崇佛传统的继承。在后族执政时期，西夏统治者依靠佛教的支持，将个人的超度和帝国正统性相结合。佛教帮助后族维持了广泛的政治同盟。[②]史伯林讨论了藏传佛教跋绒派与西夏皇室的关系。[③]林瑞宾认为榆林窟第三窟佛顶尊胜曼荼罗中的供养人是夏仁宗仁孝，佛顶尊胜是西夏皇室的保护神。[④]向本健详细考释了没藏太后所建《承天寺碑》，揭示了没藏家族借助佛教进行政治统治的背景。[⑤]

西夏番姓大族的信仰世界中还存在着天崇拜和龙崇拜。张迎胜先生认为元昊之名意为昊天，元昊自称兀卒具有青天子之意。“这些自我命名，不仅适应了西夏民众的天神崇拜意识，更便于树立帝王的绝对权威。”[⑥]他指出西夏大族首领称号谟宁令所表示的天大王之意使这些首领“便有了替‘天’行事之责，这是很容易受到具有天神观念的西夏民众的认可和拥戴的”[⑦]。“西夏统治者是以‘天神’（‘天尊’）作为他特殊身份的政治伙伴，靠他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捍卫自己居于统治的地位，实现对国家权利的垄断。可以肯定地说，是西夏统治者对西夏民众天神信仰的利用和篡改，造成了西夏王朝政权和神权的迭合。”[⑧]他以元昊为母梦白龙而生、德明闻有龙见而迁都、西夏陵的龙造型对象、《天盛律令》对龙图像的垄断为例指出龙神是西夏政权的奠基石和保护神。

上述研究表明西夏皇室利用佛教、天崇拜、龙崇拜等各种信仰来塑造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王海洲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社会的天然伴生者，是统治行为得以可能和顺利施展的根本原因。”[⑨]特德 C·卢埃林认为：“宗教和超自然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权力直接依靠宗教，如神权政治

① ［美］邓如萍著，聂鸿音、彭玉兰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

② Ruth W.Dunnel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③ E.Sperling, Further Remarks Apropos of the 'Ba'-rom-pa and the Tangut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7.1, 2004.

④ Rob Linrothe, *Xia Renzong and the Patronage of Tangut Buddhist Art: The Stupa and Ushnishavijaya Cult*,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N.28, 1998.

⑤《西夏の仏教とその政治的背景》，《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第 23 号，2006 年，第 111—135 页。

⑥ 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 页。

⑦ 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 页。

⑧ 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2 页。

⑨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 页。

就是如此;第二,宗教可用来使统治精英合法化;第三,宗教可为谋求权力的人提供他们操纵的深层结构、信仰和传统。"[①]西夏皇室正是利用佛教等信仰来使自己的政治统治合法化。王小甫认为中古中国的北族首领"是族群的人格化,既然如此,他就不能是一般的族群人员,停留在王中之王、众汗之汗这样的政治层面也不行,他必须被想象为具有超凡格位,即需要被神化,这在传统社会对于族群凝聚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造神运动方面,外来宗教具有特殊的功效"[②]。西夏皇帝视自己为佛、天子、龙子是神化自我的重要政治手段,受到了佛教王权观和中原皇权观的双重影响。

司徒安认为在古代中国,"在儒家的形态下,皇帝的言行代表了没有躯体的'天';在佛教的形态下,他是与僧团尊者保持和谐关系的转轮王,两者在证悟的名义下结成共生关系"[③]。西夏皇帝视自己为佛与佛教的王权观具有密切联系,在藏文史籍中西夏皇帝通常被称为法王,而转轮王即是法王。萨玛秀克认为:"在吐蕃人的观念中,西夏国王是'法律的君主'。"[④]实际上,法王并非法律的君主,而是指尊崇并弘扬佛法,以佛教意识形态治国之王。邓如萍曾谈道:"附带说,我在寻踪以求说明仁宗或其他西夏君王在树立君王地位时曾借用过转轮王的名号和偶像。我的研究还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详尽的证据将使这项论题大有可为。"[⑤]本文拟对西夏皇帝转轮王名号的来源,以及西夏皇帝转轮王名号与西夏政治的关系进行详细讨论。莫里斯·迪韦尔热指出:"权力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和来源是它符合本集体的价值和标准系统所规定的合法性设想,而且本集体内部一致同意这种设想。"[⑥]转轮王、祥瑞、星象、天崇拜、龙崇拜都是中古中国历时悠长的政治传统,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所信服。本文除将讨论西夏皇帝转轮王名号的来源,以及西夏皇帝转轮王名号与西夏政治的关系外,还将系统研究西夏皇帝怎么样运用祥瑞、星象、天崇拜、龙崇拜来形塑自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及祥瑞、星象、天崇拜、龙崇拜与西夏政治的演进。

---

① [英]特德·C·卢埃林著,朱伦译:《政治人类学导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② 王小甫:《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2页。

③ [美]司徒安著,李晋译:《身体与笔: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④ [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西夏绘画中供养人的含义和功能》,景永时编:《西夏语言和绘画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⑤ [美]邓如萍著,聂鸿音、彭玉兰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⑥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第四节 本书结构安排

当前学界较多地将西夏的番姓大族和唐五代的党项大族分开进行研究，较少注意到这些大族在公元 7 至 13 世纪间的连续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中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与形塑。本书试图在较为全面搜集汉文、西夏文史料的基础上，系统研究这些大族在公元 7 至 13 世纪的连续发展，集中考察其政治权力在不同时代身份转变下的扩展，以及政治权力对其身份认同意识的形塑、政治权力与信仰世界间的互动。具体而言，是通过分析党项部族对藩镇体制的附着及渗透，探讨藩镇职官系统对党项部族政治演进的影响。将以几个党项大族为核心形成的地域部落集团，如夏州党项、灵州党项置于唐廷应对吐蕃东侵、回鹘汗国崩溃余部南下、吐蕃王朝崩溃的北亚政治大变局下予以考察，分析羁縻府州消解前后党项大族形成地域部落集团的原因。嵬集传世史籍及出土墓志所见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节度使各类官衔及本镇士人对其尊称，将此类史料置于唐末定难军作为藩镇、五代的定难军作为独立强蕃、北宋初年的定难军作为名义上的藩镇、实为独立王国的政治演变观察视域中，探析其不断变化的政治内涵。从胡籍藩镇转变为封建王朝的视角观察西夏皇族对其他番姓大族的权力支配及双方在国家政权中的权力分配，探讨部落政治如何在封建国家构建中转变为贵族政治。利用宗教社会学理论讨论黑水城出土西夏佛经发愿文、题记所反映的番姓大族的功德实践及宗教权力分层。同时对西夏番姓大族信仰对西夏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西夏番姓大族的家族文化对西夏国家文化的影响予以深入考察。

具体而言，本书绪论将讨论西夏的族群结构与族群认同，分析党项人的他称和自称，考察党项人在复杂的族群结构中如何形成族群认同，西夏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间的关系。探析西夏皇族嵬名氏与后族卫慕氏、野利氏、没藏氏、梁氏、罔氏在西夏社会中的发展历程。回顾、评论学术界既有研究，提出本书将要讨论的论题。第一章主要讨论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考察唐代党项拓跋氏从猕猴种到西羌、从西羌到北魏拓跋氏后裔的身份认同转变，唐代党项窦氏自居为西羌和扶风窦氏的双重身份认同，定难军李氏自居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唐皇族、华夏、党项的多重身份认同，西夏皇族嵬名氏自居为番人、北魏拓跋氏后裔、唐朝李氏、北宋赵氏的多重身份认同，并分析产生这些身份认同的原因及影响。第二章主要讨论西夏番姓大族的权力构建，考察党项拓跋氏、窦氏与唐中央及夏州藩镇之间政治关系的演进，分析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节度使官爵制度之变迁及其政治内

涵，定难军节度使与本镇职官系统间的政治关系，探讨李继迁、李元昊政治谱系的建构与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系；通过考察西夏番姓大族的封爵、文武仕途、权力斗争分析番姓大族对西夏国家权力的分割与支配。第三章主要讨论西夏番姓大族的信仰与西夏政治之间的互动。首先考察唐五代以来丝路佛教对灵夏党项的影响，再分析西夏皇室如何利用舍利崇拜、佛王传统来塑造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探析西夏番姓大族的宗教实践及宗教权力分层；再讨论祥瑞、星象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间的关系，探析西夏皇室怎样利用天崇拜、龙崇拜和祖先崇拜来建构王朝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最后对上述研究进行概括性总结，指出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与信仰始终与他们的政治权力演进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与信仰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第一章　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

第一节　猕猴种、西羌别种、北魏皇族后裔：唐代党项拓跋氏之身份认同

一、党项拓跋氏族出西羌

盛唐时代的开元年间，党项拓跋氏被认为是羌族，反映此一观念的主要是新近出土的《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该墓志云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国连要服，气蕴金行，俗尚酋豪，力侍刚悍，载炳前史，详于有隋”。墓志铭铭辞亦云：“三苗之胤，惟姜有光。”[①]志文“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化用自《后汉书·西羌传》所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②]王明珂先生指出《后汉书·西羌传》的此种叙述，体现的是“‘三苗’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凶人的化身，曾被华夏祖先‘舜’打败而遭流放于边远之地。因此将羌人视为三苗之后，也就是华夏借此‘羌人的祖源’来表示这些异族的邪恶本质与边远劣质。这篇文字又称羌人是‘姜姓之别’，也就是说他们是姜姓炎帝之族的一个支系。在战国末至汉初文献中，炎帝常被书写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因此称羌人为姜姓之别，也是喻指他们是被华夏英雄打败而居于边地之失败英雄的后裔”[③]。志文“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中的“出自三苗”正指出了拓跋守寂出于非汉族群，而“盖姜姓之别”又暗指拓跋守寂与华夏具有一定联系，是华夏边缘之人。

---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一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③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2页。

志文“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说明了拓跋守寂姓氏之来源及其郡望。根据志文，拓跋守寂单名寂，字守寂，如此“以字为氏”似意为拓跋守寂之名与字相通。但《风俗通义》云：“禄氏，纥子武庚，字禄父，其后以字为氏。”[①]《大唐故骞府君墓志铭》亦云：“其先闵损，字子骞，孔门之十哲。子孙以王父之德，以字为氏。”[②]可见“以字为氏”指的是拓跋守寂之姓氏拓跋来源于其先人之小字。

罗新先生认为在内亚政治中，“‘拓跋’是一个由官号和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是官号，‘跋’是官称，‘拓’是修饰‘跋’的，‘拓跋’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实践中某一固定的名号”[③]。关于拓跋为内亚游牧政权之官称，中原史籍有明确记载。《唐会要》记贞观五年突厥“阿史那阿咄苾败走后。其酋及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用。徒费中国”[④]。《新唐书·李大亮传》则记“诏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使以绥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之未附者，峙粮碛口赈其饥”[⑤]。可见拓跋与拓设相通，其时任突厥拓设的为阿史那社尔。

拓跋既为官称，而志文云拓跋来源于拓跋守寂先人之小字，则此小字或由官称而来。在内亚游牧政权中，官称确实可以用作人名，如入唐葛逻禄藩将炽俟弘福之祖父名娑匐颉利发，据罗新先生研究，娑匐“是由一个官号（娑、设）加上一个官称（匐、墨、卑）联合构成的一组政治名号”[⑥]长期存在于突厥政治体系中。颉利发（eltäbär）亦为突厥官称，据《周书》所记突厥官制，颉利发位于叶护、设、特勤之下，为突厥第四等高官。吴玉贵先生指出：“颉利发是突厥汗国常见的官职，在汉文史籍中又有俟利伐、希利发、俟利发、俟列发等不同的译法。”[⑦]芮传明先生认为颉利发为颉利吐发之省称。[⑧]罗新先生则认为：“俟利发、颉利发、俟利伐、俟力发、俟匿发，还有高昌曲斌造寺碑里的希利发等等，对应的都是同一个柔然、突厥政治体中的某一个专有制度名号。”[⑨]娑匐与颉利发可并连在一起作为官称，《新唐

① [东汉]应邵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9页。
②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③ 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④ 《唐会要》卷七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54页。
⑤ 《新唐书》卷九九《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11页。
⑥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⑦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⑧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⑨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书》即云突厥属部仆骨部酋长为"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①。因此炽俟步失之父娑匐颉利发无疑是采用了自己在为西突厥官属时的官称来作为己名。

党项内附隋唐之前，曾长期服属于吐谷浑。《拓跋守寂墓志》云拓跋守寂先祖"名王弥府君洎附，授大将军"②，此"名王弥府君"即《隋书·吐谷浑传》所记"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③之拓拔木弥。拓拔木弥任吐谷浑名王，其先祖或任吐谷浑拓跋，党项拓跋氏因此得姓。

志文"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明指拓跋守寂郡望为西平郡。唐制将相大臣"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④。拓跋守寂爵位正为西平郡开国公。东汉和隋的西平郡均位于今湟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所记羌人也游居于此，但党项的居地位于今白龙江流域，因此《后汉书·西羌传》所记之羌人与党项人并不都是同一族群。前文谈到墓志称拓跋守寂为三苗之后源于《后汉书·西羌传》对之羌人祖源之描述，但实际上党项自有其祖源的历史记忆，《隋书·党项传》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⑤本身为猕猴种为青藏高原族群之普遍历史记忆，内迁前之党项所居地正为青藏高原东缘。志文将党项人的祖源记忆修改，将其祖源与汉代的羌人相联系，使党项在血缘上成为汉代羌人之后。唐廷以拓跋守寂郡望为西平郡，封其为西平郡公，更是在地缘上使党项人变为了汉代羌人之后。

志文"国连要服，气蕴金行，俗尚酋豪，力侍刚悍"进一步在地缘和文化表征上点明了拓跋守寂属于非汉族群。"国连要服"说明拓跋氏一族居于属于要服之地。《周礼》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⑥《周礼》又云在要服之外为藩国，属于化外之地，这样要服便成为华夏边缘之地。"气蕴金行"则指出拓跋氏一族居于属于西方的要服之地，因西方属金。"俗尚酋豪，力侍刚悍"则说明在文化风俗上拓跋氏一族为不同于华夏之人。实际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附仆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0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一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③ 《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4页。

④ [唐]李涪：《刊误》卷下《封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2页。

⑤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5页。

⑥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74页。

上“国连要服，气蕴金行，俗尚酋豪，力侍刚悍”也是源于《后汉书·西羌传》对汉代羌人的描述。《后汉书·西羌传》云汉代羌人“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①。

志文“载炳前史，详于有隋”，说明墓志文作者认为拓跋氏的族源、血缘、居住地域、文化风俗都见载于《隋书》这一官方典范文本。《隋书》的纪传部分与史志部分分别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和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隋书》对党项的记载见于《隋书·西域·党项传》。《隋书·西域·党项传》记载党项的族源为三苗之后，其居住地域“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其文化风俗为“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②。这样一种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异族意象的他者描述，隋人对于党项这一族群的文化风俗其实是极为陌生的。《隋书·西域·党项传》即记载隋文帝对入朝的党项酋豪子弟谈道：“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③可见隋文帝对移动这一游牧人群的基本属性不甚了解。王明珂先生认为：“移动以及随时做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的利器。移动，使得他们能利用分散且变化无常的水、草资源，也让他们能够及时逃避各种风险。必须经常移动，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④

由于《隋书》成书于唐初，《隋书·西域·党项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初唐人对于党项的认识，但《隋书·西域·党项传》并没有记载党项的内部结构，仅简单地提及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⑤。直到安史之乱后，杜佑才在《通典》中谈到党项“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⑥。这种对党项氏族组成的明晰描述，应该是由于党项内迁成为内蕃后，唐人与之接触频繁才导致的。

墓志文作者认为拓跋氏的族源、血缘、居住地域、文化风俗都见载于《隋书》，是强调本人对拓跋守寂族源的描写渊源有自，同时也借《隋书》这一官方典范文

① 《后汉书》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②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5页。
③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6页。
④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⑤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5页。
⑥ 《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党项》，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69页。

本来强调自己背后的唐廷对于党项族源的解释是具有权威性的，不容更改的。在传统文化中，墓志文具有公私双重属性，于私而言，由于墓志深埋地下，因此墓志文是逝者在地下世界中的身份凭证；另一方面，由于岁月荏苒、山谷变迁，墓葬往往平毁，但墓志由于为石质通常可以长存于世，即使被发掘出来，也可供后人了解志主生平，所谓“恐人事随化，陵谷迁移，纪德镌功，乃为不朽”[①]也。于公而言，高官的墓志文或由朝廷遣人撰述，或由高官亲属礼请名家撰写。由朝廷遣人撰述的墓志文因其官方性质，极有可能被撰作人甚至官府保存副本；由名家撰写的墓志文往往被名家编入自己的文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无论是朝廷遣人撰述还是礼请名家撰写，高官亲属均会保留一份副本，这样墓志文又会在高官家族中代代流传。由于墓志文在官府、社会、本家族三种层面流通，因此墓志的公共属性是大于其私属性的。

根据志文，拓跋守寂，“以开元廿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寝疾，薨与银州敕赐之第。诏赠使持节都督灵州诸军事、灵州刺史。赙物一百五十段，米粟一百五十石，应缘丧葬所在官给，遵朝典也。粤明年八月十八日，护葬于银州儒林县新兴乡招贤里欢乐平之原，安吉兆也”。志盖阴面又刻有拓跋守寂“业继英豪，志怀忠烈，绥其种落，扞我边陲，岁序滋深，勋庸益著。生而懋赏，既洽于荣章；没有追崇，更优于宠数。宜增上卿之位，以饰重泉之礼。可赠鸿胪卿，仍令夏州刺史郑宏之充使监护，主者施行”[②]。可见拓跋守寂从逝世到安葬都被朝廷密切关注，朝廷不仅赠官，还在经济上予以赙赠，甚至遣夏州刺史郑宏之护葬，拓跋守寂可说是极尽身后之荣。拓跋守寂墓志文作者为夏州刺史郑宏之，墓志文的书写者为洛阳县尉郑□，从两人的身份、郑宏之参与护葬以及朝廷对拓跋守寂丧葬的重视来看，拓跋守寂墓志文的撰作应为官方行为。这样一种印刻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墓志文陪伴着拓跋守寂长眠于地下，表明拓跋守寂的亲属已接受了唐廷对于拓跋氏祖源、血缘的认定，其族属由白龙江流域的游牧人群变为了与汉代河湟羌人有血缘承继关系的党项羌。至于拓跋守寂本人是否认为自己是党项羌人已并不重要，冰冷的墓志成为逝者的代言人，诉说着逝者的祖源、血缘。

① [唐]李志暕：《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27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二、党项拓跋氏族出鲜卑

拓跋守寂一族对于自身族属的认识，还可以从拓跋守寂之叔拓跋兴宗的表文中窥探。拓跋兴宗曾参与拓跋守寂葬礼，其留存于世的三篇表文被《全唐文》所收录，撰作时间据韩荫晟先生考证为天宝五、六载（745—746年）。[①]拓跋兴宗在《请致仕侍亲表》中谈到自己“蕃夷贱末，久荷国恩，靡钝策疲，已历三纪”[②]。在《第二表》中又云己“以蕃夷之贱品，忝冠冕之清流，身带三印，爵封五等，入践命卿，出为副将，正是臣报国立功、荣宗耀戚之时。爰惜毛羽，保持名位，宁可进寸，其容退尺，岂愿损华毂以傅板舆，乐闲居而忘厚秩？士君子犹贪其富贵，臣种类岂知其矫饰！”[③]在《第三表》中谈道：“臣虽戎狄贱品，忝沐熏风，乌鸟之心，实愧乳哺。”[④]从三表叙述可知，拓跋兴宗认为自己是蕃夷、戎狄、种类，蕃夷、戎狄这些带有歧视性的词汇表明其来源于非汉族群，种类则说明其为部落之人。蕃夷、戎狄在唐人语境中通常指北部边境族群，如出于铁勒仆固部的朔方军大将仆固怀恩云：“臣家本蕃夷，代居边塞，爰自祖父，早沐国恩。”[⑤]出于沙陀的晋王李克用指斥唐廷：“且陛下陷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之后，骂臣曰戎、羯、蕃、夷。”[⑥]章群先生即指出：“所谓蕃胡，大抵可分为蕃与胡，蕃指唐代自东北至西北沿边诸族，胡指西域胡。”[⑦]

拓跋兴宗称自己为带有强烈北族色彩的蕃，而没有称自己为羌，是何原因？余以为是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拓跋氏一族自内迁后世袭银州下辖的党项羁縻州静边州都督，而银州所属的河曲地域自初唐以来就接纳了大量突厥降众，唐廷在此地域还设六胡州以处已经游牧化的突厥系粟特人。突厥第二汗国可汗默啜曾向武则天“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⑧]。艾冲先生指出：“历史文献所谓‘六州’系指‘丰、胜、灵、夏、朔、代六州’，此说不确；其实所谓‘六州’是指‘河曲’地域的丰、胜、灵、夏、盐、银六州，因为突厥颉利可汗直管诸部、阿史那苏尼失部落、阿史那抹末部落、阿史那社尔部落游牧地就在这

① 韩荫晟编：《党项西夏资料汇编》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②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3132页。
③ 同上，第3133页。
④ 同上，第3133页。
⑤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83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59页。
⑦ 章群：《唐代藩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2页。
⑧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武后神功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16页。

'河曲'六州之间，默啜索要的正是这些'降户'。"[①]邻近银州的夏州，其下辖的羁縻府州，有不少由党项人和突厥人、铁勒人混组。《旧唐书·地理志》云："云中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五：舍利、思璧州、阿史那州、绰部州、白登州。""呼延州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三：贺鲁州、那吉州、跌跌州。"[②]据此，由党项部落为主体的云中都督府下辖有铁勒羁縻州舍利州，突厥羁縻州阿史那州，另一由党项部落为主体的呼延州都督府则下辖有铁勒羁縻州跌跌州。党项人不仅和突厥人、铁勒人混居，还有着相同的经济形态。《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云："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州，拓跋、舍利、仆固、野利、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③]在这种多族群混居的情况下，党项人受到突厥人、铁勒人的影响而加速其北族化则不难想象，因此拓跋兴宗称自己为带有强烈北族色彩的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仆固怀恩也称自己为蕃夷，而其正出于夏州下辖的铁勒羁縻州仆固州都督府，与拓跋兴宗为同一地域之人，同一地域不同族群之人采用同一民族泛称，说明二者对北族这一超越各自族群的广大游牧人群符号的认同趋向性。

党项拓跋氏的身份认同观念，随着拓跋氏一族与汉地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在安史之乱后又发生了重大转变。拓跋守寂殁后，时隔 76 年问世的《元和姓纂》已将拓跋守寂列为拓跋鲜卑之后。《元和姓纂》卷一〇"拓跋"条云："后魏书云，黄帝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为拓后跋氏，后拓后跋氏从省文为拓跋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干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④]《元和姓纂》为太常博士林宝所撰，林宝在原书序中谈道："元和壬辰岁，诏加边将之封，酬屯戍之绩，朔方之别帅天水阎者，有司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焉。主者既行其制，阎子上言曰："特蒙涣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荣也。而封乖本郡，恐非旧典。"翌日，上谓相国赵公：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硕士，辩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署之省阁，始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缉，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无遗谬者矣。宝末学浅识，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

① 艾冲：《公元七至八世纪"河曲"地域的民族分布与农牧演替》，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136 页。

② 《旧唐书》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414 页。

③ 汤开建：《唐李荃〈太白阴经·关塞篇〉西北诸道部族地理考证》，《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51—52 页。

④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576 页。

为首焉。”①

从序言来看,《元和姓纂》的编撰是由于元和七年(812年)朔方大将阎某在受封爵位时,发现自己的封爵名不是自己的郡望天水,而是太原,于是上奏改议,引起唐宪宗重视,因而命宰相李吉甫召集博学之士修订官员氏族谱而引起的。在正式编撰前,唐宪宗对《元和姓纂》所要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明确指示,认为是书编成后,书中所记载的各姓氏必须写明其祖源、郡望、子孙及其官位。《元和姓纂》编撰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封爵的命名。林宝受命后仅用二十天就撰成《元和姓纂》,在编撰时参阅了大量经史典籍和当世流传的各种家谱。现存唐代元和七年(812年)之前的各类经史典籍均未记载党项拓跋氏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而且前述官方撰作的《拓跋守寂墓志》也未记载此一血缘承袭,《拓跋守寂墓志》明确写到党项拓跋氏之姓氏是以字为氏,可见林宝将党项拓跋氏记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应是利用了党项拓跋氏之家谱。

伊沛霞先生指出中古时期“谱学(一项与宗族组织和团体有关、其中必须注明世系的活动)大盛。谱学构建不仅收集单个家族,而且囊括整个社会精英群体,从一百个到数百个家族不等,有时根据知名度为这些家族区分等次。贵族家庭和政府皆对编修谱牒展现出浓厚的兴趣。”②在这样一个重视谱牒的时代,不仅汉族士族重视修谱,内附蕃胡高官也重视修谱,如颜师古就曾为安兴贵作《安兴贵家传》。大量利用谱牒而撰作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叙述武威安氏世次时,有多处与《元和姓纂》所记武威安氏世次不同,说明各自有本;但由于《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可知武威安氏的族谱在北宋还曾留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项拓跋氏极有可能撰修家谱,此家谱又为林宝所利用。林宝将党项拓跋氏定为北魏拓跋鲜卑之后,不仅是照搬党项拓跋氏家谱所叙,还跟《元和姓纂》的撰作主旨有关。唐宪宗明确要求修成的《元和姓纂》要记载大姓的子孙及其官位,林宝在撰写“拓跋”条时,由于北魏拓跋氏已尽改元氏,唐宪宗时已无仍姓拓跋的北魏鲜卑后裔高官,而党项拓跋氏与北魏拓跋氏字同音同,自唐玄宗以来代出显宦,因此林宝将党项拓跋氏附于北魏拓跋氏之后,并写到拓跋守寂之“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③。从拓跋澄岘“今任银州刺史”来看,林宝是了解党项拓跋氏在当世的活动情况的。

---

①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② [美]伊沛霞著,范兆飞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③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6页。

党项拓跋氏为何认为自己是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还得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深刻分析。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境内对胡人极为排斥，世代追随唐室的武威安氏向朝廷请求改姓李氏及徙籍京兆，大多数粟特人则通过改变自己的籍贯和郡望来与胡人划清界限。[①]唐朝上下对胡人的厌恶波及其他蕃族。傅乐成先生认为："安史乱后，唐室对于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亦因为转严。"[②]他进一步指出："唐代虽然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唐人的夷夏观念，渐趋严格，对外来文化也开始采取敌对态度。国人的民族思想所以在中唐以后日渐滋长，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安史之乱，是中国境内胡族的大叛乱，几使唐帝国趋于瓦解。经八年血战，乱事虽勉强平定，但唐代前期的盛世，已一往而不可复。继之而起的是安史余孽的割据河朔，外族如吐蕃、南诏的乘机入侵，由是引起国人对外族的仇视。二是科举制度的发达。唐自太宗实行科举，历朝诸帝，均大力提倡，用以笼络英俊，粉饰太平。才智之士，群趋科举考试以取富贵，社会上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风气，进而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对外族的尚武精神及其文化，自然轻视卑弃。"[③]

安史之乱后，吐蕃大举进占河陇，又长期侵扰唐京畿地区。党项在吐蕃对唐京畿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贺平党项表》云："天宝、至德之际，北燕偏重，中原一掀。大历、建中之际，逆胡余波，巨盗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鸟飞，为戎虏之耳目；狼心枭响，作郊畿之残贼。"[④]拉铁摩尔即指出："吐蕃扩张性军事行动的核心力量来自其王国东北边缘的党项、吐谷浑等部，而非来自藏南的拉萨一带。"[⑤]党项甚至还收容安史叛军，颜真卿《论百官论事疏》云："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土贼，至今为患。"[⑥]党项还参与仆固怀恩之乱。如此种种，皆使唐廷对于党项极为厌恶。在这样的背景下，忠于唐廷的党项拓跋氏将自己的祖源记忆修改，使自己的血缘与北魏鲜卑拓跋氏相连接，无疑是一种政治策略。通过这种修改，党项拓跋氏在血缘上成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从而与侵扰唐朝的其他党项人划清界限。

党项拓跋氏尊北魏鲜卑拓跋氏为祖还有其攀附士族之原因，士族是中古社

①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123页。

②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214页。

③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362页。

④ [唐]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36页。

⑤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

⑥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北京：1975年，第3594页。

会的特殊人群，其以世代冠冕而在帝国官僚系统中地位崇高，又因重视名教家法，文化教养较高而被社会所推崇。唐初，唐皇室与在朝士族、山东旧族在门阀等第观念上不尽一致，唐皇室借官修《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意图重新厘定士族等级。池田温先生即指出："前后三次编纂的氏族志，集中反映了依靠王朝权力重整氏族秩序的意图。"①《元和姓纂》是唐帝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任命官员修订氏族谱，而在它之前的《姓族系录》首次将内附蕃族纳入氏族谱。《册府元龟》云唐中宗命柳冲编修《姓族系录》时，"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业门风，国籍相传，士林标准；次复勋庸克懋，荣绝当朝，中外相辉，誉兼时望者，各为等列；其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别为一品"②。田廷柱先生认为《姓族系录》"把'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列为一品'，把汉族的士族门第制度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华夷混同，划分姓族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了"③。毛汉光先生亦指出："唐代新族者，系指新进士族、新进士族之后裔、蕃族等。换言之，士族阶层中除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旧族以外，盖称唐代新族。"④由于自初唐以来内附蕃胡即在唐朝政治军事领域活跃，许多内附蕃胡担任唐朝高官，而唐朝皇室又倾向于以官品来确定氏族等第，因此唐中宗命柳冲将内附蕃胡中担任高官者纳入《姓族系录》，也因而形成了蕃姓士族。这种通过官方撰作而产生的蕃姓士族，势必对当时社会上的传统士族观念产生重大冲击。《元和姓纂》继承了这一编撰原则，因此我们得以在《元和姓纂》看到突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突骑施哥舒氏、铁勒阿跌氏。

由于唐朝官方意识形态中存在"蕃姓士族"这一概念，党项拓跋氏被唐廷视为蕃姓士族是极有可能的，但安史之乱后唐廷上下对蕃胡群体极为厌恶，因此党项拓跋氏不得不攀附汉族士族，抛弃之前的蕃姓士族身份，在家谱中以北魏鲜卑拓跋氏为祖。党项拓跋氏尊北魏鲜卑拓跋氏为祖还因为当时社会上并不认同蕃姓士族。柳芳《氏族论》即云："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⑤党项拓跋氏通过以北魏鲜卑拓跋氏为祖，可以与代北虏姓士族元氏产生血缘联系，当时之代北虏姓士族早已融入中原，相对于唐朝官方制造的蕃姓士族，元氏显然更为文明，是中原士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项拓跋氏因尊北魏鲜卑拓跋氏为祖而与元氏同宗，在血缘上便成了中原士族。毛汉光先生指出："北朝胡姓大族，

① [日]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② 《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谱牒》，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421页。

③ 田廷柱：《隋唐士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

④ 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⑤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至隋唐时急速衰微……北朝的宗室元氏及宇文氏与源氏的情况很类似，他们在安史之乱后已一蹶不振。”[①]正因为元氏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党项拓跋氏得以由其“血缘”成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裔，变为了元氏在中原士族中的代言人。《元和姓纂》这一官方典范文本更是通过确定党项拓跋氏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而把党项拓跋氏族与其他蕃姓士族相区分，使党项拓跋氏成了官方认同的中原士族。

党项拓跋氏攀附士族还表现在本家族的汉化上，其汉化主要体现在居住地域、婚姻对象、文化教养、命名习惯这四个方面。从居住地域来看，拓跋守寂之叔拓跋兴宗一家长期居于长安，拓跋兴宗向唐玄宗所上《请致仕侍亲表》云：“臣某言：臣闻怀禄者耻于冒进，事亲者贵在及时。苟贪非分之荣，何报所生之德？臣兴宗中谢。伏奉某月日敕，许臣入京觐省者。”[②]从表文可知拓跋兴宗曾奉唐玄宗敕命前往长安探望其母，则其家在长安无疑。拓跋兴宗在其上唐玄宗《请致仕侍亲第二表》中谈道：“陛下必以臣幸无大过，不令失职，即望全其官守，罢以军麾，减其俸禄，以延老母。略许其宿卫，兼遂微臣之定省，朝则觐君，退还侍母。”[③]从中可知拓跋兴宗已不满足于从任职地往返长安探望母亲，其向唐玄宗请求从任职地返回长安担任宫廷宿卫武将，从而得以长期在长安侍奉母亲。

拓跋兴宗在其上唐玄宗《请致仕侍亲第二表》中谈道：“自圣鉴未迴，恳诚犹阻，而臣又不幸，愚子供奉官右威卫郎将守义近亡。”[④]从中可见拓跋兴宗之子拓跋守义曾担任供奉官右威卫郎将，唐代的供奉官“是泛指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是供职场所在宫廷之内的官”[⑤]。右威卫郎将为南衙禁军军官，负责指挥右威卫下属的内府府兵番上宿卫。从拓跋守义担任供奉官右威卫郎将可知其也在长安生活。拓跋守义逝于长安，但其在长安可能生活长达十年。拓跋兴宗于天宝五或六年（746或747年）撰写三表，此时拓跋守义逝去，但《拓跋守寂墓志》盖底部左侧栏刻有“弟开元州刺史守义从京送至银州赴葬”[⑥]，可知拓跋守义于拓跋守寂下葬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就在长安。拓跋守义所任官的开元州，为党项羁縻州，隶属于静边州都督府，从他任开元州刺史可知其初入京不久。

党项拓跋氏家族中，不仅拓跋兴宗一家居于长安，拓跋守寂之弟拓跋守礼也在长安担任禁军军官。《拓跋守寂墓志》记载拓跋守寂“弟游骑将军、守右武卫翊

①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②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3132页。
③ 同上，第3133页。
④ 同上，第3133页。
⑤ 张东光：《唐代的内供奉官》，《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⑥ 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府右郎将、员外置宿卫，赐紫金鱼袋、助知检校部落使守礼”[①]。从中可知拓跋守礼任南衙禁军十六卫之一右武卫的翊府右郎将。志文又云拓跋守义“岳舆列侍，鸿雁断联翩之行”[②]，可知其确实靠近帝侧。

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不仅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帝国的文化中心。众多中原士族由于仕宦而趋之若鹜。毛汉光先生即指出：“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于投身官僚层；科举入仕者以适合官僚政治为主，地方代表性较低，士族子弟将以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求取晋身，大帝国由此获得人才以充实其官吏群。”[③]党项拓跋氏家族居于这样的环境，又担任帝国官僚，耳濡目染华夏风物，势必对华夏的社会风尚了解渐深，其加速汉化并进而攀附士族亦不难想象。

从婚姻对象来看，党项拓跋氏多与中原士族联姻，娶中原士族之女为妻。《拓跋守寂墓志》记拓跋守寂之母“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居妇则智，在母能贤，秉义申黄鹄之诗，均养布鸮鸠之德”[④]。拓跋兴宗《请致仕侍亲表》记其母为谯郡曹氏。与太原王士联姻在唐朝蕃将中蔚为风气，如契丹蕃将李光弼、吐蕃蕃将论惟贤均娶妻于太原王氏。对太原王氏的推崇甚至使成德军节度使、契丹人王士真也伪冒为太原王氏之后。[⑤]党项拓跋氏礼聘太原王氏、谯郡曹氏，其后裔遂成为蕃汉混血之党项人。马驰先生即指出唐代：“蕃将通婚，颇讲究妇家的门第，故多与汉人博陵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士家望族联姻。在这种背景下，繁衍出一大批汉蕃混血的士族化的蕃将后代。”[⑥]《拓跋守寂墓志》所记拓跋守寂之母王氏“秉义申黄鹄之诗”典出汉代刘向所撰《列女传》之“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可见王氏早年寡居。拓跋兴宗《请致仕侍亲表》有云：“臣才韬龀，父已背亡，守志偏栖，钟情善训，恩深徙宅，慈过折蒌，孤危相保，臣得成立。”[⑦]可知拓跋兴宗之母曹氏也是早年寡居。由于拓跋守寂、拓跋兴宗早失父爱，王氏、曹氏在其成长中扮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③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⑤ 冯金忠、赵生泉：《河北正定出土唐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墓志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

⑥ 马驰：《唐代藩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

⑦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3132页。

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士族门风也会影响到拓跋守寂、拓跋兴宗。

从文化教养上来看，《拓跋守寂墓志》云拓跋守寂“丕承遗训，嗣有令绪，造次必形于孝悌，成功不倦于诗书”，又云其“性无伐善，乐在交贤，果于用兵，敏于从政，立礼成乐，殚见洽闻”①。从志文的描述可知拓跋守寂允文允武，但更多是践行孝悌、勤读汉文典籍，而且乐于同汉族贤士交往，这应与其母王氏的教育密不可分。另外，拓跋守寂逝于银州敕赐之第，这表明他长期居于银州城内的府邸，这与其所统领的党项部落行居模式颇有不同。拓跋兴宗也服膺于儒家孝悌观念，他在给唐玄宗的表文中明确谈道：“假臣强颜，苟冒荣宠，犹望孝理，抑就名教。”②他不惜致仕以求敬恭桑梓，在向唐玄宗请求致仕以奉养老母不果后，再次上表论列，甚至第三次上表，表文情词恳切，充分表达了其渴望晨昏定省慈母的人伦之情。

从表文的撰作来看，拓跋兴宗对汉文也极为熟练，其运笔虽然谈不上扬葩振藻，也可以称之为春容大雅。

从命名习惯来看，《拓跋守寂墓志》记拓跋守寂先祖名拓跋弥、拓跋宁，高祖名拓跋立迦，曾祖名拓跋罗胄，祖父名拓跋后那，父名拓跋思泰，这些名字除拓跋思泰外都带有强烈的非汉色彩。从拓跋守寂起，党项拓跋氏族人的命名开始讲究世次，如拓跋守寂之弟名拓跋守礼，其堂弟名拓跋守义，拓跋守寂之子名拓跋澄澜，另有拓跋澄岘、拓跋澄泌。党项拓跋氏对蕃名的扬弃和对汉名世次的讲究说明了其汉化潮流。

第二节　西羌与扶风窦氏：唐代党项窦氏之身份认同

一、窦氏族出西羌

唐僖宗乾符年间，世袭党项羁縻州长宁州都督的窦氏家族既标榜自己的郡望为汉族士族窦氏的郡望扶风，又宣称自己为三苗之后的羌人。新见《唐故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兼长宁州都督窦公墓志铭》记载志主窦伯岁“公之氏族郡在扶风，本始西域三苗之后。安附边隅，率拜首领，公勤报国，传之不朽”③。

---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 《全唐文》卷三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056页。[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3132页。

③ 白赛玲：《横山墓志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4页。

中古时期的窦姓，一为汉姓，一为鲜卑姓，一为羌氏姓。根据志文，窦伯岁的郡望为扶风。汉族窦氏之郡望多为扶风，如《元和姓纂》卷九云："窦犨为晋大夫，仕赵简子，裔孙汉丞相婴。窦婴之先，本居清河观津，后徙扶风平陵。"[①]《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四云窦婴堂兄窦充"避秦之难，徙居清河，二子：长君、广国。广国字少君，章武景侯，二子：定、谊。谊生赏，袭章武侯。宣帝时，以吏二千石，徙扶风平陵"[②]。敦煌遗书 S.2052 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云："歧州扶风郡，出十一姓：窦、马、曾、鲁、万、寇、井、苏、惠、班、辅。"[③]P.3421 号《氏族志残卷》亦云："扶风郡出六姓，歧州：马、窦、班、辅、曾、惠。"[④]鲜卑窦氏将其祖源比附于扶风窦氏，如《元和姓纂》卷九记鲜卑窦氏"状称本扶风人。窦武被诛，后人雁门太守统北奔鲜卑拓跋部，为没鹿回部大人，赐姓统豆陵氏，魏孝文改为窦氏"[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鲜卑窦氏"本扶风人，汉大鸿胪卿窦章之后，因避窦武之难，亡入鲜卑拓跋部"[⑥]。姚薇元先生即指出鲜卑窦氏"称窦章后，当系冒托无疑"[⑦]。

羌氏窦姓多见于两晋十六国时，如后秦姚苌统治时期，有"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⑧]。《华阳国志》记西晋末巴氏李特入蜀后，曾修改西晋广汉太守辛冉悬赏令为："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氐叟梁、窦、符、隗、董、费等首，百匹。"[⑨]从氐人长老中有窦姓可知窦在巴氐中为豪族。《晋书·周琼传》云："初，氐人窦冲求降，朝廷以为东羌校尉。"[⑩]《资治通鉴》亦称窦冲为"武都窦冲"[⑪]，而武都向为羌氐聚居区。

志文称窦伯岁"本始西域三苗之后"。《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⑫]《隋书·党项传》云："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⑬]《通典·党项传》则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⑭]。窦伯岁生活于唐代党项羌聚

①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364 页。
② [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29—530 页。
③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23 页。
④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61 页。
⑤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364 页。
⑥ 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76 页。
⑦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75 页。
⑧ 《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970 页。
⑨ [东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453 页。
⑩ 《晋书》卷五八《周访附周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84 页。
⑪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和五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3294 页。
⑫ 《后汉书》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869 页。
⑬ 《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845 页。
⑭ 《通典》卷一八九《边防五·西戎一·序略》，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125 页。

居之夏州，且终官于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其出身于党项羌无疑，且其姓氏如前考可上溯至两晋十六国时。志文称窦伯岁郡望为扶风，又指出其祖源为党项羌，看似比较矛盾，但反映了当时中原推崇门第贵阀之风气已经影响到夏州地区的党项酋豪。此种攀附与鲜卑窦氏将祖先追附为逃入鲜卑拓跋部的扶风窦氏之后大有不同，因为党项窦氏在攀附扶风窦氏的同时，仍然在坚持自己出于三苗之后的非汉族群血统，而鲜卑窦氏则借攀附扶风窦氏而宣称自己是扶风窦氏之后，放弃了对鲜卑血缘的身份认同。

党项窦氏为何标榜自己的郡望为汉族士族窦氏的郡望扶风？这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郡望是中古社会界定士族的重要标准，又为士族群体所推重。毛汉光先生即指出："士族是具有时间纵度的血缘单位，其强调郡望以别于他族，又如一家百年老店强调其金字招牌一般，故郡望与士族相始终。"在唐廷创造了蕃姓士族这一新概念后，党项拓跋氏获得了西河郡这一郡望，拓跋思泰封爵即为西平郡开国公，但由于安史之乱以后党项拓跋氏攀附鲜卑拓跋氏，此一郡望便为党项拓跋氏所放弃，唐末拓跋思恭受封夏国公即可见一斑。相对于党项拓跋氏，党项窦氏在党项酋豪中属于第二层次，其与唐廷的关系也并不紧密，因此没有自己的郡望，所以借攀附扶风窦氏而获得郡望。

另一方面，党项窦氏既标榜自己的郡望为扶风，则通过这一地缘符号成为扶风窦氏一族，如此便具有了所谓的"士族"身份。具有这样的身份对于窦伯岁来说十分有利，因为窦伯岁任官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藩镇左厢部队下辖的子弟军的军事指挥官。夏州藩镇自设立以来，其最高长官节度使向由汉人担任，直至拓跋思恭。夏州藩镇的军队，其高级军官多为汉人，这从夏州故地统万城出土的《唐夏州节度衙厢马步兼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张宁墓志》《唐夏银绥宥等州节度左厢兵马使高谅墓志》《唐夏州节度押衙臧允恭墓志》《唐节度押衙充监军衙马步都知兵马使陈审墓志》《唐夏州节度押衙兼洪门四镇都知兵马使曹公墓志》可以印证。夏州藩镇的幕府文职僚佐则均为汉人，甚至有出身士族者，如出于河东柳氏的柳宗权即曾任夏州掌书记、观察判官。在这样一个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官僚系统中，窦伯岁通过攀附扶风窦氏，可以消泯族群边界，更好地融入此一官僚系统。从《窦伯岁墓志》题为"夏州节度随军江诂撰"可知墓志的作者为窦伯岁的同僚、夏州幕府的文职僚佐节度随军江诂。江诂或出于同僚之谊为窦伯岁撰写墓志文，在窦伯岁与江诂的交往中，其受到汉族文人的士族观念影响是很自然的。另外，《窦伯岁墓志》记其"年迫从心，乾符□□□□□月廿四日忽疾，奄终私

室”①,从“奄终私室”可知他在夏州城内应有一宅第。窦伯岁定居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夏州城中,其伪冒的扶风窦氏身份对于其融入城市生活也是比较有利的。

党项窦氏虽然攀附扶风窦氏,但是仍然坚持自己为三苗之后,余以为有两点原因。第一,三苗是唐朝官方界定的党项祖源,党项窦氏声称族出三苗即代表接受了这一官方概念,但同时也可以借此来强调自己非汉族群的身份。从《窦伯岁墓志》来看,窦伯岁曾祖名窦罗磨、祖父名窦越磨、父名窦铁山,这些名字非汉色彩浓重。窦罗磨、窦越磨、窦铁山世袭党项羁縻州刺史、都督,没有担任夏州藩镇的官职,也因此没有进入夏州城居住,这样就保留了在夏州城外的部落行居习惯。关于党项在夏州城外的生活形态,唐人沈亚之《夏平》云:“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广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项与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橐驼,其后支属更酬杀,转转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杀掠以为常。尝与华民贸易马牛羊橐驼者,贸已,辄以壮骑从间道,伺险击夺华民,华民脱死者几希矣。”②可见党项人以部落为社会组织,依靠牧养马、牛、羊、骆驼来维持生活,并以掠夺、贸易来作为辅助性生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窦伯岁无疑对本家族、本部落的非汉族群本质保有深刻的记忆,即使他后来进入夏州城担任藩镇武官,定居于城内。这种记忆使他坚称祖源为三苗之后,而攀附扶风窦氏则成为他在夏州城市汉人社会生存的一种策略。

第二,窦伯岁在担任夏州蕃镇武官的同时,还担任党项羁縻州长宁州都督。后者使他具有对属部的管辖权,这样窦伯岁得以长期与党项部民保持联系,对于维持他的身份认同观念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窦伯岁所任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藩镇左厢部队下辖的子弟军的军事指挥官。唐朝缘边藩镇的子弟军往往由该藩镇下属的蕃落组建成军,或为蕃汉混编部队。窦伯岁作为夏州藩镇子弟军的统领,其麾下当有不少党项士兵,窦伯岁以三苗之后的身份认同为号召,可以极大地凝聚党项士兵,以利于其指挥作战。

① 白赛玲:《横山墓志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4页。

② [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七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1894页。

第三节　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唐后裔、党项人：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李氏之身份认同

一、定难军李氏族出鲜卑拓跋氏

由于党项拓跋氏在安史之乱后攀附鲜卑拓跋氏且被唐朝官方认同，因此定难军基业的奠定者拓跋思恭在唐末仍然被视为鲜卑拓跋氏之后。黄巢起义军席卷唐都长安后，拓跋思恭率先统夏州蕃汉军南下勤王。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起义军败离长安。在此前后，拓跋思恭与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合军在宜君县大败黄巢军。淮南节度使高骈闻知后，命幕府僚佐崔致远撰写贺表上奏唐僖宗。该《贺杀黄巢贼徒状》云："右臣得进奏院状报，定难军拓跋相公、保大军东方逵尚书奏，于宜君县南杀戮贼徒，并生擒贼将。又凤翔李相公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圣上御宣政殿排仗受贺者。窃以逆贼黄巢，稔恶既多，就刑非久，敢驱乌合之众，屡拒鹰扬之师。拓跋相公、东方尚书或力微裔孙，或曼倩余庆，皆申秘略，共弭凶徒，能顺天诛，遂陈月捷。军名定难，雅称关张之声；县号宜君，克符尧舜之德。"[①]崔致远在表中称此时任京城四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拓跋思恭为"力微裔孙"，所谓力微，是指北魏始祖拓跋力微。《魏书》云："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睿。"[②]崔致远虽然为新罗人，但为唐朝宾贡进士，曾在长安、洛阳游历，又长期在唐做官，因此他称拓跋思恭为拓跋力微之后无疑反映了时人的观念，同时也表明党项拓跋氏攀附鲜卑拓跋氏已被社会所认同。

朝野视拓跋思恭为鲜卑拓跋氏之后，还表现在拓跋思恭封爵的命名上。拓跋思恭的封爵，现存唐史史籍并未记载，见于宋代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新出墓志。《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内殿承制、合门祗候李继元，表述其祖保大定难节度使、朔方郡王拓拔思恭仕唐，剪灭黄巢，赐姓，父克文率族归阙；与李继迁本五从兄弟，名同上字，心实耻之，愿改名守元。"[③]《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云："公以祖、父箕裘继常，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信用于门下。"[④]从这两则史料

①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6页。

② 《魏书》卷一《序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11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可知拓跋思恭的封爵为朔方郡王。唐制将相大臣“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①]。拓跋思恭被封朔方郡王，而朔方泛指北方之朔野，鲜卑拓跋氏正出于北方之朔野，因此朝廷以朔方命名拓跋思恭王爵，无疑是认为他是鲜卑拓跋氏之后。五代时，后梁末帝封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但后唐庄宗改封李仁福为朔方郡王，众所周知后唐祖绍李唐，其在宫廷礼仪、国家典礼、选官取士等方面全面向已经灭亡的唐朝看齐，因此后唐朝廷改李仁福陇西郡王为朔方郡王也反映了后唐认为李仁福为鲜卑拓跋氏之后。

进入五代，定难军李氏不仅坚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之后，还明确北魏道武帝为家族始祖。拓跋思恭族孙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在其墓志中被称为“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也。自仪凤之初迁居于此，旅趋辇毂，便列鹓鸿，或执虎符，或持汉节者，继有人也。以唐中和之岁，国家多难。圣主省方。又闻骨肉之间，迴禀英雄之气，长驱骁锐，却复翠华。厥立奇功，果邀异宠，遽分第土，遂赐姓焉。已八十年，四五朝矣。山河远大，门族辉华，莫可比乎，孰能加也”[②]。从志文可知墓志作者对定难军李氏家族之前身、党项拓跋氏自唐高宗仪凤以来内迁至银夏，而后在长安侍从帝侧，家族中多人担任武将、刺史的历史非常熟悉，很明显此时定难军李氏家族中存有族谱，墓志作者在撰写墓志时即予以参考，此族谱也记载了北魏道武帝为本家族始祖。

定难军李氏为何将北魏道武帝作为家族始祖，一方面是由于北魏道武帝是北魏太祖，即北魏实际的创建者；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此外部环境的刺激就是党项大族府州折氏已开始标榜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刺史折嗣祚碑》云：“昔周文王有大明嗣太王季（阙）祖讳华，云中人也。永西伯之苗裔，大魏之后，宇文之别绪。以金城（阙）俞。自武德中诏府谷镇遏使，不改善政，永（阙）子孙黼黻（阙）之荣（阙）能不施劳于民，不伐善于已。慷慨（阙）以魏孝文皇帝廿七代之孙也。世袭家声，勋庸不（阙）昔先王之顾命，巨唐之芳叶，爰因忠烈，为唐允陇西氏焉。”[③]从碑文来看，府州折氏已以北魏孝文帝后裔自居。王明珂先生指出：“当某一族群（家族、宗族）的‘祖先系谱’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并得以保存、留传时，其意义在于该族群通过‘我族历史’宣称一种自我认知与认同；此种自我认知与认

① [唐]李涪：《刊误》卷下《封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2页。

②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③ 《全唐文》卷九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291页。

同，也得到当时主体社会的注意与认知。”[①]《刺史折嗣祚碑》出现了府州折氏的“家族谱系”，折嗣祚的先祖自西伯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府州折氏通过这种虚拟的祖先系谱，宣告了自己为鲜卑拓跋之后。仇鹿鸣先生指出：“古人素有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的美好希冀，巨型石碑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景观与权力象征，其展示的永久性与纪念性，对于古人的生活世界而言具有深刻的影响。”[②]因此府州折氏树立《刺史折嗣祚碑》便具有强大的宣传影响力。

定难军李氏承续自唐代党项拓跋氏，而党项拓跋氏在安史之乱后自蕃姓士族而中原士族，唐朝官方也承认其“高贵”身份，加之黄巢之乱后中原士族凋零，定难军李氏为硕果仅存的少数士族之一，因此其往往自傲，如《李仁宝墓志》即记本家族“山河远大，门族辉华，莫可比乎，孰能加也”[③]。府州折氏在唐末仅为区区镇遏使，在后唐时才发迹崛起，其以北魏孝文帝后裔自居必然引起同属党项羌的定难军李氏之不快。在党项羌内部，本来一直只有定难军李氏为“鲜卑拓跋氏之后裔”，后起之府州折氏突然宣称自己为北魏孝文帝之后，将侵蚀定难军李氏自唐代以来所形塑的社会名望，对定难军李氏自唐代以来所构建的本家族系谱也会产生重大冲击，对唐代以来党项羌内部既有的社会阶序也造成了震荡，因此定难军李氏极为痛恨府州折氏，至后周时，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仍以府州“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④]。为了在血缘正统性上超过府州折氏，定难军李氏不得不将北魏道武帝明确为本家族始祖，由于北魏孝文帝在血缘世系上为道武帝玄孙文成帝之孙，定难军李氏得以在世次上超越了府州折氏，得以成为当世世次最高的北魏鲜卑拓跋氏的正统“后裔”。

定难军李氏在确定北魏道武帝为本家族始祖后，在家族成员墓志中便对道武帝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拓跋思恭之孙李彝谨的墓志云：“昔后魏威震朔陲，声扬诸夏，控弦之士动逾十万，食鱼之客何啻三千。参合陂中，频有经天之气。榆林塞外，常观夹日之祥。而后慑服群豪，通和列国。平北至功勋益著，图南之谋略潜施。动必应机，举无遗算。保全大魏，吞并中原。立事建功，光前绝后。故得家留余庆，代不乏贤。枝流相因，英雄间出。果于唐祚，又降奇才。寻遇国步艰难，人情叛乱。值刘琨之夜舞，当樊哙之横行。公先代首合师，誓除奸贼。安一人于平仄，

①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页。

② 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522页。

领十道之车徒。重立皇纲，始自公之先祖。今乃略而述之，不可尽也。”[①]参合陂为北魏道武帝出生之地，亦是其率领魏军大败后燕军、奠定北魏立国基础的重大战役发生地，因此志文云“参合陂中，频有经天之气。榆林塞外，常观夹日之祥”。志文在赞颂北魏道武帝之后，越过党项拓跋氏其他祖先，直接开始歌颂拓跋思恭在唐末戮力勤王的忠义之举，这样北魏道武帝与拓跋思恭便成了定难军李氏在历史长河中一前一后之伟大英雄，北魏道武帝在这样的文本中成了与拓跋思恭有直系血缘联系的先祖。

《李彝谨墓志》在赞颂北魏道武帝及拓跋思恭之伟业后，明确指出李彝谨本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墓志铭辞亦云：“代有英特，贤生朔方。家传将相，道契皇王。”[②]李彝谨墓志刻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刻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李光睿墓志》称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本后魏之华宙，朔野之大族”[③]。志文亦称其“公帝祚传芳，侯门积庆，享寿年钟于四纪，增封户及于万余”[④]，指明其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光睿之子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亦被称为“公本系族，乃后魏之苗裔也，峻址长源，绵历代祀，匡时济俗，继有其人”[⑤]。《李继筠墓志》铭辞亦云：“后魏华族，浚源巨渎。英杰诞生，何人敢躅。”这些墓志文虽然出于定难军幕府文职僚佐之手，但是既镌刻于墓志之上，就体现了墓主家族甚至墓主本人对家族源于北魏拓跋氏的深层心理认同，同时也说明定难军幕府文职僚佐在这样的文类场域中已深信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出于北魏拓跋氏。

二、定难军李氏出于李唐皇族

夏州藩镇由于拓跋思恭率军围剿黄巢而被唐僖宗赐号定难军，拓跋思恭也被赐姓李氏。《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唐僖宗在蜀，诏以思恭为京城西北收复都统，预破黄巢有功，僖宗赐姓。”[⑥]《新唐书·党项传》云拓跋思恭“贼平，兼太子太

①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③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⑤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傅，封夏国公，赐姓李”①。拓跋思恭甚至还被赐名，《近事会元》云：“至唐僖宗朝，有拓跋思恭镇夏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名石。”②晚唐以来，有不少蕃将在被唐皇室赐姓李氏的同时，还被唐皇室赋予了皇族身份，如铁勒蕃将阿跌光进被“赐姓李氏，列宗籍”③，沙陀蕃将李国昌本名朱邪赤心，被“赐氏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赐亲仁里甲第”④。唐末，岐王李茂贞本名宋神通，也被唐僖宗赐姓名，同时也“编于帝属，列彼储闱。纪玉谍以腾茅，齿金枝而表庆”⑤。在蕃汉武将都被唐皇室赐姓并编入宗室属籍的潮流下，拓跋思恭以其首倡平乱之勋也应在被赐姓的同时编入属籍。

党项拓跋氏早在唐初即被赐姓为李，《旧唐书·党项传》记唐廷拜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职贡不绝”⑥。但是在拓跋赤辞之后并未见党项拓跋氏延用李氏。拓跋思恭被赐姓李后，党项拓跋氏尽改姓李，从唐末一直沿用至北宋初年。党项拓跋氏在第一次被赐姓李氏后并未延用，而在拓跋思恭被赐姓李氏后全族尽改姓李，如其父名李重建、其叔名李重遂，其弟名李思忠、李思谏、李思孝、李思敬、李思瑶，其子名李成庆、李仁福。党项拓跋氏全族改姓李氏，很可能是由于拓跋赤辞没有被编入皇室属籍，而拓跋思恭被编入皇室属籍的缘故。拓跋思恭被赐李姓在党项拓跋氏家族史上不啻为绝顶荣耀，因此在家族成员的墓志上被极力追述，如《李仁宝墓志》云：“以唐中和之岁，国家多难。圣主省方。又闻骨肉之间，迥禀英雄之气，长驱骁锐，却复翠华。厥立奇功，果邀异宠，遽分第土，遂赐姓焉。”⑦由于唐高祖李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皓七代孙也”⑧，定难军李氏也开始称自己为陇西李氏。立石于后晋开运三年（946年）的《李仁宝墓志》，其墓志盖阴刻楷书“故陇西李公墓志之铭”；立石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李光睿墓志》《李继筠墓志》，立石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李光遂墓志》，其墓志盖均篆刻“陇西郡李公墓志之铭”⑨。《李光遂墓志》志石还首题“大宋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② ［北宋］李上交：《近世会元》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850册，第980页。
③ ［唐］令狐楚：《李光进神道碑》，《全唐文》卷五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5510—5511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沙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6页。
⑤ 薛光序：《李茂贞墓志》，周阿根编：《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64页。
⑥ 《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2页。
⑦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⑧ 《旧唐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4、69、76、82页。

国故管内藩部都指挥使检校礼部尚书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并序"①。

五代初年,在唐末被赐姓的强藩纷纷自居为李唐皇族。《李克用墓志》记晋王李克用"王讳克用,字翼望,陇西成纪人也"②。《李茂贞墓志》记李茂贞"王贯陇西郡大郑王房,名茂贞,字正臣"③。李克用与李茂贞都对后梁政权抱敌视态度,尤以李克用为甚,二者均以复唐为政治旗号。由于李唐君临天下三百年,李唐皇姓在分裂割据、人心思唐的五代初年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后唐灭后梁后,李唐王朝一度在中原地区复活,这种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以李唐皇姓为标榜,重构稳定的政治秩序,甚至在河西走廊和遥远的西域地区也盛行一时。甘州回鹘公主自称陇西李氏。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题记云:"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④,莫高窟第 100 窟甬道北壁供养人题记云:"……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一心供养。"⑤于阗国王尉迟僧乌波即称自己汉名为李圣天,并将李姓传与后人,如莫高窟第 61 窟东壁北侧题记云:"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授太傅曹延禄姬供养。"⑥《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题名亦云:"故大朝大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⑦

定难军李氏是否也借李唐后裔之名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呢?余以为极有可能。在唐亡之后,定难军李氏自可以恢复旧姓,但仍然坚持李姓,但这种坚持不是坚持对已逝唐王朝的忠诚,而是借李唐后裔之名对外谋取在新朝的政治名位,对内构建以本家族为至尊的稳定统治阶序。同为"李唐后裔"的李克用与李茂贞,在唐亡后都以复唐相标榜,与后梁连年征战,但定难军李氏在梁唐禅代之际就接受了后梁的封爵与官职,《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梁开平元年,授思谏检校太尉、兼待中。"⑧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在后梁开国之初接受其封爵与官职,说明定难军已接受后梁为新的宗主,全然忘记了后梁太祖朱温弑杀唐昭宗。定难军李氏的这种政治立场受到李茂贞与李克用的强烈质疑,因此定难军受到岐军与晋军的联合围攻,幸赖后梁派出援军,定难军得以继续生存,与后梁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后梁末帝以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唐制将相大臣"凡所封邑,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84 页。

② 周阿根编:《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 年,第 1 页。

③ 周阿根编:《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 年,第 164 页。

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21 页。

⑤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49 页。

⑥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22 页。

⑦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999 页。

⑧《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746 页。

必取得姓之地”[①]，后梁承唐制，可见后梁承认李仁福为李唐后裔。

后唐灭后梁后，于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对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②]。此朔方王为朔方郡王之简称，后唐明宗时，以“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③]。后唐为何将李仁福由陇西郡王改封朔方郡王，一方面是由于陇西郡王为伪朝后梁之封爵，后唐复兴唐朝后，需新赐爵名以示正统；另一方面则暗含了将定难军李氏驱逐出李唐皇裔群体的意味。因为定难军李氏虽为“李唐皇裔”，但是在唐朝灭亡后效忠后梁，后梁与唐有不共戴天之仇，作为“李唐皇裔”，在道义上绝不应该接受后梁的封爵与官职，定难军李氏既已接受，后唐必对其进行惩罚；同时也显示了后唐力图在蕃族中垄断“李唐皇裔”这一政治资源，因为后唐李氏出于沙陀，定难军李氏出于党项，二者同为蕃族，但是后唐既已复兴唐朝，则后唐当为唯一的且具正统性的李唐继承者，需要排除定难军李氏借“李唐皇裔”身份对神器的觊觎。晋王李克用曾在唐末上表中谈道：“若以臣云中之伐，获罪于时，则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郓，陛下何不讨之？”[④]其时拓跋思恭已获赐姓，但沙陀李氏并未称其为李思恭，可见沙陀李氏早已不认可定难军李氏的“皇族”身份。

定难军李氏的“李唐皇裔”身份是否为五代历朝承认？从后梁封李仁福为陇西郡王，后周封李彝兴为陇西郡王可知两朝都承认了此种身份。甚至北宋也封李继筠为陇西县开国子。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虽然没有为定难军李氏立传，但是在《党项传》中并未记载定难军李氏，可见后晋朝廷并未视定难军李氏为非汉之人。后晋史臣在《旧唐书》的历史书写中，在中和二年即称拓跋思恭为李思恭，此时拓跋思恭尚未赐姓，统称其弟为李思谏、李思孝，说明后晋使臣对于定难军李氏的“李唐后裔”身份有所认可。

进入北宋，史臣则在历史书写中不断强调定难军李氏为非汉人群。成书于北宋初年的《旧五代史》为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立有专传，该传云：“李仁福，世为夏州牙将，本拓拔（跋）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广明之乱，唐僖宗在蜀，诏以思恭为京城西北收复都统，预破黄巢有功，僖宗赐姓，故仁福亦以李为氏。”[⑤]陈尚君先生大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则记：“李仁福，世为夏州牙

① [唐]李涪：《刊误》卷下《封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2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七·庄宗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二〇·明宗纪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5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元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将，本党项拓拔（跋）氏之族也。”陈尚君先生指出：“党项二字，影印本缺，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八引《薛史》补。”①

从《旧五代史》的记载来看，宋初使臣在历史书写中一来强调定难军李氏出于党项拓跋氏，二来强调定难军李氏的姓氏是唐僖宗所赐予，这和《旧唐书》对定难军李氏的族源、赐名失载形成了鲜明对比。《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此时任定难军节度使者为李光睿。从《李光睿墓志》可知定难军李氏在北宋初年仍然坚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并未承认自己属于党项。

定难军李氏自长兴四年夏州之战后极为轻视中原王朝，《册府元龟》云：“李彝殷镇夏州，傲视中原。凡贼臣不逞，必阴相缔结，冀其输货。应接李守贞，出兵境上以酬其贶。朝廷知其心羁维之。”②这一方面是因为定难军李氏在夏州之战中战胜后唐朝廷，一方面是因为定难军李氏出于唐朝旧族，且具有唐皇赐姓，而后唐之后继之而起的后晋、后汉、后周统治者均无旧族身份，只是纯粹的武人。宋太祖以后周禁军大将篡权自立，本身亦为武人，但北宋朝廷从建隆三年（962年）开始就发动统一战争，在《旧五代史》成书时，宋军已扫平武平周保权、荆南高继冲、后蜀孟昶、南汉刘鋹，发动对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指日可待，而定难军李氏即为北方割据势力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使臣意图通过历史书写来“还原”定难军李氏的党项族属，希冀从夷夏之防的角度来强调日后宋军削平定难军李氏的正当性，同时亦可在社会上削减定难军李氏之名望，赢得社会舆论。

定难军节度使、夏王李元昊称帝时，自居为北魏拓跋氏和拓跋思恭之后，北宋史臣则通过历史书写来抵消其对王朝政治格局的冲击。欧阳修在《新唐书·党项传》中记有“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③，又记有拓跋思恭之弟思谏、思孝、思敬，明确将拓跋思恭一族视为党项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为李仁福立传，《新五代史·李仁福传》云：“李仁福，不知其世家。当唐僖宗时，有拓跋思敬者，为夏州偏将，后以与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思敬卒，乾宁二年，以其弟思谏为节度使。”④该传未记拓跋思恭，但将本为拓跋思恭之子的李仁福叙为“不知其世家”，割裂了拓跋思恭与李仁福的血缘关系；又将拓跋思恭事迹安于拓跋思敬头上，使拓跋思恭成为与定难军无关之人。通过《新唐书·党项传》和《新五代史·李仁福传》的历史

①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三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9页。
② 《册府元龟》卷四四六《将帅部·观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029页。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④ 《新五代史》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6页。

书写，欧阳修使李元昊所宣称的祖先世系成为虚构，因为拓跋思恭被写为党项羌之后，便不是李元昊所宣称的北魏拓跋氏之后，拓跋思恭既然是党项羌，则李元昊亦为党项羌，西夏李氏与北魏拓跋氏便无任何关系。同样，由于李元昊宣称拓跋思恭曾被赐姓，参与平定黄巢，那么通过记载拓跋思敬平定黄巢以及被赐姓，则形塑了一段与拓跋思恭无关的定难军历史，李元昊的宣称则成为混淆历史记忆的“伪说”。

三、定难军李氏出于华夏

定难军李氏自居为李唐皇族体现了其华夏认同，表现在以李为姓，以陇西为郡望。定难军李氏认同华夏还体现于他们自称为黄帝之裔，以及命名、文化教养、服饰上。定难军李氏以黄帝之裔自居主要见载于《宋管内藩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该墓志记李光遂“上祖乃轩辕氏之苗裔，灵源殊流，内著外扬”①。《李光遂墓志》志盖篆刻“陇西郡李公墓志之铭”，志石首题“大宋国故管内藩部都指挥使检校礼部尚书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并序”②。从墓志的撰作可知李光遂以陇西李氏而为黄帝之裔。陇西代表着汉族士族、李唐皇族的郡望，是汉族名门的地缘符记；李则为汉族姓氏，陇西李氏是汉人李姓者最高贵的一支，而黄帝为华夏的核心祖源。陇西李氏为黄帝之裔，因此李光遂在“成为”陇西李氏之后随即也“成为”黄帝之裔。

五代时期，不少在中原的沙陀人通过攀附华夏祖先而力图成为华夏，如后晋高祖石敬瑭自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③石敬瑭还以青州汉族大儒石昂为宗正丞，这样得以与汉族石氏连宗，表现出对华夏的极度仰慕。后汉高祖刘知远以其四代祖刘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④，又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⑤。后晋沙陀系粟特人安万金在其墓志中被记为：“公本自稷契之苗裔也，始因周平王治国，六蕃来侵。将军奋剑一挥，万夫胆碎；操戈直指，八表晏清。上旌功劳，乃命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③《旧五代史》卷七五《晋书一·高祖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77页。

④［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⑤《新五代史》卷十《汉本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页。

氏族焉。公即将军二千年后玄孙也。”[①]安万金通过被追述为稷、契的苗裔、东周将军的后裔而使安氏家族在血缘上与华夏连接，从而成为华夏。

邓小南先生指出北宋初年的武将大多具有沙陀、奚的族源血统，但“这批人及其族裔，事实上已经渐染了相当深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其交际、联姻圈也已不再局限于沙陀、粟特。久而久之，已经无人再以‘夷狄’称之、视之”[②]。在北宋初年“胡汉语境”消融的情况下，李光遂被称为黄帝之裔，无疑反映了定难军李氏对华夏的身份认同。

在命名上，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都有字号。《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记李仁宝“公讳仁宝，字国珍”[③]，可知李仁宝字国珍。《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云：“曾祖讳□□，字□□皇任□□。曾祖母□郡□氏。祖讳仁福，字□□，皇任夏州节度使、韩王。祖母，列考讳彝殷，字□□，皇任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公讳光（睿），字□□，即西平王之令子也。”[④]《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云：“曾韩王，名讳仁福，字□，以位分土茅，望重藩屏……祖夏王，名讳彝殷，字□，有溢国之勋，负众人之望……名讳继筠，字□。”[⑤]可知李思恭、李仁福、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等定难军节度使均有字。另外《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记李彝谨“公讳彝谨，字令谦”[⑥]，可知李彝谨字令谦。李彝谨为李仁福第三子，李仁宝为李思恭堂兄弟李思澄之子，可见定难军李氏的主支和分支家族成员都有命字之习惯。

命字在五代时期的蕃族中极为流行，以沙陀三王朝而言，晋王李克用之父李国昌字德兴，李克用字翼望，李克用从父弟李克修字崇远；后唐沙陀系粟特人安元信字子信，安重遇字继荣，另一沙陀人药彦稠字众先；后晋高祖石敬瑭从父弟石敬威字奉信，石敬威之帝石赟字德和，石敬瑭从兄石晖字德昭，石敬瑭第二子石重信字守孚，第三子石重乂字宏理；后晋沙陀系粟特人安万金字宝山，安彦威字国俊，史懿字继美；回鹘人张从训字德恭；后汉高祖刘知远长子刘承训字德辉；另外仕于后周的沙陀系粟特人安审琦字国瑞，安审信字行光，回鹘人何福进字善

① 周阿根编：《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94页。

② 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朗润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6—87页。

③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⑤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长，党项人折从阮字可久。这样的命字风习也是诸蕃族攀附华夏的文化手段，通过命字，诸蕃族得以在姓名表征上与汉人相同，从而消泯族群边界。

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除有字号外，还严格按照世序命名。定难军李氏思字辈成员计有李思恭、李思忠、李思谏、李思孝、李思敬、李思沿、李思瑶；仁字辈成员计有李仁佑、李仁颜、李仁福、李仁裕、李仁宝、李仁立；彝字辈成员计有李彝昌、李彝景、李彝殷、李彝谨、李彝氲、李彝超、李彝温、李彝璠、李彝震、李彝嗣、李彝雍、李彝敏、李彝璘；光字辈成员计有李光俨、李光普、李光新、李光睿、李光文、李光宪、李光美、李光遂、李光信、李光琇、李光琏、李光义、李光璘、李光琮、李光嗣、李光祚；继字辈成员计有李继筠、李继捧、李继迁、李继忠、李继瑗，如此严格的世序命名甚至可以称之为家法。

在文化教养上，定难军李氏成员一方面好读诗书、践行忠孝；一方面好与汉族士人交游。关于好读诗书、践行忠孝，《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诸子“皆以温恭约己，忠孝流芳。修文传贾马之踪，讲武踵孙吴之迹”①。《后周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云李彝谨子“男，光璘，阅礼诗书，通明赏俊，若高紫之泣血，如曾子之绝浆”②。《后晋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辞记渎氏诸子“至孝哀兮殒妣”③。《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云李彝谨“行坚金玉，誉比芝兰。敦诗书礼乐之名，蕴温润谦和之敬”④。《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达兴亡之礼，阐教化之源，以温、良、恭、俭、让之风，自谨于己，以仁、义、礼、智、信之道，不欺于心”⑤。关于与汉族士族交游，《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任定难军节度使时积极延揽汉族文士，志文云：“于是乎，燕台□(将)筑，弘合常开，来英彦于九州岛，纳贤才于四野。黄金白璧，乃是众资，肥马轻裘，未尝独有。说魏游秦之士，雨集庭闱，论天对日之徒，云臻户牖。常曰：座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复何忧哉，有以见公延纳之道。”⑥从志文叙述可知在李光睿的延揽下，定难军汉族文士人才济济。志文“常曰：座上客长

①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⑤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⑥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满，樽中酒不空，复何忧哉”为引用李光睿平日之语，可知李光睿求贤若渴。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墓志的作者均为定难军幕府文职僚佐，与逝者或有交谊，或为故吏，如《李仁宝墓志》作者为银州防御判官齐峤。齐峤在志文中谈到撰写志文的原因是“今以唯亏梦笔，固昧知人，素无黄绢之辞，兼白眉之誉。贵遵请讬，聊敢涤濡”①。节度判官郭峭在《李彝谨墓志》中写道：“峭早依公门馆，偏忝恩知。诚惭鸟胫之才，莫述龙头之德。辞不获已，宁无愧乎。”②节度判官郭贻在《李光睿墓志》中写道：“贻叨依俭幕，久厕原宾，遽承见讬之私，俾叙无穷之绩。援毫述事，忧心徒积于厚颜，变谷为陵，他日宁进于拊掌。强搜鄙思，勉勒贞珉。”③

在生活方式上，定难军李氏也体现了汉族士大夫色彩。《李仁宝墓志》对李仁宝隐退后的怡性生活多有描写，称：“张平子月下秋吟，陶静节篱边醉卧，功成名遂，无以比焉。”④“张平子”即张衡，张衡字平子。“陶静节”即陶渊明，《南史·隐逸传上》云陶渊明“世号靖节先生”⑤。根据志文，李仁宝最终于自己的别墅庄园殁去。唐代修建园林之风极盛，士大夫与文人竞相造园，李浩先生曾指出：“有唐一代留下名称之园林，可能比前代园林总和还要多。”⑥此风延至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曾“宿于张全义之别墅”⑦，后唐尚书左丞崔沂“卒于龙门之别墅”⑧。后唐鸿胪少卿贾馥致仕后“复归镇州，结茅于别墅”⑨，后汉史宏肇之弟史福“比在荥阳别墅”⑩，后周左卫上将军宋彦筠“薨于伊川之别墅”⑪。与夏州、绥州临近的延州亦有别墅，如后汉时“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允权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别墅”⑫。李仁宝退隐于别墅一方面说明其经济优渥，另一方面说明其虽为武职军将出身，但担任过州刺史后已向汉族士大夫阶层趋近，颇有文人风尚。

---

①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③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⑤《南史》卷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9页。

⑥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2页。

⑦《旧五代史》卷三二《唐书八·庄宗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43页。

⑧《旧五代史》卷六八《唐书四十四·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01页。

⑨《旧五代史》卷七一《唐书四十七·贾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41页。

⑩《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九·杨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07页。

⑪ 高弼：《大周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致仕蔡国公赠侍中宋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47页。

⑫《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十六·折从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46页。

在服饰上，定难军李氏全为汉族样式。宋人所撰《李继捧移镇制雍熙》云："具官李继捧。绍缵祖宗。勤劳藩屏。献琛奉贽。矜持事上之心。服冕乘轩。允执来朝之礼。"[①]从"服冕乘轩"可知李继捧以冠冕之服乘车入朝。《东都事略·西夏传》云李继迁偷袭李继捧时，李继捧"方寝，闻难作，单衣披发，骑骏马遁，仅以身免"[②]。李继捧仓促之中"单衣披发"正说明其入睡前为束发，束发是作为华夏的重要标志。

定难军李氏对华夏的认同还在于其有意识地自别于党项羌，如《后晋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云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外遏番浑，内安黎庶，为国朝之柱础，作边垣之景星"[③]。《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记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在位时"郡邑封疆，开托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逾百万家，户口雄豪，人心任直"。志文又记李光睿任定难军节度使时，"临拯塞，镇名都，控群胡，御敌寇，然隼舆熊轼，久彰求瘼之功，而弓矢彤弓，未尽专征之志"。墓志铭辞又称李光睿"宣扬号令，慑服羌夷"[④]。《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云李继筠在任衙前厅直指挥使时，"勇怀刚毅，威慑戎夷"[⑤]。《北宋定难军管内藩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辞称李光遂"慑伏戎夷，平凌雁碛"[⑥]。李光睿之子李继捧入朝献地后，宋太宗曾向其咨询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⑦]从这些记载可知定难军李氏以"番浑""戎夷""群胡""羌夷""羌人"的统治者自居，通过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区分，使本为同族的党项人成了与我族李氏在血缘和文化上都有巨大差异的非汉人群。

另外《册府元龟》曾记后唐长兴四年之战中，李彝殷曾登城对后唐军队声明："夏州虚名耳，无珍宝帑藏贡赋朝廷，但以父子相传，寓居此郡，或朝廷指使征伐，愿誓众先登。幸国家哀怜。"[⑧]从"寓居此郡"可知定难军李氏以夏州的外来者自居，但实际上其先祖自唐高宗仪凤年间即内徙至此，夏州可以说是定难军李氏的本贯。后唐明宗在劝谕李彝超、李彝殷兄弟移镇的诏旨中宣称："但夏、银、绥、宥

① 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卷一〇三《武臣一除拜》，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页。
②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七，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099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⑤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一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兰州：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4页。
⑧ 《册府元龟》卷一六六《帝王部·招怀第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54页。

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①]，反映出后唐朝廷视定难军为胡籍藩镇。李彝殷通过宣称本家族为夏州的外来者而与“边远”“夷狄”这两种地理上、文化血缘上的华夏边缘相区隔，从而得以成为华夏。

定难军李氏还通过将嫁与本家族的党项豪族女华夏化，使本家族在血统上成为“纯粹”的华夏。李仁宝以破丑氏为妻，而破丑为党项大族。《旧唐书·党项传》云：“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②]《新唐书·刘师立传》云：“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尝苦边，又阻新附，师立讨之。”[③]《新唐书·党项传》云：“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④]周伟洲先生指出：“党项破丑氏部原居于今青海湖南的大积石山一带。贞观末，吐蕃势力北上，破氏部也随一些党项部落北迁至陇右一带。”[⑤]但绥州军事判官张少卿所撰写的《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则称：“夫人以元魏灵苗，孝文盛族，天麟表瑞，沼凤腾芳。金枝继踵于三台，玉叶联姻于八座。”[⑥]在这样的文类叙事中，破丑氏成了北魏孝文帝之后，而在五代时期北魏元氏早已被视为汉人，破丑氏通过攀附北魏孝文帝而在血缘上成了华夏。《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又称破丑氏“而况三从顺道，四德奉亲。崇妇礼以宅方，备母仪而敷训”。墓志铭辞亦称“六亲风靡，四德兰馨”[⑦]。张少卿通过叙述破丑氏尊行三从四德之华夏妇仪，使破丑氏在文化上成了华夏。墓志还谈到破丑氏逝后，“于是选择异地，修饰灵宫。藩汉数千，衔哀追送”[⑧]。在葬礼这样一种深具文化展演的仪式中，参与葬礼的“蕃汉数千”均有可能看到破丑氏的墓志，这样通过“蕃汉数千”的送葬而公证了破丑氏的华夏身份。

《后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云李仁福正室渎氏“夫人望重华族，德光清范。禀彩裳之挺质，曜霞帔以降神”[⑨]。从整个墓志的行文来看，作者并没有交代渎氏的族属。《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有三女，“次适渎罗驮。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彝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7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2页。

③ 《新唐书》卷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42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⑤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次在室。朱门禀气，甲族联姻”[①]。李光睿次女之夫名渎罗驮，名字带有强烈的非汉色彩，渎罗驮应与渎氏同出一族，渎氏为党项人无疑。从“望重华族”“甲族联姻”来看，渎氏出于党项大族。《渎氏墓志》的作者在墓志行文中只字未提渎氏的族属、世系，从而在文类叙事中形塑了渎氏的华夏身份。作者在志文中还赞颂渎氏“四德咸推，六行兼著。柔明表则，温凝之婉淑难偕。仁智才能，雅顺而雍容罕比……景曜垂祥，月华表瑞，效葛覃之美称二南，标妇道之成樛木。矜宽六义，著子孙之盛”。墓志铭辞亦称渎氏“三天克备，四德彰明。谦勤奉礼，显著嘉声……婉娩雍容，如珪之德。作程垂节，英聪之质。百行昭著，三英罕伦”[②]。通过这样的文类叙事，渎氏从党项妇女变为了尊行三从四德、高标妇道的华夏妇女。

四、定难军李氏出于党项

定难军李氏虽然通过各种政治、文化手段形塑自己为华夏，但是其毕竟出于党项，且在唐朝灭亡后没有再到中原朝觐，长期居于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的夏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对于党项的身份认同，主要表现在其蕃名和婚姻上。

从姓名上来看，定难军李氏的一些家族成员在汉名之外还有蕃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五月“丙子，以故绥州刺史李光□男匕罗为绥州刺史”[③]。从《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可知李光琇为李彝谨长子，则李匕罗为李彝谨之孙、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曾孙。匕罗非汉色彩浓重，当为蕃名。清人吴广成在其《西夏书事》中将李七罗改为李丕禄。《西夏书事》卷三云：“绥州羌族强悍，刺史李光佑在州缮完城堡，及卒，羌人乘隙为乱，丕禄捕首事者诛之。开宝四年春正月，李丕禄授绥州刺史。”[④]汤开建先生指出：“丕禄、匕罗译音之误也，为李光琇子，则与李继迁、李继捧为同辈兄弟。匕罗（丕禄）当为其党项名，其‘继’字辈的汉名，文献不载。”[⑤]《资治通鉴》记有长兴四年后唐明宗以武力迫使李彝超移镇时，“李彝超不奉诏，遣共兄阿啰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⑥]。从中可知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太祖开宝四年五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6页。

④［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⑤ 汤开建：《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递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3页。

李彝超有兄名“阿啰王”，此亦为一蕃名，但“阿啰”应为实际蕃名，“王”则为尊称。此李阿啰之汉名不为汉文史籍所载，幸赖出土墓志可以得知。《后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昆季四人：长曰彝温，守职随使都押衙。次曰彝超，皇任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太傅”①，可知李彝超之兄为李彝温。李彝温所任随使都押衙为军职，因此被李彝超派遣守卫青岭门，其蕃名为阿啰。

从婚姻上来看，定难军李氏的婚姻对象有很多为党项人。前文云及李仁宝之妻为党项破丑氏；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妻渎氏出于党项大族，李光睿之次女嫁与渎罗驮。另外《后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曾祖讳重建，皇任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曾祖妣破丑氏，累赠梁国太夫人”②，可知李重建娶破丑氏。李彝谨之子李光琇“即娶破丑氏之女”③，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次婚破丑氏，道义服家，贤明训子”，李光睿还有“女三人，长适苏越罗，先公而亡”④，李彝谨亦“有女三人：长适野由氏，次适苏氏”⑤。野由为党项姓氏，由苏越罗这样一个蕃名亦可知苏氏为党项人。从宋人所撰《耀州节度李继捧母汉阳郡夫人吴氏可进封南阳郡太夫人祖母河西罔氏可特进西河郡太夫人》可知李继捧祖母为罔氏，则罔氏为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妻。罔氏亦为党项大姓。

由于李彝温之母为党项渎氏，李光琇之母为党项破丑氏，因此李彝温、李光琇有蕃名是很自然的，而他们的兄弟也应有蕃名，但是在李彝温之弟李彝谨的墓志中，仅记载了李彝谨字令谦，很明显定难军李氏在其官方典范文体中有意回避族出党项，因为如果记载蕃名就与其自居华夏相矛盾，也因此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的蕃名仅在其家族内部使用，大量的蕃名不被官方文类记载。虽然定难军李氏如此积极地塑造华夏身份，但至宋初时已不被宋人认可，《旧五代史》即直称李仁福为党项拓跋氏之族。李继捧在病逝前曾向宋太宗请求流放己子，但“上以保忠戎人，性犷悍，且被病，恐所奏不实”⑥。可知宋太宗视李继捧为党项人。定难军李

①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③ 刘梦符：《后汉沛国郡里氏夫人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⑤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真宗景德元年六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40页。

氏家族成员的蕃名也被宋人记于史籍《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由于定难军李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党项的身份认同，因此得以凝聚境内的党项部族，在应对外患时得以利用党项部族武力，这在后唐长兴四年夏州中得到突出表现。长兴四年，后唐明宗乘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逝世，意欲将袭藩镇故事、自称留后的李彝超移镇，任安从进为夏州节度使，但安从进"初至芦关，蕃酋望风归附，寻加存抚，各令放归。及上马登山，未行百步，反袭从进，骑从七十余人几至不济"①。后唐大臣刘煚凝建议以李彝殷"为夏州留后，彝超征诏赴阙，则诸蕃归心矣"②。可见新任夏州节度使安从进不孚众望，党项诸族只认同定难军李氏的政治权威。后唐朝廷通过保留定难军李氏在夏州的世袭政治地位，又以李氏家族成员为人质，才能获得党项诸族的政治认同。在后唐讨伐大军开赴夏州后，李彝超"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遣党项抄粮运及攻具……壬辰夜，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救之……又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③。在当时，党项部族武力是定难军李氏唯一可以依赖的援军，定难军李氏正是依赖与党项部族武力的里应外合，才成功抵挡黑云压城的后唐大军。

第四节　番人、北魏拓跋氏后裔、李唐后裔、北宋宗室：西夏嵬名氏之身份认同

一、西夏嵬名氏族出自番人

李继迁抗宋自立后，主要依赖党项部族武装对抗宋军围剿，"复连娶豪族"④，以党项豪族女野利氏、罔氏等为妻，他还公开自居为党项。李继迁在上宋太宗表中谈道："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⑤从"向化"可知李继迁认为其先祖为华夏边缘之人，则其本人亦为华夏边缘之人。北宋君臣亦视李继迁为党项，在宋军擒获李继迁之母后，宋太宗本欲杀之，但宰相吕端进谏云："夫举大事者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虏

① 《册府元龟》卷三八九《将帅部·请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398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三八九《将帅部·请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398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3—9084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9页。
⑤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悖逆之人哉！”[①]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在给宋真宗的表文中亦谈道：“臣谓李继迁不合与夏州，又不合呼之为赵保吉。虽赐姓与名，已自先朝，然狼子野心，终是异类。”[②]带有歧视性的“胡虏”“异类”均刻画了北宋君臣中李继迁的非汉形象。

自李德明起，李氏家族成员广泛使用党项姓名。据《宋史·夏国传》，李德明“小字阿移”，李元昊“小字嵬理，国语谓惜为‘嵬’，富贵为‘理’”，谅祚“小字宁令哥，国语谓‘欢嘉’为‘宁令’”[③]。李德明之党项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广为出现，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二月，“李继迁子阿伊克元从刘荣来降，补三班借职，赐居第”[④]。五月，“西面部署司言李继迁与其子阿克伊聚兵浦洛河，声言入寇”[⑤]。景德元年（1004年）“邠州部署言李继迁子阿移孔目官何宪来归，诏令乘传赴阙”[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李继迁在与西凉六谷吐蕃作战伤重不治后，“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⑦]。从李德明即位后才改名德明，可知其在李继迁在位时仅有党项名阿移，而没有汉名，这与之前定难军李氏既有汉名又有蕃名大为不同，这应是李继迁在为己子命名时有意而为之，体现了李继迁去汉化而自居为党项的心理。李阿移虽改名为李德明，但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此时夏州政权正在策划与北宋约和，向北宋称臣，这样在上奏北宋的表文中需要以汉名来修饰。李德明实际上仍视己为党项，在北宋吊祭使吊祭其母时，“泣曰：蕃夷母丧，蒙天子吊赠、起复之命，宠荣极矣”[⑧]。

李元昊在未即位前亦以党项人自居，史载“德明尝使人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元昊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间，而与汉榷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不可。’德明为贳不杀”[⑨]。李元昊又屡屡向李德明进谏不要臣宋，在被李德明训诫后，仍抗言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⑩]从“我戎人”和“蕃性所便”均可看出李元昊对党项的身份认同。

李元昊称帝后，更是以改名、改发式、创制本民族文字等具有强烈去汉化色彩的政治、文化措施来强调本国的非汉政治属性。在改名上，李元昊放弃北宋所

① [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0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9，13992，14000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二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五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3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00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8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5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仁宗康定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87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4页。

赐赵姓，自名嵬名吾祖。西夏文字典《文海》释嵬名为“帝君之族姓”[①]。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文的‘嵬名’二字的字形组成都有‘圣’字，以表示皇帝种姓的高贵。‘嵬名’之第一字‘嵬’在西夏文字典中与另一有‘至亲、嫡亲、近亲’之意的字同音，在《文海》中注明其字意为‘父母亲骨肉亲’。第二字‘名’字在西夏文中和另一个发音为‘名’、意义为‘番’的字同音。这两个字在《文海》中声、韵都相同，但调类不同，一为上声，一为平声。‘番’即指西夏主体民族而言。作‘番’解的西夏字，译音为〔名〕或〔弥〕。‘嵬名’之‘名’可能源于这一党项族的族称。‘嵬名’两字合在一起意为‘近亲的番人’。”[②]从史先生对嵬名的释义来看，西夏皇室是自居为番人的。西夏番文《杂字》和汉文《杂字》均列有“番姓名”条，西夏番文《杂字》“番姓名”条下有西夏番姓 244 个，汉文《杂字》列有西夏番姓 60 个，嵬名在两书此条中都居于首位。嵬名既列于“番姓”条，说明编撰者认为嵬名属于番姓，姓嵬名的西夏皇族为番人。西夏番文《杂字》既有刻本，又有写本，在黑水城、武威、敦煌均有出土，可见其广为西夏人所使用，流通地域也极为广阔。随着番文《杂字》在西夏社会的流通，西夏境内的番人、汉人、吐蕃人、回鹘人都会通过书中的“番姓”条了解到西夏皇族为番人。这些番人、汉人、吐蕃人、回鹘人通过学习番文《杂字》，会逐渐接受西夏皇族是番人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一观念遂根深蒂固。

李元昊不仅将本家族尽姓嵬名，还将西夏境内的党项人统一称为番族。西夏文字书《文海》释“番“为：“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③]从“番”的释义来看，《文海》编撰者明晰西夏的番人即党项人，但为何不直接称其为党项，而冠以番这一称呼？余以为有三点原因。第一，自《隋书》立有《党项传》后，《旧唐书》《旧五代史》均仿其体例立有《党项传》，这样不仅中原王朝习惯称此一人群为党项，服属于中原王朝并接受汉文知识系统的党项上层，也普遍采取此一族称，并将之传播至本民族下层。为了扬弃这一代表汉文历史书写的族称符号，李元昊采用“番”来统一界定西夏境内的党项人。第二，在李元昊称帝之前，北宋、辽境内都活跃着大量党项部族。北宋既以党项称呼自己统治下的党项部族，又以党项称呼李氏所统治的党项部族；辽则以“党项”或“唐古”来称呼自己统治下的党项部族。为了与北宋及辽所管辖的党项人相区别，李元昊采用了“番”来称呼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并以官修典籍将其制度化，使“番”成了西夏党项人新的族称。第三，由于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河陇，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入居河西走廊，李元昊所统治的地域长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95 页。
②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98 页。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25 页。

期以来都是多民族混融，党项人也不免吐蕃化、回鹘化，如李继迁曾采用本为吐蕃之俗的传箭劝降西凉六谷吐蕃，在西夏立国后成为官方传递制度。为了与吐蕃、回鹘相区别，李元昊以“番”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以“西番”来称呼吐蕃人。

在改发式、创制本民族文字上，李元昊于称帝前夕即“衣锦袍、黄绵胡帽”①，称帝后向北宋进表，表文云：“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②《东都事略·西夏传》记李元昊“尽更先世所为居室、衣冠、文字，而国中数有叛者”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④。《梦溪笔谈》亦云：“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⑤为何要创制西夏文、秃发，因为之前使用汉文、束发。从宋人田况所云“昊贼蓄谋岁深，尽更汉法，自作妖书”⑥，亦可知李元昊在称帝前尊行汉仪。

创制西夏文使之成为国家文字，不仅能使西夏的党项人文明化，西夏王朝成为与中原王朝相媲美的文明国度，还能以此为工具凝聚西夏的党项人成为番族；又人为地制造了族群边界，对外使西夏的党项人与北宋的汉人、党项人，辽的党项人相区隔，对内构建了稳定的族群阶序。因为西夏首重番人，番文是以番人语音而创造的书面语，西夏的番人容易学习，学成后，在以番文为国家文字的各种政治、文化场合中更能发挥主导作用，西夏文《夫子善仪歌》即赞颂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后，“由此后帝族绵绵共听政，弭药儒层出不穷。各级诸司臣僚中，弭药司吏尤兴盛。其多至此汝试想：非夫子功谁之功？”⑦从诗歌可知掌握番文的番人确实在西夏官僚系统中有之，作者把其归功于创制西夏文的野利仁荣；而西夏境内的汉人、吐蕃人、回鹘人自用其汉文、吐蕃文、回鹘文。另外在李元昊称帝前，其境内的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皆有历史传承之文字，唯独居于尊贵的番人没有文字，文化上的弱势与政治上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使文化与政治相匹配，李元昊必须创制番文并使全体番人均修习并实践。

西夏文作为西夏统治者创造的族群边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于北宋而言，《郡斋读书志》云：“《蕃尔雅》一卷，右不载撰人姓名，以夏人语依《尔雅》体译以华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仁宗宝元元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1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13996页。
③ [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一二七，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104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冬十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04页。
⑤ 《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仁宗庆历元年五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7页。
⑦ 聂鸿音：《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译释》，《西夏文献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言。”[①]《宋史·艺文志》云:“刘温润《羌尔雅》,一卷。”[②]胡玉冰先生指出:“《蕃尔雅》是一部由刘温润依《尔雅》体例编纂的、用汉语解读西夏语的字书。”“刘温润身处宋夏关系紧张之时,本人又曾撰《西夏须知》,懂得西夏语言和西夏文是了解西夏的关键,而西夏的语言文字由于古奥难懂,非专书解读不可,由此可推知,他撰写《羌尔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汉人了解西夏文,进而更深入地了解西夏。”[③]可见宋人如果不借助工具书是很难读懂西夏文文献的。于西夏而言,番人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中谈道:“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④]《番汉合时掌中珠》刻印于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此时距西夏灭亡只有三十七年,但从序言可知西夏社会仍番汉有别。另外西夏文《夫子善仪歌》云:“羌汉番三一母生,语言不同地所分。愈西愈高羌人国,羌人国内羌文字;愈东愈低汉人国,汉人国内汉文字。自己语言自己爱,各个文字各个敬……皇天下各读各经各国礼。不合于羌羌归降;后土上各奉各业各国仪,招引汉人汉屈服。”[⑤]从诗歌可知西夏番人是非常认同文字作为一种族群边界的存在,番文、汉文这样一种族群边界既在番、汉的不同语言中存在,也在番、汉的不同地理区域中存在,正是由于番文、汉文的存在,西夏的番人才与中原王朝的汉人成为在文化上不同的异群体。

李元昊在称帝进北宋表文中自称创制西夏文,《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⑥]在西夏文献中亦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如《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称“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钦崇佛道,撰述蕃文”[⑦]。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云:“其后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言语,建立番礼。创制文字,翻译契经。”[⑧]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云:“风帝即位,四海战战兢兢。番地独尊,八山巍巍荡荡。剑刃以磨,地上疆界已正;玉毫绵长,人中番文写成。”[⑨]但据西夏文《夫子善仪歌》和《宋史·夏国传》可知西夏文的真正创制者为在李元昊称帝后主持番学的野利仁荣。为何李元昊自称创制西夏文并被称颂,史金波先生认为“元昊创制并推行西夏文,其间所表现

①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七《伪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7页。
② 《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76页。
③ 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④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⑤ 聂鸿音:《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译释》,《西夏文献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8—209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13页。
⑦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⑧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5页。
⑨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辨”初探》,《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

出的对番族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十分明显。”[①]正是由于元昊自居为番人，而纯粹的番人应全面掌握番文并熟练运用，如果是番文的创制者则番文水平更高，所以元昊才自称创制番文，使其本人成为西夏番学的化身。另外由于元昊是西夏的实际开国皇帝，西夏立国，番族才得以诞生，番文才得以创制，也使后代番人受惠颇多，因此后世番人才赞颂元昊创制了西夏文。

在元昊之后的一些西夏皇帝也极为重视番文字典、韵书的编纂。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其序文中有‘朕’的字样，知为御制序，可见西夏皇帝对编辑、出版西夏文字书的重视。以皇帝的名义作序，已彰显出本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书名前冠有国名，应是官修书。更可见西夏统治阶层对民族语言、文字基本书记编纂出版的重视”[②]。另一西夏文韵书《五音切韵》序云：“今观看诸书，有西蕃、汉人之《切韵》。今文字之五音者，平上去入，各以字母明之，分析清浊平仄，别示重轻，明上下章，呼应切字，斟酌韵母，为文之本，凡所集存，永久不忘，是以传行。以朕之功德，依时修成今之《切韵》。国家敬重，为智慧增盛之本。佛法经藏、王旨敕禁、诗文清浊、阴阳吉凶、历日正法、治人定律、赞庆典集等，为文之本源也。……诸业中无当之宝，一切内文宝最上。”[③]从序文行文可知为西夏某帝所撰，为与吐蕃、中原《切韵》相媲美，下诏官修番文《切韵》。该皇帝被考证为夏惠宗秉常。从序文可知夏惠宗秉常极为重视番文，认为番文适用于西夏国内雕印佛经、下达圣旨、敕命、禁令、诗文用韵、占卜、测算历日、制定法律、典礼仪文。他还认为以番文撰述之功业在一切业绩之上。番文是西夏番学的核心和基础，夏惠宗秉常重视编纂《文海宝韵》《五音切韵》正是为了大力弘扬以番文为代表的番学，通过官方编撰形成番学的典范文本，进而在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使用，使番学成为西夏社会的主流学术，进而支持并巩固番族在西夏的统治地位。番文和番人的密不可分使番文成了西夏番人的身份标志，夏惠宗秉常对编纂《文海宝韵》《五音切韵》重视正体现了他对番人的身份认同。

在西夏皇室崇重番学的影响下，西夏宗室也积极学习番文，有很多番文学养深厚。西夏文《同音》序云：“依音立字，据语成句，为世间大宝，成民之根本。先集稍稍乱，后新渐渐行。吾等陷迷惘，学者不易寻，故而节亲主、德师、知中书枢密事、执正廉、主孝文武业、恭敬百工、东南族长、上皇座嵬名德照，因所见文本略有

①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7页。
②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③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杂乱，乃请御史正、谏官、校书郎、东南族长、上大学士兀啰文信，重正其杂乱，集合其声类，大字六千一百三十三，注字六千二百三十。遣匠雕刊，传行国内，劝民习之，为智之本，勿生懈怠。”[①]《同音》重校序云：“今《同音》者，昔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之作。后又增新字时，学士浑嵬白、兀名犬乐等别以新字，另作《同音》一本，是以新旧两部各自传行。其后节亲主嵬名德照深谙番文，因见旧本有讹，新字别出，故延请学士术兀啰文信，结合新旧，集成一部，即今日此本。其亦眼心未至，知识不重。”[②]从序文可知身居德师、知中书枢密事高位的西夏宗室嵬名德照番文学养深厚，见番大学院切韵博士、学士所作之番文韵书《同音》存在新旧本之分，体例不一、内容不同，于学习番文颇为不便，便主动延请上大学士兀啰文信将《同音》新旧本合纂为一部并予以修正。兀啰文信修成全新本《同音》后，嵬名德照又以工匠雕印刊刻，在西夏境内广为传播。从“为智之本，勿生懈怠”可知嵬名德照深明《同音》具有规范番文学习之功用。嵬名德照以其番学素养之深厚，又主动延请番族高士编纂番文韵书，书成后大力推行，说明番文不仅是开启番族智力的文化工具，还是凝聚并保持番族族群认同的符号象征。正是由于番文是西夏番人最核心的族群文化标志，在明朝中期还有西夏番人后裔予以使用，随着西夏番人后裔融入华夏，西夏番文也就逐渐变成了不为华夏所解的神秘文字。

西夏皇帝对番人的身份认同还体现在宫殿居室名称、饮食习惯、祭祀以及行猎上。宋史典籍多记载西夏番人以族帐为居住单位，西夏皇帝的宫殿也被称为帐，这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多有记载。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法典规定无职杂人入内宫所犯罪行时，依据入宫门的远近而区别判罪轻重。首先是‘车门’，再进为‘摄智门’，再内是‘广寒门’和南北‘怀门’，最后是皇帝的帐内。”[③]西夏皇帝的帐内是至尊之处，因此西夏政府制定“帐下人阑入法”层层保护[④]。《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云：“三种内宫及帐下等，外面沿门一律一种派门楼主一人、内宿守护三人，内提举一人”[⑤]“沿内宫帐下不许诸人胡乱往来”[⑥]“沿帐下不许种种工匠、肃女子等住”“帐下库局分所住人不许往来帐下”“官家不住之内宫及帐下等亦应巡检”[⑦]“一等帐下门关迟一时十三杖，一夜徒六

①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②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③ 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10页。
④ 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38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6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年”[①]“不传上谕，仅谓帐上御前召之，则当比杂人入宫之罪状加一等”“一等入帐下□□□中，入帐下□内者徒一年，持武器者则徒二年”[②]。《天盛律令》记载的西夏皇帝帐内的侍从官名即有帐下内侍、侍奉帐者、帐下内官都案头监，另有帐门末宿为禁军部队之一种。《天盛律令名略上卷》还记有“内宿帐下等守口派值日”[③]。在“敕禁”条下又记有“青白帐一种为”[④]，可见青白帐为西夏皇帝御用之物。《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敕禁门》具体规定：“一诸官民青帐、白帐等敕禁：其中允许头盖青下为白。若违律为一种白、青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⑤]夏仁宗仁孝在平定任得敬之乱后，曾献百头帐与金世宗，可见西夏皇室对帐之重视并以之为珍品进行外交活动。

西夏番人在饮食上惯用乳制品。王明珂先生指出：“游牧人群难以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⑥]西夏皇室也嗜好乳制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利限门》云：“一御用等年供给乳畜，依先群牧司人计议能定之用度，母牛、母羖攌、母羊者，应使笨工牧人中出多少，不许于牧监、大小首领等中派遣。彼牧乳畜者所在之处当奏报，当求谕文判写，直接供养酪脂、乳酥等，勿与诸牧场同，勿交羖攌毛绒，牧者当得之。酥者，酪脂、乳酥等交，则为大校之酥勿计”[⑦]“一等御供畜中分离母畜，牧人摊派杂事、牧监大小首领派于圈牧人中等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受贿则以枉法贪赃罪论。御供圈牧已定之外，无谕文判写而令多抽时，所多之畜在圈牧中，其毛绒、酥几年未纳，依现价法计价，以偷盗法判断。”[⑧]从上可知西夏皇室有专门的御用乳畜，这些乳畜由西夏群牧司负责管理，设置专门的牧场。御用乳畜主要为西夏皇室提供酪脂、乳酥等乳制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利限门》又记：“一等官家出时，供给者应于圈牧者中派遣若干，随导官家，勿入军溜中，不许于其他诸牧场中抽入供给随导。”[⑨]说明西夏皇帝出行时，御用乳畜也得由皇室牧场中的牧人押领随行，为西夏皇帝随时提供乳制品。

---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④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⑥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79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0页。
⑨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0页。

羊、马、牛为西夏番族的重要畜产，在西夏番族的信仰世界中也被作为神祇被崇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皇族崇祀神畜多有记载，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名略》下卷记有“御用神畜分牧遣管理法”和“祭牛神牛马等死患病”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患病门》云：“一有神马、祭牛、神牛一种者，年年四月三日于冬夏分别时，于旧宫内天神下当送马中散茶酒。其中有突然死亡及患病等时，牧人当速告局分处派人视之。谓已死之畜有神字迹，是实情，当令视者只关，派一官巫，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当往本土地上，于彼畜所产幼仔之色美好者穿耳以祭祀。”②夏神宗遵顼之父齐国忠武王李彦宗被祭祀时，其神像戴以羊首冠。明定襄伯郭登在《甘镇志》中写道：“城西南隅有古祠，载祀明神为‘护国忠武王’……神以羊首饰冠，朱衣端笏，仙姝吏兵执枝戟、斋斧，列侍左右。”③《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云：“西夏忠武王庙，城镇远楼南之西偏。俗名土主庙，李夏时建。或云祀齐忠武王李彦宗也。”④其书卷十六《杂纂》明确指出：“西夏土主庙，明时重修，定襄伯郭登撰记，以为六丁之神。按，神称西夏土主忠武王。王，爵也，忠武，谥也。”⑤陈炳应先生认为《甘州府志》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西夏皇族对羊的崇拜。考虑到‘羌’字从羊和我国羌人的一些后裔迄今仍在盛大节日中饰羊头的风俗，可以说，西夏皇族也是出于羌族的”⑥。

羊、马、牛还作为随葬品安置于西夏皇族的坟墓中。西夏陵陪葬墓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于1975年冬被发掘，“在墓室填土及底部出土的有羊、牛、狗等家畜骨骼近百块……在距甬道门1.40米的墓道底部，发现一完整的幼狗骨架。在墓室西南角有一完整的幼羊骨架”⑦。在墓室东北填土中还发现石狗、石羊各一件。根据墓室平面图，幼羊骨架位于墓主人棺木之西南侧，前述神像以羊为冠首的西夏忠武王庙也位于甘州城西南隅，足见西夏皇族保有族出西南的历史记忆，而这也是大多数番人所拥有的历史记忆，如野利氏家族墓葬墓室西侧也出土有幼羊骨骼。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陪葬墓越王仁友墓甬道两侧也曾发现铜牛和石马，在墓室发现铁狗。研究者指出“据遗迹分析，其位置未曾移动。铜牛位置靠近甬道东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2—583页。
③ [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289页。
④ [清]钟庚起纂，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五《营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⑤ [清]钟庚起纂，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一六《杂纂》，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846页。
⑥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⑦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壁，头向内（墓室）；石马的位置靠近西壁，头向外（甬道）。二者并列，方向相反。”[①]在M78陪葬墓的甬道也曾出土铜牛、石马，墓室中出土有石狗。西夏六号陵墓室西侧室填土曾出土2件金鞍饰，可见陵主李德明对骑马非常热衷，他还曾送名马与宋使，《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是月，赵德明落起复，遣人内都知蓝继宗为官告使往赐之。德明与继宗射，继宗每发必中，德明遗以所乘名马”[②]。位于贺兰山山前洪积扇的野利氏家族墓地也出土有许多随葬的羊、马骨骼，如M4墓墓道有两处发掘出马骨，“一处为马头，出土在距墓门3.3米、靠近墓道西壁的台阶上……另一处马骨出土在距墓门1.7米处的墓道底部，马头完整，头东有马腿骨，均排放整齐，未曾扰动，周围有木板朽迹，可能表明随葬的马头、马腿是盛放于木盒之类的装置之中”[③]。M4墓室西侧出土有幼年绵羊骨骼。M7墓室发现马头骨和羊骨，经整理鉴定，M7“墓道有马2匹、骆驼1匹、绵羊2只，墓室中有马2匹、绵羊1只”[④]。

杜建录先生指出：“对和则为牧、战则为骑的党项人来说，马乃立国之根本，非如猪羊类也……羊是党项畜牧业占第二位的产品。”[⑤]因此西夏皇族嵬名氏和后族野利氏的墓葬中出土马骨和羊骨，无疑为西夏发达的畜牧业提供了生动注脚。史金波先生亦认为：“这些动物造型的随葬品应是西夏畜牧业发达和牲畜神崇拜的表现，反映出西夏墓葬的民族和地域特点。”[⑥]这些随葬品所展现的西夏墓葬的民族特点其实也表现了墓主人的身份认同，因为在目前已发掘的西夏汉人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此类的随葬品，在北宋境内的汉化党项人折氏家族墓地中也没有看到此类随葬品，以马、牛、羊、骆驼等游牧经济中的主要牲畜随葬无疑展现了墓主人作为番人的非汉特点，表明墓主人不仅要在冥世享用这些牲畜，也要借这些牲畜来表现自己的番人身份。

西夏文大型志书《圣立义海》记载了西夏皇室和整个番人群体的一种特殊信仰——神石崇拜。《圣立义海·月之名义》“七月之名义”云：“七月中，鹌鹑鸣，民庶乐，国家安。众神齐聚：七月十五，‘茂陵’报父母之恩，供神石，设贝场，乃众神会聚之地也。国内设礼：君、臣、民等报恩孝顺父母，故期设神石器，悔过也。”[⑦]从中

①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47页。
③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⑤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⑥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06页。
⑦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可见西夏境内上至皇帝，下至臣僚、百姓都崇奉神石，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都在神石前忏悔以思孝顺父母。歌颂西夏皇族起源的《夏圣根赞歌》云："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𗴂𗫂𗥃𗥤𗥈𗥉𗍫，𗖵𗖷𗏴𗅲𗧘𗪘，𗥈𗥉𗢳𗫂𗖵𗖷）[①]陈炳应先生认为这两句诗皆指党项人发源地，其中白河为今白龙江，石城则为《后汉书·段颎传》所载在积石山附近的石城羌。[②]如此西夏境内的神石崇拜应带有祖先崇拜之意义。西夏皇室参与所有臣僚和百姓都举行的神石崇奉仪式，说明皇室已自居为番族共同体之一员，以番人的身份来报恩父母。直至今日，在羌族人群中仍流行崇拜白石。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白石是代表神意的武器，成功促使羌人从北方南迁至岷江上游。王明珂先生指出羌族神话中的天神木比塔"是所有羌族的天神——护佑羌人战胜敌人的天神；白石则是这位天神的象征"[③]。另外西夏番人还使用神石进行占卜，如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成对谚语》云："野立卜石念秘咒，赞雷电角敌归伏。"[④]

"狩猎是许多游牧人群喜好从事的活动，也是他们避免宰杀牲畜而仍可得到肉食的手段。"[⑤]夏崇宗乾顺在位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仁曾上疏谈道："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⑥]可见狩猎为西夏番族的重要风俗。西夏皇帝也颇好狩猎，如汉文史籍曾记夏太祖李继迁"善骑射，饶智数。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坂下，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巅，一发中虎眼，毙之。蕃部由是知名"[⑦]。李元昊称帝前后，"每欲举兵，必率酋豪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⑧]。李元昊曾携没藏氏行猎，《宋史·夏国传上》云："两岔，河名也，母曰宣穆惠文皇后没藏氏，从元昊出猎，至此而生谅祚，遂名焉。"[⑨]夏仁宗仁孝也曾在贺兰山下狩猎，史载："仁孝猎于贺兰原，有骏马损足，命执治道者戮之。阿华侍侧，谏曰：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仁孝讶而止。"[⑩]西夏文大型志书《圣立义海》也记载了西夏皇帝的狩猎活动。《圣立义海·月之名义》"十月名义"条云："御寇行猎：十月时，天降霜，使蒲草尽枯死，君依赖于

①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356页。
③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8页。
④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
⑤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⑥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⑦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04页。
⑨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00页。
⑩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2页。

天,率军行猎也。”①“腊月之名义”条云:“年末腊月:国属金,土日,君出射猎,备诸食。”②可见西夏皇帝在一年之中的两个月都要外出进行大规模的狩猎,一次是率军围猎,等同于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借围猎而锤炼西夏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次则是为了储存食物而进行的狩猎,但很难想象作为一国之尊的西夏皇帝需要为了食物而进行狩猎,因此年末腊月的狩猎对西夏皇帝而言更像是一种文化展演,旨在向臣民展示自己作为番人的族群特质。

西夏皇族对番人的身份认同还在于将夏州政治边缘化。夏州是西夏立国前党项拓跋部世居之地,拓跋思恭创建的定难军根基之地,但是在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其政治地位便逐渐下降,至西夏立国后更是一落千丈。李继迁起兵后最初十分重视与宋军争夺夏州,通过占领夏州外围的绥州、银州一步步靠近夏州,在夏州附近与宋军展开长期的拉锯战,他在上宋太宗的表文中谈道:“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③宋太宗为避免李继迁攻陷夏州后凭借夏州的高城深壕对抗宋朝,下令堕城并徙民于周边诸州。李继迁被宋廷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保持了对夏州的合法占有,但在攻下灵州后,便从夏州迁徙至灵州。史载:“初,保吉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弟继瑗言: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而迁弃,恐扰众心。保吉曰: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④

李德明即位后从灵州迁至怀远镇,将怀远镇建为兴州,李元昊称帝后将兴州升为兴庆府作为西夏的正式国都,而夏州则成为西夏的边州,元昊甚至将不为其爱的孽子流放至此。史载元昊“子阿理谋逆,杀之,及妃咩米氏。咩米氏,曩霄第四娶,生子阿理,无宠,屏居夏州王庭镇。阿理年渐长,谋聚众为乱。其党卧香乞以告,曩霄执阿理沉于河,遣人赐咩米氏死”⑤。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夏州位列末等司倒数第二,仅在绥州之前。夏州的主政官员为一寨主、一寨副、一行主。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②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③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④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⑤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在末等司位列夏州之前的有讹泥寨、安远堡、宣德堡、凉州、定羌寨、常威寨、西明寨、绥远寨。从夏州的主政官员设置和其所属的末等司构成来看，夏州在西夏中期后不但不是边州，反而降为堡寨。杨蕤先生即指出："西夏诸州仅仅沿用了唐宋以来的名称而已，降级为与堡寨同列的政区。"[①]宋神宗五路伐夏之时，夏州守军未作认真抵抗即轻易放弃，"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②]。此时的夏州十分萧条，"是日，王中正至夏州，时夏州已降种谔，谔寻引去。（据十一月五日丁亥奏）中正军于城东，城中居民数十家"[③]。

作为李继迁龙兴之地的夏州为何在西夏立国后政治地位一路下跌，一是由于李继迁在攻占灵州后已确定了向西发展的战略方针，李德明时期定难军即大规模向河西走廊拓展势力范围，至李元昊称帝时西夏的核心统治区主要是兴灵地区和河西走廊，夏州所在的横山地区遂成为宋夏边境堡寨耸立的四战之地。二是由于李继迁之前的历任定难军节度使均把自己打造成华夏之裔，以汉人之面目向中央朝廷争取政治名位，对内则以此身份形塑统治合法性。作为定难军会府的夏州在唐末至李继迁起兵抗宋前的一百年间，不啻为已经华夏化的定难军李氏的大本营。李继迁作为从华夏回归党项的定难军李氏代表，通过将夏州政治边缘化不仅可以显示自己去华夏化，坚持对党项认同的决心；还可以借空间转移脱离夏州这一华夏化的政治场域，消除之前已经华夏化的定难军李氏的政治影响，重构全新的党项化的定难军李氏的政治文化。

由于西夏嵬名氏以番人自居，番人臣僚在翻译中原汉文典籍时对"夷狄""胡"等敏感词汇通常予以篡改，如夏译汉籍《类林》卷三《烈直篇》"苏武"条将苏武所云："堂堂汉使，安得屈于四夷？"改为"汉国所派堂堂使官，安得屈于小国？"卷三《忠谏篇》"范蠡"条将勾践所云："臣自惟生处夷狄，未见天理"改为"臣生于寡地小姓，岂知大义"。卷六《列女篇》慕容垂妻条将"伪范阳王德聘季妃"去掉"伪"字。卷六《异识篇》"张华"条将"愍帝在长安陷于胡贼"中的"胡贼"改为"回鹘贼"[④]。这些都反映了西夏番人译官对北族身份的敏感，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夷狄""胡"等中原地区惯用的歧视性词汇极为反感。

① 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49 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神宗元丰四年十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7682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7683 页。
④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9 页。

二、西夏嵬名氏族出于北魏拓跋氏

由于中晚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长期标榜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李继迁在起兵抗宋后也号称自己为拓跋氏之后。北宋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曾向宋太宗上疏谈道："臣顷在翰林，见继迁上表云：乞取残破夏州，奉拓拔（跋）氏祭祀。"[①]史载李继迁在该表文中叙及"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蒁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继绝"[②]。李元昊称帝后，极力向宋廷宣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他在上北宋的表文中谈道："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③]《宋史·夏国传》亦云表文声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④]宋人甚至记载李元昊改姓元，《归田录》云："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⑤]李元昊以北魏拓跋氏为己祖，不仅是延续党项拓跋氏、定难军李氏自中晚唐五代宋初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且更是一项政治宣言，旨在通过北魏拓跋氏之后的尊贵身份来强调自己建立西夏国家的合法性。这种政治意图在其致北宋嫚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嫚书云："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柘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⑥]李元昊在嫚书中首先强调西夏与北宋各自统治的民众族属不同，西夏与北宋的地理区位不一，继而谈到其称帝是为民众所推，顺应民心，自己作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更是具有称帝资格。

李元昊称帝极大地震动了宋廷，北宋朝野上下对李元昊声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全然否认，宋廷在《赐西平王赵元昊诏》中严厉指斥李元昊"轻述僭差，且将徇过分之谋，具非常之号，冒陈世系，辄改岁元"[⑦]。北宋名臣范仲淹在给李元昊的信中谈道："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且尧、舜、禹、汤固有后裔，复可皆立为帝。若大王之国，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也，徒使疮痍百姓，伤天地之仁。"[⑧]虽然北宋否认李元昊族出北魏拓跋氏，但是西夏皇族仍然以北魏拓跋氏之后自居。夏仁宗仁孝寿陵西夏文残碑 M2X:3+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太宗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897 页。
②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63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仁宗宝元二年春正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893 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995 页。
⑤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 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仁宗宝元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950 页。
⑦ [宋]宋庠撰：《元宪集》卷二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年，第 1087 册，第 616 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〇，仁宗庆历元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087 页。

20+160+533+876 云："受后魏本，册也义残重，文武皆备世世君，世名显者不妙也乎。"[①]西夏文宫廷诗《严驾向山歌》亦云："先祖轩辕尽有言者何时终。故袭魏拓跋无土筑城圣指教。"(𗍫𗏁𗐯𗅲𗈪𗌭𗖵𗗙𗥃𗤓𗧘𗫂，𗍊𗹦𗡞𗼃𗦳𗣼𗖌𗖵𗗙𗥃𗤓𗧘𗫂

在民众中强化北魏拓跋氏为皇室祖先这一概念，无疑是一种提升自己社会身份、地位的政治手段。通过坚持以北魏拓跋氏为祖还得以成为黄帝之裔，作为黄帝之裔的西夏嵬名氏开始认为西夏的国家文明高于周边各族。西夏6号陵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记有“梯航四□”[①]，7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记有“大破之虏”“并吞八荒”“三年西戎”“戎夷匪(茹)”“北塞鞑靼变俗用夏”“西戎满”[②]。西夏文《夏圣根赞歌》云：“四方夷部遣贺使，一中圣处求盟约。”(𗍫𗥃𗢳𗤓𗥞𗖵𗫂，𗏁𗐱𗏁𗥞𗤶𗥃)[③]这些虏、戎、夷正是西夏周边文化低于西夏番族的游牧民族。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西夏番人解释“汉”为“蛮”，“吐蕃”为“戎羌”，“九姓回鹘”“契丹”为“夷”。从“北塞鞑靼变俗用夏”可知西夏皇族正是要以本国的番族文化来改造处于蒙昧状态的鞑靼，西夏的番族文化因而披上了“华夏”的外衣。此时在西夏番姓大族的眼中，世界上具有文明的民族仅有吐蕃、西夏番人、宋朝汉人，女真金人因为毁灭华夏文化被仁孝斥为“丑虏”[④]。

从《金史·西夏传赞》所引罗世昌文还可得知西夏嵬名氏保留了其祖先居住地位于松州的历史记忆，松州是包括党项拓跋氏在内的绝大多数的党项人的祖居地，但在罗世昌笔下，北魏衰亡后，居住在松州的北魏皇族元氏的一支恢复旧姓拓跋氏。这支恢复旧姓拓跋氏的北魏皇族无疑就是中原史籍所记载的党项八大部中的拓跋部，可见西夏皇室认为他们是北魏衰亡后流入党项的北魏宗室。这样的历史书写可以称之为“英雄徙边记”[⑤]。王明珂先生认为英雄徙边记为一种英雄祖先历史想象，“此种历史叙事的主要情节为：一位失败或受挫的英雄，自华夏远走边缘蛮荒之地，在此他成为本地的王。通过这样的历史叙事及其中的符号隐喻与情节，古代华夏描述不同性质的边缘。此种历史记忆的流传，也造成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⑥]。西夏皇室通过这样的英雄徙边记来诠释自己的祖先为何是党项人中的元魏后裔，借元魏后裔之高贵血统来强调西夏王朝的正统性，也确立了自己在国内高于其他番人家族的社会地位。

西夏嵬名氏以北魏拓跋氏后裔自居还表现为数任西夏皇帝均有拓跋姓名，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九卷《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九卷《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219页、222页、229页、233页、258页。

③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8页。

⑤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9页。

⑥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9页。

这为藏文史籍和佛教史籍所记载。《汉藏史集》记载西夏的第一个皇帝智祖皇帝在出生后几乎被汉人皇帝杀死，“在杀小孩时，妇人假装其子已死，放到棺材中，哭着带出城，抛到河边苇草厚密处。每天都有一只只鹰飞来，保护小儿不被冻死，另一妇人有一头乳黄牛，乳牛每天前去小儿身边，为小儿哺乳。一天，乳牛的主人跟着乳牛行迹查看，见此情景，人为此小儿大有灵异，将小儿抱回作为义子，起名为拓跋我努，译成藏语意为黄牛哺乳者”①。《佛祖历代通载》云：“庚申，西夏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顺子，改年大庆”②“丙寅，西夏拓跋失都儿忽，乾顺小子仁友之子，乃仁宗侄也。是年五月立，在位六年”“西夏神宗拓跋须蕃邸立，改年光定”③“癸未，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干定……丙戌，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④藏文史籍和佛教史籍所记载的西夏皇帝拓跋氏姓名有许多不见于汉文典籍，如拓跋我努、拓跋须、拓跋德仁，这些姓名都表现了西夏嵬名氏对北魏拓跋氏的身份认同。

三、西夏嵬名氏出于唐朝李氏、宋朝赵氏

西夏皇帝在对辽、对金外交中多用李姓。《辽史·西夏外纪》云：“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⑤《辽史》诸本纪中，《圣宗本纪》记有李继迁、李德昭，《兴宗本纪》记有李元昊、李谅祚，《道宗纪》记有李秉常，《天祚帝纪》记有李乾顺。《辽史》诸列传中，《韩绍芳传》《萧术哲传》《萧惠传》《罗衣轻传》《古迭传》记有李元昊，《药师奴传》《耶律俨传》《萧得里底传》记有李乾顺。辽人墓志亦称西夏皇帝姓李，《秦德昌墓志》云：“重熙中，兴宗问罪于西夏，遣公召夏王李元昊，奉命既严，乃曰：李王据虎狼之国，不可以柔而致。遂直诣其厅之前以下马，入厅限内见之。李王欲正坐，公请并坐，曰：何得倨见上国使臣，及辱万乘，亲征行銮咫尺而不朝见，毋持小小土疆，至如十倍于此，亦不劳瓦解。李王愠色殊无礼待。公曰：草莽之身，直如亡命，亦且无憾。李王遂朝。初在合门嘱公以简其礼及不呼名，公尽依常礼，通名喝李王，左右掩耳声苦，皆欲奋剑而刺之。”⑥

《金史·太宗本纪》《金史·西夏传》均记有李乾顺，《金史·熙宗本纪》《金史·世宗

① 《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② [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九卷《史传部一》，第687页上。
③ [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九卷《史传部一》，第701页上。
④ [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九卷《史传部一》，第701页下。
⑤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4—1525页。
⑥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本纪上》《金史·食货志》《金史·完颜衷传》《金史·纥石烈良弼传》《金史·结什角》均记有李仁孝,《金史·章宗纪》记有李纯佑、李安全,《金史·卫绍王本纪》《金史·宣宗本纪》记有李遵顼。《辽史》《金史》的相关记载说明西夏皇帝极为重视李姓这一唐朝赐姓所蕴含的政治价值,李姓虽然是唐朝赐姓,但是毕竟为唐朝皇姓,且为党项拓跋氏长期使用,远较辽朝耶律氏、金朝完颜氏尊贵,因此坚持使用李姓可以在血缘、文化上与辽朝、金朝相抗衡,甚至超越之,从而抵消在政治上从属辽朝、金朝的不利局面,形塑西夏作为西朝、嵬名氏作为西帝的尊贵地位。

西夏嵬名氏不仅在对辽、对金外交中使用李姓,还在本国政治文化的构建中以唐裔自居。据彭向前先生研究,西夏承继唐朝土德,以金德为本国符德,由于金德尚白,因此西夏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白高国。[①]他又指出夏毅宗谅祚改制仿唐色彩浓重。[②]这样在西夏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蕃、汉礼之争或许可以置于身份认同的角度下予以考察。他还统计了将西夏皇帝称为李王的蒙元史料,计有郝经《沙陀行》《三峰山行》,袁桷《送乐德敬甘肃儒学提举之二》《贺兰堂记》,胡只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噜噶齐王公神道碑》《元史·木华黎传》、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纪》。[③]另外《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云:"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④]《资善大夫中书左丞相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亦记:"李氏之在,与水细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⑤]进入蒙元以后,夏神宗遵顼之孙李惟忠及其后人均使用李姓,《元故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铭》即云:"忠襄始仕我朝,家于淄川,从唐所赐夏国姓。"[⑥]《资善大夫中书左丞相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更将李惟忠、李恒一支视为陇西李氏,碑文云:"惟李氏家陇西成纪者,实秦将信诸孙,汉至六朝,门阀甚峻,惟与崔、卢、郑氏姻,不连他族。唐季王西夏,甚盛强,虽宋、金尝加兵,终莫能服。"[⑦]此碑既置于李氏家庙中,可见李恒后裔已认同本支出于陇西李氏,通过家族祭祀又不断凝聚此一观念。

---

① 王炯、彭向前:《五德终始说下的大白高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彭向前:《谅祚改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③ 彭向前:《西夏"李王"为"孛王"试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④ [元]姚燧著,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一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
⑤ [元]姚燧著,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一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⑥ [元]吴澄撰:《吴文正集》卷八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97册,第589页。
⑦ [元]姚燧著,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一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西夏皇帝在对北宋外交中使用赵姓。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捧入朝纳地后，由于李继迁出奔地斤泽掀起反宋大旗，宋太宗遂以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返回夏州剿杀李继迁。李继捧临行前，宋太宗对其赐姓名。《宋太宗实录》云："辛未，诏赐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姓赵氏，名保忠。上以李继迁频扰边陲，欲委保忠边事，故以五色花笺一幅，御书姓名以赐之。"[①]此时李继捧的封爵为天水郡开国侯，天水为赵姓郡望。宋太宗对李继捧赐国姓并以天水命爵，主要是以此殊荣来笼络李继捧，使其在政治上效忠宋廷，在军事上配合宋军围剿李继迁。李继捧复镇夏州后，对李继迁先围剿后约和。为了全面恢复定难军在夏州的独立地位，李继捧通过李继迁向辽朝示好，《辽史·圣宗纪》云："丁丑，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②]从中可知李继捧在争取辽朝的政治支持时没有使用宋太宗所赐姓名，表明了其意欲独立的政治野心。李继捧因首鼠两端被宋军擒拿回朝后，由于其尚具有潜在的政治利用价值，宋太宗仍对其赐姓名赵保忠。《新安文献志》即存有张秉所撰《李继捧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京城仍赐姓名赵保忠制》。入宋的定难军李氏，除李继捧使用赐姓外，其余各支仍然使用李姓。《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内殿承制、合门祗候李继元，表述其祖保大定难节度使、朔方郡王拓跋思恭仕唐，剪灭黄巢，赐姓，父克文率族归阙；与李继迁本五从兄弟，名同上字，心实耻之，愿改名守元。"[③]这与唐末拓跋思恭被赐姓后其父、叔、子、侄全部改为李姓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宋廷只愿意施恩于李继捧一家，视李继捧为入宋定难军李氏的唯一政治代表。

李继迁在附宋后也被赐姓名，与李继捧不同，李继迁一族都被赐姓。《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丙午，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以国姓，名曰保吉。赵保忠又荐其亲弟继冲，上亦赐姓，改名保宁，授绥州团练使。"[④]宋太宗认为对李继迁赐姓为朝廷隆恩，曾谈道："保，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予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⑤]《答银州观察使赵保吉诏》亦云："宠以嘉名。赐之国姓。朕之于汝。无所负焉。"[⑥]宋廷对李继迁赐姓，是将其视为宗室。

①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8页。
②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11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太宗淳化二年七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1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二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5页。

《赵保吉赐姓名除银州观察使诏》云："赐之国姓。俾预于宗盟。"[①]此时李继迁的封爵亦为天水郡开国侯。李德明即位后，宋廷更将李德明一族正式列入宗室属籍。宋真宗《赐赵德明诏》云："况早联宗属。曾列侯藩。"[②]《赵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云："举宗联命氏之荣，奕世荷殿邦之寄。"[③]《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云："其有宠联宗籍。位冠侯藩。"[④]《西平王赵德明加恩制》云："於戏，归祭膰以先同姓，受福攸均。"[⑤]宋廷在赐予李德明的诏书中不断强调李德明被赐姓，是对外宣称李德明乃以宋朝宗室的身份来代宋廷治理西夏，因此西夏乃一藩镇而不是独立政权，同时也劝诫李德明应谨记自己拟血缘的宗室身份，代宋廷治理好西夏以藩屏中原。

李元昊在称帝前也使用赵姓，《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云："嘉捍难于边衡，赐同姓于宗籍。"[⑥]史载汉人张元、吴昊进入西夏后，"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⑦]。李元昊从父山遇也以赵为姓，《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己酉，鄜延路钤辖司言，赵山遇遣人至金明县，与都监李士彬约降。"[⑧]在李元昊称帝后，宋廷予以的政治惩罚便是削其赐姓及宗室身份。《削赵元昊官爵除去属籍诏》云："曩者德明即世，西夏控哀。朝廷录守方之忠，悯称慈之礼。拔于童孺，付以节旄。名袭真王，宠视同姓……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令宗正寺除去属籍。"[⑨]在李元昊之后，谅祚、秉常在对宋外交中均使用赵姓，《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赵谅祚遣使者来致祭"[⑩]，"窃见近年以来，赵谅祚虽外遣使人，称臣入贡，而内蓄奸谋，窥伺边境"[⑪]。"臣伏见神宗皇帝，以夏国主赵秉常为臣下所因，兴兵致讨，奋扬天威"[⑫]。谅祚曾因以李谅祚之名向北宋上表而被宋廷训斥，《赐夏国主今后表章如旧称赐姓名诏》云："维乃祖之称藩。有先朝之赐姓。抚绥隆于君义。亲爱笃于人伦。自再纳于誓言。亦且循于轨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举措之违。得非左右之惑。宜存远虑。

①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5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⑦ 《宋史》卷一《张元吴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仁宗宝元元年九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⑨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8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英宗治平元年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06页。
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英宗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08页。
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749页。

用迪前猷。今后所上表章。宜却如旧。”[①]谅祚又向宋廷请求“尚主，诏答以昔尝赐姓，不许。”[②]无论是用李姓上表还是向北宋请求和亲，都表明谅祚意图在宋夏外交中提升西夏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说明谅祚并未以赵宋赐姓为意。宋室南迁后，西夏与南宋基本断绝了中央级的外交往来，西夏皇室也未再使用赵姓。夏仁宗仁孝在《西夏回刘锜等檄书》中谈道：“如孤者，虽处要荒，久蒙德泽，在李唐则曾赠姓，至我宋乃又称臣。”[③]一“孤”字点明西夏此时已是独立政权，不接受宋廷册封，也再不是南宋的藩属，而此前西夏皇帝在上北宋的表文中都自称臣某。“在李唐则曾赠姓，至我宋乃又称臣”，强调了西夏嵬名氏曾使用唐朝所赐李姓，但完全没有谈到北宋也曾对西夏皇室赐姓，这种刻意回避旨在消除北宋对西夏皇室赐姓的历史记忆，在宋、金、夏三朝鼎立的政治局面中提升西夏的政治地位。

不再使用赵姓标志西夏已自居为一朝，西夏人遂不避讳对北宋的抨击。赞颂西夏皇室祖先的《夏圣根赞歌》云：“汉天子，日日博弈博则负，夜夜驰逐驰不赢。威德未立疑转深，行为未益，啰都生怨自强脱。我辈之阿婆娘娘本源处，银腹金乳，善种不绝号嵬名。”[④]这里的“汉天子”暗指北宋皇帝，由于“汉天子”沉迷于下棋走马，朝政日坏，嵬名氏的祖先啰都愤而自立。西夏番文《比邻国夏德高歌》讽刺北宋皇帝“懒惰兽日日射，灾器军岁岁行。爱女色，五百美女常围绕；好乐音，五欲乐安不共承。尧帝布衣令忧戚，舜王陶器为悲伤。因此，人功□升高未能晓，巧智以避臣谗劝者无。上，福星避宫过，下，庶民心已离。天灾降，女上变，战神有，斗者无。州上被攻夫已逃，王城遭围，所有君臣已投降。天相红衣速打击，日威黄草急速射。常存珍宝诸人分，可怜儿女分别领。凤楼金宫凤鸟已出推□墓，龙宫云座火光已耀填灰尘。念玉玺身上火起今何在，恋君座睡眠好梦先已过。”[⑤]西夏宫廷诗人通过讽刺北宋皇帝荒淫亡国来反衬西夏在仁宗仁孝的治理下民富国强，北宋在西夏人的心中已成为陈腐的过去。

小　结

综上所述，唐代党项拓跋氏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猕猴种到羌，再从羌到鲜卑

①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四《政事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2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仁宗嘉祐七年四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45页。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8页。
④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⑤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3页。

的两次转变。党项拓跋氏在内徙关内道之前，居于松州以西的白龙江流域，与活动于这里的宕昌、白狼等族群都保有自身为猕猴种的历史记忆。由于吐蕃东进，党项拓跋氏先迁徙至唐关内道的庆州，再迁徙至夏州、银州，逐步加深同汉地社会的接触。唐廷为利用党项拓跋氏部族武装对抗突厥，对党项拓跋氏以高官厚爵相笼络，赋予了党项拓跋氏在蕃蕃将和入朝蕃将的双重政治身份。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党项拓跋氏接受了唐廷界定的党项出于西羌这一族属观念。唐廷在官修史籍中，将党项和西羌这两个活动时间和行居空间都有巨大差异的族群相联系，人为地制造了党项出于西羌。唐廷不仅通过历史书写将党项界定为汉代西羌之后，还通过封爵对党项拓跋氏赐予了西平这一郡望，使党项拓跋氏与历史上活动于西平郡的西羌产生了现实联系。在党项拓跋氏酋豪逝后，唐廷通过参与营葬，特别是派遣官员为逝者撰写墓志铭，强调了党项拓跋氏出于西羌。这样，无论唐代的官方文类——史籍，还是党项拓跋氏的私人文类——墓志，都渲染了党项拓跋氏为汉代西羌之后。但是由于党项拓跋氏内迁后所居住的夏州、银州有大量的突厥、铁勒等北方部族，原为青藏系民族的党项拓跋氏也开始自称为蕃。安史之乱后，伴随着朝野上下对于蕃胡人群的强烈歧视，忠于唐室的党项拓跋氏也开始自称为鲜卑拓跋氏之后。这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党项这一蕃胡人群的身份，一方面也是受到中原社会攀附士族风气的影响。安史之乱前，党项拓跋氏已是蕃姓士族。安史之乱后，党项拓跋氏通过伪冒鲜卑拓跋氏之后，与代北虏姓士族元氏发生联系，成为元氏的别支，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党项拓跋氏还在家谱中记叙本家族源出鲜卑拓跋氏，在《元和姓纂》采纳了党项拓跋氏家谱的叙述后，党项拓跋氏的伪冒便成为官方所认定的“真实”。至唐末，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成为时人普遍的观念。

党项窦氏也接受了唐廷对于党项族源的界定，自称为三苗之后。这一方面是由于时至唐末，中原王朝所塑造的党项人为三苗之后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加之党项窦氏世袭唐羁縻府州都督，对唐王朝保持着较强的政治认同，基于传统观念和忠唐的政治立场，党项窦氏采纳了唐廷对于本族族源的界定。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夏州藩镇幕府文职僚佐的影响。由于窦伯岁与夏州节度随军江诂交游，江诂把中原王朝官修史籍对党项祖源的描绘照搬到了窦伯岁的墓志中，窦伯岁因此成为三苗之后。窦伯岁既自称为三苗之后，又称自己为扶风窦氏，保持了双重身份认同。与党项拓跋氏不同，由于远离唐廷，始终活动于夏州地域，党项窦氏没有深度汉化，因此坚称自己为三苗之后，以保持非汉民族特点。但由于窦伯岁为夏州藩镇武职军将，在夏州城内居住，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中汉人社会风气的影响，

因此他也攀附扶风窦氏，自称为扶风窦氏。

定难军李氏上承唐代党项拓跋氏，因此仍然保持了党项拓跋氏在安史之乱后所形塑的本家族为北魏拓跋氏后裔的历史记忆。定难军李氏将此种历史记忆载入家谱，并明确北魏道武帝为本家族始祖。定难军李氏将北魏道武帝作为本家族始祖，一是为了在世次上压过自称为北魏孝文帝之后的府州党项折氏，一是继续保持自己作为唐代旧族的高贵身份。定难军李氏在被唐朝皇帝赐姓后，全族尽改姓李，表现出对这一赐姓的高度重视。在唐亡后，定难军李氏没有恢复旧姓拓跋氏，继续使用李姓，主要是为了利用李唐皇姓这一政治资源对外求取政治名位，对内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北魏拓跋氏之后和李唐之后的双重身份使定难军李氏得以在五代傲视中原王朝。至北宋初年，由于胡汉语境的消融，定难军李氏也通过自称陇西李氏、黄帝后裔而攀附华夏；但在北宋欲统一全国的政治背景下，作为旧割据势力的定难军李氏，其华夏身份不为北宋所认可。北宋通过历史书写突出强调定难军李氏为党项之人。最终定难军李氏在北宋君临天下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分裂为华夏化的李继捧一支和党项化的李继迁一支。

西夏嵬名氏是从华夏回归党项的李继迁的直系后裔，依靠党项人的力量开创西夏王朝，因此特别注意对党项的身份认同。李德明不仅一直使用党项名，还自称蕃夷。李元昊将本家族改姓为嵬名，又将西夏境内的全体党项人都界定为番人。在西夏文、汉文《杂字》中，西夏皇族嵬名氏都列于番姓部首位，说明不仅西夏皇族自居为番人，作为臣民的编纂者也认为西夏皇族为番人。西夏皇室还特别重视在国内倡导以番文为核心的番学，借此凝聚番人并对外宣示西夏为番人的国度。西夏皇室还通过将宫殿居室称为帐，长期食用各类乳制品，祭祀羊、牛并以之殉葬，大规模行猎来展现自己的番人身份。西夏嵬名氏还保持了定难军李氏自称北魏拓跋氏之后的政治传统，将此历史记忆载入皇室谱牒，并通过神道碑、宫廷诗歌等各种媒介向臣民宣扬，对外塑造自己称帝开创皇朝的政治合法性，对内塑造自己统治广大民众的政治合法性。西夏皇室在对辽、金外交中使用李姓主要是标榜自己为唐朝皇裔。西夏皇室不仅使用李姓，还在德运、政治制度上全面继承唐朝。在西夏灭亡后，西夏皇族后裔继续延用李姓。西夏皇室的赵姓为北宋赐姓，主要在对宋外交中使用，北宋对这一赐姓极为重视，力图在宋、辽、金三国对峙期保持对西夏的政治领属，但西夏在北宋灭亡后即不再使用赵姓。

第二章　从藩镇到皇朝：西夏番姓大族的权力构建

第一节　杖节把斧：党项拓跋氏、窦氏、野利氏与唐中央及夏州、邠宁藩镇

一、党项拓跋氏与唐中央及夏州藩镇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廷以颉利可汗部众分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六羁縻州。在颉利可汗被擒之前，突利可汗已经降唐。唐廷为安抚其部众，“在以夏州为中心的地区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突利任顺州都督，阿史那思摩为化州都督”。[①]粟特胡部为东突厥汗国的重要属部，伴随着降唐突厥人大量进入河套以南，粟特人也加入了此次迁徙浪潮。入居河南的粟特人聚居于六胡州一带，《新唐书·地理志》云：“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②]

在粟特人定居灵夏南境后，由于吐蕃崛起内徙的党项人也来到了灵夏一带。《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③]神龙三年（707年），唐廷以六胡州“置兰池都督府”[④]。而据《新唐书·地理志》，在党项羁縻府州中亦有兰池都督府。可见六胡州粟特人与灵夏党项共同生活于同一行政单位中，双方关系密切。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粟特人康待宾等由于“苦于赋役，诱降虏余

①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②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4—975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2页。
④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8页。

烬，攻夏州反叛”[①]。叛军声势浩大，《臧怀亮碑》即称：“会六州九胡，洊凶阶乱，仓卒起于怀袖，杂沓混于宾主，虏接塞联，马肥弓劲，其骇人也。”[②]叛军主体为粟特人，还包括突厥人，即前文之“降虏余烬”、《资治通鉴》所记“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中的“诸降户”[③]、唐玄宗招抚叛军诏令中的“左右厢降户”。[④]另外还有一些吐谷浑人，唐玄宗招抚叛军诏令记为“吐浑”。[⑤]党项部落武装为康待宾叛军的重要盟军，《旧唐书·张说传》云在叛军起事后，“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⑥]《资治通鉴》则记“先是，叛胡潜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据其仓庾”。[⑦]

从史籍记载来看，康待宾叛军在攻夏州不克后，和灵夏党项部落武装合兵东向进攻属于胜州的银城县、连谷县。联军进攻两县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取这里的仓粮以补充军资，二是为了招诱这里的突厥人加入反唐大军。胜州一带聚居有大量突厥人，早在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南侵夏州时，唐廷即命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⑧]进击薛延陀。开元年间王睃还上疏谈道：“突厥时属乱离，所以款塞降附。……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辄动兵马，屡有伤杀。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⑨]胜州一带还是后突厥汗国南侵中原的重要孔道，《资治通鉴》云武后神功元年（697年）正月“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⑩]。六州胡与党项联军占据胜州属县，以仓粮作为军资，正可以持守待援，等待后突厥汗国军队的南下。

康待宾叛军带有浓厚的突厥背景，康待宾起事时自称叶护，其余党康愿子自称可汗。彭建英先生即指出六胡州之乱是“已部分突厥化的降胡（粟特系突厥）在受到唐朝挤压时，自愿采用突厥官号，发动武装叛乱，在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突厥的亲近和认同”[⑪]。六州胡长期以来即是突厥属部，叛军内部夹杂有大量突厥人，唐玄宗讨伐叛军诏敕即称叛军为“北胡部落”[⑫]。“北胡”

① 《旧唐书》卷九三《王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88页。
②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75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5页。
④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90页。
⑤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90页。
⑥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2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七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6页。
⑧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33页。
⑨ 《旧唐书》卷九三《王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86—2987页。
⑩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武后神功元年正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12页。
⑪ 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⑫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16页。

即指突厥。前文分析叛军东攻胜州带有获取后突厥汗国支援的性质，而党项在武后圣历年间即曾与后突厥汗国联合，《新唐书》云："圣历初，灵、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诏余庆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众内附。"[①]圣历初年即圣历元年，而圣历元年（698年）距神功元年（697年）仅差一年，前文所引默啜可汗于神功元年（697年）遣军进犯胜州应与《新唐书》所记圣历初年灵州、胜州党项诱使后突厥汗国军队寇边为同一事件。可见在武后时期后突厥汗国即通过胜州党项来南侵胜州，这样六州胡与灵夏党项联军东攻胜州的一大背景即在于圣历初年胜州党项与后突厥汗国的联合寇边已使胜州成为党项与后突厥汗国的交往窗口，攻陷胜州可通过早已和后突厥汗国存在联系的胜州党项向后突厥汗国投以忠效、迅速获取与后突厥汗国的联系。六州胡与党项组成联军的政治原因也在于双方同奉后突厥汗国为宗主国。

由于叛乱区域密迩关内道与京畿，唐廷出动大军平叛。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②]。在唐军追击至骆驼堰时，叛军内讧，"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③]。关于六州胡与党项羌自相残杀的原因，《新唐书》记为"羌、胡自相猜，夜斗"[④]。六州胡和党项羌互相猜疑见于《臧怀亮碑》，碑文云臧怀亮"公分于二蕃，制于散地，持必攻之郡，计必死之凶，上奇兵以四征，保危堞以内备，虽诸军合势，而殊效特高"[⑤]。可见是臧怀亮运用计谋使六州胡和党项羌互相猜疑。据碑文，臧怀亮其时"复以本官兼胜州都督、东受降城大使、营田大使、兼朔方军大总管、上蔡县开国公"[⑥]。可知在胜州主持防御叛军进攻的正是在此地任官的臧怀亮。

叛军溃散后，一些余众亡匿山谷沙漠躲避唐军追杀，其中就包括一些党项人。唐玄宗下诏赦免，诏文云："其胡贼及勾引诸蕃同叛逃在山谷沙蔽间，疑惧不出者，并原其罪。"[⑦]唐玄宗又以朔方军大总管王晙负责招抚，下诏令王晙"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诸军战士，应须酬录功勋，及却投来吐浑、党项、左右厢降户、杂藩，并胡残部落，或善恶未分，或久长取稳，若须厘革，一事已上，并委王晙叙录。处置

① 《新唐书》卷一一六《陆余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39页。
②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2—3053页。
③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3页。
④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07页。
⑤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75页。
⑥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75页。
⑦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16页。

讫奏闻”[①]。

张说也负责招降党项，《资治通鉴》记其“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说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②]。《新唐书·地理志》云“麟州新秦郡，下都督府。开元十二年析胜州之连谷、银城置”[③]。可知开元十二年（724年）唐廷新设麟州以抚集党项。值得注意的是麟州是以在叛乱中受到叛军攻击的胜州连谷、银城二县设置的，这说明胜州党项也参与了叛乱，而以麟州抚集党项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较高的州级行政建制监控惯与突厥交通的胜州党项。

在唐廷平叛大军的战斗序列中还出现了吐谷浑人和党项人的身影。吐谷浑王族慕容曦光墓志云其“去开元九年，六州叛，复领所部兵马，摧破凶胡”[④]。据《拓跋守寂墓志》记载，拓跋守寂之父拓跋思泰在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兼静边州都督防御使、西平郡开国公”时，“会朔方不开，皇赫斯怒，周处则以身殉节，毕万乃其畯克昌。赠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⑤]。唐廷赠拓跋思泰特进制亦云：“九年六月丁酉，制曰：念功之典，《书》有明训；赠终之数，《礼》著彝式。党项大首领故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节淳、洮等一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拓跋思泰，顷者戎丑违命，爰从讨袭，躬亲矢石，奋其忠勇。方申翦鹹之勋，俄轸丧元之痛，壮节弥亮，美名可嘉，宜崇宠章，俾慰泉壤。可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赐物五百段，米粟五百石，仍以其子守寂袭其官爵。”[⑥]周伟洲先生指出：“九年，指开元九年（721年），时六胡州爆发以康待宾为首的反唐战争，守寂父思泰率部众“讨袭”，战死，故唐朝颁此制以予封赏，并以其子守寂袭官职。”[⑦]从制文来看，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为拓跋思泰荣誉职衔，其实职为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属于在蕃蕃将。《拓跋守寂墓志》记拓跋思泰曾祖拓跋立迦“率众内属。……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圊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⑧]。静边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9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6页。

③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5页。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33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⑥ 《全唐文》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95页。

⑦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府即静边州都督府，据周伟洲先生考证其治所为银州儒林县新兴乡。志文称静边州所在的银州为圊阴之地，而原属于胜州、新隶于麟州之连谷、银城二县也处于圊阴之地。《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云连谷、银城均为“汉圊阴县地”①。可见六州胡和党项联军所进攻的连谷、银城县与拓跋思泰所在静边州距离极近，因此拓跋思泰率本部赴难，不幸战殁。

从拓跋思泰战殁来看，领有二十五羁縻州的静边州都督府主体部落党项拓跋部尚不具有号召灵夏地区所有党项部落的实力，所以夹杂大量灵夏党项的叛军敢与之对敌。叛军中的党项应主要来自于云中都督府与呼延州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云：“云中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五：舍利、思璧州、阿史那州、绰部州、白登州。”“呼延州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三：贺鲁州、那吉州、跌跌州。”②这两个都督府的党项部落与突厥部落杂居，因此极有可能受突厥影响参与六州胡之乱。党项拓跋部与叛军中灵夏党项的战争反映了内徙党项中拥护唐王朝统治与投效突厥的不同政治态度。

从上可见，在六胡州之乱中党项人基于政治态度的不同，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派系灵、夏、胜三州党项，一派系党项拓跋部。灵夏党项首先与六胡州粟特人结成联盟掀起叛乱，随后向胜州移动以争取后突厥汗国的支持，胜州党项随即也加入叛军。党项拓跋部则与叛军针锋相对，积极参与唐廷平叛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在六胡州之乱中，大多数党项人都支持以粟特人为首的党项粟特联军，党项人与粟特人的政治倾向一致，双方基本处于同等的政治地位，仅有党项拓跋部一支没有加入叛乱，反而应唐廷征召参与平叛。拓跋部首领虽然战殁但从此奠定了其在唐廷持续发展的政治资本以及在党项诸部中的政治威望。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人逐渐取代粟特人在唐代西北政治格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迄至唐末终于因缘际会建立了定难军政权。

党项拓跋氏没有参与叛乱是因为其自内徙以来即与唐廷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拓跋守寂墓志》云：“迨仪凤年，公之高祖立迦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国家纳其即叙，待以殊荣。却魏绛之协和，美由余之入侍。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圊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曾祖罗胄府君，不殒其名，昭乎前烈，亢宗守业，保族勤邦。拜右监门卫将军、押十八州部落使，仍充防河军大使。祖后那府君，信以出言，功高由志。莫非嘉绩，裒德备洽于朝恩；抚有余人，建牧以崇其都

① 《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529页。[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页。

②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4页。

府。拜静边州都督、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赠银州刺史。”[①]从墓志记载可知拓跋守寂高祖拓跋立迦、曾祖拓跋罗胄均有荣誉性质的禁军将衔。周伟洲先生指出拓跋罗胄所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当为员外置，且为虚衔。押十八州部落使、防河军大使，均为唐朝专为管理少数民族所设官职名，所谓‘防河军大使’中‘河’，应为今无定河”[②]。考诸唐代文献，唐代前期的“防河”主要指防备突厥人在冬季渡黄河南下。张鹭《龙筋凤髓判》所载《将军宋敬状被差防河恐冰合贼过请差州兵上下数千里椎冰庶存通镇（左右领军卫二条）》即云：“蛮夷猾夏，肇自遐年；獯鬻不臣，匪惟今日。猎狁孔炽，太原称六月之兵；冒顿不恭，平城有七朝之弊。濡学之士，守玉帛以和亲；介胄之夫，励金旌而薄伐。宋敬身参八校，名班五戎，分铜兽以握兵，佩银龟而按节。长驱鹿塞，须崇卫霍之勋；直迈龙沙，宜建班张之效。如千寻紫塞，远接天山；万里黄河，遥通瀚海。雁飞霜早，拥积雪而埋；狐听冰初，寺层冰而裂地。浮澌岳耸，讵烦王霸之机？累冻天平，无劳宋玉之请。斯显河宗肃令，风伯申威。既夕破而晨凝，亦朝开而暮合。”[③]杜甫《兵车行》亦云：“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④]因此拓跋罗胄所任“防河军大使”的军事职能旨在防备突厥人，而其子拓跋后那、孙拓跋兴宗均担任防河军大使，可见党项拓跋氏一直为唐廷所用来对抗突厥人，突厥人变为党项拓跋氏的主要敌人。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拓跋思泰参与平定六胡州之乱既是因为党项拓跋氏的忠唐立场，亦是因为在长期的防河战备中突厥人已成为党项拓跋氏的主要敌人。

《新唐书·兵志》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⑤]《旧唐书》曾记载唐廷以内附的吐谷浑部落组建安塞军，《旧唐书·德宗纪》云：“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⑥]据李如暹子李良仪墓志，李良仪在李如暹逝后继任安塞军使，可见吐谷浑李氏世袭安塞军使。拓跋罗胄、拓跋后那、拓跋兴宗祖孙三代也世袭防河军使，防河军的军事力量应主要来源于党项拓跋部。苏航先生认为：“在外蕃部落中置军在唐前期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②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唐]张鹭著，田涛、郭成伟校注：《龙筋凤髓判校注》卷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④ [清]仇占鳌：《杜诗详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3页。

⑤ 《新唐书》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4页。

⑥ 《旧唐书》卷一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9页。

就已经出现，但在徙于内地的部落中置军建号似乎并无确凿的例子。”[①]从党项拓跋氏世袭防河军使来看，唐前期在内附的党项部落中已出现了军级建置。苏航先生曾以蔚兰横野军为例分析提出“在部蕃军”这一概念，在部蕃军是指“编入边军的正式编制，有征讨或游奕等任务时从军活动，而无事之时则放归部落的部落军”[②]。拓跋罗胄、拓跋后那长期担任押十八州部落使，主要在部落生活，防河军也应为在部蕃军。但从拓跋兴宗开始，防河军转为从军蕃部。《拓跋守寂墓志》云：“叔父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匠兴宗，材略纵横，器宇瓌硕，强学由其侍问，制胜所以绥边。”从志文可知拓跋兴宗以朔方军节度副使兼任防河军使。苏航先生曾以朔方军中的党项将领任敷和铁勒浑部首领浑释之为例指出：“在军蕃部是指长期生活在边军当中的蕃部军。他们是正规军中的定额士兵，通常按正规军的组织原则进行编制，与纯粹的部落兵有着明显的区别。”[③]拓跋兴宗既任官于朔方军，防河军也随之长期在朔方军中活动，因此成为从军蕃部。

唐代前期的朔方军节度辖区有不少内附的藩部羁縻府州，这些羁縻府州的世袭都督有很多都担任朔方军中的节度副使一职，如世袭归德州都督的论弓仁曾任“朔方节度副大使”[④]，论诚节为“朔方节度副大使开府仪同三司右金吾卫大将军知阶州事武威郡王”[⑤]。世袭安乐州都督的慕容曦光“至开元二十八年，敕差充朔方军节度副使”[⑥]。世袭金徽州都督的仆固怀恩在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时任节度副使，《册府元龟》记“肃宗干元二年七月封朔方都知兵马使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大宁郡王”[⑦]。王永兴先生指出：“就朔方军的将校和兵士而论，朔方军乃是蕃汉混杂，以胡兵为主力的部落制的军队。”[⑧]拓跋兴宗的父兄皆世袭静边州都督府都督，拓跋兴宗本人担任朔方军节度副使，表明党项拓跋部也是朔方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拓跋兴宗在天宝五、六年（746—747年）连续向唐玄宗上《请致仕侍亲表》《请致仕侍亲第二表》《请致仕侍亲第三表》，他在第二表中谈到自己“身带三印，爵封

① 苏航：《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51页。
② 苏航：《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2页。
③ 苏航：《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4页。
④ 《新唐书》卷一一〇《论弓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6页。
⑤ [唐]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四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91页。
⑥ 《慕容曦光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33页。
⑦ 《册府元龟》记“肃宗干元二年七月，封朔方都知兵马使、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大宁郡王”《册府元龟》卷一二九《帝王部·封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13页。
⑧ 王永兴：《论朔方军》，《陈门问学从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

五等，入践命卿，出为副将”[①]。周伟洲先生认为表文中的“身带三印”是指《拓跋守寂墓志》所载拓跋兴宗所任之朔方军节度副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将作大匠三印。“出为副将”是指拓跋兴宗担任朔方军节度副使。[②]但《拓跋守寂墓志》记“叔父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匠兴宗”，可见拓跋兴宗带朔方军节度副使、防河军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将作大匠四印。《拓跋守寂墓志》刻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而《请致仕侍亲表》《请致仕侍亲第二表》《请致仕侍亲第三表》撰作于天宝五、六年(746—747年)。在这十年间，拓跋守寂官职不可能没有升迁，拓跋守寂在《请致仕侍亲第三表》即谈到“往者一辞天阙，六变星霜，徒叨守郡之荣，终切倚门之望”[③]。从中可知拓跋守寂在撰作表文的六年前，即开元二十八年、二十九年(740—741年)曾离开长安外任“守郡”之官，“守郡”指担任刺史。刘禹锡《苏州贺册皇太子笺》云：“朝议大夫使持节苏州诸军事守苏州刺史上柱国刘某叩头叩头……某限以守郡，不获称庆宫庭。”[④]拓跋守寂既担任州刺史，就不可能一直担任“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匠”，因此他在《请致仕侍亲第二表》谈到的“身带三印”也不是朔方军节度副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将作大匠三印。这三方官印中的一方当为陇右节度副使印，因为《请致仕侍亲第二表》云：“陛下于愚臣过听，谓边将得人，则有陇右专知教练兵马使右骁卫将军蔺廷辉，才略冠军，智勇无对。今节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令摄使替臣。”[⑤]从表文可知拓跋兴宗向唐玄宗举荐陇右专知教练兵马使右骁卫将军蔺廷辉，蔺廷辉又被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代替拓跋兴宗。“摄使替臣”表明拓跋兴宗被替代之前担任一使职官，拓跋兴宗在向唐玄宗举荐蔺廷辉十年前就曾任朔方军节度副使，因此他在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麾下所任官职极有可能为陇右节度副使。在陇右节度使麾下还有一些党项蕃将，如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丁未，党项鹘揽支来降，授果毅，借绯鱼袋，与陇右节度驱使”[⑥]。另外《唐六典》还记载：“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⑦]刘统先生认为这些陇右节度辖区内的羌兵“从其

①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133页上。

②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133页下。

④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3页。

⑤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六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133页上。

⑥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五《外臣部(二十)·褒异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88页。第11册。

⑦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5页。

驻防的地域来看，应该是从内附的党项羌部落中抽调的”[①]。

拓跋兴宗因担任南衙禁军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匠而长期居于长安，《拓跋守寂墓志》即称其“入捻公徒，出司戎旅，位将时并，名与功偕”[②]。从拓跋兴宗《请致仕侍亲第二表》可知拓跋兴宗之子拓跋守义曾担任供奉官、南衙禁军右威卫郎将。《拓跋守寂墓志》亦载拓跋守寂之弟拓跋守礼任南衙禁军右武卫翊府右郎将。在此三人以外，党项拓跋部还有拓跋他悉罗、拓跋朝光、拓跋乞梅到过长安。元代尚存的《跋唐段思审画拓跋他悉罗等射羵羊图》画尾题有“景龙二年秋七月，奉诏写蕃人拓跋他悉罗等射羵羊图。朝散大夫、行工部尚书兼楚州长史、宫苑勾供奉段思审写。”[③]由于拓跋他悉罗来到长安朝觐，并被允许在宫苑射猎羵羊，宫苑勾供奉段思审才得以奉诏描绘拓跋他悉罗射猎之状。安史之乱后，唐廷采纳郭子仪建议将内徙党项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以防止党项与吐蕃联合攻唐。为使党项顺利迁徙，唐廷“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④]。其后，又有“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⑤]。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大力征召河西、陇右、朔方军节度辖区内的藩部武装抗击安史叛军。以朔方军节度辖区而言，就有归德州的吐蕃人和安乐州的吐谷浑人参与抗敌。《论惟贤神道碑》记论惟贤“随先父统其士马，与元帅哥舒翰掎角盾寇，锋刃既接，大小数十战，摧陷坚阵。洎王帅失御，以智信保全所领之军，驰于灵武，扈从肃宗”[⑥]。《慕容环墓志》记慕容环之父慕容相“属胡逆乱邦，公素□□有略，乃脱朝服，殒本部东讨，旋旆”[⑦]。党项拓跋部也被唐廷利用来对抗安史叛军，《新唐书·党项传》云：“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⑧]《新唐书·地理志》记夏州“有天柱军，天宝十四载置，宝应元年废”[⑨]。关于任容州刺史、天柱军使的拓跋氏部酋，史无明载，

①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② 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196册，第124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⑥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〇九，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784页上。

⑦ 陈玮：《新出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⑨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3页。

但《唐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敕》云："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拓跋澄泌、高晖、卢钦友、成惟良、曹楚玉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各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之阁。并寇难已来将相勋高者，其名籍图画亦准此。"[①]在这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中，拓跋澄泌姓名与《拓跋守寂墓志》所记之拓跋澄澜相近，无疑出于党项拓跋部。汤开建先生即认为拓跋澄泌乃《新唐书》所载之容州刺史、天柱军使，为拓跋澄澜之弟。[②]与拓跋澄泌名列同等的仆固玚、高彦崇、浑日进、李建义、李光逸、杨崇光、李怀光、张如岳、白元光、温如雅、高晖、卢钦友、成惟良、曹楚玉均为朔方军将领，则拓跋澄泌亦当为朔方军将领，其所领天柱军由党项拓跋部组建，为朔方军之别部，在安史之乱即将被平定时裁撤。时至唐末，党项拓跋部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历史仍然被唐廷记忆犹新，《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以尔成庆，代有殊烈。禄山滔天之日，文已载于司勋。"[③]"文已载于司勋"即指拓跋澄泌名载《广德元年册尊号敕》功臣之列。拓跋澄泌凭借讨伐安史叛军的战功不仅荫官后代、加获采邑，还获得减死铁券，被太庙记名，个人画像还被凌烟阁收藏，可谓备极人臣之宠，党项拓跋氏在朝野的名望进一步增强。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朱泚之乱爆发后，党项拓跋部又参与平乱。《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朱泚盗国之时，绩复书于盟府。"[④]《旧唐书·德宗纪上》云："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六千来援。"[⑤]《旧唐书·戴休颜传》云："戴休颜，夏州人。在军伍以胆略称。大历中，为郭子仪部将，以战功累迁至盐州刺史。奉天之难，倍道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德宗嘉之，赐实封二百户。与浑瑊、杜希全、韩游瑰等捍御有功。"[⑥]可见在朱泚之乱中，党项拓跋部是以朔方军之一部参与平乱。

作为朔方军军事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党项拓跋部，在安史之乱后于朔方军节度辖区保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党项拓跋氏有多个家族成员担任夏州、银州刺史。《旧唐书·吐蕃传下》云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拓拔

① [北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九，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② 汤开建：《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替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年，第24页。

③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④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⑤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8页。

⑥ 《旧唐书》卷一四四《戴休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13页。

乾晖率众而去,复据其城"①。《元和姓纂》云拓跋守寂之"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②。安史之乱后,唐廷由于防忌武人而对朔方军采取削弱政策。李鸿宾先生指出:"如果说肃、代二朝偏重于对朔方将领的疏远防忌和分割另行组建其他节度使的话,那么德宗干脆将其肢解,使其变为旧有力量的若干之一。"③在拓跋乾晖任夏州刺史之前,唐廷已派遣北衙禁军神武军大将时常春取代吕希倩为夏州刺史,意图从朔方军夺回夏州的控制权。拓跋乾晖任夏州刺史很可能是由于党项拓跋部在朱泚之乱中的战功,但由于夏州被吐蕃攻克,拓跋乾晖不再担任夏州刺史,从《元和姓纂》所记可知拓跋乾晖在后来又担任银州刺史。夏州为中都督府,唐制中都督府都督为正三品上。银州为下州,唐制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拓跋乾晖以夏州刺史而任银州刺史无疑为贬官。唐德宗在分割朔方军节度辖区的过程中组建了京西北八镇,以夏州为会州的夏绥银节度是为一镇。拓跋乾晖在贞元二年(786年)十二月失陷夏州,夏绥银节度紧随其后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成立,首任夏绥银节度兼夏州刺史为禁军左羽林大将军韩潭,在韩潭之后的夏绥银节度使大都具有禁军将领及朝廷文官背景,因此党项拓跋氏在夏绥银节度辖区的权力扩展受到极大限制,政治地位也有所下降,史书对其的记载也越来越少。

虽然唐廷限制党项拓跋氏在夏绥银节度辖区的权力扩展,但是拓跋乾晖、拓跋澄岘叔侄仍然相继担任银州刺史,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拓跋乾晖、拓跋澄岘能世袭银州刺史,表明党项拓跋氏在银州政治势力庞大。党项拓跋部在安史之乱前长期居于银州,《旧唐书·地理志》云:"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④据《拓跋守寂墓志》,拓跋守寂即安葬于银州儒林县,拓跋氏在银州城内还有唐皇敕赐之第。安史之乱后,静边州都督府虽然被迁于银州之北,但银州地区仍然有不少党项拓跋部部落。《唐故使持节万州诸军事万州刺史赐绯鱼袋刘君墓志铭》云:"宰相段文昌在蜀时,爱君之磊落,善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为殿中侍御史银州长史知刺史事……岁余受代,酋长拓跋建宗等七百余众遮拥不欲去,君驰去之。"⑤唐廷为了笼络党项拓跋氏而以拓跋乾晖、拓跋澄岘世袭银州刺史,但由于唐廷对夏绥银节度辖区的控制持续加强,党项拓跋氏也未能再继续任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0页。
② [唐]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6页。
③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④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3页。
⑤ 《全唐文》卷六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6654页。

银州刺史，取而代之的是以夏绥银节度使麾下的将领代理银州刺史。《唐故使持节万州诸军事万州刺史赐绯鱼袋刘君墓志铭》云："先时，银之长不命于朝数十年矣，诸将摄理，夺其马牛，夷人苦，益复叛远。"[①]从志文来看在拓跋乾晖、拓跋澄岘之后，唐廷并未设正任的银州刺史，刺史一官通常由夏绥银节度使麾下的将领代理，而这些将领往往侵夺党项人的利益。这一方面表明唐廷轻视银州，因此未设正任刺史；另一方面表明唐廷欲以夏绥银节度的武职军将来取代党项拓跋氏，削弱党项拓跋氏在银州的政治影响。由于未设正任刺史和取缔党项拓跋氏世袭银州刺史的政治特权，银州和党项拓跋氏的政治地位都大为下降，因此夏绥银节度的武职军将敢于侵削银州党项人的利益。

在唐廷的压制下，党项拓跋氏通过加入夏绥银节镇的军队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益。《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曾祖讳重建，皇任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②]。李重建为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之父，他所担任的"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中的"大都督府"指夏州，夏州按唐制为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即安抚平夏番落使，安抚平夏见于《旧唐书·宣宗本纪》，是书记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八月，"以司农卿郑助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夏绥银宥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安抚平夏党项等使"[③]。李重建所任之番落使为京西北节镇常见武职军将，《资治通鉴》即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凤翔节度使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④]。

不仅党项拓跋氏担任夏绥银节镇的武职军将，党项拓跋部的部族武装也被吸纳进夏绥银节镇的军队。统万城出土的《张宁墓志》首题"唐故夏州节度衙厢马步兼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使上柱国清河张宁墓志铭有序"[⑤]，"四州"指夏绥银节镇的夏、绥、银、宥州，"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这一官职表明夏绥银节镇组建有蕃落军，都知兵马使为蕃落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张宁本官夏州节度衙厢马步都知兵马使，此官为夏州节度使直属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张宁以此官兼任四州蕃落都知兵马使，表明夏州节度使以亲信将领控制本镇以党项部族武装为主体的蕃落军。张宁曾率蕃落军镇压南山党项，墓

① 《全唐文》卷六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6654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德宗贞元二年十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473页。

⑤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志记:“祭酒以六州蕃部与所主士兵五千人,自德静镇走数百里为外应。”[①]前文提到夏州节度使多为禁军将领出身,其直属军的军官和士兵亦多具有禁军背景。《旧唐书·韩全义传》记韩全义“少从禁军……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三年,为神策行营节度、长武城使,代韩潭为夏绥银宥节度,诏以长武兵赴镇”[②]。《张宁墓志》云:“祭酒讳宁,京兆人也。父讳崇,有定难功,以材力显。初,效力禁卫,李寰仆射爱其语直有勇,因以拔距一将縻之。”[③]夏州节度押衙充监军衙马步都知兵马使并知衙事陈审墓志记陈审之父陈俊为“左神策军礼泉镇军判官”[④]。从《张宁墓志》可知张宁为长安人,其父为奉天定难功臣,张宁本人又于禁军效力,可谓出身禁军世家。赏识张宁的李寰亦为禁军大将,以忻州刺史而升入禁军。《旧唐书·穆宗纪》云:“忻州刺史李寰守博野,王廷凑攻之不下。其李寰所领兵宜割属右神策,以寰为军使,仍以忻州军为名。”[⑤]《旧唐书·李同捷传》云:“俄而乌重胤卒,授神策节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师,无功召还……李寰赴阙,又以李佑代为横海节度。”[⑥]《旧唐书·文宗本纪》云:“以新除横海军节度使李寰为夏州节度使。”[⑦]从《李同捷传》和《文宗本纪》可知李寰在李同捷之乱时已为神策军节度使,在平叛战争后期被任为横海军节度使,但随即被征召返回长安,从长安出任夏州节度使。张宁应该就是以神策军将领的身份随李寰赴镇。在夏州节度使及直属军队均具有禁军背景的情势下,党项拓跋氏在夏绥银节镇军队中无疑被边缘化了。随着拓跋思恭在夏绥银节镇的步步高升,党项拓跋氏才得以于唐末树立起在本镇军队中的主导地位。

拓跋思恭早年在夏绥银节镇担任教练使。《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云:“公家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曾祖父字令光,年一百廿四岁,充兴宁府都督。娶高氏。生祖父字奉林,充兴宁府都督。娶婆高氏。祖父字文亮,充兴宁府都督。娶婆王氏,生公。公以祖、父箕裘继常,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信用于门下。王始为教练使,公常居左右前后,凡边朔战伐,军机沉密,多与功坐谋。时有征防卒结变于外,突骑得入屠灭权位,其首乱者逼节使,请署为马步都虞侯。半年之□,凌慢愈甚。时朔方王集不下,伺隙尽擒诛之。公弟兄皆与其

①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② 《旧唐书》卷一六二《韩全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7页。
③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④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⑤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页。
⑥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同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08页。
⑦ 《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页。

事。”[①]从志文可知白敬立家族世代为夏州武将，曾祖白令光、祖白奉林、白文亮世袭兴宁府都督，这种都督世袭制无疑为羁縻府州官员任用制度。王义康先生指出：“夏州境内唐前期曾安置有突厥白氏部落。据《白道生碑》《白元光传》，道生其先为突厥人，道生曾为宁朔州刺史、兼统部落。白敬立族属不详，但从附会白起之后来看，无疑是出自附塞部落。”[②]白敬立虽然族属不详，但唐末五代多有吐谷浑白姓者，如白义诚、白承福、白万金。《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六》亦云：“吐浑白都督族帐移于代州东南。”[③]《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下》云：“吐谷浑宁朔两府留后李可久加检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赐姓。”[④]《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四》云：“太原奏，吐浑白可久奔归契丹，诸侯咸有异志。”[⑤]夏州境内置有吐谷浑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云：“吐谷浑州二：宁朔州（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右隶夏州都督府。”[⑥]定难军时期夏州仍有吐谷浑人，《后晋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云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外遏番浑，内安黎庶，为国朝之柱础，作边垣之景星”[⑦]。白敬立又任以吐谷浑人为主的延州安塞军防御使，其应该出于夏州的吐谷浑羁縻州府。

从《白敬立墓志》来看，白敬立在拓跋思恭为夏州教练使时即为拓跋思恭部属，常常为拓跋思恭出谋划策、参与军事机宜。可见夏绥银节镇的蕃将在唐末因其边缘地位已连结为一体。在夏州征防卒发动军变诛杀大将，倡乱者逼迫节度使署命其为马步都虞候半年之后，拓跋思恭与白敬立兄弟伺机以部属剿灭乱军，平定兵变。剿灭乱军之战是夏绥银节镇蕃部势力的一次大集结，在没有夏州节度使指挥的情况下，党项人和吐谷浑人以拓跋思恭为主进行了一次政治冒险，战后夏绥银节镇蕃部的政治地位获得提高，势力亦大为拓展。作为乱军的征防卒应为客军。《旧唐书·穆宗本纪》云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壬寅，夏州节度使奏浙东、湖南等道防秋兵不习边事，请留其兵甲，归其人”[⑧]。《九国志·陶雅传》云：“乾符中，天下将乱，始投笔和门。会西蕃入寇，征四方兵，防秋灵夏，雅与行密泝上军偕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 王义康：《唐代羁縻府州辑补》，《唐代边疆民族与对外交流》，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43页。

④ 《旧五代史》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7页。

⑤ 《旧五代史》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14页。

⑥ 《新唐书》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5页。

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⑧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4页。

往。”[①]拓跋思恭在平定兵变后升任宥州刺史。《新唐书·党项传》称其于“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②],但新出《唐宁州刺史陈讽墓志》记陈讽兄陈调为宥州刺史[③],陈讽逝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陈调在本年应仍为宥州刺史。《白敬立墓志》记黄巢陷京后,拓跋思恭以宥州刺史率军征讨黄巢,长安于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陷落。陈调既在乾符六年(879年)为宥州刺史,则拓跋思恭只能在广明元年陈调离任后担任宥州刺史,可见《新唐书·党项传》所云拓跋思恭于唐僖宗之父唐懿宗咸通末年为宥州刺史有误。拓跋思恭主导平定的夏州军乱应发生于唐僖宗乾符年间,其背景正是《九国志·陶雅传》所载之“会西蕃入寇,征四方兵,防秋灵夏”。

《新唐书·党项传》云拓跋思恭“窃据”宥州带有强烈的贬义,考虑到《新唐书》撰修时西夏已对北宋形成了巨大威胁,欧阳修、宋祁在描述西夏始祖拓跋思恭时很可能加入了官方意识和个人情感。实际上由节度使奏请朝廷诏命本镇军将为藩镇属州刺史是晚唐藩镇政治的常态,拓跋思恭担任宥州刺史应由朝廷诏许,而非“窃据”。宥州是夏绥银节度辖区内唯一的上州,地位高于银州、绥州这样的下州,仅次于会府夏州。上州刺史从三品,乃唐代高官。唐廷对于宥州极为重视,长期以禁军驻守。《资治通鉴》云元和九年(814年)“五月,庚申,复置宥州,理经略军,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实之”[④]。撰于大中五年九月至大中六年底(851—852年)的《田克加检校国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云:“敕: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宥州诸军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经略军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军宥州行营都知兵马使、上柱国、雁门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田克加。”[⑤]可知宥州刺史带有左神策军宥州行营都知兵马使一职。在拓跋思恭之前任宥州刺史的陈调亦具有禁军背景,陈调之父陈君仪为右龙武大将军,叔父陈君赏曾任右金吾卫大将军。陈调之弟陈讽“值禁旅搜俊访能,简求良器,唯技特而识远者即兹选。公系练武经,少得妙于球击。方属右广阅艺之秋,公果膺其搜罗”[⑥]名列禁军。拓跋思恭担任宥州刺史标志着党项拓跋氏在夏绥银节镇的重新崛起,以及唐禁军势力的开始衰落,此时距拓跋澄岘任银州刺史已有六十八年。

---

① [宋]路振撰,吴在庆、吴嘉骐校点:《九国志》卷一,傅璇琮、徐海荣、徐青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丙编,第六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220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③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九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704页。

⑤ [唐]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5页。

⑥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拓跋思恭担任宥州刺史后不久，随着黄巢乱军不断逼近长安，党项拓跋氏又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机遇。在拓跋思恭为宥州刺史时，诸葛爽为夏州节度使。《资治通鉴》云广明元年（880年）“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之。师泰见朝廷多故，使军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复以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以爽为夏绥节度使”①。诸葛爽本在代北任北面招讨副使讨伐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其任夏州节度使后仍兼任北面招讨副使。《旧唐书·僖宗纪》云中和元年（881年）正月“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谠发本道之师，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玫、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②。《旧唐书·郑从谠传》云唐僖宗诏命郑从谠“卿宜差点本道兵士，酌量多少，讨北面副招讨使诸葛爽，俾令入援。从谠承诏雪涕，团结戎伍，遣牙将论安、后院军使朱玫率步骑五千，从诸葛爽入关赴难”③。《旧唐书·诸葛爽传》云：“广明元年，贼陷京师，诏爽率代北行营兵马，赴难关中。”④从这些史料可知诸葛爽在任夏州节度使后并没有赴镇，一直在代北行营领军作战。长安失陷后，诸葛爽直接从代北率领行营诸军赶赴京畿讨伐黄巢乱军。在僖宗诏旨中，拓跋思恭也名列代北行营军，但拓跋思恭是否在代北随诸葛爽南下讨叛呢？《白敬立墓志》云：“洎乾符年，大寇陷长安，僖宗卜省于巴蜀，王自宥州刺史率使府将校，统全师问安赴难，及于畿内。”⑤从中可知长安失陷后，时任宥州刺史的拓跋思恭率夏绥银节镇诸将，以夏绥银节镇全军赶赴京畿讨伐黄巢乱军。前文谈到诸葛爽在任夏州节度使后并没有赴镇，一直身处代北，夏绥银节镇的诸将和全部军队自然不可能也随其在代北，因此才能被拓跋思恭召集前往平叛。唐僖宗诏旨中谈到代北行营诸军中有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玫，而从郑从谠遣牙将论安、后院军使朱玫率步骑兵五千随诸葛爽讨叛可知朱玫军为诸葛爽南下之军的主力部队，史籍并未记载拓跋思恭在代北随诸葛爽南下，拓跋思恭等夏州节镇军只是因诸葛爽为夏州节度使而遥隶于代北行营。

拓跋思恭因夏州节度使诸葛爽未在镇而得以召集夏州节镇军进击黄巢叛军，表现了党项拓跋氏在夏绥银节镇的强大政治号召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拓跋思恭乃宥州刺史，在夏绥银节镇内仅次于节度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节度使不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3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09页。
③ 《旧唐书》卷一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71页。
④ 《旧唐书》卷一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02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在镇时代表着藩镇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拓跋思恭在乾符年间平定防秋军变乱后，在夏绥银节镇的政治威望大为增长，已成为本镇蕃将和蕃落军的政治代言人，夏绥银节镇的军队由神策行营和蕃落军构成，此时蕃落军的势力已超过神策行营。

拓跋思恭所率夏州讨叛军中蕃落军比例尤重。《资治通鉴》云拓跋思恭"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讨贼"①。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唐廷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②。郑畋在檄文中谈道："畋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节度使仇公遇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争麾陇右之蛇矛，待扫关中之蚁聚。而吐蕃、党项以久被皇化，深愤国雠，愿以沙漠之军，共献荡平之捷。"③在郑畋眼中，拓跋思恭所领夏州讨叛军已全然为党项之众。《授李成庆节度使制》亦云："洎黄巢犯阙，先臣进士兄弟，宗族携率征讨。"④可见党项拓跋氏全族都参加了夏州讨叛军，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即在平叛战争中战没。《宋史·夏国传》云："继迁，继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尝从兄思恭讨黄巢，拒贼于渭桥，表有铁鹤，射之没羽，贼骇之，遂先士卒，战没，僖宗赠宥州刺史，祠于渭阳。"⑤拓跋思恭也亲临战阵解爱将之围。《白敬立墓志》云："一日，公失众临阵，为大寇环逼。王轻骑犯围，公乃得出。"⑥

拓跋思恭出兵后，先"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⑦，再与凤翔节度使郑畋、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同盟讨叛，并传檄天下。在"时巢贼僭号，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唯郑畋守凤翔，郑从谠守太原"⑧的情势下，拓跋思恭率夏州军赴难被唐廷视为首义之举。唐昭宗《改元天复敕》云："关畿不守，先帝西巡，惟我辅臣，首图义计。故收复京城西面行营诸军都统鄜夏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10页。

③ 《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36页。

④ 《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以尔成庆，代有殊烈。禄山滔天之日，文已载于司勋。朱泚盗国之时，绩复书于盟府。洎黄巢犯阙，先臣进兵，兄弟宗族携率征讨，首谋大计，果成元功。麟阁丹青，鸿钟纪勒。垂之不朽，永以无穷。"[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5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⑦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⑧ 《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99页。

节度使李思恭，扬威北鄙，决胜东桥，佐郑畋匡复之谋，倅岐阳统制之命，提戈奋勇，运策摧凶，终成逐雀之功，显就回銮之计。”[①]《授李成庆节度使制》亦云：“洎黄巢犯阙，先臣进士兄弟，宗族携率征讨，首谋大计，果成元功。”[②]关于黄巢之乱中地方藩镇谁最先赴难，《旧唐书·王处存传》云：“时李都守河中降贼，会王重荣斩伪使，通使于处存，乃同盟誓师，营于渭北……处存、王重荣首倡义举，以招太原。”“洎收京师，王铎第其功；勤王举义，处存为之最；收城破贼，克用为之最。”[③]但《改元天复敕》和《授李成庆节度使制》为唐廷颁布的具有国家政治权威的文类，唐廷通过颁布这样的敕、制，在国家政治层面确认了拓跋思恭为黄巢之乱中首倡平乱的功臣。

由于拓跋思恭首倡平乱，夏州节度使诸葛爽投降黄巢，唐僖宗以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④]。为激励拓跋思恭平叛，唐僖宗再升其为正任节度使，继又赐夏绥银节镇号为定难军。中和二年（881年），拓跋思恭又被“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⑤]。据《新唐书·僖宗纪》和《太平广记》，拓跋思恭又担任过南面都统和北面都统。左武卫将军为从三品，与宥州刺史同品级，但毕竟是禁军将衔。检校司空虽然为检校官，但司空位列三公，为正一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代宰相名号，拓跋思恭以夏州节度使而任此职则为使相。京兆尹为从三品。从这些官衔来看，唐廷对拓跋思恭可谓隆恩浩荡，将拓跋思恭从一上州刺史纳入中央职官系统。拓跋思恭因此感恩戴德，虽然在讨伐黄巢时一败于王桥，二败于东渭桥，三败于富平，甚至在败于富平之后奔回本道，但仍然坚持勤王义举。

在平乱战争中，夏州军长期与鄜延军并肩抗敌。拓跋思恭出兵伊始就两次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盟讨贼，在王桥、东渭桥、富平之战中夏州军与鄜延军合力拒敌。两军长期合军驻营于东渭桥。中和二年（881年）夏，由于战事胶着，拓跋思恭一度驻军于鄜州。《白敬立墓志》云：“后王驻军鄜州，舍于洛郊传舍。时大暑，久征之卒皆困寐于帐下。夜漏未分，暴水突至，独公先知，持刃呼左右。王惊起褐衣，就车得出。公乃手擐王骑及子城南门之外，守鑰者呼之不应，公乃梯堞而上，断关

① [北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五，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②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③ 《旧唐书》卷一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00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启扉，王与军人方脱其难。”[①]《新唐书·黄巢传》则记“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逗留不进”[②]。中和三年（882年）四月李克用等东面诸军收复长安前后，拓跋思恭与鄜坊节度使东方逵为北路军在宜君县大败黄巢军。崔致远为高骈所撰《贺杀黄巢徒伴表》云：“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③]

李克用等东面诸军收复长安后，唐廷论功行赏，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④]。太子太傅为从一品，夏国公亦为从一品封爵。拓跋思恭的绘像还被收藏于凌烟阁，其功勋被勒铭于巨碑。《授李成庆节度使制》云：“麟阁丹青，鸿钟纪勒。垂之不朽，永以无穷。”[⑤]唐僖宗还赐拓跋思恭铁券、朱书御扎。《宋太宗实录》记：“乙酉，麟州防御使李克文来朝，以唐僖宗赐其祖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铁券、朱书御扎上献。”[⑥]唐昭宗即位后，唐廷又对拓跋思恭赠官，将其配享于唐僖宗之庙。《改元天复敕》云：“逮予初位，尚洽嘉谋，追矚崇勋，宜膺庙食。其郑畋已有别敕处分。其思恭宜委中书门下特与加赠，仍配享僖宗皇帝庙廷。”[⑦]

黄巢之乱后藩镇混战，政局日益动荡，党项拓跋氏在唐昭宗被李茂贞劫迁凤翔前经常被唐廷指使讨伐跋扈不臣藩镇。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九月，为争夺河中盐利，唐廷发动讨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之战，大宦官田令孜“遣邠宁节度使朱玫会合鄜、延、灵、夏之师讨河中。”[⑧]光启二年（886年）朱玫之乱爆发后，拓跋思恭被唐廷诏命出兵，《新唐书·党项传》云：“嗣襄王煴之乱，诏思恭讨贼。”[⑨]《新五代史·李仁福传》云：“朱玫之乱，思恭与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桥。”[⑩]《白敬立墓志》云：“后王受命复平伪朝，而先定奸臣于鄜畤。”[⑪]拓跋思恭出兵后先攻下延州，《白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461页。

③ [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⑤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⑥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6页。

⑦ [北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五，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⑧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22页。

⑨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⑩ 《新五代史》卷四〇《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6页—第437页。

⑪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敬立墓志》所谓奸臣应指李孝恭。中和三年(883年)，唐廷“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①。黄巢之乱后李孝恭不仅领有延州保塞军，还保持了对鄜州保大军的控制。《唐遮言》记罗虬于“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②。拓跋思恭攻克延州后本欲再克鄜州，但此时唐廷为防定难军势力扩大，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孙惟最为鄜州节度使。《新五代史·孙德昭传》云：“朱玫乱京师，僖宗幸兴元，惟最率兵击贼。累迁鄜州节度使，留京师宿卫。鄜州将吏诣阙请惟最之镇，京师民数万与神策军复遮留不得行，改荆南节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军，号‘扈驾都’”③。鄜州将吏前往长安请孙惟最赴镇正是为了借助唐廷的军事势力来对抗拓跋思恭。由于孙惟最没有赴任，拓跋思恭于两年后攻克鄜州。《白敬立墓志》云：“更二岁，复下鄜畤。”占领鄜州后，拓跋思恭以白敬立为鄜州招葺使，但“无何，延州余孽为变，鄜人从风，兴异志。公获其哀告，遂间道得归。又从王载收鄜、延。举不期月，鄜、延复下，破城垒三十余所，诛恶党一二千人”④。

夏州军与鄜延军在黄巢之乱中并肩作战，但为何在黄巢之乱后反目成仇？主要在于拓跋思恭意图将鄜延纳入定难军的势力范围，这从战后拓跋思恭以亲信白敬立为鄜州招葺使、延州防御使即可看出。王凤翔先生指出黄巢之乱后“群雄割据混战，日渐衰弱的唐廷不仅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就连朝命制定也要唯强藩马首是瞻。藩镇尤其是强藩多通过干政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⑤。在强藩纷纷干预朝政的情势下，拓跋思恭自然也想凭借定难军的实力参与朝政，但是由于鄜延横亘于夏州与长安之间，迅速参与朝政的想法很难实现。鄜延是夏州南下长安的必经之地，“连接延河谷地的延州、洛河谷地的鄜州、子午岭东麓的坊州以及隶属京兆府的同官、耀县，便构成南通长安的直捷之道”⑥。占领鄜延就意味着打通了朝向长安之路，因此拓跋思恭不惜与鄜延翻脸，两战而必夺之。

拓跋思恭占领鄜延后，唐廷被迫承认其为鄜州节度使。《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曾记“至广明年及中和岁，故两镇令公王斯本贯，荣耀乡间”⑦。“故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95页。

② [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遮言校注》卷一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③ 《新五代史》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75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⑤ 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⑥ 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两镇令公”即拓跋思恭。令公是对中书令的尊称，拓跋思恭在中和二年(882年)被唐僖宗“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①]。因此志文尊称其为“两镇令公”。称其为“两镇”即因为拓跋思恭率定难军攻取鄜延后以夏绥节度使兼任鄜州节度使。《资治通鉴》胡注引《唐实录》云：“思敬本姓拓跋，鄜夏节度使拓跋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也。”[②]《唐大诏令集》天复元年(901年)《改元天复敕》又载：“西面行营诸军都统，鄜夏节度使李思恭，扬威北鄙，决胜东桥，佐郑畋匡复之谋，鈇岐阳统制之命。”[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内殿承制、合门祗候李继元，表述其祖保大定难节度使、朔方郡王拓拔思恭仕唐，剪灭黄巢，赐姓。”[④]保大为鄜州军号，定难为夏绥军号。刘敬瑭墓志与《唐实录》《改元天复敕》《续资治通鉴长编》互相印证，说明拓跋思恭确曾担任过夏绥与鄜州两镇节度使。

拓跋思恭强占鄜延引起其他强藩的侧目。《资治通鉴》载晋王李克用曾上表云：“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⑤]李克用上表的直接背景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唐廷召集诸镇讨伐河东，在讨伐军中就有拓跋思恭的定难、保大两镇。《资治通鉴》记大顺元年(890年)四月“壬子，张浚帅诸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本月，“张浚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⑥]。张浚所率的讨伐军主要由禁军、蕃落军、诸镇军构成，蕃落军的一半来自拓跋思恭的两镇，诸镇军的三分之一也来自拓跋思恭的两镇，可见唐廷对拓跋思恭的倚重。从鄜、夏蕃落军自长安前往晋州也可看出拓跋思恭在占领鄜延后，定难军的军事力量可以迅速抵达长安，拓跋思恭参与朝政的愿望得以满足。

拓跋思恭逝世后，弟拓跋思谏继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另一弟拓跋思孝则任鄜州保大军节度使。《新唐书·党项传》云：“以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思孝为保大节度、鄜坊凡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⑦]拓跋思恭所奠定的两镇基业继续为诸弟所保守。光启三年(887年)李茂贞担任凤翔节度使后迅速崛起。乾宁二年(895年)，李茂贞与河东李克用围绕河中争帅事件冲突不断，李茂贞联合王行瑜、韩建入朝兵谏后，李克用自河东勤王入关。由于李茂贞上表认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③ [北宋]宋敏求编，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五，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11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元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00页。
⑦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罪，唐廷以李克用为首组建讨伐军专讨王行瑜，拓跋思谏和拓跋思孝也加入到讨伐军的行列。《旧唐书·昭宗纪》云："又诏鄜州节度使李思孝本军进讨。"[①]《资治通鉴》记："戊戌，削夺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鎗为西面招讨使。"[②]《资治通鉴》还记李克用"遣李存信、李存审会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园寨，擒其将王令陶等，献于行在"[③]。

拓跋思孝任保大军节度使后，"累兼侍中。"[④]乾宁三年（896年），拓跋思孝"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俄为节度使"[⑤]。《资治通鉴》亦云："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诏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⑥]《授李思敬马殷湖南节度使制》记拓跋思敬"具官李思敬，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钟刻伐，带砺誓盟。探义府之根源，畅和门之方略。双鞬小戟，承家而猿臂推奇。叔豹季狸，济美而牛头入梦……或贰戎车之政令，宽缓不苛……有以难兄告老，沥恳以闻。俾谐内举之诚，爰颁试守之命"[⑦]。制文强调了拓跋思敬出于功臣之家，从中可知拓跋思敬是以保大军节度副使一职而任保大军留后的。由于李茂贞势力迅速坐大，党项拓跋氏在鄜州的权力中坠。光化二年（899年），李茂贞迫调拓跋思敬为武定军节度使，以假子李继颜为保大军节度使。《授李思敬武定军李继颜保大军节度使制》称赞拓跋思敬"奉上诚专，康时绩茂，常蓄持危之志，雅推御众之能"[⑧]。可见唐廷对拓跋思敬的忠唐的政治品质是较为了解的。

乾宁三年（896年）拓跋思谏卸任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子李成庆继任。本年李茂贞击溃嗣覃王李嗣周所领禁军，兵锋直指京郊，唐昭宗被迫出走，凤翔军进入长安后大掠并火烧京城。唐廷在此危难之时迫切希望定难军能出兵勤王。《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既克绍于门风，爰委用于旧土。未行真命，且假剧权。士心咸感于惠和，封部果臻于宁肃。既符试可，须议与能。方当殄寇之时，将用正名之典。我之异渥，实为吁谟。以尔成庆，代有殊烈。禄山滔天之日，文已载于司勋。朱泚盗国之时，绩复书于盟府。洎黄巢犯阙，先臣进士兄弟，宗族携率征

① 《旧唐书》卷二〇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5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二年六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74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二年八月己，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74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三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84页。
⑦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2页下。
⑧ 《全唐文》卷八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16页。

讨，首谋大计，果成元功。麟阁丹青，鸿钟纪勒。垂之不朽，永以无穷。今则近辅元渠，久未诛翦。朕之郁慎，格于皇天。尔其思曾高戡祸之勋，缵父叔定倾之烈。尽驱锐旅，速殄袄巢。克副家声，以康国步。服我休命，所宜若何。勉树功名，勿孤注倚。”[①]从制文来看，李成庆在凤翔军进入长安之前为定难军留后，唐廷为使定难军出兵勤王，正式授予李成庆节度使旌节。制文详述党项拓跋氏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勤王之功，正是为了唤醒党项拓跋氏忠于唐室的历史记忆，使其迅速出兵。制文还谈到皇室陵替，唐昭宗怨愤至极，希望李成庆缅怀先祖勤王业绩，以大军扫平李茂贞。李成庆是否出兵史无明载，但李成庆之叔前任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被唐廷任命为讨伐军副统帅。《资治通鉴》云乾宁三年（896年）九月“以孙偓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②]。拓跋思谏在乾宁二年（895年）曾领军与李克用一起围攻静难王行瑜，此次接受诏命担任静难节度使，既表现了党项拓跋氏一向的忠唐立场，又可以使党项拓跋氏的政治势力扩展至邠宁镇。周伟洲先生认为拓跋思谏没有赴镇。从《资治通鉴》记乾宁四年（897年）三月“更名感义军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③]来看，拓跋思谏的前任苏文建在乾宁四年（897年）三月才移镇到昭武军，而在此之前苏文建应一直在镇，因此拓跋思谏确实没有赴镇。

拓跋思谏虽然没有赴镇，但在乾宁四年（897年）正月被唐廷任命为延州宁塞军节度使。《资治通鉴》云乾宁四年（897年）正月“己亥，罢孙偓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以副都统李思谏为宁塞节度使”[④]。《授李思谏延州节度使制》云：“累代以勋劳报国，殉节忘生。一门以忠孝承家，推心济物。功铭钟鼎，誓著山河。每逢多难之秋，必奋安危之用。昨以邠岐动众，畿甸匪宁。授以统临，锡之鈇钺。举旄效命，投袂连行。备闻靡盐之诚，克抱尽敌之意。朕念兵革繁兴，十有八载。蒸黎板鈇荡，邑里洞虚。为人父母之心，深惭凉德。拯国艰危之运，唯有责躬。爰议罢兵，用安率土。又念昨者邠人不令，潜持两端。有误军机，遂成退守。复临彼土，自不怀安。虽欲抚宁，谅难辑睦。是乃换双旌之雄重，割两郡之膏腴。成一家千里之封，列三镇十连之责。勉思勤竭，膺我宠灵。”[⑤]制文将党项拓跋氏视为唐室功臣，赞扬党项

① 《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以尔成庆，代有殊烈。禄山滔天之日，文已载于司勋。朱泚盗国之时，绩复书于盟府。洎黄巢犯阙，先臣进兵，兄弟宗族携率征讨，首谋大计，果成元功。麟阁丹青，鸿钟纪勒。垂之不朽，永以无穷。”［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三年九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94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昭宗乾宁四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503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六一，唐昭宗乾宁四年正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500页。

⑤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29页下—2330页上。

拓跋氏忠于唐室。从制文可知拓跋思谏在讨伐李茂贞的行营军中勤勉于事，没有赴任邠宁镇的原因是由于邠宁镇在此次军事行动中首鼠两端、贻误军机，如果赴任，邠人内不自安，邠宁镇也就不好管理。制文称将拓跋思谏从静难节度使移为宁塞节度使，“是乃换双旌之雄重，割两郡之膏腴。成一家千里之封，列三镇十连之责”。表明唐廷将延州管属权让与党项拓跋氏，使拓跋思谏的延州宁塞军与拓跋思敬的鄜州保大军、李成庆的夏州定难军连为一体。前述拓跋思恭曾两占延州，但从《刘敬瑭墓志》称其为“两镇令公”，《唐实录》和《改元天复敕》称其为鄜夏节度使，其后裔李继元称其为保大定难节度使来看，拓跋思恭并没有获得延州保塞军的节钺。《白敬立墓志》记拓跋思恭的亲信白敬立被拓跋思恭“荐为延州防御使”[①]，从“荐”字可知拓跋思恭是向唐廷举荐。《白敬立墓志》题“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守延州刺史、充本州岛防御、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安塞军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白府君墓志”[②]。从唐廷任命白敬立为延州防御使和白敬立的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等官衔来看，唐廷一直保持了对延州的政治领属权，直到将拓跋思谏任命为延州宁塞军节度使。

定难军节度使李成庆卒后，拓跋思谏再任定难军节度使。由于李茂贞势力的持续扩大，党项拓跋氏在延州的权力中坠。《旧五代史·杨崇本传》记：“天佑三年冬十月，崇本复领凤翔、邠、泾、秦、陇之师，会延州胡章之众，合五六万，屯于美原，列栅十五，其势甚盛。”[③]天佑三年即公元 906 年，延州胡章指胡敬璋。《旧五代史·高万兴传》云：“河西自王行瑜败后，郡邑皆为李茂贞之所强据，以其将胡敬璋为节度使。”[④]《新五代史·高万兴传》则记：“唐末，河西属李茂贞，茂贞将胡敬璋为延州刺史。”[⑤]从《旧五代史·杨崇本传》来看，最迟于天佑三年（906 年）李茂贞已据有延州。

二、党项窦氏与唐中央及夏州藩镇

唐僖宗乾符年间，世袭党项羁縻州长宁州都督的窦氏家族也与夏州藩镇存在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新出《窦伯岁墓志》题“唐故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兼长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杨崇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82 页。

④《旧五代史》卷一三二《高万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744 页。

⑤《新五代史》卷四〇《高万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39 页。

宁州都督窦公墓志铭”，续云：“公之氏族郡在扶风，本始西域三苗之后。安附边隅，率拜首领，公勤报国，传之不朽。曾祖讳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大历二年九月十日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祖讳越磨，立性清贞，道高不仕。父讳铁山，承袭宿功，名芳上国。会昌二年六月十九日敕授长宁州都督。公讳伯岁，文抚知畧，武识安危。会昌五年六月廿三日□授左厢子弟兵马使，充长宁州都督。年迫从心，乾符□□□□□月廿四日忽疾，奄终私室，享年七十四岁。”①

从志文“安附边隅，率拜首领，公勤报国，传之不朽”来看，窦伯岁先祖为内徙党项之首领，且世代相袭，对唐王朝忠心耿耿。银夏党项首领对唐廷一向尽忠竭力，如静边州都督拓跋思泰即在唐军平定六胡州之乱中“爰从讨袭，躬亲矢石，奋其忠勇”②，英勇战殁。志文记窦伯岁曾祖窦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大历二年九月十日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安史之乱后，吐蕃以党项、吐谷浑、奴剌等为前驱，频年侵掠唐关内地道区，并深入至京畿。仆固怀恩叛乱后又以叛军联合吐蕃、回纥、党项、吐谷浑、奴剌进犯长安。党项为仆固怀恩叛军的重要联盟，于邵《贺破渭北党项状》即云：“此贼与怀恩作恶，俱为不道，昨率其蜂虿，犯我郊畿。”③在叛乱平定后，唐廷为加强京畿防御，采纳郭子仪建言，将关内道北部之党项、吐谷浑与已进占陇右之吐蕃进行地理分隔，“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④。唐廷又召忠顺于唐的“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剌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⑤。由于庆州破丑氏、野利氏、把利氏与吐蕃结姻，被吐蕃赞普封王扰边，郭子仪又上表奏请以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设置行庆州以压制反唐之党项势力。之后郭子仪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⑥。唐廷的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史载原背离于唐的“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喻安西北庭诸将制》亦云：“党项内附，回中大宁，天下

① 白赛玲：《横山墓志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4页。
② 《全唐文》卷一六《赠拓跋思泰特进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95页。
③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六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282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6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6—6217页。
⑥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郡国一其教理，王畿征调一如平时。”①

正是在此背景下，窦罗磨才于大历二年九月十日被敕授大首领，长宁州刺史。其年十月廿二日被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旧唐书·代宗纪》云大历二年十月“乙酉，回纥、党项使来朝”②。乙酉正是廿二日，可见窦罗磨被敕告加殿中监、上柱国因与党项使者来朝相关。关于党项使者的身份及其来朝的原因，《册府元龟》云：“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寇灵州。十月，党项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③考虑到之前拓跋朝光、拓拔乞梅等党项羁縻州刺史均已入朝，这位请供军粮的党项首领应即刚被敕授长宁州刺史不久的窦罗磨。《窦伯岁墓志》亦称窦罗磨“立志竭忠，宏规盖古”。盖指其主动请求上供军粮而言。银夏一带的党项人早在景龙年间即从事农业。敦煌遗书 S.1344 号《唐开元户部格残卷》记有景龙二年六月九日唐中宗敕命“左厢桑干、定襄两都督府管内八州降户及党项等，至春听向夏州南界营田，秋收后勒还”④。窦罗磨之举之所以“宏规盖古”在于党项羁縻州一直不上交赋税于中央，而灵州在仆固怀恩之乱中残破，史载路嗣恭任朔方节度使后，“披荆棘以守之”。灵州防御吐蕃进攻亟需军粮。《册府元龟》云：“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寇灵州。命有司运米二万石供灵州军。是年冬，率城百官、士庶钱，充朔方军粮。其六军兵士，不存此限”⑤。《旧唐书》亦云大历二年（767 年）十月“甲申，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⑥。因此窦罗磨此举意义非常，也因而被敕授从三品殿中监、正一品勋官上柱国。殿中监为殿中省长官，直接服务于天子，“掌乘舆服御之政令，总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六局之官属，旧属官又有天藏府，开元二十三年省。备其礼物，而供其职事”⑦。窦罗磨以一党项首领所任之殿中监当为试官，静边州都督拓跋澄澜也曾任“守殿中省尚辇奉御员外置同正员”⑧，两位党项首领均以殿中省官为其试官、员外置同正员官，或与党项善于养马有关。

窦罗磨所任刺史之长宁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为剑南道泸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在两唐书地理志党项羁縻州中未见其名。窦罗磨为党项羌首领，其任官之

①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政事·抚慰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年，第 555 页。

② 《旧唐书》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87 页。

③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三七《外臣部十八·助国讨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1267 页。

④ 郝春文，金滢坤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96 页。

⑤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四八四《邦计部二·经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5488 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287 页。

⑦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23 页。

⑧ [唐]郑宏之：《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224 页。

长宁州断不为泸州都督府下之长宁州。在陕北地区出土墓志中，常有未见于史籍记载的党项羁縻州，如《白敬立墓志》记载之兴宁府。周伟洲先生即指出："'兴宁府'疑即党项羁縻府之一的'清宁都督府'。"[①]从窦罗磨意向灵州献助军粮来看，其应与灵州官府联系紧密，其所任官之长宁州应直接隶属于灵州都督府。据《新唐书·地理志》，隶属于灵州都督府的党项羁縻府有兰池都督府、芳池都督府、相兴都督府、永平都督府、旭定都督府、清宁都督府、忠顺都督府、宁保都督府、静塞都督府、万吉都督府、乐容州都督府、静边州都督府，隶属于灵州都督府的党项羁縻州有清塞州、归德州、东夏州、布州、北夏州、思义州、思乐州、昌塞州、吴州、朝州、归州、浮州、佑州、卑州、西归州、嶂州、鹘州、开元州、归顺州、淳州、乌笼州、恤州、嵯州、盖州、悦州、回乐州、乌掌州、诺州等。长宁州或为其中一州之别名，或为史籍失载之党项羁縻州。窦罗磨之后党项窦氏世袭长宁州都督，直至窦伯岁。从窦伯岁葬地来看，长宁州应在银、夏一带。

身为灵州都督府下属的窦罗磨入朝请助灵州军粮，其直接原因在于时任朔方节度使的路嗣恭在灵州安抚党项有力。史载路嗣恭赴任灵州后，朔方"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称疾召至，因杀之，威信大行"[②]。大历二年十月"戊寅，灵州奏破吐蕃二万，京师解严"[③]。十月戊寅为十月十六日，窦罗磨在十月二十二日入朝，其应在长宁州闻知灵州被吐蕃军围攻或解围后，迅速从银夏驻地南下至长安请献军粮。

根据志文，窦罗磨之子窦越磨没有入仕。窦越磨之子窦铁山于会昌二年六月十九日被敕授长宁州都督。唐制"替代留守军将及军发后更添兵马，新授都督、刺史及改替、追唤别使，若禁推、请假敕许及别敕解任者，皆须得敕书"[④]。羁縻府州之新任都督、刺史的拜授同样适用，一般由朝廷遣官携敕书宣授。窦罗磨任官长宁州时仅为刺史，窦铁山任官长宁州时官拜都督，可见长宁州在会昌二年已由羁縻州升为羁縻府。长宁州的升格应与党项人口增长有关，会昌四年颁布的《赐党项书》即云："自尔祖归款国家，依附边塞，为我赤子，编于黔黎。牛马蕃孳，种落殷盛，不侵不叛，颇效信诚。"[⑤]可知会昌年间党项人口大增，长宁州也因而升为长宁州都督府。

---

①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注。

② 《旧唐书》卷一二二《路嗣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00页。

③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页。

④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八《门下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3页。

⑤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第六《诏敕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从志文来看，窦伯岁于唐僖宗乾符年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则其当生于唐德宗贞元末年。会昌五年（845年）六月二十三日，窦伯岁被授命担任夏州左厢子弟兵马使兼长宁州都督，时已至壮年。周伟洲先生曾指出："中唐以后史籍很少提及党项羁縻府州，因为颇疑此时党项羁縻府州已名存实亡。"[①]刘统先生则认为："元和年后，史书记载党项都称为某部落或某族，不再提羁縻府州称号。党项酋长也由羁縻州都督刺史转为正州刺史。""可以认为，党项部落在关内道设置的羁縻府州，在宪宗元和年间予以废止。党项部落融合于唐朝编户之中。"[②]从窦伯岁自会昌年间至乾符年间任长宁州都督可知唐宪宗元和以后，直至唐末银夏一带的党项羁縻府州仍然存在。窦伯岁既担任夏州左厢子弟兵马使，志文又云其终于私室，其应长期生活于夏州城内，在夏州还有私宅，去世后才葬于长宁州地界。此时的长宁州早已由灵州转隶于夏州，《册府元龟》记元和五年五月，"盐州奏渭北党项拓跋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收放，经今十五余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充百姓"[③]。据《旧唐书·地理志》，盐州自贞观二年隶于灵州，则在盐州地界的党项羁縻府州也隶于灵州。盐州于"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④]。盐州地界的党项羁縻州又转而隶于夏州。正由于长宁州在元和以后已为夏州管辖，所以窦伯岁才长期在夏州任藩镇军职。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之乱后，唐廷忌朔方军势力太盛，尾大不掉，逐渐将其分割，在其属地相继设立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振武、天德、夏绥等七个藩镇，与朔方军治地灵武合称京西北八镇，原为朔方军统管之党项羁縻府州亦分隶于各镇，此举既削弱了朔方军，亦将各党项部落打散，使之不能集中力量与吐蕃联合威胁于唐。李德裕曾上奏谈道："闻党项分隶诸镇，……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⑤]可谓一语破的。长宁州由灵州划归夏州管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唐代藩镇军队一般按左右厢划分编制，窦伯岁所任之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为夏州左厢子弟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至德以后，都知兵马使率为藩镇储帅。"[⑥]"在道一

①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②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③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七《外臣部二十二·降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13页。

④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7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六年十月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77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93页。

级或藩镇使府下的兵马使，职权最大的莫过于都知兵马使。”[①]唐代的子弟军在中央禁军、藩镇、府州团练、羁縻府州均有存在。中央禁军中如武德初年组建之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②]。开元初年成军之左右龙武军，“皆唐元功臣子弟并外州人”[③]。至德二年组建之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④]。另有“射生子弟”[⑤]等。藩镇中的子弟军如刘辟在西川时的“五院子弟”[⑥]，韩滉在江东组建之“迎驾子弟”[⑦]，李诉任魏博节度使时“取大将家翘秀者为子弟军列于诸校之上”[⑧]，会昌泽潞之役中出现有陈许徐泗“军外子弟”[⑨]，藩镇中子弟军的军官多被称为“衙前子弟”[⑩]“节度子弟”[⑪]，归义军还设有“子弟虞侯”[⑫]。府州团练中的子弟军如安史之乱中的常山团结子弟、李德裕镇蜀时组建之雄边子弟，幽州雄武军中的“土团子弟”[⑬]。

羁縻府州中的子弟军多出现于西南、东南的羁縻府州。安史之乱爆发后，南阳节度使鲁炅以“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⑭]。唐肃宗曾以“云南子弟”[⑮]参与讨伐安史叛军。杨思勗曾在岭南“鸠募首领子弟兵马十余万，取伏波故道以进”[⑯]，讨伐安南首领梅玄成。黔州刺史曹高任也率军“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⑰]吐蕃军。唐代剑南道边防军有西山子弟、邛雅子弟，其中西山子弟为羌人组成，杜甫《东西两川》云西山“兼羌堪战子弟向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⑱]。西山

① 李艳：《唐代兵马使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2页。
②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0页。
③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4页。
④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1页。
⑤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5页。
⑥ 《旧唐书》卷一四〇《刘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28页。
⑦ [唐]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五《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5页。
⑧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三《碑中·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带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⑨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五《论石雄等添兵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92页。
⑩ [唐]刘仁贽：《唐董府君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⑪ [唐]张元赟：《唐振武节度随军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⑫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66页。
⑬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一七《论幽州事宜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
⑭ 《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61页。
⑮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8页。
⑯ 《旧唐书》卷一八四《杨思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56页。
⑰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8页。
⑱ [唐]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著》校注卷二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88页。

子弟为本族羌豪统帅，《旧唐书·地理志》云："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马使嗣归诚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内天保郡归附。"[①]窦伯岁所任之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与西山子弟兵马使名称相近，只不过前者为都级长官。夏州乃缘边藩镇，蕃汉混杂，境内尤以党项居多，本镇军队中自然有大量党项羌，拓跋思恭早年即为夏州军中之教练使。夏州左厢子弟军，顾名思义由夏州本地的军将及官健之子弟组建成军，但考虑到由出身党项羌之窦伯岁担任该部最高军事指挥官，该部应为蕃汉混编部队，甚至全由党项羌组成。党项羌酋豪加入藩镇武力早在开元年间即已出现，如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丁未，党项鹘揽支来降，授果毅，借绯鱼袋，与陇右节度驱使"[②]。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之叔拓跋兴宗曾为"朔方军节度副使、兼防河使、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将作大将"[③]。拓跋兴宗又曾任职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麾下，其《请致仕侍亲表》之《第二表》曾上言唐玄宗道："陛下于愚臣过听，谓边将得人，则有陇右专知教练兵马使右骁卫将军蔺廷辉，材略冠军，智勇无对。今节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令摄使替臣。"[④]《册府元龟》还记有唐文宗太和元年八月"灵州奏部落游奕使拓拔忠义招收得部落五千余帐，于界首安置讫"[⑤]。游奕使亦为藩镇常见军职。

三、党项野利氏与静难军

党项野利氏在内徙前即为党项八大部之一，在内徙至唐关内道后主要居于庆州。《旧唐书·地理志》云："芳池州都督府，寄在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静、獯、王、濮、林、尹、位、长、宝、宁，并党项野利氏种落。""安定州都督府寄在庆州界，管小州七：党、桥、乌、西戎州、野利州、米州、还州。"[⑥]可见在庆州的党项羁縻府芳池州都督府主要是由野利氏部落组建，同在庆州的安定州都督府也有野利氏部落组建的羁縻州。从党项拓拔（跋）氏世袭静边州都督来看，野利氏也应世袭芳池州都督。在庆州的野利氏有五大部落，《旧唐书·党项传》云："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⑦]野利氏除主要居于庆州外，还有一部分分布于

①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05页。

②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五《外臣部（二十）·褒异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88页。第11册。

③ ［唐］郑宏之：《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④ 《全唐文》卷三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056页。

⑤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九七七《外臣部二十二·降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14页。

⑥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9页。

⑦ 《旧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夏州。《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云:“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州,拓跋、舍利、仆固、野利、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①]党项野利氏的金石资料仅见于新发现的《野利延玉碑》。该碑原在甘肃庆阳市华池县林镇乡大凤川旧城子老城西洼,2001年十月被运回华池县城,现存华池县博物馆。从《野利延玉碑》的发现地点和碑中所叙野利延玉家族活动的区域来看,野利延玉家族即出于庆州的野利氏。

《野利延玉碑》云:“非□□□□□□当时之□永兴,□贡于□殿。”“又于开元元年三月日,奉宣命昭,赴开庭封漠明补充□□□□□。”[②]可见野利延玉家族的祖辈曾前往唐朝京师长安。唐玄宗开元以前,多有党项首领前往长安。据《旧唐书·党项传》,党项大酋细封步赖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来到长安,被唐廷“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③]。党项大酋拓跋赤辞被唐廷拜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后,“自此职贡不绝”[④]。从前往长安的党项人多为本部大酋来看,在开元年间来到长安的野利延玉祖辈也应为庆州野利氏的大首领。刘统先生指出:“羁縻府州虽与正州不同,也有向唐朝提供赋税的义务。”[⑤]这种赋税的形式很灵活。从《野利延玉碑》所记“□贡于□殿”可知野利延玉祖辈前往长安,主要是向唐廷贡纳。

从碑文来看,野利延玉之父野利阿胡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被唐廷授予官告,任守静州防河大使,置同正员。从守静州防河大使来看,野利阿胡是有散官的,因为散官高于职事官称为守。防河大使军事色彩浓厚,野利阿胡的散官应为武散官。置同正员表明野利阿胡所任守静州防河大使为员外官,“即正员官编制之外官员的意思”[⑥]。关于静州,《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均记剑南道有一静州。《资治通鉴》云后汉乾祐二年(949年),“诏以静州隶定难军,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谢”[⑦]。《宋史·夏国传上》云:“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⑧]杨蕤先生认为定难军所领有的静州“很有可能从唐羁縻州静边州演变而来。这是因为从名称上判断,二者相似;更重要的是静边州曾经侨治在银州附近,也就是静州的大致范围”[⑨]。野利阿胡所任官之静州,

① 汤开建:《唐李荃〈太白阴经·关塞篇〉西北诸道部族地理考证》,《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52页。

② 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1页。

④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2页。

⑤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⑥ 杜文玉:《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⑦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隐帝乾祐二年正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407页。

⑧ 《宋史》卷四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2页。

⑨ 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从其家族活动历时来看，应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党项羁縻府芳池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静州，在庆州地界。党项拓跋氏首领也曾担任防河使，《拓跋守寂墓志》记拓跋守寂曾祖拓跋罗胄、祖拓跋后那均任防河军使。党项拓跋氏首领所担任的防河军使主要防备突厥，而野利阿胡所担任的防河大使应主要防备吐蕃。

安史之乱后吐蕃大举东进，不仅逐步占领河陇，围攻西域，还深入唐京畿作战。在关内道西部的党项也加入吐蕃的作战队伍。庆州的野利氏成为吐蕃军团的前锋，不仅与吐蕃联姻，还接受了吐蕃的王爵。《新唐书·党项传》云："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①]唐廷为防止党项与吐蕃联合，采纳郭子仪建议，一方面派遣使者招抚，一方面设置行庆州，以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庆州刺史，又遣军严密巡逻断绝双方往来之路。郭子仪之后又建言唐代宗在党项羁縻府拓跋氏静边州、野利氏芳池州都督府下设长史一官以监视。"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②]芳池州的野利部虽然有很多迁往绥州、延州以与吐蕃隔绝，但是还有大量部众留在了庆州。唐代宗大历末年，庆州的野利秃罗与吐蕃联合作乱。由于之前唐廷的政治、军事措施得当，野利秃罗"招余族不应，子仪击之，斩秃罗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刚以其部数千人入附鸡子川"[③]。在中唐时，庆州的野利氏联合其他党项部落形成了稳定的部落联盟，是党项东山部的主体部族。《新唐书·党项传》云："六州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④]

唐廷以野利阿胡担任静州防河大使置同正员，正是利用党项野利氏部族武力在庆州对抗吐蕃。庆州自安史之乱后屡为吐蕃所袭扰。《旧唐书·代宗本纪》记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三月"辛未，吐蕃寇盐州、庆州"[⑤]。《旧唐书·德宗纪下》记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九月"壬子，吐蕃寇庆州"[⑥]。本年九月，"吐蕃寇庆州及华池县，杀伤颇甚"[⑦]。周伟洲先生指出："永泰元年后，唐朝境内的内迁党项主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⑤ 《旧唐书》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4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4页。
⑦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8页。

要分属朔方、振武、夏州(或云夏州节度,置于贞元三年)、泾原、邠宁、鄜坊(渭北)、河东等七个节度使管辖。各节度使所领州及军镇虽时有变化,但内迁党项却是分属这七个节度使,并在其直接控制之下。"[①]至德二年(757年)邠宁节镇设立后,野利阿胡及其部落便主要由邠宁节度使统辖。

碑文云:"又于大和八年二月日,奉静难军节度使牒监漠境于□□□之蕃,□世祖节雄,□□名而千里之外,永标鳞各"[②]。可知野利阿胡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被静难军节度使派遣监护党项部落。静难军节度使即邠宁节度使,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唐廷对邠宁节镇赐号静难军。由于碑文刻于后唐,邠宁节镇时已称为静难军,因此碑文以追述的笔调称唐文宗大和年间的邠宁节度使为静难军节度使。据《唐方镇年表》,大和八年任邠宁节度使者为李用。李用在大和七年六月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下》云大和八年六月"己卯,以右神策大将军李用为邠宁节度使"[③]。

唐廷虽然以藩镇节度使来管治各镇的党项部落,但节度使都于会府理事,没有深入党项部落,既不能了解部落民情,又不能有效地管理部落,因此在很多时候,得借助于担任本镇军职的党项酋首来安抚部落。朔方节度使就曾以担任本镇军职的党项首领拓跋忠义,招抚党项部落。《册府元龟》记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八月"灵州奏,部落游弈使拓跋忠义招收得部落五千余帐,于界首安置讫"[④]。野利阿胡被邠宁节度使派遣监护党项部落,即在此背景下。

从碑文来看,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二月,"静难军节度使□相公朱"任命野利阿胡为凤川、静羌两镇副兵马使。"静难军节度使□相公朱"即朱玫。朱玫原为邠州通寨镇将。中和元年(881年)二月,邠宁节度使李存礼率军前往京畿讨伐黄巢。本镇留守大将王玫却乘机攻陷邠州。黄巢拜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⑤]。本年七月,唐廷"以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⑥]。《旧唐书·僖宗纪》云中和三年(883年)五月,唐廷以"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邠宁节度使朱玫就加同平章事,进封吴兴县侯,食邑一千户"[⑦]。同平章事为相职,朱玫以藩镇节度使任相

①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② 吴景山:《庆阳金石碑铭菁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③《旧唐书》卷一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0页。
④《册府元龟》卷一二九《帝王部·封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13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僖宗中和元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56页。
⑦《旧唐书》卷一九下《唐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6页。

职则为使相。《唐会要》即记朱玫为唐僖宗六十使相之一。因此碑文称朱玫为“静难军节度使□相公朱”。

在黄巢军于中和三年(883年)被赶出长安后，朱玫返回本镇，得以任命野利阿胡为凤川、静羌两镇副兵马使。凤川镇为庆州之镇。《武经总要》前集云凤川镇“西北控子午岭，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筑。东至州北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镇五十里。东至南华池镇二十里，西界四十里”①。《武经前集》云凤川镇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筑。《嘉靖庆阳府志》则称凤川镇“在城东北五十里，宋范仲淹置。控子午岭，入西夏界。东接本府一百五十里。东南置华池镇二十里”②。顾炎武《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称凤川镇为范仲淹设置。但从《野利延玉碑》来看，凤川镇早在唐僖宗中和年间即已存在。静羌镇为麟州之镇，又名静羌堡、静羌寨。《武经总要》前集云静羌堡“控兔毛川一带贼路，东南至建宁寨十七里，西至镇州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黄河没遮川百里。北至西界”③。《雍正陕西通志》云静羌寨在神木县“东南一百里，唐建”④。但麟州在唐属振武节度使管辖，庆州与麟州之间相距遥远，中隔延州、绥州、银州。从庆州到麟州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也得翻越白于山，经过夏州。麟州在中和四年就被从振武镇划给河东镇。《资治通鉴》记本年“八月，李克用奏请割麟州隶河东，又奏请以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皆许之”⑤。可见野利阿胡所任官之静羌镇当不为麟州之静羌镇。碑文所记之静羌镇应与凤川镇一样同为静难军属镇，或在庆州。

野利阿胡所任凤川、静羌两镇副兵马使属于直隶于静难军节度使的镇将。唐制“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⑥。安史之乱后内地藩镇多置镇，设镇将统领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大唐六典·尚书兵部》云：“凡镇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⑦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⑧张国刚先生指

① [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影印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893页。

② 《嘉靖庆阳府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7页。

③ [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七，《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影印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867—868页。

④ [清]刘与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一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551册，第911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中和四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313页。

⑥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9页。

⑦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⑧《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9页。

出唐代的“县镇除隶属各支郡外,重要的军镇仍由节度使直接统领”①。野利阿胡直接被静难军节度使朱玫委任为凤川、静羌两镇副兵马使,表明凤川、静羌两镇的镇军是由静难军节度使直接统领的。

从碑文来看,野利阿胡于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九月升为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镇边使一职表明凤川、静羌两镇密迩藩部。镇边使作为藩镇镇将的一种,广泛见于五代。《嘉庆浚县志》所载后周《黎阳大伾山寺准敕不停废记》记有“前义成军随使押衙、总镇边使兼□王□金□”②。《乾隆翼城县志》云后周有王德,“以镇边使屯兵守翼”③。

根据碑文,唐昭宗光化三年(900 年)五月,野利阿胡又被静难军节度使委任官职,惜碑文残损不得而知。碑文云:“岁□于天复八年不幸□薨。后于当年八月中,蒙使府念野利阿胡久效赤心,忠贞佐主,蒙静难军节度使侍中李牒胡为监□察御史。”可知天复八年(908 年),静难军节度使“侍中李”任野利阿胡为监察御史。碑文中的天复八年实为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天复四年(903 年),唐昭宗改元天佑。朱温弑杀唐昭宗,拥立唐哀帝李柷即位后,仍沿用天佑年号。朱温篡唐后,与朱温对立的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淮南杨行密都继续使用唐天佑年号。《野利延玉碑》撰、刻于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后唐视本朝为唐朝之再兴,极力贬斥后梁为伪朝,因此《野利延玉碑》以唐朝年号来纪年。

静难军节度使“侍中李”据《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为李继徽。侍中即门下侍中,为李继徽相职,在传世李继徽史料中未见,可补史阙。野利阿胡被李继徽授任的监察御史为宪衔,非实职。赖瑞和先生指出:“唐代的御史衔可以用以奖军功,也可以用以酬事功,但都经由上司上奏皇帝取得。”④从碑文来看,野利阿胡获得的监察御史这一宪衔是由静难军节度使李继徽直接授任的,没有经过朝廷。李继徽原为岐王李茂贞养子,在李茂贞于关中扩张权势时被李茂贞上奏朝廷任为静难军节度使。李茂贞由于劫唐昭宗于凤翔,引发朱温率大军入关讨伐。李继徽在邠州也被围攻,势穷降于朱温,但后来又背叛朱温,自成一系。李继徽直接授任野利阿胡宪衔显示了静难军在后梁初建时的独立性,因为当时唐朝已亡,李继徽又不承认后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因此自己授予本镇武将宪衔。从碑文所记“岁□于天复八年不幸□薨”来看,野利阿胡或于本年逝世。碑文云:“论祖父野利阿胡之

①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事体制》,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89 页。
② [清]熊象阶纂:《嘉庆浚县志·浚县金石录卷上》,清嘉庆六年刊本。
③ [清]李居愿等纂:《乾隆翼城县志》卷一一《执秩》,清乾隆刻本。
④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 年,第 108 页

功勋，幼而为唐邦之荣洛保护。”可见野利阿胡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任守静州防河大使时或为童稚，但其至至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才逝世，仕宦长达123年，实为罕见的高寿。《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①]可谓不虚。

野利李延玉为野利阿胡之子，碑文云：“又于当年九月中，蒙静难军节度使陇西□牒补野利李延玉充节度押司。”自唐中后期以来，藩镇中即设“押司”一职，为节度使之亲从。如《唐故魏博节度天雄军司马南阳郡宗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公之令弟奉义郎试太常寺丞节度要籍兼支计押司曰文度。”[②]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刻《神福山寺灵迹记并序》碑阴记有“押司录事郎立”[③]。后周王虔真之祖父王景良曾任“使院押司官”[④]。入宋以后，押司官多为州、县政府中负责案牍事务的文吏。任命野利李延玉为节度押司的静难军节度使“陇西□”应为李姓节度使，因为陇西为李姓郡望。据《五代十国方镇年表》，进入五代后，在《野利李延玉碑》所刻的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之前任静难军节度使李姓者，有李继徽、李彦鲁、李保衡、李敬周。碑文已称李继徽为“侍中李”，因此“陇西□”当为李继徽、李彦鲁、李保衡、李敬周中之一人。后梁乾化四年（919年）十二月，李继徽为其子李彦鲁毒害，李彦鲁自称静难军留后。贞明元年（920年）四月，李继徽养子李保衡又袭杀李彦鲁，自称静难军留后。李彦鲁随即投附后梁，被后梁任为华州感化军节度使，后梁以河阳留后霍威为静难军节度使。根据碑文，野利李延玉是于某年九月被静难军节度使任命为节度押司的，而李彦鲁是从后梁乾化四年（919年）十二月至贞明元年（920年）四月为静难军留后、李保衡仅在贞明元年（920年）四月为静难军留后，在两人的任期内都没有九月，因此任野利李延玉为节度押司者应为李敬周。据《五代十国方镇年表》，李敬周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至长兴元年（930年）十月为静难军节度使。

从碑文来看，野利李延玉起家任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为袭其父职。碑文云：“后于天成元年七月奉□□□□□□□□贞明五年三月□□□□遂□置太师□□王□，补李延玉充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经仔细核对碑刻拓片，可知录文缺字的后半部分为“鄜延两道□置太师渤海王”。考诸史籍，后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任太师、渤海王者为延州节度使高万兴。《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上》云贞明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1页。
②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2页。
③ 史景怡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九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65页。

元年(915年)二月,后梁将"延州节度使、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万兴进封渤海王"①。碑文中的"□置"实指制置使。贞明四年(919年)四月,高万兴弟鄜州节度使高万金逝世,后梁以高万兴兼理鄜州。《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中》云本年四月"癸亥,以延州忠义军节度使、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王高万兴兼鄜、延两道都制置使,余如故"②。此后高万兴又于贞明六年(921年)进一步升为鄜、延两镇节度使。

凤川、静羌两镇本属静难军,但两镇武职官长为何在贞明五年(919年)被鄜延两道都制置使高万兴署任?高万兴、高万金兄弟本属岐王李茂贞大将胡敬璋,后投附朱温。朱温遣高万兴、高万金攻克原属李茂贞的鄜、坊、丹、延四州,以四州之地分建二镇,以高万兴为延州节度使,高万金为鄜州节度使,两人虽臣属后梁,但独立性极强,《旧五代史》即将两人列入世袭列传。凤川、静羌两镇位于静难军的庆州,庆州紧邻延州镇和鄜州镇,延州镇和鄜州镇都位于庆州东面。《资治通鉴》云贞明元年(915年)"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举邠、宁二州来附"③。可见在静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内乱中,李彦鲁仅占据了邠州和宁州,以此二州投附后梁,静难军剩余的庆州、衍州并未为李彦鲁所拥有,在李彦鲁投附后梁后也未为后梁所直接管辖。

李彦鲁投附后梁后,岐王李茂贞遣大军围攻邠州,不胜而退,但秦岐政权保持了对庆州、衍州的领有。《资治通鉴》云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是岁,庆州叛附于岐,岐将李继陟据之。诏以左龙虎统军贺瑰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破岐兵,下宁、衍二州"④。后梁军虽然战胜秦岐军,重占宁州并进克衍州,但还是没有占领庆州,直至贞明三年(917年)。《旧五代史·贺瑰传》云:"贞明二年,庆州叛,为李继陟所据,瑰以本官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诸军都虞候,与张筠破泾、凤之众三万,下宁、衍二州。三年秋,庆州平。"⑤庆州被平定后,贞明三年(917年)十一月,后梁"以宁州刺史周武为武静军防御使,守庆州刺史"⑥。但从碑文所记贞明五年(919年)高万兴署官野利李延玉来看,延州镇应在贞元五年占据了庆州,因而得以任命庆州的武官。后梁将庆州让与高万兴很可能是为了笼络其牵制李茂贞,因为后梁当时的大敌乃是河东晋王李存勖。

---

①《旧五代史》卷八《梁书·末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9页。
②《旧五代史》卷九《梁书·末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4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均王贞明元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788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808页。
⑤《旧五代史》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4页。
⑥《旧五代史》卷九《梁书·末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2页。

从碑文来看，野利李延玉又被庆州鄜延制置使史宪任为三交川镇城使。从庆州鄜延制置使这一官称可知后梁确曾将庆州与鄜州镇、延州镇合为一路。三交川即三条河流汇合之处，此地名在泾州、河东都有。《太平寰宇记》记泾州灵台县有“三交川水，在县东南五里，亦名三香水，源从麟游县”①。《宋史·地理志》记晋宁军有“三交堡，地名三交川岭。元符元年，神泉砦筑堡毕工，赐名”②。泾州自唐末即隶属于李茂贞秦岐政权，直至李茂贞之子向后唐纳土，因此后梁设置的庆州鄜延制置使不可能在泾州灵台县的三交川设镇城使。河东的三交川岭亦不隶属于庆州鄜延制置使。野利李延玉所任官之三交川只能在庆州、鄜州或延州。《旧唐书·地理志》云鄜州有三川县，“以华池水、黑水、洛水三水会同，因名”③。但碑文明记为三交川，可见不是鄜州的三川县。从野利李延玉家族几乎终身任官于庆州来看，碑文中的三交川应在庆州地区。从现今的水文情况来看，庆阳有马莲河、蒲河、洪河、四郎河、葫芦河5条河流，较大的支流就有27条，河流主干道和支流汇合之处极多，不乏三条水流汇合之处。碑文中的三交川或为这些三条水流汇合之处中的一处。

镇城使也为镇将之一种。五代吴越国曾设此官。《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化州路儒学教授王君墓志铭》云：“王氏上世有仕吴越为镇城使者。”④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五代镇将管辖地域的镇，其幅员有十数华里以至数十华里，管内包括都市和乡村，镇将一般驻在都市并以它为治所。”⑤野利李延玉所任之三交川镇城使即体现了这一特点。

根据碑文，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史宪任命野利李延玉为西北路都指挥，都指挥即都指挥使。都指挥使一职设置于唐末，《玉海》卷一百三十九《兵制四·宋朝侍卫亲军·三衙》云：“当唐末，藩镇之兵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知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⑥早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齐克让就担任“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⑦。唐僖宗避难蜀中时，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二《关西道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4页。
②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38页。
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0页。
④ [元]黄溍著，王颋点校：《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⑤ [日]日野开三郎著，索介然译：《五代镇将考》，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9页。
⑥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1987年，第2584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35页。

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①。《事物纪原》云此为:"此名指挥使之始也。"②野利李延玉任西北路都指挥使,即为西北路诸军的总指挥官。路都指挥使还见于后蜀。《宋史》记后蜀后主孟昶曾以孟保正"为峡路都指挥制置使,屯夔州,以经画边事"③。

碑文云:"又于天成三年六月日奉庆州防御使牒,补充本路指挥□□于高家砦顺中□□□□□□□□永镇,□公边都指挥使。"可知野利李延玉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年)被庆州防御使任为本路都指挥使,镇守于高家寨等处。《旧五代史》记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十一月,"贝州刺史窦廷琬上言:请制置庆州青白两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万石。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以廷琬为使"④。庆州防御使的设立标志着庆州独立于庆州鄜延制置一路。在田廷琬据守庆州发动叛乱时,后唐"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周率兵讨平之,夷其族"⑤,庆州又重新隶属于静难军。

碑文云:"于八月日奉静难军节度使□太保、中书门下平章事毛牒,补充都度押衙。"可知野利李延玉被静难军节度使毛某任命为都押衙。此毛某即毛璋。《旧五代史》云天成元年(926年)五月,"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⑥。《毛璋墓志》记毛璋"又迁静难军节度使兼加使相,食邑七百户。爰从征伐,遂陟殊权,持斧钺之威,秉钧衡之令。严肃内外,峻若于秋霜;抚恤军民,煦同于春日"⑦。使相即碑文中的中书门下平章事。《毛璋墓志》题毛璋为"唐故特进检校太保"⑧,即碑文中的太保。据《资治通鉴》,毛璋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被命为静难军节度使,天成元年(926年)十月离开邠州,移镇潞州。碑文记野利李延玉于八月被毛璋任命为都押衙,应为天成元年(926年)之八月。都押衙为藩镇使府高级武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⑨日本学者渡边孝认为都押衙为藩镇"军事、行政部门的总务部长"⑩。根据碑文,在毛璋离任后的天成某年十二月,野利李延玉又被继任的静难军节度使授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等检校官及宪衔。

---

①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5页。
② [宋]高承著,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一〇《军伍名额部·指挥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7页。
③ 《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85页。
④ 《旧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30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七四《窦廷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73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三六《唐书·明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96页。
⑦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13页。
⑧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12页。
⑨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戊辰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50页。
⑩ 渡边孝:《唐·五代の藩镇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社会文化史学》第30号,1993年,第111页。

第二节　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节度使称号之政治内涵

一、定难军节度使之封爵

据《新唐书·党项传》，拓跋思恭在黄巢之乱平定后被唐廷封为夏国公。唐制国公从一品。拓跋思恭亲信白敬立之墓志云："公以祖、父箕裘继常，为故夏州节度使、朔方王信用于门下。"[①]《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内殿承制、合门祗候李继元，表述其祖保大定难节度使、朔方郡王拓拔思恭仕唐，剪灭黄巢，赐姓"[②]。可见拓跋思恭又被封为朔方郡王，唐制郡王从一品。白敬立逝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其墓志刻于乾宁二年（895年），则拓跋思恭受封郡王应在景福二年之前。《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云："至广明年及中和岁，故两镇令公王斯本贯，荣耀乡间。"[③]"两镇令公"即拓跋思恭，前文已考。志文记拓跋思恭于唐僖宗广明年间至中和年间，以王爵荣耀于夏州，则拓跋思恭当在被封夏国公后不久即晋为朔方郡王。从《刘敬瑭墓志》所记来看，拓跋思恭被封朔方郡王在夏州轰动一时，因为拓跋思恭可以说是夏州设立节镇以来，第一位本籍为夏州的节度使被封王。此项殊荣对于党项拓跋氏来说也意义重大，因为拓跋思恭也是党项拓跋氏被中原王朝封王之第一人。

拓跋思恭之后的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李成庆、李彝昌都没有封王，直至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仁福被后梁末帝朱友贞封为陇西郡王。朱友贞本为后梁均王，在郢王朱友珪弑朱温即位后，发动政变诛杀朱友珪，随即称帝。朱友贞称帝后进封群臣。《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上》云乾化三年（913年）三月"庚戌，以天雄军节度使、充潞州行营都招讨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弘农郡王杨师厚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进封邺王。壬戌，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进封陇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义军留后、检校太保戴思远为检校太傅，充邢州节度使。庚午，以镇东军节度副使、充两浙西面都指挥使、行睦州刺史马绰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领秦州雄武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④]在进封的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11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④ 《旧五代史》卷八《梁书·末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6页。

四人中，杨师厚、戴思远均为梁太祖朱温旧将，且杨师厚力助朱友贞发动政变，李仁福乃奉后梁为正朔的强藩，马绰为吴越国大将。在此四人中，只有杨师厚和李仁福被朱友贞封王，对李仁福的封赏紧随杨师厚之后，排于戴思远之前，足见后梁朝廷对于李仁福的重视。

定难军与后梁发生政治联系时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本年朱全忠率大军于凤翔攻围李茂贞，“三年，茂贞山南诸州尽为王建所陷，泾、原、秦、陇、邠、鄜、延、夏皆降于汴”①。由于李茂贞为定难军在关内最大的敌人，定难军在朱全忠入关后立即依附朱全忠。为消灭定难军以扫除朱全忠在关内的势力，天佑三年(906年)，李茂贞假子静难军节度使李继徽率静难、凤翔、保塞、彰义、保大诸镇兵大举进攻定难军，朱全忠以大将刘知俊、康怀英等领军赴援，双方在美原大战，李继徽大败。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李茂贞又与晋王李存勖所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等合军攻围定难军，在李仁福紧急求援下，“朱全忠亲自率军至陕州指挥，他命大将杨师厚、康怀英率军三万进驻三原，又命梁将李遇从鄜州、延州方向向夏州挺进，岐晋联军见势遂解围而去”②。在朱友贞即位时，李茂贞与李存勖遥相呼应，欲合力颠覆后梁，后梁由于连续发生政变而实力大损。因此后梁朝廷为了巩固定难军这一盟友，在关内震慑李茂贞，将李仁福封为陇西郡王，待以殊荣。

后唐同光元年(924年)十一月，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同光二年(925年)二月，李存勖大封从驾灭梁功臣。对于奉后梁为正朔的割据势力，李存勖于三月先后进封荆南高季兴，鄜延高万兴，于四月进封楚国马殷，最后于四月底才“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③，与李仁福同日进封的还有朔方军节度使韩洙。从进封顺序来看，李仁福位于最后，无疑被视为较为顽固的忠梁势力。李仁福逝后，子李彝超嗣立，但不被后唐承认，后唐明宗欲将李彝超移镇于延州，在李彝超不从后遣大军攻围夏州。在攻城战爆发后，“辛丑，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④。后唐在战争爆发后追封李仁福为虢王实际上为一种政治策略，旨在笼络李彝超，软化其抗拒之心。虢王为一字国王，出土于统万城的《毛汶墓志》《刘敬瑭墓志》《何德璘墓志》均称李仁福为虢国王。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39页。
② 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页。
④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5页。

李彝超逝后，弟李彝殷嗣立。广顺元年(951年)郭威代后汉自立，建后周，大封群臣。受封的割据势力仅有定难军李彝殷及荆南高保融，且李彝殷位在高保融之前，史载“夏州节度使李彝兴进封陇西郡王，荆南高保融进封渤海郡王”①。显德元年(954年)郭威于正月“庚辰，制皇子开封尹、晋王荣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行开封尹、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襄州安审琦进封陈王；郓州符彦卿进封卫王，移镇天雄军；荆南高保融进封南平王；夏州李彝兴进封西平王”②。李彝兴与郭威的继承人柴荣、后周重臣安审琦、符彦卿同日封王，可见郭威对李彝兴极为重视。李彝兴受封之西平王为二字国王。李彝兴逝后，宋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③。夏王为国王，宋制正一品。

李彝殷之后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李继捧均没有从北宋获得王爵。李光睿封爵据其墓志可知先为陇西县开国子，后为陇西郡开国公。宋制开国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户。开国公为从一品，食邑三百户，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为陇西郡开国公时“食邑三百户，食实封八百户”④。李继筠封爵据其墓志为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⑤。李继捧的封爵据《咸平集》为天水郡开国公，是在他入朝献地后所获，在他被宋太宗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后仍然保留。李光睿、李继筠、李继捧没有从北宋获得王爵一方面说明定难军入宋以后地位下降，一方面表明定难军已成为北宋统一北方的阻碍，从天无二日的正统性出发，北宋不再对定难军李氏赐以王爵。

李继捧入朝献地后，由于李继迁在夏州掀起反宋大旗，宋太宗以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返回夏州围剿李继迁。李继捧回到夏州后，为恢复定难军的独立地位，投靠辽朝。《辽史·圣宗纪》记辽圣宗统和九年(991年)“冬十月丁丑，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⑥。李继捧接受辽朝王爵表明定难军开始臣属辽朝，此前李继迁已被辽封为夏国王。《辽史·圣宗纪》云统和八年(990年)十二月“庚戌，遣使封李继迁为夏国王”⑦。“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西夏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这可以算是辽朝对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63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太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01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3页。
④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页。
⑦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页。

西夏政治集团分而治之的一个例子。"[①]在李继捧被宋军擒拿送京后,辽朝又于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己卯,封夏国王李继迁为西平王"[②]。李继迁对辽朝所封西平王极为重视,宋真宗即位后,宋廷虽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但李继迁仍然在其境内自称西平王。宋臣田锡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上疏谈道:"昨李继迁虽授夏州节度使,在彼自称西平王,岂不为将来边患。"[③]宋臣张齐贤对辽朝封李继迁为西平王的政治意图十分清楚,他指出:"朝廷于迁贼之恩,可谓厚矣。殊不知契丹虑迁贼感大国之恩,断右臂之势,防患所切,其谋甚深,署王爵以赐之,遣戎使以镇之。王爵至则旌节之命轻矣,我之命适所以资之也,戎使至则动静皆伺之,向背之心异矣,我使往适所以坚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虚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损哉。"[④]辽以王爵封赐李继迁,使宋廷所赐定难军节度使一官相形见绌,王爵使李继迁政治地位提高,而对辽来说既没有因赐爵而授予李继迁封地,亦没有使李继迁享受辽朝俸禄,因此对辽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会使李继迁感恩戴德,在军事上积极牵制北宋。宋真宗亦指出:"顷者,契丹伪封继迁为西平王,虽戎狄之命不足此数,然遽加以王爵,盖虚名也。"[⑤]

李德明即位后,辽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封其为西平王。宋夏之间达成景德合约。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北宋"以赵德明为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如内地"[⑥]。北宋封李德明为西平王是为了争取李德明臣宋,恢复边境和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甲午,张崇贵自延州入奏,诏谕以继迁昔时变诈之状,今当使德明自为誓约,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境之上有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则授德明以定难节度使、西平主,赐金帛缗钱四万贯匹两、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使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之禁,凡五事"[⑦]。李德明虽然没有全部满足北宋提出的条件,但北宋为了早日获得和平,仍然封李德明为西平王。西平王本为辽朝封爵,但北宋在封赐时没有改变这一爵名,表明北宋已承认西夏的两属地位,同时通过正式册封宣扬本国也具有赐爵李德明的政治权利。《赵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云:"利用建侯。外监方国。抚宁陬落。临长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勋贤而弗授。故定难军节度使

① 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②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宋真宗咸平六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2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宋真宗咸平四年十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7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宋真宗咸平六年二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1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宋真宗景德三年十月庚午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28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宋真宗景德二年六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7页。

赵保吉男德明。袭其令绪。蔚有长才。举宗联命氏之荣。奕世荷殿邦之寄。务尊王室。动守朝经。率职献琛。拜章请吏。眷言恭顺。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将之旌旗。锡真王之印绶。缵乃旧服。镇于夏台。”[①]从制文来看，北宋封李德明为西平王首先在于李德明乃李继迁之子，李继迁曾被赐北宋皇姓，因此李德明也顺继拥有了北宋皇族这样的拟血缘身份，这种身份是李德明封王的合法依据；加之李德明恭奉皇室，恪尽臣职，因此北宋才不惜名器，以王爵来羁縻李德明。

制文强调李德明被封之西平王乃真王，《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也强调李德明为真王。龚延明先生指出宋代“国王称真王，以别于郡王”[②]。山崎觉士先生认为：“‘真王’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史记》卷九二的淮阴侯传，但那是没有封土只有爵号的‘假王’。”[③]换言之，既有爵号又有封土的王才能被称为真王。李德明所领之定难军历来为中原王朝的藩镇，定难军的疆土也被中原王朝视为边疆王土，因此制文声称李德明为真王是在强调李德明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北宋，李德明只是在代宋廷治理定难军这一边疆王土，同时也反衬了辽朝所封王爵为伪，因为定难军在历史上既不从属于辽，其疆域也非辽朝所有，只有北宋才具有册封李德明为王的政治资格。

辽朝为了延续辽夏间的政治隶属关系，使李德明不完全倒向北宋，于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④]。宋仁宗于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谒太庙、大赦、改元后，“定难节度使、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西平王赵德明封夏王”[⑤]。北宋的夏王也为国王，可见北宋一直在与辽朝争夺对李德明的册封权。

李元昊即位后，辽朝封其为夏国王，这与先封其父为西平王再晋为夏国王不同，主要因为李元昊在即位之前已娶辽兴平公主，因此辽朝对其超授。北宋则以李元昊为西平王。

二、定难军节度使之本官

定难军节度使本官全称为定难军节度使、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

①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页。
② 龚延明：《宋代职官志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页。
③ [日]山崎觉士：《吴越国王与“真王”含义——五代十国的中华秩序》，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④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2页。

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之前的定难军,在前任节度使卸任或逝世后,新任节度使往往先自任为权知军州事,再由朝廷正式拜为节度使。《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云:"既克绍于门风,爰委用于旧土。未行真命,且假剧权。士心咸感于惠和,封部果臻于宁肃。既符试可,须议与能。方当殄寇之时,将用正名之典。我之异渥,实为吁谟。"[①]从"未行真命,且假剧权""方当殄寇之时,将用正名之典"来看,李成庆先为在被唐廷授为定难军节度使时,任权知军州事。权知军州事是一种差遣性质的州长官。陈志坚先生认为唐后期的权知军州事"有两重含义:知州事和知军事。此名可能首先出现在节度使所驻州。因为节度使都例兼会府州刺史,统领军政。所以当节度使不在会府时,军务由兵马留后负责,而州府事务则应由知州事负责""唐后期,方镇会府州的权知军州事的地位类似原来的留后一职、往往用于对指定继任者的任命上"[②]。因此李成庆以权知军州事而任定难军节度使是晚唐以来藩镇权力继承的一般模式。

进入五代后,定难军继续采取这一权力继承模式。《旧五代史·李仁福传》记李仁福逝后,子李彝超"矫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真命"[③]。《册府元龟》亦记"周李仁福为夏州节度使,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三月,遣押衙贾师温奏事,称疾甚,以次子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正命"[④]。由于后唐反对定难军父死子继,强迫李彝超移镇,双方发生战争。定难军获胜后,后唐被迫于长兴四年(933年)十月"壬戌,以权知夏州事、检校司空李彝超为夏州节度使、检校司徒"[⑤]。《资治通鉴》亦云:"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充使。"[⑥]虽然后唐被迫以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但仍然遵循了任命权知军州事为节镇藩帅这一政治规则。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逝世前,"以兄行军司马彝殷权知军州事;彝超寻卒。以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⑦]。

北宋立国后,定难军仍然沿袭此权力继承模式。李彝殷逝世时,"以其子行军司马光睿权知州事。"[⑧]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戊辰,以权知夏州李光睿为定难

①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330页。
②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③《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7页。
④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四三九《将帅部·要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953页。
⑤《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8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90页。
⑦《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后唐潞州清泰二年二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128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干德五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6页。

节度使”[①]。《宋史·夏国传》亦载“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讳改‘光’为‘克’。彝兴之卒，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卒后，“其子衙内指挥使继筠权知州事。乙巳，以继筠为定难留后”[②]。《宋史·夏国传》亦载李继筠于“克睿卒，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③]。《李继筠墓志》云：“无何，故侍中疾殛。以边藩任重，军府事繁。简署权知奏章，俞允。”[④]可知李光睿在逝前任命李继筠为权知军州事。李继筠卒后，弟李继捧嗣立。李继捧在被宋廷任为定难军留后前，也曾担任权知军州事。《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诸子中，“次曰继捧，见权知夏州军府事”[⑤]。

李继迁叛宋后，定难军以权知军州事获得朝廷节钺的权力继承模式被打破。李继迁在宋太宗时官拜银州观察使，宋真宗即位后直接以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大诏令集》即存有《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可见李继迁越过权知军州事直接担任定难军节度使。此后李德明、李元昊继任定难军节度使时，也都没有担任过权知军州事。这说明李继迁至李元昊称帝前的定难军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藩镇，而是具有藩镇名号的独立王国。

在定难军历史上，虽然新任节度使往往先自任或被前任节度使委任为权知军州事，但在向朝廷请求节钺时，通常称自己为本军所立。《资治通鉴》记：“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卒；甲戌，其子彝昌自为留后。”[⑥]《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二年，思谏卒，三军立其子彝昌为留后，寻起复，正授旄钺。”“三年春，牙将高宗益等作乱，彝昌遇害，时仁福为蕃部指挥使，本州岛军吏迎立仁福为帅。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检校司空，充定难军节度使。”[⑦]《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十》云：“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奏，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称留后。”[⑧]《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则记李彝超于“仁福卒，三军立为帅”[⑨]。《资治通鉴》亦记“戊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庚申，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⑩]。在崇尚武力的藩镇时代，军队是各个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十二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7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3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3页。
④ 陈玮：《北宋定难军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706页。
⑦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⑧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3页。
⑨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7页。
⑩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二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2页。

藩镇的支柱，在藩镇权力嬗替时也代表着本镇的民心所向。因此定难军新任节度使向朝廷声称自己为本军所立，既是一种政治姿态，表明本镇军队是支持自己向朝廷请求节钺的坚强后盾，也表明自己继立是顺应了民意，这种民意是其向朝廷请求节钺的合法性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逝世。本年六月，宋廷以李光睿子为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自唐中期以来，“具有相当独立性的藩镇，其节度使往往由本镇拥立，先在境内自称节度留后，继而向朝廷派遣使者，邀求旌节，获得正式的节度使任命”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节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后事，其后遂以节度留后为称。”②入宋以后仍然存此官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十三《承宣使》云：“唐中世以后，节度使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台’。本朝沿唐制，方镇有节度观察留后。”③李继筠所任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为北宋正任武阶官，在武臣正任官六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节度使。北宋授予李继筠节度观察留后，而不任其为节度使，一方面是因为李继筠年龄尚轻，但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个政治信号，即北宋有意降低定难军李氏的政治地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五月，陈洪进、钱倜先后纳土归朝，北宋正式统一南方，至此只有北方的北汉没有降服。定难军虽然名为臣属北宋的藩镇，但实为独立王国，因此北宋欲统一北方，除了在军事上降服北汉外，还须使定难军主动归朝。恰在此时李光睿逝世，继任的李继筠仅为弱冠之年，为了削弱定难军的独立性，宋廷便降低了李继筠的官阶。即使如此，定难军内部仍视李继筠为正任节度使。《李继筠墓志》云：“绍彼高旌，付兹长嫡。”④可见李继筠仍持节度使旌节。李继筠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逝世后，其弟李继捧自为权知军州事，但迟至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一月宋廷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后。《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以夏州衙内指挥使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后。”⑤北宋对继立的李继捧继续授以留后，无疑是延续了之前对付李继筠的政治策略。但李继捧在自任权知军州事之后近一年半才被北宋授以留后，表明北宋已非常不愿意再让定难军保持独立地位，因为在太平兴国四年（980年）五月，北宋已攻灭北汉，定难军成为北宋统一北方的最后障碍。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

①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六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88页。
③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第236页。
④ 陈玮：《北宋定难军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0页。

捧在内部诸叔反对其嗣立，外部北宋已混一南北的巨大压力下奉土归朝。李继捧归朝后，曾从宋太宗在含芳园游赏，同时随从的还有北汉刘继元、后蜀孟玄珏、吴越钱惟浚。大臣宋琪奏言："继元以下，各江南塞北之人，尝各据土疆，累世不宾，今并束身归命入侍。旒扆非神功圣德，冠绝千古，岂有如此之盛乎？"[①]从随从人的身份和宋琪的奏言来看，北宋朝廷是将李继捧所代表的定难军视为割据势力的。宋人甚至称定难军为一国。《文恭集》云："未几，夏帅继捧挈河右之图，举国内属。朝廷授以崇信节制。"[②]北宋初年编纂的《旧五代史》亦将定难军李仁福列入《世袭列传》，与荆南高季兴、楚国马殷、吴越钱镠并列。这些都说明五代宋初的定难军虽然拥有藩镇名号，但实质上为一独立割据政权。

在藩镇时代，节度使旌节作为节度使权力的物化象征，对构建节度使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朝廷赐予节度使旌节，表明朝廷将对藩镇的政治统治权分割与节度使，节度使遂成为代朝廷统治藩镇的合法代表。定难军节度使极为重视本镇旌节。《李光睿墓志》云："兴嗣赏劳，国之盛典。公自军列陟将坛，释纕服以继弓裘，舍哀杖而持节钺，虽当仁不让，而受宠若惊，深增惕砺之怀，用副倚毗之念。"[③]可见李光睿在接受旌节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在这种代表权力传继的政治仪式中，李光睿接受旌节即表明本人继承了前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的权力。在接受旌节之前，宋太祖已降制授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光睿接受旌节更为合法。"虽当仁不让，而受宠若惊"表明李光睿执掌节度使旌节在定难军内部有其合法性，因为李光睿本人为前任节度使李彝殷之子，又被李彝殷指定为本镇储帅，但在接受旌节时仍然需要朝廷的许可，显示了定难军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但独立性极强的政治特性。

定难军节度使为保护旌节，还专设一军。《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记刘敬瑭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改补门枪节院军使"[④]。节院可代指节度使官署。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诗云："节院收衙队，球场簇看车。"[⑤]但《新唐书·百官志》云节度使辖境内州县设有节楼。当其罢秩时"锁节楼、节堂，以节院使主之"[⑥]。

---

①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5页。

② [宋]胡宿撰：《文恭集》卷三六《志铭·宋故左龙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88册，第930页。

③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⑤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97页。

⑥《新唐书》卷四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0页。

可见节院应为藩镇中一职司。冯培红先生认为:“唐五代藩镇时期,节度使所辖管内诸州县筑有节楼、节堂,设立节院,以迎接新任节度使的旌节,属于藩镇节度使礼仪制度的内容之一。”[①]他更指出:“节院的长官称节院使,又作节院将,或因节度使掌管军事而称节院军使。”[②]敦煌文书 P.2482《阎海员邈真赞并序》即记阎海员职衔为“归义军节度左班首都头知节院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③]。因此刘敬瑭所任门枪节院军使为定难军保护本镇节度使旌节的部队的指挥官。

在定难军内部,旌节形塑了节度使李氏家族的尊贵地位。在李氏家族成员的墓志中,旌节不断被提及,以此炫耀家族成员的尊贵身份。《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辞云:“龙旌虎节,玉乘金昆。貂蝉满座,将相盈轩。乃文乃武,令子令孙。其三。祖列双旌,夫荣五马。分叶于尧,霸基于夏。”[④]

李继捧入朝献地后,定难军节度使的旌节也随之缴纳宋廷。《封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制》即云李继捧,“顷者抗章象魏,来献提封。愿宿卫于京师,寻载移于旄节,屡迁近镇,益见勤王”[⑤]。代表定难军李氏最高权力的节度使旌节一旦离开定难军辖境,即标志着定难军世袭五州的霸业走向衰亡。宋太宗以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回镇夏州,同时将旌节再次授予。由于此前李继捧已经归顺宋廷,宋廷视再赐李继捧节度使旌节为无上殊荣。《李继捧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京城仍赐姓名赵保忠制》云:“朕含容待遇,恩礼有加,大旆双旌,屡委十连之任;解衣推食,亟承三接之恩。既换高牙,俾还旧地;兼佩相印,仍齿宗盟。赐予殊常,宠荣备极。”[⑥]李继捧因再次被赐旌节而获得北宋分割的专制夏州的政治权力。《钱惟治孙承佑李继捧加恩制端拱□年郊恩》云:“具官李继捧。金方禀锐。玉塞知名。大旆高牙。不坠弓裘之业。”[⑦]“高牙”即旌节,在制文中旌节成为北宋赐予李继捧的政治权力的物化象征。

---

① 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军使考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8 页。

②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70 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51 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51 页。

⑤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589 页。

⑥ [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一《辞命》,合肥:黄山书社,2004 年,第 69 页。

⑦ 《宋大诏令集》卷一〇三《武臣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82 页。

宋真宗即位后，以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但没有赐赐予李继迁节度使旌节。《续资治通鉴长编》云至道三年（997年）十二月“甲辰，以银州观察使赵保吉为定难节度使，遣内侍右班都知张崇贵赍诏赐之”①。《宋史·张崇贵传》亦云：“及是，保吉复修贡，诏以定难节度授之，命崇贵持诏命、衣带、器币以赐。”②宋廷虽然没有赐予李继迁旌节，但派遣官阶正六品的宦官持诏拜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仍显示了宋廷对李继迁的重视，因为在此之前中原王朝通常只派一般的使者授予新任定难军节度使官告，如《李继筠墓志》云北宋“于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内降驵骑赍到官告一通、敕牒一道，授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③。景德合约达成后，李德明被宋廷封为定难军节度使，重获旌节。北宋十分重视对李德明的旌节授予，景德三年（1003年）十月“丁丑，以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为赵德明旌节官告使，太常博士赵湘副之”④。李元昊继任后，宋廷亦遣旌节官告使。《续资治通鉴长编》云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癸巳，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员外郎、判开拆司杨告为旌节官告使，礼宾副使朱允中副之”⑤。李德明、李元昊既接受宋廷赐予的节度使旌节，说明他们已认可北宋为中央朝廷，定难军为此中央朝廷之下的藩镇，他们的政治权力也是被北宋所赐予的。因此在李元昊称帝后，为了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于本族为北魏拓跋氏的高贵血统，诸羌及周边各族各国的民意推举，否认权力来自于北宋朝廷的赐予，便将节度使旌节奉还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元昊复遣贺九言赍嫚书，纳旌节，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归娘族而去”⑥。

北宋以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一直将定难军视为隶属于本朝的藩镇。宋廷认为李德明首先是定难军节度使，其次才是西平王、夏王。李德明是以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而获得王爵的。《赵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云：“是用建上将之旌旗。锡真王之印绶。缵乃旧服。镇于夏台。”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景德三年（1006年）“冬十月庚午朔，以赵德明为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如内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太宗至道三年十二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96页。
② 《宋史》卷四六六《张崇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18页。
③ 陈玮：《北宋定难军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真宗景德三年十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2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4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仁宗宝元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49页。
⑦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页。

地”[①]。《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云:“而自赍坛受钺。赐履抚绥。委其外御之权。宠以真王之爵。”[②]在各种制文和史籍中,李德明的官爵都是定难军节度使在前,王爵在后,如《西平王赵德明加恩制郊祀毕》记有“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西平王、食邑一万八千户、食实封五千八百户赵德明”[③]。李元昊即位后,宋廷仍然坚持李元昊首先是定难军节度使,其次才是西平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癸巳,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④]。宋廷之所以强调李德明、李元昊的官爵首先是定难军节度使,其次是西平王,正是为了表现定难军是北宋治下的藩镇,而不是一个独立王国。

辽朝最初也认为定难军是一藩镇。《辽史·圣宗本纪》云统和四年(986年)四月“癸卯,西夏李继迁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⑤]。此后至统和八年、九年(990—991年)辽才先后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西平王。但李德明即位后,辽朝没有继续拜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直接封其为西平王。辽朝在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又将李德明晋为夏国王。《辽史·圣宗本纪》云本年“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⑥]。《宋史·夏国传》亦载:“五年,辽复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⑦]玉册金印为历代天子所专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唐庄宗入洛,镠遣使贡献,求玉册。庄宗下其议于有司,群臣皆以谓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韬尤为不可,既而许之,乃赐镠玉册金印。”[⑧]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又赐以玉册金印,说明辽已视李德明所统之定难军为一独立政权,而不是一藩镇,辽赋予了定难军作为独立政权的政治资格。李元昊即位后,辽仍封其为夏国王而不拜以定难军节度使。辽曾对北宋声称:“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国主,仍许自置官属,至元昊亦容袭爵。”[⑨]直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才决定对元昊“当行封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真宗景德三年十月庚午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28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4页。
⑤ 《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页。
⑥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2页。
⑧ 《新五代史》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0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仁宗庆历三年七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08页。

册为夏国主，赐诏不名，许自置官属”[①]。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北宋与西夏达成合约后，正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册以漆书竹简，凡二十四，长尺一寸，褾用‘天下乐’晕锦。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龟钮锦绶”[②]。与辽以玉册金印赐予李德明不同，北宋以竹册、银印赐予李元昊，表明北宋仍视西夏为服属本朝的诸侯。

虽然北宋认为李德明之定难军为一藩镇，李德明为藩镇节帅，但李德明在其辖境已自居为王者。《儒林公议》记李德明“其号令、部署、宫室、旌旗一拟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輦始出，饯馆已，更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③]。李元昊自称辖境为一国，他在接受宋廷所赐定难军节度使官职时，对属下谈道：“先皇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④]李元昊在称帝前“车服僭窃”，对北宋使臣“虽相见之初，暂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后，便具帝者之仪”[⑤]。最后为了彻底摆脱作为北宋藩镇的政治地位，李元昊筑坛称帝，向北宋奉还定难军节度使旌节。

李德明虽然在辖境内以王者自居，但在对北宋的外交活动中，仍然以藩镇的面目示人。李德明派往北宋的使臣多具有定难军武职军将的官衔，或被称为衙校。《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有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夏州赵德明遣牙将王旻奉表归款”[⑥]；九月“癸丑，赵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马使白文寿来贡”[⑦]；十二月，“赵德明又遣其教练使郝贵来贡”[⑧]。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赵德明遣其兵马使贺永珍来贡马。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马使贺守文来贡”[⑨]；六月，“赵德明复遣左都押衙贺永正等来贺”[⑩]。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赵德明遣牙吏贡马五百、橐驼二百，谢给俸廪”[⑪]。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月，“赵德明遣牙校刘仁勖贡马二十匹”[⑫]。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二月，“赵德明使都知兵马使白文美来告东南蕃部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62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9页。
③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④ 《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仁宗宝元二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26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真宗景德二年六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5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真宗景德二年九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64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真宗景德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80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98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真宗景德三年六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5页。
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真宗景德四年三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48页。
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22页。

多逃入汉界者”①。《宋会要辑稿·礼四五》记有“诏甘州、交州进奉使副，夏州进奉教练使，并令赴崇德殿宴。甘州、交州使升朵殿坐，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座”②。都知兵马使、教练使、左都押衙等都是唐以来即存在的藩镇武职军将官衔，李德明的使臣以此官衔出使北宋表明李德明接纳了北宋对其政权的政治定位，但这种接纳是有条件的，即李德明政权只在外交场合表现为隶属于北宋的藩镇，作为北宋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五代以来，中原王朝还以起复制度来规范朝廷与定难军节度使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逝世后，“三军立其子彝昌为留后，寻起复，正授旄钺”③。由此可见定难军新任节度使必须在经过朝廷起复后，才能获得旌节，起复在定难军上层的权力继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吴丽娛先生指出：“唐五代后期，令官员终止的起复往往仍常常被作为一种殊荣。”④“朝廷对节度使的‘起复’固然是谋求稳定和对藩镇加以笼络的一项政策，却也是藩镇和节度使一再坚持的结果。”⑤“所谓起复，常常因朝廷屈从藩镇压力。配合上述吊祭使的派遣，也成为朝廷安抚、平衡藩镇势力的一种手段。”⑥在长兴四年之战前后，后唐对李彝超两次授予起复官。《册府元龟》记：“十月壬戌，制权知夏州事、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李彝超，可依前起复检校司空、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等州押蕃落等使。”⑦后唐对李彝超的第一次起复，仅授予其云麾将军、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都是没有实职的武散官、检校官、宪衔及勋官；但第二次起复授予其定难军节度使，赋予了李彝超节制夏、银、绥、宥四州的最高统治权。第二次起复的原因就在于定难军在长兴四年之战中战胜后唐。

北宋对新继任的定难军节度使仍实行起复。《李光睿墓志》云：“无何，大宋乾德五年，西平王遐龄不享，大限告终，河朔之间，人民乏主。高祖知公素怀贞节，夙抱纯诚，智善安边，谋能却敌。况夏台高地，秦土余封，非公果毅英明，莫能制也，特授公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藩落等使，起复云麾将军、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真宗景德二年六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36页。
②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19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④ 吴丽娛：《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05页。
⑤ 吴丽娛：《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06页。
⑥ 吴丽娛：《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07页。
⑦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七八《帝王部·姑息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982页。

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①]李光睿通过起复获得了武散官、环卫官、检校官、定难军会府州刺史、宪衔、勋官、封爵及食邑。李光睿“以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薨于私地”[②]，继任者李继筠仅仅过了一个月就被宋廷起复。《李继筠墓志》云：“于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内降驺骑赍到官告一通、敕牒一道，授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遄加服命之恩，并示夺情之宠。”[③]李继筠服丧一个月就被起复可以说是宋廷特殊的恩典。

宋廷拜李德明、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对其实行严格的起复、落起复制度。罗小红女士指出唐代“武官起复时，在其官衔上往往挂有‘起复’二字，待其终制后再‘落起复’”[④]。五代、宋沿用此项制度。宋廷对李德明、李继迁起复、落起复，主要是针对其服母丧。《宋史·夏国传》云李德明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复镇军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以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德明以乐迎至柩前，明日释服，涕泣对使者自陈感恩”[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戊子，赵德明落起复”[⑥]。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春，李德明“丁继立母忧，除起复如前制，以屯田员外郎上官佖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阁门祗候常希古为致祭使”[⑦]。天禧五年（1021年）五月，“赵德明落起复，遣人内都知蓝继宗为官告使往赐之”[⑧]。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母卫慕氏逝后，宋廷“诏起复镇军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以内殿崇班、合门祗候王中庸为致祭使，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郭劝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己酉，西平王赵元昊落起复”[⑩]。

李德明、李元昊获得的起复官都是高阶的武散官和环卫官，从起复到落起复的时间均为两年。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对于具有藩镇名号，实为独立政权的割据

①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罗小红：《唐代家礼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0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六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10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1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47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04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12页。。

势力的统治者都实行起复、落起复，从起复到落起复一般为两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五月，“壬戌，以权知凤翔军府事、泾州节度使李从曮为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①。李从曮于天成元年(926年)五月，“制落起复，加检校太师”②。天成四年(929年)九月“甲申，以前荆南行军司马、检校太傅高从诲起复，授检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③。长兴二年(931年)高从诲“落起复，加兼中书令”④。李德明、李元昊从起复到落起复也为两年，可见宋廷是以藩镇的标准来执行对李德明、李元昊的起复、落起复，说明在李元昊称帝前宋廷一直视定难军为一隶属于中央的藩镇。辽对李德明也实行起复，但是以藩王的标准来起复的。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吊祭。甲戌，遣使起复”⑤。

北宋还通过控制、改动李继迁、李德明的官职名称来限制李继迁、李德明权力的扩大。李继迁在攻占灵州后，宋廷一直不承认定难军对灵州的占有。宋真宗即位后，以李继迁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静等州观察使置押蕃落等使”⑥，但此官职与灵州并无任何关系。辽圣宗却于统和十八年(1000年)“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继迁子德昭朔方军节度使”⑦。朔方军为灵州军号，自唐以来即长期为灵州藩镇使用，辽授李德明为朔方军节度使表明辽承认灵州归属李继迁的定难军政权。李德明在与北宋议和时，宋廷坚持定难军归还灵州，在李德明不从后，仅授其“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⑧，此官职亦与灵州无关，可见宋廷仍坚持对灵州的政治领属权。李元昊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后，宋廷在对其封官拜爵时仍坚持不将灵州或朔方军纳入其官职名中。在对李继迁、李德明本官中的押蕃落使一职的限制上，宋辽则保持了一致。《宋史·石普传》记石普任鄜延副都部署时，“赵德明纳款，诏降制命，普

① 《旧五代史》卷三二《唐书·庄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6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1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52页。
④ 《旧五代史》卷四二《唐书·明宗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75页。
⑤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3页。
⑥ 《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5页。
⑦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页。
⑧ 《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总制属羌，则强横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内蕃落使”[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鄜延副都部署石普言，夏州请盟，朝廷加以恩制，望不授押蕃落使。上曰：是蕃部旧职，不可去也。然普意亦有可采，宜令止兼管内押蕃落使。”[②]辽则对李继迁授以管内蕃落使，《辽史·百官志》记“夏州管内蕃落使。圣宗统和四年置，授李继迁”[③]。宋、辽对李继迁、李德明本官中的押蕃落使都冠以管内，表明宋、辽都欲限制定难军节度使对党项羌的统治权，因为在宋、辽境内都居住有大量的党项羌。李继迁、李德明如果只任管内蕃落使，则只能名义上统治定难军属境内的党项羌人，而不能争夺宋、辽境内的党项羌人。

三、定难军节度使之检校官、兼官、文散官、功臣号、食邑、赠官

自唐末至五代，定难军节度使的检校官多为检校三师、三公。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据《新唐书·党项传》，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被授予检校司空。拓跋思谏继任节度使后任检校司徒。《旧五代史·李仁福传》记“梁开平元年，授思谏检校太尉、兼待中”[④]。可见拓跋思谏在后梁开国时从前唐的检校司徒升为检校太尉。《春明退朝录》卷下云：“太尉旧在三师之下，繇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⑤]可见太尉一官极为尊崇，不轻易为朝廷所除拜，检校太尉亦是如此。张国刚先生即指出：“唐代宰相带三师三公之职，以上公（即太尉）为最重。太尉的地位本在三师之下，可是由于唐末五代重武之风日炽，太尉这个历史上的武官称号竟然超迈于傅、保之上，一般功臣可以加太傅、太保而不能随便授太尉，只有太师的地位还略在其上。”[⑥]宋承唐、五代制，三师三公“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亦如之”[⑦]。龚延明先生认为：“三公官司徒不迁太尉，而越次升迁三师官太保，究其原因，缘唐初秦王李世民曾兼太尉，故其后重惜其名，多不敢拜太尉，始有超拜太保、太傅之例。五代沿用不废。”[⑧]拓跋思谏以检

① 《宋史》卷三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74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真宗景德三年九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25页。
③ 《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2页。
④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⑤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⑥ 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⑦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28页。
⑧ 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页。

校司徒而为检校太尉，与从司徒升太保、太傅升太尉的惯例不符，无疑为超授，显示了后梁对拓跋思谏的重视。

李仁福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被三军拥立为帅后，“梁祖降制授仁福检校司空，充定难军节度使”①。开平四年（910年），岐王李茂贞与晋王李存勖所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等合军攻围定难军，李仁福顽强坚守一月有余，“梁援军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②。李仁福从检校司空越过检校司徒升为检校太保，主要是因为其坚守夏州，为后梁打击了敌对势力岐王李茂贞与晋王李存勖。后梁末帝时，李仁福又自检校太保升至检校太师，亦为超授，乃后梁末帝登基后的政治笼络。后唐灭后梁后，仍然以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表现了后唐对前梁势力的安抚。

李彝超在长兴四年之战前为检校司空，战后后唐承认李彝超为新任定难军节度使，将其升为检校司徒。《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十》云：“壬戌，以权知夏州事、检校司空李彝超为夏州节度使、检校司徒。”③李彝超母《渎氏墓志》云：“彝超，故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④可见李彝超又从检校司徒越过检校太保升为检校太傅。李彝殷任定难军节度使时，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其检校官主要从后晋获得。《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李彝殷于“晋天福初，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检校太师”⑤。检校太尉和检校太师都为检校三师、三公官中的高品，尤以检校太师最为尊贵，可见在易代之际后晋朝廷对于李彝殷极为笼络。后晋灭亡后，后汉、后周都承认后晋对李彝殷除拜的检校官。《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上》云：“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李彝殷，并加兼侍中。”⑥《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云：“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保、兼中书令、西平王李彝兴加守太傅。”⑦李光睿于“彝兴之卒，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累加检校太尉。”⑧据《李光睿墓志》，李光睿自检校太保升检校太傅，最后升检校太尉，完全按照宋廷规定的升迁顺序。这些检校官对于形塑李光睿在定难军内部的尊贵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李光睿墓志》即云：“名高四世，望重三公。俨万乘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纪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8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9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书·隐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45页。
⑦ 《旧五代史》卷一二〇《周书·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93页。
⑧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3页。

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仍分阶品，渐峻井田。”①

李继筠被北宋拜为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时，同时被除授检校司徒，随后又升为检校太保。《李继筠墓志》云：“于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内降驺骑赍到官告一通、敕牒一道，授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遄加服命之恩，并示夺情之宠。于当年十一月，以郊礼毕礼，渥泽普天。远□侍臣，曲宣明诏。赐官告一通、敕牒一道，特授检校太保、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②从志文来看，李继筠被除授的检校司徒、检校太保都有官告。李继筠检校官的升迁仍然是按照宋廷规定的升迁顺序，升迁的原因主要在于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一月南郊祀天后大赦天下，封赏群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即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一月“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御丹凤楼，大赦”③。

李继捧在任定难军留后时的检校官史无记载，但他在入朝后任感德军节度使时曾被除授检校太傅。宋太宗特命李继捧回镇夏州时，“可特授依前检校太傅”④。据《辽史·圣宗纪》，李继捧投靠辽朝后，辽对李继捧授予了检校三师、三公官中品位最高的检校太师，可见辽对李继捧的政治转向非常重视，所以以高官笼络。

辽对李继迁也授以检校太师。据《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北宋则对李继迁授以低于检校太师一级的检校太尉。相对于李继迁，北宋对李德明一开始就除授检校太师，这主要是因为双方景德合约的达成。《宋史·夏国传》云李德明“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授特进、检校太师”⑤。从《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来看，北宋在李元昊继任后也除授其为检校太师，说明北宋意图固定对定难军节度使的检校官封授制度。

定难军节度使的兼官主要指其在本官之外所兼带的三师、三公以及相职。拓跋思恭在黄巢之乱后兼太子太傅。太子太傅为三太之一，唐制从一品。在历任定难军节度使中，只有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的李彝殷和与北宋达成景德合约的李德明拥有三师、三公的兼官。据《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一》和《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李彝殷在周世宗时加官太保，在周恭帝时加官太傅。北宋建立

①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太祖开宝九年二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37页。

④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8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9页。

后，“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兴”[①]。后周、北宋对李彝殷加三师、三公主要是因为李彝殷是历经数朝的老臣，另外还由于定难军是“郡邑封疆，开托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逾百万家，户口雄豪”[②]的强藩，经常与叛臣交结，威胁中原王朝。《资治通鉴》云：“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每藩镇有叛者，常阴助之，邀其重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泽羁縻之。”[③]中原王朝对李彝殷加三师、三公即为羁縻之策中的一种。由于北宋与辽一直在争夺对李继迁、李德明的封赐、拜官，双方都力图将定难军纳入以本朝为中心的“天下”，因此北宋在与李德明达成景德合约后，对李德明的拜官赐爵都予以高标准对待，对李德明加三师也是一种政治优渥。《宋史·夏国传》记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加守太保……天禧元年正月，加守太傅”[④]。

历任定难军节度使中，除殁于乱军的李彝昌和早逝的李彝超、李继筠，以及李继筠之父李光睿，大都兼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相职。据《新唐书·党项传》，拓跋思恭、拓跋思谏在唐末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拓跋思谏的相职在后梁立国后升为正三品的侍中。《旧五代史·李仁福传》云：“梁开平元年，授思谏检校太尉、兼待中。”[⑤]《五代会要》记梁太祖有使相二十七人，拓跋思谏名列其中。《资治通鉴》还记定难军节度使李成庆于光化三年（900年）被唐廷加同平章事。

据《旧五代史·李仁福传》，李仁福因固守夏州而被梁太祖拜为同平章事。后梁灭亡后，李仁福被后唐升为正三品的中书令。《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五》云：“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⑥]《五代会要》记李仁福为后梁太祖二十七使相之一，后梁末帝三十二使相之一，后唐庄宗三十二使相之一，后唐明宗三十八使相之一。长兴四年之战后，后唐与定难军交恶，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李彝殷都没有担任后唐的使相。李彝殷在石敬瑭建后晋后才被加同平章事。《旧五代史·李仁福传》记李彝殷“晋天福初，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⑦]。后汉、后周立国后，李彝殷分别被加侍中、中书令。《五代会要》记李彝殷为后晋少帝二十七使相之一，后汉高祖二十使相之一，后汉隐帝三十三使相之一，后周太祖四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9页。

②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隐帝乾祐二年正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407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1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页。

⑦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9页。

十二使相之一，后周世宗三十五使相之一，后周恭帝二十使相之一。北宋代周后，仍然承认李彝殷被后周拜除的中书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建隆元年（960年）“定难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李彝兴，言遣部将李彝玉进援麟州，北汉引众去”①。又记有乾德五年（967年）九月“庚子，夏州言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李彝兴卒”②。

李光睿、李继捧主持定难军军政时，北宋因欲统一全国，有意降低作为割据势力统治者的定难军节度使之官位，便不再对李光睿除拜相职。李继筠因早逝也没有被除拜相职。李继捧入朝被北宋再遣回夏州任定难军节度使后，宋廷于端供“二年，加保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③。北宋对李继捧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笼络李继捧以加速围剿李继迁，从而稳定北宋的西部边疆。《宋会要辑稿》记宋太宗朝有使相二十人，李继捧名列最后，在他之前的是出于割据势力的钱惟浚、陈洪进，可见宋廷是将李继捧也视为割据势力的，以李继捧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只是一种羁縻手段。宋廷视加李继捧为同平章事为宏恩。《李继捧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京城仍赐姓名赵保忠制》云：“既换高牙，俾还旧地，兼佩相印，仍齿宗盟，赐予殊常，宠荣备极。”④

李继迁因长期与北宋敌对，北宋在拜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没有加以相职。李德明因与北宋达成景德合约而被加以相职。李德明的各种相职开创了定难军节度使兼相职的几个特例。首先，李德明在被除拜定难军节度使时即兼相职。《宋史·夏国传》云：“帝嘉之，乃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⑤在李德明的官爵中出现了兼侍中。在李德明之前的定难军节度使，往往是履任多年后才被朝廷加以相职。其次，李德明是第一个被加正二品尚书令的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夏国传》云：“仁宗即位，加尚书令。”⑥《宋大诏令集》中存有《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在李德明之前的定难军节度使，获得的最高相职都是中书令。再次，李德明是第一个被中原王朝的敌对国封为尚书令的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夏国传》云：“辽复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6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4页。
④ [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易名审订：《新安文献志》卷一《辞命》，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69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9页。
⑥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2页。

国王。”[①]最后，李德明是第一个以尚书令兼中书令的定难军节度使。《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定难节度使、守太傅、尚书令、兼中书令西平王赵德明封夏王。”[②]宋廷一般以归顺本朝的割据势力的统治者及皇子为尚书令兼中书令，如钱倜为“武胜节度使、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③]。“相王元偓加尚书令、兼中书令，为成德、镇宁等军节度使，进封徐王”[④]“镇安忠武节度使、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镇王元俨为河阳三城、武成节度使，守太师，徙封孟王。”[⑤]李德明以尚书令兼中书令一方面表明宋廷视其为归顺本朝的割据势力，一方面也说明宋廷视其为拟血缘的皇族，因为李德明以被赐赵姓并被纳入宗室属籍的身份获得了与皇子同样的相职。李德明相职的升迁严格按照宋廷规定的升迁顺序，从侍中升为中书令，再升为尚书令。这种升迁往往和宋廷的推恩相关。《宋史·夏国传》记李德明“东封，又遣使来献，礼成，加兼中书令……四年，祀汾阴，进中书令……仁宗即位，加尚书令”[⑥]。宋廷由于东封泰山和祭祀汾水而将李德明的相职升迁，含有将李德明纳入华夏礼制，进而将定难军纳入北宋“天下”的政治意味。李德明在宋真宗东封泰山时遣使贡献，也说明定难军对北宋正统性予以承认，因此北宋将其相职升迁以示奖赏。《宋史·夏国传》记“时辽亦遣使册德明为大夏国王”[⑦]。辽在李德明遣使随从宋真宗东封泰山之后封李德明为夏国王，无疑是一种与北宋争夺正统性的政治行为，因为只有正统王朝才具备册封藩属为王的合法资格。李元昊在称帝前，宋廷也对其加授相职。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癸巳，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⑧]。景祐“二年，加兼中书令”[⑨]。

从传世史籍和出土墓志来看，定难军节度使拥有文散官的主要有李仁福、李光睿、李继捧、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二》，李仁福的文散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中官阶最高者，后唐朝廷即宣称“开府仪同三司，阶之极”[⑩]。李光睿的文散官据其本人墓志为正二品特进。北宋与辽都对李继捧授予文散官。据《宋史·夏国传》，北宋授予李继捧的文散

①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2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2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太宗端拱元年八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56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旧，真宗天禧元年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4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2页。
⑥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13992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4页。
⑨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4页。
⑩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98页。

官为正二品特进。据《辽史·圣宗纪》，辽授予李继迁的文散官为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宋制，特进乃宰相所带阶，北宋在授予李继捧特进的同时也除拜其为同平章事，可见李继捧被授予特进是由于其为使相。辽在授予李继捧开府仪同三司的同时也除拜其为侍中，可见宋辽同制。

李继迁也接受了北宋和辽授予的文散官。从《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来看，北宋对李继迁授予从二品光禄大夫。《辽史·圣宗纪》则记辽授予李继迁特进。北宋在对李德明、李元昊加相职的同时，也授予他们高阶文散官。《宋史·夏国传》记李德明被北宋授予特进兼侍中。《西平王赵德明加恩制郊祀毕》则记李德明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中书令。可见李德明在被加尚书令后，其文散官也从特进升为开府仪同三司。《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记李元昊被授予特进兼侍中。北宋对李德明、李元昊文散官的授予是严格按照特进乃宰相所带阶的标准来执行的。

定难军节度使中，李仁福、李光睿、李继捧、李继迁、李德明都有功臣号。李仁福的功臣号为后唐明宗所赐，《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四》云："乙丑，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凤翔节度使李从曮、朔方节度使韩洙，并加食邑，改赐功臣。"[①]与李仁福同时被赐功臣号的都是名义上臣属后唐的独立性极强的割据势力统治者。这些人对于后唐明宗李嗣源篡夺后唐政权并无任何功劳，但仍然被赐予功臣号，反映了后唐明宗意欲将李仁福、李从曮、韩洙纳入本朝政治体系的意图。李光睿的功臣号据其墓志为推忠保毅翊戴功臣和推忠保顺翊戴功臣。龚延明先生指出宋代"宰相、枢密院初拜则赐功臣号，宰相赐六字，余官并四字，诸班直将校二字"[②]。李光睿的功臣号为六字，与宰相初加功臣号字数相同，显示了北宋对李光睿较为重视。李光睿的功臣号从字面上来看是强调李光睿对北宋具有忠诚这一政治品格，对宋太宗的统治具有翊赞之功，但李光睿作为一方霸主对北宋的翊戴是有所保留的，因此宋廷通过赐予这样的功臣号来勉励李光睿效忠本朝，支持宋太宗的统治。李光睿获得功臣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廷举行大典后的推恩，《李光睿墓志》云："朝廷飞驺骑以推恩，降天书而褒美，就加推忠保毅翊戴功臣……皇上运属休平，礼终告谢，方须好爵，遍及尤勋，又加推忠保顺翊戴功臣检校太尉。"[③]

李继捧的功臣号是被辽朝所赐予，据《辽史·圣宗纪》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

① 旧五代史》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27页。

② 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8页。

③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臣。“效顺”一词表明了李继捧作为外藩的政治地位，定难则表明辽朝希望李继捧与辽携手以抗北宋。据《银州观察使赵保吉除定难军节度使制》，李继迁在被北宋除拜为定难军节度使时就被赐予功臣号。李德明在被北宋除拜为定难军节度使时也被赐予功臣号，据《赵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为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据《宋史·职官志》，推忠、亮节、翊戴为中书、枢密、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的功臣号，保顺为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的功臣号。李德明在被初赐功臣号后因北宋推恩而不断进加功臣号。《宋史·夏国传》云：“七年二月，谒太清宫，遣使来献方物，加宣德功臣。……冬，郊祀，又加崇仁功臣……乾兴元年，加纯诚功臣。”[①]宣德、纯诚为宋代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的功臣号，崇仁既可以赐中书、枢密，亦可以赐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清人吴广成指出：“‘宣德’，赐皇子、皇亲号也。德明闻车驾谒太清宫，遣使诣行阙朝贺，献方物，特加赐号，宠异之。”“崇仁，赐亲王、重臣者。时真宗郊祀，受尊号，故覃恩。”[②]《宋史·夏国传》仅记李德明为北宋十四字功臣，但《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记李德明为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守正翊戴功臣，可见李德明在宋仁宗即位前被加守正功臣，《宋史·夏国传》亦云：“大中祥符元年，以天书降，加赐守正功臣。”[③]此功臣号与李德明所兼中书令的相职相匹配，因为守正功臣主要是被用来赐予中书、枢密。从《西平王赵德明加恩制郊祀毕》来看，李德明后来又被加协恭功臣。宋仁宗郊祀后，又加李德明佐运功臣。据《宋会要辑稿》，李德明于天圣八年（1030年）又被赐赞治功臣。这样李德明在逝世前的功臣号全称为推忠宣德崇仁保顺纯诚亮节协恭赞治佐运守正翊戴功臣，为二十二字功臣。宋臣杨亿曾指出：“近代以来，将相大臣有加至十余字者。”[④]李德明的功臣号超逾十余字，达到二十二字，可见宋廷对其隆宠至极。

定难军节度使的食邑往往与其封爵相等，因为中央规定每一级的封爵都有相应的食邑。李仁福在后唐明宗时被两次加食邑。《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二》云：“戊申，夏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⑤]《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四》云：“乙丑，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凤翔节度使李从曮、朔方节度使韩洙，并加食邑，改赐功臣。”[⑥]杜文玉先生指出：“五代时期虽沿袭唐代封爵制度，但在食实封的人数上却控制颇严，非大功不给实封，而

①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1页。
② 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④ 《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07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三六《唐书·明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00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三八《唐书·明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27页。

且对实封户数进行了控制。”[①]李彝殷曾被后汉加食邑实封。《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二》云：“庚午，泾州节度使李德琉、徐州节度使安彦威、秦州节度使康福、延州节度使刘景严、襄州节度使安从进、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并加食邑实封。”[②]

据《李光睿墓志》，李光睿在被封陇西县开国子时，食邑为五百户；在晋为陇西郡开国公后，食邑三百户，食实封八百户。据《李继筠墓志》，李继筠在被封陇西县开国子时，受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按《司封格》，食邑一千五百户以上始加食实封。因此李继筠所受食实封二百户为宋太宗特旨加封。

从《赵保吉赐姓名除银州观察使诏》来看，李继迁在被除拜定难军节度使时，被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此前李继迁任银州观察使时，其食邑为一千五百户，因此在他被拜为定难军节度使后食邑为二千五百户。据《赵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李德明在被除拜为定难军节度使时，受赐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户。李德明的食邑户在宋代十四等食邑中列第四等。北宋食实封分七等，最高等为一千户。《宋史·职官志》云食实封“五百户已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有特加至数千户者”[③]。李德明食实封为二千户，远远超过常制，为北宋特殊恩典。李德明的食邑、食实封在其任定难军节度使后又一路上升。《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记李德明食邑一万六千户、食实封五千户。《西平王赵德明加恩制郊祀毕》记李德明食邑一万八千户、食实封五千八百户。据《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李德明逝前食邑二万一千户、食实封七千户。《宋史·职官志》云宋朝食邑“二千户以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特加有至万户者”[④]。李德明食邑远远超过一万户，而代表实际经济利益的食实封也达到七千户之巨。李德明在景德合约后从宋廷获得了大量经济收入，宋廷还以内地节度使俸禄赐予李德明，食实封即是李德明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德明是以每次获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而累加至食邑二万一千户、食实封七千户。《宋史·夏国传》云李德明于“大中祥符元年，以天书降，加赐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东封，又遣使来献，礼成，加兼中书令，益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⑤]。

定难军节度使被赠官主要出现于北宋时。据《旧五代史·李仁福传》，李彝殷逝后，宋廷赠以正一品太师。吴丽娱先生指出：“晚唐以后，由于节度使多带平章

① 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0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96页。
③ 《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76页。
④ 《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76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事和检校三师三公衔,故卒赠一品更是顺理成章,事实便是晚唐五代宰相和功臣权藩赠以三师三公衔者最为常见。"[①]唐代"赠官的资格仍是依卒时或致仕时品级最高者"[②]。宋沿唐制。李彝殷逝世时最高官阶为正一品太尉,太师虽然也是正一品,但自唐以来多由太尉升为太师,因此李彝殷被追赠太师是被升高了一级。

李光睿,据《宋史·夏国传》被赠为侍中。侍中为正三品相职。李光睿逝前最高官阶为检校太尉,太尉为正一品,但由于其逝前没有相职,因此宋廷赠以侍中为厚赠。《李光睿墓志》即云:"主上闻良帅之云亡,动皇情而兴叹,追封甚速,赙赠尤丰。"[③]侍中这一赠官还被刻于墓志中以示荣耀。《李光睿墓志》题"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赠侍中李公墓志铭并序"[④]。据《辽史·圣宗本纪》,李继迁逝后辽赠以正二品尚书令。由于李继迁长期于北宋敌对,北宋并没有对其赠官。李德明逝后,"宋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⑤]。李德明生前即任尚书令兼中书令,但所兼三师官为太傅,因此宋廷越过太尉赠以太师,升高两级。

第三节 权豪驭政:定难军节度使家族与本镇职官系统

一、定难军节度使与本镇武职军将

1. 定难军李氏家族与本镇军队

定难军的军队由节度使直属军、蕃落军和州军组成。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多有任武职军将者,或作为节度使直属军、蕃落军、州军三军的总指挥官,或分别任职于节度使直属军、蕃落军和州军。定难军由蕃军、汉军混编而成,因此定难军内部设有蕃汉都指挥使统一治军。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定难军都指挥使高宗益弑杀节度使李彝昌后,"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⑥]。《中国藏西夏文献》M42·001号《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云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李彝谨为"管内蕃汉都指挥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早负

① 吴丽娛:《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58页。
② 吴丽娛:《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1页。
③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2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汉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721页。

气能，益彰武勇，飞箴无惭于百中，临敌克就于捷”[①]。M42·005号《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记志主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之弟李光新“见任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②]。其中“管内蕃汉都指挥使”即为“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的简称。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云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随使马步军都教练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彝氲，武略超群，才谋特异，蕴摧凶之茂绩，抱通变之宏规”[③]。

教练使为藩镇中教习士卒军事技能之军将，其武艺精湛，常为士卒表率。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依礼教习。仍以其数申兵部。”[④]该敕明确提到：“自今已后，委诸道观察、节度、都防御、团练、经略等使，每道慎择会兵法及能弓马解枪弩及筒射等军将，两人充教练使，每年至合教习时，分番各以本艺阅试。”[⑤]可见晚唐时藩镇的教练使不仅要求武艺精湛，还要求其必须对行军作战之兵法娴熟于心。李彝氲多任马步军都教练使为教练使系统中都级官长，总领定难军各级教练使，堪称定难军总教头。冠以“随使”更说明其与定难军节度使之间的亲从隶属关系。“武略超群，才谋特异”，说明时任定难军随使马步军都教练使的李彝氲精通武艺与兵法，确实为定难军士卒之表率。

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任节度使直属军的衙前都知兵马使者见于《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志文云志主李光睿有“宠弟五人，长曰光文，衙前都知兵马使”[⑥]。兵马使一职，始设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大谷文书2840号记有豆卢军检校兵马使。都知兵马使始设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时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副使治甘州，领都治河西兵马使”[⑦]。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至德以后，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②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④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六《讲武》，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04页。

⑤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校订书）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359页。

⑥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⑦ 《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62页。

都知兵马使率为藩镇储帅"[①]。都知为总知、总管之意。[②]李光文任衙前都知兵马使则为定难军节度使直属军的最高指挥官。

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有多人担任节度使直属军的都押衙一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③]日本学者渡边孝认为都押衙为藩镇"军事、行政部门的总务部长"[④]。藩镇及所属州府中的押衙系统一般分左右厢,都押衙即分为左都押衙、右都押衙,左都押衙又较右都押衙尊显。《唐台州刺史杜雄墓志铭》即云:"副使叶公与左都押衙师位右都押衙绍香及诸都将,亲奉丧事,各率家财,送往事居,知无不至。"[⑤]从此志文来看,左都押衙位于节度副使之下,右都衙押之上。在定难军中,左都押衙可简称为都押衙。据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立石的《后晋虢王妻渎氏墓志铭》记载,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妻渎氏已去世之子李彝温为"故随使左都押衙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⑥]。而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立石的《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云志主李彝谨之长兄李彝温"守职随使都押衙"[⑦]。李彝温早在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前就已逝世,因此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所追记的其所任"守职随使都押衙"无疑为后晋时渎氏墓志铭所记"故随使左都押衙"之简写。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志主李仁宝之父"考思澄,皇任定难军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思澄"[⑧]。李思澄为定难军基业奠基者拓跋思恭(李思恭)同辈从兄弟。

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还有人任节度使直属军中的马军高级军官。《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记里氏第三子李光义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马军第二都军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⑨]。《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亦云李光

---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9页。

②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55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戊辰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7250页。

④ 渡边孝:《唐·五代の藩镇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社会文化史学》30,1993年。

⑤ 《全唐文》卷八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08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⑦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⑧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义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守职节度押衙充马军第二都军使”①。军使为唐代军一级的长官，在延边屯戍地区“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②。在内地藩镇关险之处亦置有军镇，设军使。中央禁军亦设军使，多由宦官担任，如神策军使、六军使、十军使等。军使发展至五代已演变为禁军、藩镇军中一级军事编制单位的统兵军将。“都军使”在五代各朝禁军中为骑军的统兵军将，如后梁谢彦章为“两京马军都军使”③，后唐李行德为禁军“捧圣都军使”④。宋沿袭五代之制，禁军中马军“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步军谓之都头。副兵马使、步军谓之副都头”⑤。另外杜文玉先生曾指出：“都军使即都指挥使的异称。”⑥定难军的都军使与五代各朝禁军的都军使一样为骑军的统兵军将。

藩镇衙军为节度使直属军中警卫节度使的核心力量，为节度使亲军，拱卫使衙。日本学者堀敏一指出：“牙军和其他军队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负有旦夜守卫衙城的任务。总之，牙军就是节度使的麾下军、近卫队的意思，所有节度使的兵力都是以牙军为中心而组成的。”⑦衙内都指挥使在对藩镇全军的军事指挥权上不如管内都指挥使，但其为节度使亲从军将，领导节度使亲军，因此其威权极重，与节度使关系最为密切。后梁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即因幼弱，“军府事皆决于牙内都指挥使潘晏”⑧。由于与节度使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衙内都指挥使往往由节度使亲属担任。如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击败东川节度使董璋后，董璋“只与亲男衙内都指挥使董光嗣并从骑二人，磐马而奔，弃甲而遁”⑨。后晋襄州节度使安从进举兵造反后，被张从恩击败，“获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弘义”⑩。这种“节度州长官(以下称藩帅)的子弟、部曲等任衙内都将(都指挥使)等役职，是五代藩镇的常例”⑪。

---

①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② [唐]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③ [北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六《谢彦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21页。

④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后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2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禁军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584页。

⑥ 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

⑦ [日]堀敏一著，索介然译：《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92页。

⑧ 《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760页。

⑨ [后蜀]何光远撰，邓星亮、邬宗玲、杨梅校注：《鉴诫录校注》卷一，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8页。

⑩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后晋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9230页。

⑪ [日]高井康典行：《斡鲁朵与藩镇》，张希清、田浩、黄宽重、于建设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

在定难军，衙内都指挥使往往是本镇储帅。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早年“名实有闻，势不可抑，却于转授衙内都指挥使”[①]。《宋史·夏国传》亦云李继筠“初为衙内都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②]，在其父李克睿病逝后“自权知州事，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③]。《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五月“壬寅，夏州言定难节度使李克睿卒，其子衙内指挥使继筠权知州事。乙巳，以继筠为定难留后”[④]。可见定难军的衙内都指挥使可简称为衙内指挥使。在李继筠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逝世后，宋廷以其胞弟“夏州衙内指挥使李继捧为定难军留后”[⑤]。另外《李继筠墓志》还记李继筠“初自开宝七年中，补衙前厅直指挥使。勇怀刚毅，威慑戎夷”[⑥]。衙前厅直指挥使为节度使使衙衙前诸将之一，是藩镇内衙军中的亲从军官，指挥衙军中的厅直军。“厅直”即值守衙厅。关于厅直，宋人田锡云：“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五》，契丹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时，其幽州汉军神武兵也设有厅直。厅直指挥使自五代以来即为藩镇军队中的重要军职。《册府元龟》卷三六〇《将帅部·立功第十三》即云后唐将领索自通为“厅直指挥使”[⑧]。另据《旧五代史·索自通传》，其被后唐庄宗“补右番厅直军使”[⑨]。

李仁福第二子李彝谨曾为定难军衙军军官。《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爰自加冠，便谋入仕，非贤不举，唯善是求。操心而有始有终，俭己而何忧何惧，遂得箴规衙事，标表戎行，家门传可久之风，军府起从长之论，外为手足，内作腹心，或事匪合宜，踪龙鳞而亦犯，直而不扰，在鸡口以争先。而乃仗言安人，倾忠事主。常居左右要籍，谘谋倾忠”。李彝谨第四子李光璘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守职押衙充元从都军使”[⑩]。前述都军使为马军军事指挥官，李光璘所任“都军使”冠以“元从”则为统领节度使衙军骑军的亲信军官。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之弟李光美，于

①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3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3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42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480页。
⑥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⑦ [南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九《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23页。
⑧ [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4063页。
⑨ 《旧五代史》卷六五《索自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871页。
⑩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见任衙内都虞侯”[①]。衙内都虞候为衙军的总执法军官。

定难军所领五州自北朝以来即为蕃汉杂居之地。晚唐时夏州“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②]。由党项羌士兵所组成的蕃军是定难军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过定难军历次重要军事行动。定难军基业奠基者拓跋思恭在黄巢攻陷长安后，于中和元年(881年)“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同盟讨贼”[③]。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六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率军五十二都，兼邠、宁、鄜、夏杂虏共五万人骑，发自京师”[④]，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宋太宗亲征北汉的战争中，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曾派遣属下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帅蕃汉兵卒缘黄河列寨，渡河略敌境以张军势”[⑤]。由于蕃军为定难军的重要支柱，所以定难军节度使设蕃部越名都指挥使领导蕃军。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定难军都指挥使高宗益弑杀节度使李彝昌后，“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⑥]。《中国藏西夏文献》M42·001号《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云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李彝谨为“管内蕃汉都指挥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早负气能，益彰武勇，飞箙无惭于百中，临敌克就于捷”[⑦]。M42·005号《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记志主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之弟李光新“见任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⑧]。其中“管内蕃汉都指挥使”即为“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的简称。

蕃部越名都指挥使的越名据杜建录、贺吉德等先生研究，为党项于弥、嵬名的别称或不同译音。[⑨]据M42·005号《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志主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在早年曾被其父李彝殷授职为“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奏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② [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七〇《夏平》，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894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249页。

④ 《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65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乙己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7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汉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721页。

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⑧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⑨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授银春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①]。其被授职的原因，据墓志记载，是“以郡邑封疆，开托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逾百万家，户口雄豪，人心任直，每思共理，须借奇人”[②]，可见蕃部越名指挥使已不单单为一藩镇军职，而已衍变为一吏化军职，开始负责蕃部管理政务。而李克睿在任蕃部越名都指挥使期间确实勤于政事，以致墓志称赞其“分司戎部，奉公之节尤坚。固晓变通，颇闲韬畧，莫不明申赏罚，严示宪章。往年悖乱之徒，咸令屏迹，昔日奸凶之党，罔不悛心，致边境之无虞，俾群生之遂性”[③]。

定难军的蕃部越名都指挥使除李克睿外，还有其弟李光遂，《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云李光遂在李克睿去世时“见任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④]。据李光遂本人墓志 M42·007 号《宋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记载，其“初自建隆四年九月九日，授职牒一道，补管内蕃部都指挥使。安抚远边，播扬雄武”[⑤]。可见，蕃部越名都指挥使亦可简称为蕃部都指挥使，蕃部都指挥使亦可简称为蕃部指挥使。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早年就曾任蕃部指挥使，在节度使李彝昌为都指挥使高宗益所弑时，“时仁福为蕃部指挥使，本州岛军吏迎立仁福为帅”[⑥]。《新五代史》卷四〇《李仁福传》亦云：“是时，仁福为蕃部指挥使，戍兵于外，军中乃迎仁福立之。”[⑦]从“戍兵于外”及前引《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中所记李光睿任蕃部越名指挥使时“致边境之无虞，俾群生之遂性”[⑧]、《宋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所记李光遂任蕃部越名指挥使时“安抚远边，播扬雄武”[⑨]可知蕃部指挥使为定难军的外镇军军将，远离定难军会府夏州城，执掌边境蕃部事务。蕃部指挥使还可称为蕃落指挥使，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在初献定难军所辖五州之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页。

②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页。

③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2 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84 页。

⑥《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标点本，第 1746 页。

⑦《新五代史》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437 页。

⑧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1 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84 页。

地后，被宋廷“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①。

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还有人任蕃落使一职。此官最早见于唐德宗年间。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月，凤翔、陇右、泾源节度使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②。野诗良辅为凤翔镇名将，可见蕃落使一职应为军事使职。定难军的蕃落使设于会府与所属诸州。设于会府的名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迁在北宋初年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宋史·夏国传》云其于北宋“开宝七年，授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③。在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后，李继迁滞留于银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云：“初，李继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继迁留居银州。”④在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宋廷意欲招抚，在《赵保吉赐姓名除银州观察使诏》中曾提到：“银、夏等州蕃落使李继迁，驰声沙漠，袭庆旌旗。”⑤

定难军李氏家族中任州军军官者多为防御使、都押衙、衙内都指挥使、藩部指挥使。防御使为军事使职，《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都督》“节度使”下注云：“防御理军事。”⑥早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朝廷即“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⑦。安史之乱爆发后，“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⑧。《旧唐书·职官志三》云：“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宝后置，未见品秩。”⑨《旧唐书·地理志序》亦云：“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⑩

《资治通鉴》记李彝超曾任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据《宋史·夏国传》，李继迁“曾祖仁颜，仕唐，银州防御使。祖彝景嗣于晋。父光俨嗣于周”⑪。可见李继迁家族自其曾祖父以来世袭定难军属州银州防御使一职，历后唐、后晋、后汉与

①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4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德宗贞元二年十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7473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6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5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政事八六·四裔六·西夏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05页。
⑥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95页。
⑦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16页。
⑧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16页。
⑨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923页。
⑩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89页。
⑪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5页。

后周四朝。《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还记李仁宝“祖重遂,皇任银州防御、度支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李重遂”①。李重遂为拓跋思恭的伯叔辈人物。

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有“男五人:……次曰光琏,守职绥州左都押衙”②。《中国藏西夏文献》M42·002号《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即云后汉绥州刺史李彝谨(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长子李光琇,“守职节度押衙充绥州衙内指挥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③。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在初献定难军所辖五州之地后,被宋廷“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④。《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记载李彝谨与里氏之子李光琏“守职绥州都知番落使、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⑤。

由上可知,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成员在整个定难军军事系统中人数众多,位高权重。现将定难军武职军将中的李氏家族成员列表如下:

表1 唐末五代宋初定难军武职军将中的李氏家族成员

姓名	定难军仕职	与定难军节度使关系	史料出处
李重遂	银州防御使,度支营田等使	拓跋思恭族叔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
李思澄	左都押衙	拓跋思恭从兄弟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
李仁颜	银州防御使	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之子 李仁福从兄弟	《宋史·夏国传》

①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④《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4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续表

姓名	定难军仕职	与定难军节度使关系	史料出处
李仁福	蕃部指挥使	拓跋思恭之子 李彝昌叔父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新五代史》卷十《李仁福传》
	蕃汉都指挥使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四年二月条
李彝温	随使左都押衙	李仁福长子	《后晋故虢王妻渎氏墓志铭》 《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
李彝超	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	李仁福次子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纪》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李彝谨	管内蕃汉都指挥使	李仁福第四子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李彝氳	随使马步军都教练使	李仁福第五子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李彝景	银州防御使	拓跋思恭弟拓跋思忠子李仁颜之子 李彝超、李彝殷从兄弟	《宋史·夏国传》
李光琇	节度押衙充绥州衙内指挥使	李仁福第四子李彝谨之长子 李彝超、李彝殷之侄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琏	绥州都知番落使	李仁福第四子李彝谨之次子 李彝超、李彝殷之侄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义	节度押衙充马军第二都军使	李仁福第四子李彝谨之第三子 李彝超、李彝殷之侄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璘	押衙充元从都军使	李仁福第四子李彝谨之第四子 李彝超、李彝殷之侄	《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

续表

姓名	定难军仕职	与定难军节度使关系	史料出处
李光俨	银州防御使	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之子李仁颜之子 李光睿从兄弟	《宋史·夏国传》
李光新	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	李彝殷次子 李光睿二兄 李继筠、李继捧伯父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睿	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	李彝殷第三子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文	衙前都知兵马使	李彝殷第四子 李光睿之弟 李继筠、李继捧叔父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美	衙内都虞侯	李彝殷第六子 李光睿之弟 李继筠、李继捧叔父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遂	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	李彝殷第七子 李光睿之弟 李继筠、李继捧叔父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信	马军都指挥使	李彝殷第八子李光睿之弟李继筠、李继捧叔父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夏州蕃落指挥使		《宋史·夏国传》
李继筠	衙前厅直指挥使	李光睿长子	《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宋史·夏国传》
	衙内都指挥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壬寅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

续表

姓名	定难军仕职	与定难军节度使关系	史料出处
李继捧	衙内指挥使	李光睿次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壬寅
李继迁	管内都知蕃落使	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之子李仁颜子李光俨之子 李继筠、李继捧从兄弟	《宋史·夏国传》
	银、夏等州蕃落使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赵保吉赐姓名除银州观察使诏》

从上可看出自唐末至北宋初年，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成员代代皆有武职军将，即使是现任节度使的兄、弟、子、侄也都从事军中。李氏家族成员所任军职级别甚高，或为都指挥使，或为都军使，或为都教练使、都知兵马使、都知蕃落使，或为左都押衙及州防御使，作为定难军军中“都”级官长统领士卒，独当一面。这一方面说明定难军节度使极为重视对本镇军队的掌控，以兄弟子侄等亲族安插于内，通过亲族指挥军队而不断强化李氏家族对本镇军队的影响，使本镇军队听命于己，拱卫于己，逐渐私属化。李氏家族成员通过主导各级军事单位的指挥权而使从会府到属州的军队为李氏家族所用，成为李氏家族统治定难军所属五州的强大支柱，并进而巩固李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权。另一方面也说明出身党项羌的李氏家族世代尚武，即使是担任过节度使的李仁福、李彝超、李光睿、李继筠、李继捧早年也都从事军中，通过与军中同僚共事，与士卒共辛苦而逐渐了解本镇军情。李氏家族与本镇军队的不断融合既加强了李氏家族对本镇军队的领导，也使本镇军队对李氏家族的忠诚与日俱增，离心力逐渐消失于无形之中。

2. 定难军节度使对本镇武职军将的署任

定难军军将的选任权由定难军节度使掌握，小到虞候大至兵马使、都指挥使都由定难军节度使亲自授职。《白全周墓志铭》云白全周“蒙朔方王奖酬，公幹累授职，□自封正兵马使至于千节度押衙”[①]。《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记志主何德璘于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先太尉以公世绍熏风，少年可

① 杜建录、邓文韬、王富春：《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畏，误以前途，始补衙前虞侯，继职军门”[①]。“先太尉”指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其为定难军基业奠定者拓跋思恭之弟。开平元年（907年），后梁朝廷“授思谏检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谏卒”[②]。所以志文称其为“先太尉”。北宋定难军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康成在后唐时，“府主以无事之日，赏有之人。重禄所临，唯公是首，因差补充定塞都副兵马”[③]。府主即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在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时，“府主大王以郡邑封疆，开托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逾百万家，户口雄豪，人心任直，每思共理，须借奇人，因补公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④]。“府主大王”即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五代会要》卷一一《封建》云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正月，朝廷封“夏州节度使李彝殷为陇西郡王”[⑤]。《五代会要》又载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正月，朝廷进封“陇西郡王李彝殷为西平王”[⑥]。李彝殷入宋后为避宋太祖父宣祖赵弘殷讳改名李彝兴。宋太祖干德五年（967年）九月庚子，“夏州言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李彝兴卒。赠太师，追封夏王”[⑦]。因此，志文云其为“府主大王”。李彝殷次子李光遂在北宋建隆四年（963年）被李彝殷“授职牒一道，补管内蕃部都指挥使”[⑧]。李彝殷之孙李继筠在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被其父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补衙前厅直指挥使。勇怀刚毅，威慑戎夷。名实有闻，势不可抑，却于转授衙内都指挥使”[⑨]。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以李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⑩]。李继迁由于以智谋毙杀猛虎而“蕃部由是知名，光睿爱其勇，遂授以官”[⑪]。定难军势力范围内的军事使职官员也被定难军节度使举荐，如白敬立曾被拓跋思恭“不经年，又荐为延

①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746页。

③ [北宋]郭贻：《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④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⑤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⑥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一《封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九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6页。

⑧ [北宋]郭正：《宋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⑨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⑩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86页。

⑪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三，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州防御使”[①]。从以上均可看出定难军节度使牢固掌握着对属下各级武职军将的署命权，定难军各级武职军将在步入仕途、从事军中上与定难军节度使有着极为密切的依附关系。

定难军武职军将的人员构成集中表现为本土化和世官化。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全族都出于夏州，家族中任武职军将者自不待言。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亲随白敬立其家“自有唐洎九世，世世皆为夏州之武官”[②]。白敬立之弟白令忠为“检校左常侍、充亲从都兼营田使、洛盘镇遏使、御史大夫”[③]。白敬立次子白保勋为“节度押衙、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④]。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本人曾自虞候历职而为管内马步军都知兵马使，其祖先为刘晏后裔，“即唐代宗之宝臣晏相六世之云孙也”[⑤]。但自其祖父始即三代仕职于定难军，“祖士清，皇任定难军散都头、充魏平镇遏使”。“父宗周，皇任定难军节度押衙知奏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⑥]。刘敬瑭长子刘彦能，“历职至散兵马使”。次子刘彦頵，“见守节度衙押，充器仗军使”[⑦]。可以说刘敬瑭家族已经入籍夏州，刘氏家族世代相袭为定难军武职军将。刘敬瑭墓志铭铭辞即赞其为“世亲旌戟，代继门风”[⑧]。北宋定难军管内都军指挥使康成，其曾祖“讳山人，皇任洪门镇使，次

①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7 页。

②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③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④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⑤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⑥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⑦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⑧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任上平关使，兼授北衙都知兵马使”，祖父“讳文义，皇任东城副兵马使”，父亲“讳爽，任节度押衙”，其弟康氏“见任衙前将副兵马使”，其长子康延祚任“衙队都副兵马使”①。定难军武职军将的本土化和世官化一方面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下夏州地方的军事化和军事力量的土著化，另一方面由于夏州近边，为蕃汉杂居之地，民风尚武。地方武人的职业世袭也体现了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定难军节度使署任这些夏州人为本镇的武职军将，在军事指挥层上垄断了对本镇军队的控制权。夏州人出身的武职军将和出于夏州的基层士兵共同构成了定难军的军事力量，忠诚于同为夏州人的定难军节度使。

3. 定难军节度使与定难军武职军将的朝衔

定难军武职军将的朝衔主要是指其所带散官、检校官、宪衔及勋官。现将定难军军将中有朝衔者列表如下：

表2 末五代宋初定难军武职军将之朝衔

姓名	官职	散官	检校官	宪衔	勋官	出处
白敬立	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	金紫光禄大夫	检校尚书左仆射	御史大夫	上柱国	《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
白全周	节度押衙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国子祭酒	御史□□		《白全周墓志铭》
李重遂	银州防御使、度支营田等使	金紫光禄大夫	检校太保	御史大夫	上柱国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
李思澄	定难军左都押衙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工部尚书	御史大夫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
刘宗周	定难军节度押衙知奏进	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右散骑常侍	御史大夫	上柱国	《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
李彝谨	管内蕃汉都指挥使		检校司空	御史大夫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① [北宋]郭贻：《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续表

姓名	官职	散官	检校官	宪衔	勋官	出处
李彝氳	随使马步军都教练使		检校尚书左仆射	御史大夫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李彝温	随使左都押衙		检校右仆射	御史大夫		《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
李光琇	节度押衙充绥州衙内指挥使		检校右散骑常侍	御史大夫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琏	绥州都知番落使		检校国子祭酒	御史大夫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义	节度押衙充马军第二都军使		检校右散骑常侍	御史大夫		《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李光睿	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		检校尚书右仆射	御史大夫	上柱国	《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
李光遂	管内蕃部都指挥使		检校工部尚书 检校礼部尚书			《宋管内蕃部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
李继筠	衙内都指挥使	银青光禄大夫	左散骑常侍 检校工部尚书		卫骑都尉	《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从上表可以看出定难军武职军将中拥有散官、检校官、宪衔及勋官者多为州防御使、左都押衙、节度押衙、都指挥使、都军使、都教练使、都知蕃落使等高级军将。说明在藩镇军将中仅有高级军将才能获得朝衔，这延续了晚唐以来藩镇奏官限定高级军将的传统。在定难军拥有朝衔的高级军将中，尤以李氏家族成员居多。这一方面说明李氏家族成员位居方面，职高权重，另一方面获得朝衔又使其在藩镇内部荣宠一时，地位大大高于没有朝衔的军将。朝衔成为划分军中等级的一大标准。

定难军武职军将的朝衔主要由定难军节度使向朝廷奏请。如白敬立在唐末被拓跋思恭“表荐公加右仆射”①;刘敬瑭被李仁福“奏闻天阙,恩命加公金紫阶衔,秩亦迁于水土”,又被李彝殷“荐加保傅。大晋明皇嗣圣,普示新恩。府主太师例以奏闻,又颁恩宠”。李光睿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被其父李彝殷“奏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②。李光遂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被“内奏授官告一通检校工部尚书。又于开宝三年三月,内拜郊授官告一通加检校礼部尚书”③。李继筠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被“主帅奏正授衙内加银青阶左散骑常侍卫骑都尉。复于太平兴国□年三月,再奏授官告加检校工部尚书”④。朝衔虽然为虚衔,但其毕竟为朝廷授予,代表了朝廷的威信和荣誉,因此定难军节度使为属下军将向朝廷奏请朝衔说明定难军作为高度自治的地方藩镇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和政治归属。朝廷向定难军使府军将授予朝衔也说明自唐末至北宋初朝廷一直将定难军视为隶属于中央的地方藩镇。

一般而言获得朝衔即名列朝籍,可以向中央发展,所谓“唐末藩镇列将带朝衔者,唐末藩镇列将带朝衔者,著之朝籍”⑤是也。刘琴丽女士特指出唐代蕃镇武职僚佐“只要奏请了宪官或检校官、试官,便取得了充任其他朝廷官职的资格”⑥。这样藩镇军将便可以向中央流动。刘琴丽女士还指出唐代“武职僚佐的辟署不受地域限制,他们可以先后接受不同藩镇的辟请,加强了藩镇之间的横向交流”⑦。但定难军自唐末以来由李氏家族世袭罔替节度使一职,可谓“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⑧。定难军在后唐长兴四年之战力挫朝廷后更是俨然独立王国,与其他的藩镇相比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定难军下属官员均由节度使自己辟署,无论是幕

①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③ [北宋]郭正:《宋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④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北宋]王钦若:《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34页。

⑥ 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⑦ 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⑧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4030页。

府文职僚佐还是武职军将都由本地人担任，中央无法派员进入。这些由定难军节度使辟署的官员从出土墓志铭来看几乎终身任职于定难军，没有向中央或者其他藩镇流动。因此对于定难军武职军将而言，获得朝衔仅是一项荣誉，用以在藩镇内部表明身份地位，用以叙资，而不能将其作为迈向朝堂的凭借。

4. 定难军武职军将对定难军节度使的政治拥护

白敬立为拓跋思恭的亲信武将，亲身经历了定难军早期历史上的数次重大军事行动，见证了拓跋思恭的兴起和逝世。白敬立早在拓跋思恭为夏州教练使时即随从左右，又与拓跋思恭联合发动平定客军的军事政变。在黄巢之乱爆发后，白敬立追随拓跋思恭奔赴京畿平乱，“夜即居王之寝门，旦即视王之膳所。应对顾问，亦不离其前；传呼号令，亦皆承其命。筹度宜便，探刺变动，外常承鞫师旅，内又延语宾客，周徊折旋，曾无遗事。王乃推腹心，委之如父子；公亦尽忠瘁，报之如君臣”①。白敬立在战斗中被黄巢乱军包围时，拓跋思恭不顾危险以单骑冲突，将白敬立救出。在战事胶着，拓跋思恭驻营鄜州时，洪水突发。白敬立“持刃呼左右。王惊起褐衣，就车得出。公乃手辔王骑及子城南门之外，守鐍者呼之不应，公乃梯堞而上，断关启扉，王与军人方脱其难”②。

黄巢之乱平定后，拓跋思恭向朝廷请命奖赏白敬立，“命幕下为奖饰之词云：破黄巢于咸阳原上，非我不存；避洪涛于鄜畤城南，唯尔之力。时皆谓赵襄子举高共，蜀先主得孔明，擢终始之功，言鱼水之道，不过于此”。在拓跋思恭借讨伐朱玫之乱进攻延州时，白敬立“总衙队之师，为虎贲之卫”，作为先锋攻克延州，在攻占延州前后“推尽瘁，输忠孝，灭勍敌，峻军令，奉王指踪，守王条制”。定难军再下鄜州后，白敬立作为被拓跋思恭委任的鄜州招葺使安抚战后的鄜州民众。定难军二占鄜、延后，拓跋思恭上表唐廷加白敬立右仆射、延州防御使。在拓跋思恭逝后，白敬立“悲戚哀愤，如丧其考。触目发言，未常不形追感之色。公常云：有王有我。今王先我去世，所恨者不得灰其身，报于王之生前，今唯誓生前而答于门下，诚未及愿”③。

---

①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②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③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历拓跋思恭、拓跋思谏、李成庆、李仁福、李彝超、李彝殷六代节度使。《刘敬瑭墓志》云:“至广明年及中和岁,故两镇令公王斯本贯,荣耀乡间,兼先太尉,继绍山河,董临节制,皆睹公神情慷慨,器度泓澄。于大顺初景福末,已闻英俊,肘腋指呼,累从油幢,百战巢寇,既清氛祲。帝复宫阙,迁挟马都,权补军中右职。天佑二年,改补门枪节院军使。相次沐天波,自监察御史位至貂蝉。梁开平二年,署四州马步都虞候。虽捻繁司,急难办济,临财不苟,莅事克清。故虢国王睹以忠言,备谙直气。谏无从而忤旨,事不规而触鳞。”①

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夏州节度使下辖的宥州刺史拓跋思恭“率使府将校,统全师问安赴难,及于畿内”②。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已升任夏绥节度使的拓跋思恭又再次“以锐士万八千赴难”③。作为夏州使府军将的刘敬瑭也参与平定起义军的战争,所以志文云其“累从油幢,百战巢寇”。“油幢”指节度使旌节。刘禹锡曾在元稹赴任武昌军节度使后赋诗云:“今日油幢引,它年黄纸追。”④《石林燕语》卷六亦云:“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旌。”⑤中和元年(881年)四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⑥。本年八月,又“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⑦因此志文记刘敬瑭“累从油幢”。志文中的“故两镇令公”即拓跋思恭。

志文“兼先太尉,继绍山河,董临节制”中的“先太尉”则指继拓跋思恭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拓跋思谏。拓跋思谏乃拓跋思恭之弟。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授思谏检校太尉、兼侍中”⑧。从志文“帝复宫阙,迁挟马都,权补军中右职。”可知志主刘敬瑭在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回到长安后被升为定难军挟马都。“挟马都”即挟马军都头。挟马军为节度使衙军中的精锐,王智兴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任徐泗节度使时在徐州“招募凶豪之徒二千人,号曰

① [后晋]牛渥:《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② [唐]李潜:《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文》,《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③ [唐]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61页。

④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六《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52页。

⑤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0页。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49页。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57页。

⑧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6页。

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①]。至后唐时石敬瑭还曾“斩挟马都指挥使李晖等三十六人”[②]。刘敬瑭任定难军挟马军都头即为挟马军之首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唐之中世，以诸军总帅为都头。至其后也，一部之军谓之一都，其部帅呼为都头。”[③]

根据志文，刘敬瑭在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自挟马军都头改任门枪节院军使。进入五代后，刘敬瑭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被任为“四州马步都虞候”。“四州”即定难军节度使下辖夏、绥、银、宥四州马步都虞候本为藩镇军职，但从志文“虽捻繁司，急难办济，临财不苟，莅事克清”来看，定难军的“四州马步都虞候”已变为吏化军职。这种趋势在五代时出现，“五代以来，诸州皆有马步狱，以牙校充马步都虞候，掌刑法，谓之马步院”[④]。五代时人剧可久在《请赏罚理刑等官疏》中即提到：“其三京军巡使，诸州府马步都虞候，有精于推劾。雪活冤滥者，请量事超擢。”[⑤]志文又提到刘敬瑭在任四州马步都虞候时对“故虢王”直言进谏，“故虢王”即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

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力行削藩，与长期领有夏、绥、银、宥四州的定难军发生了激烈冲突。长兴四年（933年）三月李仁福卒，明宗以其子李彝超“为延州刺史、彰武军节度使，而徙彰武安从进代之”，准备将夏州李氏移镇。又“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药彦稠以兵五万送进之镇”，而李彝超“果不受代，从进与彦稠以兵围之，百余日不克”[⑥]。《刘敬瑭墓志》所云“以长兴四年，朝廷玷谤，军府重围”，即指此事。其中“朝廷玷谤”是指李仁福在世时“河西诸镇皆言仁福连结契丹，尝约虏使。”[⑦]但实际上“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⑧]。志文“先太傅牒请权兵把截四面，师徒抽退，士庶获安”中的“先太傅”即李彝超。《后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云渎氏之子“李彝超，故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⑨]。根据《刘敬瑭墓志》，李彝超在夏州被围时曾移牒时任宥州刺史的刘敬瑭命其领兵“把截四面”。在这场对抗朝廷削藩的战争中，定难军一方有“党项万余骑

①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3页。
②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七《后唐末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9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七月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54页。
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2页。
⑤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第7081页。
⑥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〇《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7页。
⑦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第七》，南京：凤凰出版社，第11512页。
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纪七明宗长兴四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5页。
⑨ [后晋]毛汶：《后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妻墓志铭并序》，《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①]。刘敬瑭所任职的宥州居住着大量的党项人。《新唐书·党项羌传》云“元和时复置宥州，护党项。至大和中寖疆……至开成末，种落愈繁”[②]。在唐末这里更成为定难军第一代节度使拓跋思恭的起家之地。从志文来看刘敬瑭应率领宥州的党项骑兵援救夏州，以至于后唐“师徒抽退，士庶获安。”志文“广运良筹，具难述耳”。表明刘敬瑭在为节度使李彝超谋划退敌时出力颇多。

粟特人后裔康成是定难军中统帅级的武职军将。根据《康成墓志》，康成卒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年），终年62岁。戴应新先生考证其生于唐哀帝天佑元年（905年），在28岁时参与夏州定难军对抗后唐削藩之战[③]，即墓志所云：“尝值上府多难，南军相逼。时府主大王独权庋旅，外应龟城，甚借奇人，共平家难。公唯思立事，务在荣身，因生归附之心，愿效驱驰之节。”志文中之“府主大王”，戴应新先生认为即时任定难军节度使之李彝超，但笔者以为此“府主大王”应指李彝超之长兄李彝殷。理由在于第一，《康成墓志》中的府主大王在志文中一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时没有具体时间，第二次出现时是在康成逝世之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志文云其时“府主大王忽闻倾，莫遏悲伤。俯念勤劳，仍须吊赠。”而北宋乾德四年（966年）担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正是李彝殷。《康成墓志》中出现两次的府主大王应指同一人。第二，在定难军其他官贵的墓志中，李彝超均被称为太傅而不是府主大王，如李彝超之母《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记李彝超为“故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④]。《后晋定难军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云后唐长兴四年夏州之战时“先太傅牒请权兵把截四面，师徒抽退，士庶获安”[⑤]。在定难军官贵的墓志中，李彝殷均被称为府主大王，如《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记李彝谨病重时，“府主大王以鸽原轸念，雁序兴怀。遣三代之良医，炼十全之良药”[⑥]。李彝谨于广顺二年（952年）七月逝世后，“府主大王忽闻怨悲，□过哀号”[⑦]。广顺二年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纪七，明宗长兴四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5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③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国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⑤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⑥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⑦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9年）担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正是李彝殷。《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亦云："时大周广顺元年，府主大王以郡邑封疆，开托几数千里。"[①]第三，五代时期被封王爵的定难军节度使仅有李仁福和李彝殷，李彝超并未被封王爵。李仁福于后梁乾化三年（913年）三月被"进封陇西郡王"[②]。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又被"封朔方王"[③]。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四月，"辛丑，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④]。李彝殷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被"进封陇西郡王"[⑤]。显德元年（954年）被"进封西平王"[⑥]。定难军本镇官贵称李仁福为"故虢王"[⑦]"故虢国王"[⑧]"韩王"[⑨]"先王"[⑩]，"府主大王"应指李彝殷。

从府主大王为李彝殷可知《康成墓志》所记"尝值上府多难，南军相逼。时府主大王独权庋旅，外应龟城，甚借奇人，共平家难"，并非指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夏州之战。从"家难"来看该事件应属定难军内乱。据《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彝兴传》，晋出帝天福八年（943年）九月定难军曾发生衙内都指挥使与属州刺史联合发动、旨在谋杀李彝殷的大规模动乱。动乱结束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② 《旧五代史》卷八《梁书八·末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6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七·庄宗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页。

④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二十·明宗纪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05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一·太祖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63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四·太祖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01页。

⑦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⑧ 陈玮：《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后晋）生渥：《刘敬瑭墓志铭并盖》，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⑨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后汉］刘梦符：《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⑩ 陈玮：《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陈玮：《古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云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6年第1期。

后，李彝殷上奏云："衙内都指挥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乱，当时收擒处斩讫。相次绥州刺史李彝敏擅将兵士，直抵城门，寻差人掩杀，彝敏知事不济，与弟五人将家南走。"[①]衙内都指挥使为节度使使衙卫队总指挥官，在五代时一般由节度使亲族担任，定难军李氏出于拓跋氏，拓跋崇斌正以其亲族身份任职，其发动的叛乱对李彝殷威胁甚大。在拓跋崇斌被李彝殷被擒拿处斩后，李彝殷祖父拓跋思恭之侄孙绥州刺史李彝敏率绥州州军乘乱进攻定难军会府夏州，但被李彝殷击败。从晋出帝下诏云"李彝敏潜结凶党，显恣逆谋。骨肉之间，尚兴屠害；照临之内，难以含容。送夏州处斩"[②]来看，李彝敏与拓跋崇斌为同谋。但李彝敏自称："与兄夏州节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③]从拓跋崇斌刚被李彝殷斩杀，绥州州军就出现于夏州城外来看，李彝敏所云并不可信，该事件应是一起有预谋的联合叛乱。李彝敏早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即担任绥州刺史，本年绥州与银州州军发生变乱时，由"银州防御使李仁颜与绥州刺史李彝敏讨定之"。《册府元龟》记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为绥州刺史，乞正授，从之"[④]。可见李彝殷取代了李彝敏执掌绥州大权，此后李彝殷以行军司马一职继任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敏又再次担任绥州刺史，双方之抵牾或围绕绥州之控制权。

从《康成墓志》来看，李彝殷在拓跋崇斌与李彝敏发动叛乱时身处险局，仅凭衙军防守夏州城，借助城墙之高厚与猛士奇人成功戡乱，康成即在此危急时刻投效李彝殷。《康成墓志》中的"南军"指绥州州军，因绥州在夏州以南，李彝敏率军从绥州北上而来。"龟城"指夏州城，现统万城东西二内城虽略呈长方形，但其外郭城"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驱向东城北垣"[⑤]，"因迁就地势和为包容最大面积，颇不规整"[⑥]。从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2003年测画的《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图》来看，统万城外郭城确似龟形。《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铭辞有

①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八·少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2页。
②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八·少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2页。
③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八·少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2页。
④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七八《帝王部·姑息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校订本，第2册，第1982页。
⑤ 戴应新：《1975—1977年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又载于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专辑)，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第73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专辑)，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第79页。

曰："龟城一任，凤历十移。"[①]形象比喻李光睿在夏州曾任定难军节度使达十一年。龟城可说是夏州城在北宋初年本地士人心目中的标准形象。

康成投效李彝殷后积极参与定难军的军事行动，志文有云："自后陪随霜戟，扈从风蹄。无若之不同，有艰危而备历。披坚执锐，罔辞深入之劳；破寨收营，屡奋先登之勇。旋致凶徒自溃，峻垒复完，人民例免于伤残，疆境再获于宁静，盖公之力也。"后晋少帝开运元年(944年)二月，李彝殷曾麾军进击契丹以助后晋朝廷，《册府元龟》记本年二月"辛亥，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银州刺史李彝沼，合蕃汉之兵四万抵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②]。《旧五代史》云："辛亥，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合蕃汉之兵四万抵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以牵胁之。壬子，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③]从志文"罔辞深入之劳"可知康成参加了定难军与契丹的战事。杨浣先生曾指出这场战争仅具象征意义，《辽史》对此并未记载，定难军出兵不过是敷衍后晋的虚张声势。[④]但从志文来看定难军曾攻破契丹军寨，康成也冲锋陷阵，立有大功。战后康成受赏被李彝殷署命为"定塞都副兵马"。定塞为都号，都为军事编制。《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军制》亦云："大凡百人为都。"[⑤]定塞都副兵马即定塞都副兵马使的简称。康成任此职后，志文云其"公受宠若惊，临危不惧。攀鞍跃马，每呈骁捷之能；拔刽屠龙，深蕴恢张之志"。从"攀鞍跃马，每呈骁捷之能"可知康成所任定塞都副兵马使应为定难军马军军将。

此后康成又任安远将军使。将为晚唐五代一级军事编制，史载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恭选后院将尤骁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⑥]。唐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曾"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⑦]。宋承五代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⑧]。昭义军后院将有五百人，魏博子将有五百人，正符合"五都为营"之制，可见将为营级编制。康成所任安远将军使即定难军营级编

① 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基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88页。第2册。

③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八·少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7页。

④ 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⑤ [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影印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42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顺元年四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标点本，第8398页。

⑦ 《旧唐书》卷一八一《乐彦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690页。

⑧ 《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864页。

制安远将的军事指挥官，安远为番号。此后康成又升任东城都虞候，历任随使左都押衙、随使都知兵马使，终官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虞候为藩镇军中执法军将，为都虞候总领。康成任东城都虞候，负责巡察夏州东城，处理狱讼。都押衙则总领押衙，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①]志文"爰处爪牙之任"即表明了康成所任之随使左都押衙与定难军节度使之间的亲从关系。志文云康成任随使都知兵马使时"名标上将，誉美公衙"。可见其时为衙军统兵军将。在北宋初年的定难军中，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军将，其统兵作战之军事领导权仅次于定难军节度使，在军中地位极其尊崇。五州指定难军所领有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五州管内都军指挥使即五州都指挥使。藩镇诸州都指挥使多为节度使亲信，如唐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即以其子乐从训为"六州都指挥使"[②]。康成能成为定难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说明其被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深所委遇。

据《康成墓志》，康成对李彝殷忠心耿耿，功莫大焉，因此志文称"明王建位，须凭上将之功。即见善领师徒，能祁部伍，外展纵横之策，内怀慷慨之诚。致令戎境无虞，王庭大治，不惟遐迩，悉慕威名，乃管内都指挥使康成此之功也"。从"戎境无虞，王庭大治"来看，康成主持军务有方，定难军下属蕃部及会府夏州均保持安宁。其对定难军节度使之忠心翊戴被志文称为"弼辅之功莫比"。其作为定难军首屈一指的大将"作明王之手臂"，"力壮明王"。因此其逝世使李彝殷如失肱股，志文云"府主大王忽闻倾，莫遏悲伤。俯念勤劳，仍需吊赠"。

二、定难军节度使与本镇文职僚佐

定难军李氏家族中有多人担任本镇文职僚佐，如《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中》和《资治通鉴》记李彝殷为行军司马；《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李光睿为行军司马；《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兄"光普，见任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③]。《册府元龟》记后唐以李彝超"叔思瑶为夏州行军司马，兄彝殷为节度副使"[④]。《宋史·夏国传》记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可见定难军的行军司马多由定难军节度使的子、兄、叔等近亲担任，为定难军文职僚佐的要职。在这些行军司马中，李彝殷、李光睿、李光普都为定难军节度使辟署，然后上奏朝廷得到批准。《李光睿墓志》云：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戊辰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55 年标点本，第 7250 页。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一《乐彦祯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4690 页。

③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④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四三九《将帅部·违命》，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4953 页。

“王见公之操持有则，画制多谋，谓必构之才，可以付于大事，乃奏授节度行军司马。”[①]这种由节度使自行辟署文职僚佐，然后上奏朝廷的任官模式自唐以来即广为流行于藩镇。后唐任命李彝超叔祖李思瑶为定难军行军司马，兄李彝殷为节度副使，是在逼迫李彝超移镇延州后的安抚措施。北宋直接任命李德明为定难军行军司马，是在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之后，等于承认了李德明具有继承李继迁权力的政治资格。唐制，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搜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糒、军籍、赐予皆专焉”[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制，行军司马位在节度副使之上。天宝以后，节镇以为储帅。”[③]李彝殷、李光睿、李德明由行军司马而为节度使，正反映了行军司马是定难军的储帅。

在定难军文职僚佐中，还有多人为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的戚属。《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题墓志为“从表侄孙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毛汶撰”[④]，可见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为李仁福妻渎氏的从表侄孙。毛汶在志文中谈到自己受到渎氏恩养，“汶伏念世依勋宇，显受煦慈。弥增仰恋之心，徒逦潜然之泪。汶叨蒙宠命，悚怆尤深。但禀指踪，罔避冗散。临笺濡染，益抱凄凉”[⑤]。《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题“从表侄节度判官朝议郎试大理评事赐绯鱼袋郭峭撰”[⑥]，可见定难军节度判官郭峭为李仁福之子李彝谨的从表侄。郭峭亦为李彝谨恩养，他在《李彝谨墓志》中写道：“峭早依公门馆，偏忝恩知。诚惭凫胫之才，莫述龙头之德。辞不获已，宁无愧乎。”[⑦]

毛汶家族和郭峭家族甚至世袭定难军文职僚佐。《毛汶墓志》记毛汶之父毛崇厚，“皇任定难军节度观察判官、兼掌书记、朝请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⑧]。《北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题“摄节度掌书记

①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十二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16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⑥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⑦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⑧ 陈玮：《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郭贻撰"①。《李光睿墓志》题"夏州节度判官承奉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郭贻撰"②。《李继筠墓志》题"摄节度掌书记郭正撰"③。《李光遂墓志》题"摄节度掌书记郭正撰"④。郭贻、郭正、郭峭应为同一家族之人。毛崇厚、毛汶父子和郭峭、郭贻、郭正均担任定难军判官或掌书记,判官和掌书记都是藩镇幕府文职僚佐中的高级官职。判官在藩镇幕府中地位甚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诸使之属,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⑤,职掌广泛。掌书记执掌藩镇表奏书檄事宜,自唐"开元以后,诸节镇皆置之;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⑥。掌书记在藩镇幕府中的地位处于判官之下,推官、巡官之上。据赖瑞和先生研究,掌书记属于唐代基层文官,"多作为唐代士子精英或有文词者释褐之官,或作为他们的第二、第三任官,过后他们即升迁为其他官职"⑦。

定难军文职僚佐均由定难军节度使辟署并予以升迁。从《毛汶墓志》来看,毛汶于后梁乾化元年(911年)被"故虢国王"署命为僚属。"故虢国王"即指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志文"职倅雕阴"指毛汶于定难军属郡绥州担任副贰僚佐,"倅"即副,《周礼·夏官·戎仆》云:"戎仆掌驭戎车,掌王倅车之政。"⑧"雕阴"则代指绥州。《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云绥州在隋炀帝时"又改为上州,后又改为雕阴郡,以雕山在西南,故名"⑨。唐五代府州上佐有长史、司马、别驾,毛汶或任其中一官。

志文又载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先王"李仁福署命毛汶为摄定难军节度推官。推官为藩镇幕府文职僚佐。《新唐书·百官志》云藩镇节度使下有"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各一人"⑩。关于推官的职掌,严耕望先生指出:"推官乃推勾狱讼之职。"⑪石云涛先生另指出观察使推官与节度使推官职掌有所区别,"节度使推官理军讼,而安史之乱后由参访使演变而成的观察使之推

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②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88页。

⑥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纪七十六,昭宗干宁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80—8481页。

⑦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1页。

⑧ [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夏官司马第四下·戎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95页。

⑨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页。

⑩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⑪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23页。

官则理民讼”[①]。赖瑞和先生则认为推官“是比巡官高一级的执行事务官员，职掌和巡官一样多样化，可能执行府主委派的任何职务，非仅审理狱案一项”[②]。

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毛汶在定难军幕府中又获升迁。志文没有明确交待其升为何职。从上下文判断此职与定难军与朝廷之间的文辞表章往来密切相关。毛汶任此职前为定难军推官，在任此职后终官判官。据《新唐书·百官志》，掌书记在藩镇幕府僚佐中地位高于推官，低于判官，而掌书记专掌书奏表启，因此毛汶在长兴二年(931年)所升迁的应为定难军掌书记。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今府主”又延请毛汶出任定难军判官一职。“今府主”即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旧五代史》卷四十七《后唐末帝纪中》云清泰二年(935年)三月辛丑，“以夏州行军司马李彝殷为本州岛节度使，兄彝超卒故也”[③]。因此志文称“今府主初绍洪勋，荣联河岳”。判官在藩镇节度使幕府文职僚佐中地位仅次于副使、行军司马，而位居掌书记之上。志文“虽训练之机繁，兼掌檄之无旷”，说明毛汶以节度判官一职兼任掌书记。

统万城附近近年来出土一何姓士人墓志，志题“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序”，根据志文，何公“曾祖子岩，字隐之，皇任节度随军文林郎、试右武卫长史、摄夏州医博士、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曾祖母琅琊郡王氏。祖德遇，字嗣宗，皇任夏银绥宥等州观察衙推、宣德郎、守绥州长史，右可授朝散大夫、右监门卫长史同正、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衙推，右可授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试大理司直、□赐绯鱼袋。祖母清河郡张氏”[④]。《何德璘墓志》云何德璘“考子岩，皇任儒林郎、守夏州医博士、试太常寺奉礼郎。妣太原郡王氏。”继云何德璘于“天成四年，先王改署观察衙推，寻奏授右监门卫长史□职。清泰元年，今府主绍位……遂奏授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仍兼朱绂”。又记何德璘妻为“清河张氏”[⑤]。将两方墓志所记何德遇、何德璘的世系、官衔及妻室相对比，两人实即一人，何公为何德璘之孙。从《何公墓志》所叙何公逝于北宋开宝元年(968年)来看，何氏家族在夏州活动的时间从唐末一直持续至北宋初年。

何氏家族自何德璘之父何子岩起仕职于夏州，将《何德璘墓志》与《何公墓

①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②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5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二十三·末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4页。

④ [宋]郭贻：《宋摄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⑤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志》相结合可知何子岩起家为节度随军，随军为唐藩镇幕府文职僚佐。《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云节度使有“随军四人”①。严耕望先生认为：“盖随军无定职，临时遣使勾当职事耳。”②随军为节度使之亲从，于劭《田司马传》即称其为“耳目”之职。③此后何子岩任摄夏州医博士。医学博士，“掌疗民疾”④。《唐六典》记中都督府设有“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⑤。而夏州据即《元和郡县图志》为中都督府。以后何子岩又任守夏州医博士，何子岩所任夏州医博士为正九品下，低于其所任文散官正九品上儒林郎，因此志文称其为“守夏州医博士”。从《何德璘墓志》来看，何德璘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被“先太尉”“补衙前虞候”。“先太尉”指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其为定难军基业奠定者拓跋思恭之弟。开平元年(907年)，后梁朝廷“授思谏检校太尉、兼侍中”⑥。虞候乃“保卫军中之制度、纪律或侦查非法事并消除之职也”⑦，为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故虢王”署命何德璘为“州衙推”。“故虢王”指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五代会要》云后唐庄宗长兴四年(931年)五月，朝廷“追封故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虢王”⑧。“州衙推”则为夏州州院文职僚佐，为“当州荣职”。⑨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先王”改署何德璘为“观察衙推”。此处之“先王”亦指李仁福，其任定难军节度使时间为后梁开平四年(910年)至后唐长兴四年(933年)。

后唐清泰元年(934年)，“今府主绍位”，又将何德璘升为“节度衙推兼银州长史”。“今府主”指何德璘于后晋天福八年(943年)逝世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节度衙推”为藩镇幕府文职僚佐。《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记节度使下有衙推一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制，节度、观察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职也。”⑩五代承唐制。何德璘以节度衙推兼任银州长史反映了定难军属州的藩镇化。此后李彝殷再向后晋朝廷为其奏得“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仍兼朱绂”。唐制

① 《新唐书》卷四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09页。
②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③ 《全唐文》卷四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4374页。
④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14页。
⑤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〇《大都督府中都督下都督官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4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746页。
⑦ 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⑧ [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⑨ 《唐故集州衙推狄(玄诉)墓志》，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1042页。
⑩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复三年十二月乙亥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622页。

节度使兼领观察使，其幕府僚佐“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①。五代承唐制。据石云涛先生研究，观察支使“是助府主从事政务之职，而且有分使出入之责”②。

据《何德璘墓志》，何德璘长子何绍文被李彝殷署为观察衙推兼绥州长史。从《何公墓志》可知何绍文后又升为观察支使。“观察衙推”为唐五代观察使使府文职僚佐之一。五代时的定难军节度使官衔全称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州刺史，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③。“观察处置使”为观察使、处置使合称。唐制节度使兼领观察使，其幕府僚佐设有衙推。五代承唐制，因此定难军使府中设有观察衙推。

从何绍文之子《何公墓志》来看，何公于后唐清泰元年（943年）被“先王”委任为定难军节度要籍。“先王”指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其曾被后周封为西平王，被北宋追封为夏王。节度要籍为节度使亲信属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要籍官，亦唐时节度衙前之职……则要籍乃节度使之腹心也。”④唐制，藩镇节度使之下有要籍一人。藩镇要籍官常参谋军事，《大唐故辅国大将军兼左骁卫将军御史中丞马公墓志铭》即云志主马实“起家为范阳军要籍，本军疑政，画多自出”⑤。另外，节度要籍还参与管理藩镇的财务工作，《唐故上谷成公墓志铭》即云志主成君信之婿牛从实为“节度要籍支计斛斗司”⑥。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何公被授为“府衙推、宣德郎、守绥州长史、兼监察御史、柱国”。“府衙推”指定难军会府夏州衙推。监察御史为其宪衔，非实任，但在本州仍然具有监察职权。因此志文称其“言惟正直，道屏奸邪”。天福九年（944年），何公又被“摄授观察衙推、宣德郎、兼监察御史、柱国”。志文称“摄授”是指此职为定难军节度使自行辟任。根据志文，何氏在担任定难军观察衙推后以其文韬武略参与定难军的拓土开疆。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何氏又被“摄授节度衙推、守银州长史、朝请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国，仍摄夏州长史”。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牙推，在节度推官之下。”⑦“殿中侍御史”为其宪衔，“柱国”为何公勋官。何公还摄任夏州长史一职。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何公又被定难军节度使辟署为摄夏州观察支使。

---

①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09页。。
②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③ 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3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三年正月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7318页。
⑤ 《全唐文》卷五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6049页。
⑥ 《全唐文》卷九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324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穆宗长庆三年四月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7826页。

幕职官本身没有品阶，因此藩帅要为幕职官奏请散官、试衔、宪衔等养秩。《毛汶墓志》铭辞云毛汶的散官、试衔、宪衔等“荐自钧恩，荣承天眷”。《毛汶墓志》记毛汶在为绥州上佐时“官及评事”，是指毛汶被授予大理评事，大理评事为大理寺派遣出使外州推鞫的法官，唐制从八品下，后梁承唐制。毛汶以藩镇属州官员而任此官，此官应为其试衔。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七月十四日，毛汶以小疾不愈终于家中，终官“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朝议郎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柱国赐绯鱼袋”。“朝议郎”为唐正六品上文散官，后晋承唐制。“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为检校官，“尚书水部员外郎”是指尚书省下属工部之水部员外郎。唐制水部为工部属司，水部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①。后晋承唐制，“侍御史”为其宪衔，唐制从六品下，“柱国”为其勋官。

根据《何德璘墓志》，何德璘在为夏州衙推时，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向朝廷为何德璘奏得试官右监门卫长史。此后李彝殷再向后晋朝廷为其奏得“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仍兼朱绂”。将仕郎为从九品下文散官，试大理评事为试官。“仍兼朱绂”则指何德璘被朝廷赐绯及鱼袋。从何绍文之子《何公墓志》来看，何公于后唐清泰元年（943年）被“先王”李彝殷奏授朝廷获得从九品上文散官文林郎、试官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何公任节度要籍时，其文散官及试衔又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年）被升为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何公被授为夏州衙推守绥州长史时，文散官升为正七品下宣德郎，获得宪衔监察御史和勋官柱国。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何公以节度衙推任银州长史时，获得试官试大理司直，宪衔升为从七品上殿中侍御史。

《白敬立墓志》记定难军判官李潜拥有检校官检校尚书库部郎中、宪衔侍御史。《毛汶墓志》记毛汶之父毛崇厚拥有文散官朝请大夫、检校官检校左散骑常侍、宪衔御史大夫、勋官上柱国。《李光睿墓志》记定难军判官郭贻拥有文散官承奉郎、试衔大理司直、宪衔监察御史。《后唐破丑夫人墓志》记绥州军事判官张少卿试衔为大理评事。这些检校官、文散官、试衔、宪衔应均由定难军节度使向朝廷奏得。

定难军文职僚佐的鱼袋亦为定难军节度使向朝廷奏得。《何德璘墓志》记李彝殷为何德璘向后晋朝廷奏得“观察支使、将仕郎、试大理评事，仍兼朱绂”②。“仍兼朱绂”即指何德璘被朝廷赐绯及鱼袋。据《毛汶墓志》，毛汶也被朝廷赐绯及鱼

①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1页。

②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袋。毛汶之父则被赐紫金鱼袋。赐紫金鱼袋是指毛崇厚被朝廷赐紫服及金鱼袋。紫为官员章服颜色，金鱼袋为盛装表示官员身份的鱼符之袋。着紫服，佩金鱼袋为唐代官员章服最高一级，一般为三品及以上官员才能享有。毛崇厚以藩镇判官享有此待遇可以说十分荣耀。据《白敬立墓志》，定难军判官李潜也被赐紫服及金鱼袋。据《李光睿墓志》，郭贻被赐赐绯及鱼袋。

定难军文职僚佐与定难军节度使结有较深的亲从关系。《毛汶墓志》记毛汶“匡持太府，数十载之笔阵文锋；翊辅王门，几千般之干天颂阙”。墓志铭辞亦记“匡持大府，翊辅旌旃”①。从志文来看，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得知毛汶逝世，十分悲痛，停止办理公务并着素服哀悼。《何德璘墓志》记何德璘被“府主深益知之，频所嘉叹”。称何德璘“公职列宾阶，位亲筹幄。沉机妙画，皆成有国之规；忠论诚言，□□全家之道……由是连朝继夕，承密论于从容”。何德璘子何绍文被“府主委而用之，赏其忠尽”②。《何公墓志》则记何公“外则以文才武略，开拓边封。……但蕴雄谋，以匡霸业。因得公王见待，鱼水同荣。外则以哲士筵客，内则以良医委任。胸襟有术，必能兴久覆之山河”③。墓志铭辞亦云何公“官崇幕府，位佐侯王。内分心腹，外壮纪纲。抑强扶弱，替否献藏”④。

从《何德璘墓志》及《何公墓志》来看，何氏家族为夏州地区的医学世家，何德璘及其孙何公先后以绝妙医术受知于定难军节度使并为其重用。何德璘之父何子岩任夏州医学博士，何德璘受其真传，被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以公继之家伐，习以方书，药有□全，功传百中，特署州衙推”，后又被李仁福之子李彝殷“以公□赡三医，恭勤两政，迁署节度衙推兼银州长史”。从志文“其或民有迫切，公不隐藏。凡药石以上闻，必春膏之普及”⑤来看，何德璘不仅为定难军节度使服务，还为百姓医疗。何德璘之子何绍文也“艺可承家，术多济世”⑥，何绍文之子何公则“幼习家风，颇积医论。愈威王之疾，已播良名；追良魂，屡显神效。非卢生之辈，董氏

① 陈玮：《后晋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②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7—68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⑤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⑥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之徒，莫能偕也”[①]。其高超医术被赞誉为能与燕地方士卢生、上古神人董父相媲美。后何公又为李彝殷之兄李彝超“以医见重，奏授文林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改充节度要籍。公以侯伯相知，功名必遂。转留心于方术，益砺节于衙庭。”在任观察衙推时，何公“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其精湛医术被称为“神通丸散，妙绝针汤。术追魂魄，脉认阴阳”。何公还被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派遣为其弟李彝谨诊病，《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云李彝谨病重时，“府主大王以鸽原兴怀，雁序兴怀。遣三代之良医，炼十全之上药”[②]。由于何公先后为数代定难军节度使医治，因此在其殁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罢公衙而兴叹，以为折吾梁柱，丧我股肱。追想无宁，悲伤倍切。仍差吊使，厚赐赠仪”[③]。何公之子何令珣、何令瑾等也继承家学，被称为“颇精方论，不辜门望，悉有父风”[④]。

夏州医学世家何氏家族族出粟特，而中古时期的粟特人多富有医药知识并从事医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云康国僧人迦跋摩入华后，“奉敕令往交趾采药”[⑤]，显然精于药学。据敦煌文书，公元982年有粟特人翟胡在敦煌渠北开店卖药。[⑥]关于另一卖药的阿柴唁胡，郑炳林先生指出：“阿，疑是‘何’字之误，既称之为胡，应是西域粟特人。”[⑦]可见具有医药知识的何姓粟特人也出现于沙州。郑炳林先生还认为唐代同州名医石公集“有可能是寓居中国的胡人，因为昭武九姓胡中，石是其一”[⑧]。美国学者则认为：“一位显然擅长于眼科的粟特（胡）医生，在著名的中国僧人鉴真去日本期间给他做过治疗。”[⑨]在沙州还有粟特医家史再盈。[⑩]与何氏家族任定难军文职僚佐、武职军将相似，史再盈在后晋天福七年（942年）

---

① [宋]郭贻：《宋摄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②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③ [宋]郭贻：《宋摄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④ [宋]郭贻：《宋摄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⑤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

⑥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医学酿酒建筑业中的粟特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⑦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医学酿酒建筑业中的粟特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⑧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6页。

⑨ 党新玲：《五代敦煌粟特人医家史再盈》，《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⑩ 克里斯托夫·贝克威斯著，端智译注，宗喀·漾正冈布校订：《公元七八世纪希腊医学传入吐蕃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也任归义军的节度押衙，他修习过以耆婆为代表的印度神秘医术。夏州粟特人何氏家族世代承传之医术被志文赞为神妙，其或具有外来文化背景。

定难军文职僚佐还多为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成员撰写墓志。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之墓志由银州防御判官齐峤撰写，齐峤在志文中谈道："贵遵请讬，聊敢涤濡。"[①]李仁宝之妻破丑氏的墓志为绥州军事判官张少卿所撰。李仁福妻渎氏的墓志为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所撰。李彝谨妻里氏的墓志由摄节度推官刘梦符撰写，刘梦符在志文中谈道："梦符才非倚马，学愧雕虫，难为抚掌之嗤，强副指踪之命"[②]。李彝谨另一妻祁氏的墓志为绥州军事判官所撰，作者在志文中写到"德状恭蒙传诲，令草志文。但惭短拙之词，难播盛荣之贵"[③]。李彝谨的墓志则由节度判官郭峭撰写。李光睿的墓志由节度判官郭贻撰写。郭贻在志文中谈到"贻叨依俭幕，久厕原宾，遽承见讬之私，俾叙无穷之绩"[④]。李继筠的墓志由摄节度掌书机郭正撰写。郭正在志文中谈到"正忝兹下位，实愧不文。见命庸虚，乃为铭曰"[⑤]。

三、定难军节度使与本镇州刺史

定难军辖夏、银、绥、宥四州，后又增领静州。定难军属州刺史的地位在本镇仅次于节度使。李仁福逝后，后唐逼迫李彝超移镇，在对李彝超的诏谕中谈道："其李彝超已除延州节度观察留后，便勒赴任。……应夏、银、绥、宥等州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债负、残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挥使、押衙已下，皆勒依旧，各与改转官资。"[⑥]可见在定难军，刺史位次节度使而高于武职军将。

大批定难军节度使的亲族曾担任本镇州刺史。《李仁宝墓志》记李仁宝曾任绥州刺史。李仁宝妻破丑氏之墓志记李仁宝有子李彝憼。《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均记有绥州刺史李彝敏，敏同憼，互为通假。《李彝谨墓志》记李仁福之子李彝谨终官绥州刺史，李彝谨任绥州刺史时，长子李光琇任绥州衙内指挥使，次子李光琏任绥州左都押衙。《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五月"丙子，

①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④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⑤ 陈玮：《北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第4期。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8页。

以故绥州刺史李光琇男匕罗为绥州刺史"①。可知李光琇由绥州衙内指挥使升为绥州刺史,李光琇子李匕罗又袭任绥州刺史。前述衙内指挥使为定难军储帅,李光琇以绥州衙内指挥使而为绥州刺史,体现了定难军属州的藩镇化。李仁宝、李彝敏父子世袭绥州刺史;李彝谨、李光琇、李匕罗祖孙三代世袭绥州刺史,表明定难军节度使对亲族实行了分封制,亲族长期禄食于属州。李彝谨妻里氏之墓志即云:"祖列双旌,夫荣五马。分叶于尧,霸基于夏。"②李彝谨另一妻祁氏之神道志亦称祁氏"后即从夫分茅,崇家八载,抱蟊蜇而无姤,怀葛藟之有迁"③。《李彝谨墓志》铭辞亦称"家传将相,道契皇王。分符共治,拓土开疆"④。《宋史·夏国传》所载李继迁曾祖李仁颜、祖父李彝景、父李光俨世袭银州防御使,历唐末五代,也属于分封任官制。此外《资治通鉴》记有绥州刺史李仁裕,《册府元龟》记有银州刺史李彝沼。《李光睿墓志》记李光睿弟"光宪,见任绥州刺史"⑤。《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记李光宪、李克文为绥州刺史,另记李光远、李克文为银州刺史。

定难军属州的刺史均先由定难军节度使委任,再向朝廷奏请批准。这些刺史大都出身武职军将。据《刘敬瑭墓志》,刘敬瑭于后梁时为定难军管内马步军都知兵马使,"至后唐同光三年,以宥州地属冲要,民整凋残,若匪得人,孰为绥抚。故虢王辍其绾众,权请知州。期年六月内,恩渥遐敷,正临郡印"⑥。根据志文,刘敬瑭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被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任命摄理宥州刺史,于该年六月之内转为正任刺史。《李仁宝墓志》记李仁宝被"故虢王睹其节概,举以才能。遂署职于军门,颇彰勤绩;俄分符于属郡,甚有嘉声。莫不洞晓鱼钤,深明葛阵。行驱隼旆,坐镇雕阴"⑦。《李彝谨墓志》记李彝谨在效力衙军后,"口口中权,出临属郡"⑧。《册府元龟》云长兴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为绥州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太祖开宝四年五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6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④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⑤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⑦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⑧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刺史，乞正授，从之”①。《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二》云：“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权知绥州。”②据《李光睿墓志》，李克文最先为衙前都知兵马使，但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来看，李克文后来又升为绥州刺史、银州刺史。

定难军属州州官中，不仅州刺史由定难军节度使自行委任，州上佐亦由定难军节度使选任。《刘敬瑭墓志》记刘敬瑭由管内马步军都知兵马使而为银州长史。《何德璘墓志》记何德璘被李彝殷“迁署节度衙推兼银州长史”。何德璘之子何绍文被李彝殷“署以观察衙推兼绥州长史”③。《何公墓志》记何公于“广顺元年正月廿五日，摄授节度衙推、守银州长史、朝请郎、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国，仍摄夏州长史”④。长兴四年之战前，后唐为削弱定难军节度使对属州的控制，欲收回定难军属州上佐的任命权。《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五》云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七月“刑部侍郎马缟贬绥州司马……曹州刺史成景宏贬绥州司户参军，续敕长流宥州”⑤。清人吴广成指出：“考河西自李氏世袭，绥、宥诸州不归十道，故终五代诸姓不复铨除。明宗此举，或欲示其威权。而李氏从违，《新》、《旧》两史并不载。”⑥

定难军属州州刺史军权颇重，经常参与定难军的对外军事行动。《册府元龟》云后晋少帝天福九年（944年）三月“辛亥，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银州刺史李彝沼，合蕃汉之兵四万抵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乙巳，定难留后李继筠言，遣所部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帅蕃汉兵卒缘黄河列寨，渡河略敌境以张军势”⑧。定难军属州州刺史大多为定难军节度使亲族，官位崇高，军权颇重，因此常对定难军节钺抱有觊觎之心。《旧五代史·李仁福传》记后晋天福“八年秋，彝兴弟绥州刺史彝敏与其党作乱，为彝兴所逐，彝敏奔延州，彝兴押送到阙，骨肉二百余口，朝廷以彝兴之故，絷送

①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七八《帝王部·姑息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982页。

②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2页。

③ 陈玮：《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

④ ［宋］郭贻：《宋摄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三九《唐书·明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0页。

⑥ 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⑦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88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7页。

本道斩之”[①]。李彝殷上奏云:“衙内都指挥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乱,当时收擒处斩讫。相次绥州刺史李彝敏擅将兵士,直抵城门,寻差人掩杀,彝敏知事不济,与弟五人将家南走。”[②]可见这是一次属州刺史与衙内都指挥使联合发动、旨在谋杀节度使李彝殷的大规模动乱。

《西夏书事》还记有“太平兴国六年秋八月,银州刺史李克远袭夏州不克。初继筠卒,子幼不得嗣。继捧以季弟袭职,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克远素暴悍,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夏州。继捧侦知,伏兵以待。克远兵至,入伏败死”[③]。可知在李继捧任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时,银州刺史李克远曾发动叛乱。李继捧入朝献地也是由于属州刺史上告宋廷。史载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继捧之从父也,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辛丑,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④]。由于定难军内部的动乱,宋廷才得以掌握对定难军会府州长官的任命权。在李继捧入朝后,对宋廷持有抗拒之心的仍然是定难军属州刺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十一月己酉,以李继捧为彰德节度使。先诏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皆赴阙,乃授克宪单州刺史,克文沣州刺史。克宪初偃蹇不奉诏,遣通事舍人袁继忠谕旨,遂与继忠俱至,仍以克文权知夏州”[⑤]。宋廷先命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赶赴京师,一是为了了解李继捧在镇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定难军的势力,以便迅速接收定难军所属五州之地。

最后起兵抗宋的李继迁也属定难军李氏的地方势力,其曾祖以下世居银州。李继迁即从银州出奔地斤泽,拉起反宋大旗。李继迁及弟李继冲曾被宋廷除授银州观察使及绥州团练使。宋太宗曾谈到对李继迁“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予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⑥]。可见北宋除了保持对定难军会府夏州的占有外,将银州、绥州、宥州都让与李继迁弟兄统辖。正是由于占领了银州、绥州、宥州及随后攻占灵州,李继迁才由银州观察使被宋廷拜为定难军节度使。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49页。
②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八·少帝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2页。
③ 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0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春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页。

第四节　历史记忆与权力合法性塑造：李继迁、李元昊政治谱系之建构

拓跋思恭作为首任定难军节度使，在定难军中代表着政治权威，在其殁后仍名望不减，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拓跋思恭族子李仁宝墓志即称："以唐中和之岁，国家多难。圣主省方。又闻骨肉之间，迴禀英雄之气，长驱骁锐，却复翠华。厥立奇功，果邀异宠，遽分第土，遂赐姓焉。已八十年，四五朝矣。"[①]拓跋思恭殁后，子李成庆、弟拓跋思谏先后担任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殁后，思谏子李彝昌继立，但不久就被乱军所杀。乱事平定后，李仁福被推举为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后的定难军节度使都为其子孙。关于李仁福与李彝昌的血缘关系，《资治通鉴》云开平四年（910年），"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作乱，杀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②]。可见李仁福为李彝昌的族父，由于李彝昌为拓跋思恭之侄，李仁福则为拓跋思恭族子。李仁福之子李彝谨的墓志记李彝谨"祖讳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统教练使，累赠太师"[③]。

关于此李思□，学界大都以为是拓跋思恭。但汤开建先生指出拓跋思恭曾任四面都统，未任四面都统教练使，教练使仅仅是藩镇军将。他认为此李思□乃被唐廷拜为太师的拓跋思孝。[④]但《李彝谨墓志》明确写到李思□是被累赠太师，李思□应是在殁后由于子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而被赠官，累加至太师。《资治通鉴》云："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仁，荐弟思敬自代，诏以思孝为太师，致仕"[⑤]。由此来看，李思孝是以太师致仕，则其在世时即为太师。这样，《李彝谨墓志》所记李思□就不是李思孝，而是另有其人。

虽然李仁福为拓跋思恭族子，但是李仁福之子李彝超、李彝殷、李彝谨都自称为拓跋思恭的直系后代。《资治通鉴》记长兴四年之战中，"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

① 陈玮：《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8721页。

③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④ 汤开建：《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替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干宁三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84页。

之”[①]。《册府元龟》则记“彝殷祖拓拔思恭,唐光启初得夏州节钺,自相继袭”[②],可见李彝超、李彝殷对后唐讨伐军宣称的祖父是指拓跋思恭。为何李彝超、李彝殷自称为拓跋思恭之后,因为后唐逼迫李彝超移镇,又遣大军攻围夏州,使李氏在夏州的世袭统治遭遇重大危机,自称为拓跋思恭之后既可以在后唐讨伐军面前抬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强调世袭统治的合法性,又可以对内凝聚军心、民心,唤起军民对拓跋思恭在镇时的历史记忆,从而同仇敌忾抗拒后唐。

长兴四年之战后,李彝超、李彝殷所创造的本家族为拓跋思恭之后的历史记忆普遍为家人所接受。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立石的《李彝谨墓志》云:“果于唐祚,又降奇才。寻遇国步艰难,人情叛乱。值刘琨之夜舞,当樊哙之横行。公先代首合师,誓除奸贼。安一人于平仄,领十道之车徒。重立皇纲,始自公之先祖。”[③]贞观初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而唐制“都统总诸道兵马”[④]。《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云:中和二年(882年)“八月丁巳,东方魁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拓拔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⑤]。同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党项传》又载:“拓跋思恭……中和二年,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⑥]可见《李彝谨墓志》所记载的先祖即拓跋思恭。李彝谨之妻里氏的墓志铭辞亦云:“祖列双旌,夫荣五马。”“祖列双旌”是指李彝谨的祖父为持有旌节的节度使,前述李彝谨的祖父李思□仅为四面都统教练使,不是节度使。铭辞中的节度使实指拓跋思恭。

进入北宋后,李仁福孙李克文仍声称祖父为拓跋思恭。《宋太宗实录》云:“乙酉,麟州防御使李克文来朝,以唐僖宗赐其祖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铁券、朱书御扎上献。”[⑦]李克文之子李继元亦“表述其祖保大定难节度使、朔方郡王拓拔思恭仕唐,剪灭黄巢,赐姓”[⑧]。李克文、李继元都是入宋的定难军李氏族人。留居银、夏,起兵抗宋的李继迁却没有宣称自己为拓跋思恭之后,而是声称自己为李彝殷之后。据《宋史·夏国传》,夏太祖李继迁为北宋初年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的高祖为拓跋思忠,曾祖为李仁颜,祖为李彝景,父为李光俨。拓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85页。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六《帝王部·招怀第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54页。
③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8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8页。
⑦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实录校注》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6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011页。

跋思忠之兄即为定难军基业的奠基者拓跋思恭，如此，李继迁则为拓跋思恭的族孙。但史载李继迁起兵后，“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族帐稍稍归附”[①]。可见李继迁在起兵时是以李继捧的祖父李彝殷为政治偶像进行对外宣传，并标榜自己是李彝殷之孙。李彝殷在李继迁之前的历任定难军节度使中，是唯一一个被生封王爵的，且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因此在定难军属地乃至党项羌民族中享有巨大的政治威望。《宋史·夏国传》云：“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继迁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②]世有西土的李氏主要指定难军节度使直系家族，作为支庶的李继迁之所以能够获得党项豪族的支持起兵，正是因为大打李彝殷这块政治招牌。

李继迁起兵后，宋太宗派遣已经入朝献地的李继捧返回夏州，任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希冀其能消弭李继迁联络诸党项豪族发动的战乱。但李继迁已经在党项诸豪族中站稳脚跟，成为党项羌的政治代言人，与已经汉化的李继捧分道扬镳。作为正宗李彝兴后人的李继捧反倒失势，还依靠李继迁向辽朝求取官爵。最后在宋军的讨伐下李继捧没有得到党项豪族的支持，迅速被宋军擒拿归阙。从此李继迁成为定难军李氏在党项羌聚居区唯一具有合法统治威力的代表，他成功地完成了作为李彝殷后人这一政治谱系的创造。李德明在为夏王时，宋廷则责其子弟入质，“德明谓非先世故事，不遣”[③]。可见李继迁一系对所谓“先世故事”这一政治规则的熟稔。

至西夏正式立国前，李元昊已不满足于自称为李彝殷的后人，他开始向定难军首任节度使拓跋思恭看齐，将其加入自己的政治谱系。李元昊在告宋称帝表中称“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④]。拓跋思恭与李彝殷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定难军基业的开创者，后者为定难军基业的继承者。李彝殷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但拓跋思恭所生活的时代则远远早于宋太祖。拓跋思恭与赵匡胤的身份也大为不同，前者是镇压黄巢之乱的藩镇节度使，被唐僖宗御赐皇姓，在唐末显赫一时，自其至李彝殷均为藩镇士族；而赵匡胤则只是以后周禁军将帅起家，进而篡夺后周皇位，赵宋皇室并没有士族身份。北宋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五代武人政治的延续，而唐代的贵族政治对于李元昊来说更具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6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986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990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995页。

有吸引力，以至于西夏继承了唐代的德运，之后的谅祚改制也多仿唐制。尊奉唐制在晚唐以来的西北地区是为一种政治传统，如沙州归义军即长期奉唐为正朔。因此作为西土之国君长的李元昊声称自己为拓跋思恭的直系后代对其建国来说更具政治合法性及影响力。

在李元昊将拓跋思恭加入自己家族的政治谱系之时，宋人对定难军李氏的世系已不甚清楚。《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云："夏国赵保吉，姓拓跋，其远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①]前述李继迁曾祖为李仁颜，宋人虽记载有误，但却使李继迁（赵保吉）的政治谱系上溯于李仁福。至宋哲宗时，宋廷已认可李继迁创造的政治谱系，《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哲宗赐秉常诏云："夏国主秉常世守西土，藩卫中邦，自其祖彝兴以来，沐浴皇化，职贡时至，率多忠勤。"[②]诏书明确指出李彝殷为李秉常之祖，说明宋廷并没有接受李元昊声称自己为拓跋思恭之后。

宋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将拓跋思恭与李仁福分开，如前述《隆平集》所云李仁福仅为拓跋思恭之族人，非其直系后代。《东都事略·西夏传》则云李仁福与拓跋思恭之弟、继拓跋思恭担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拓跋思谏"不知与思谏为亲疏也"[③]。《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则云："李仁福，不知其世家。""不知其与思谏为亲疏也。"[④]《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则记李仁福"本拓跋氏之族也"[⑤]。因拓跋思恭为唐"僖宗赐姓，故仁福亦以李为氏"[⑥]。可见宋人一直坚持李仁福只是拓跋思恭的族人。

《旧五代史》撰于宋太祖年间，其时定难军李氏已宣称自己为拓跋思恭之后。为了在统一战争中削弱定难军李氏的政治名望，宋朝史臣薛居正等仅撰叙李仁福为拓跋思恭族人。《隆平集》题为曾巩撰，《新五代史》为欧阳修等撰，《东都事略》为南宋王称所撰，其时距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捧举族入朝为时不远。李继捧移居内地后，定难军李氏仍然声称自己为拓跋思恭的直系后裔。但是宋代史籍对拓跋思恭与李仁福的关系语焉不详，这应是宋人有意为之，旨在不承认李彝超、李彝殷所创造的"拓跋思恭—李仁福—李彝超—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李继捧"这一政治谱系，同时也不承认李继迁、李元昊所创造的"拓跋思恭—李仁福—李彝殷—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这一政治谱系，否认拓跋思恭为西夏始祖。

---

①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94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佑元年四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64页。
③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七，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098页。
④ 《新五代史》卷四〇《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36页、437页。
⑤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746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746页。

虽然宋人不承认李元昊之世系，且《宋史·夏国传》明确记载了李继迁高祖至其父姓名，其高祖与拓跋思恭的血缘关系。但至南宋时，夏仁宗仁孝仍声称自己为拓跋思恭之后，其回吴璘檄书云："如孤者，虽处要荒，久蒙德泽，在李唐则曾赐姓，至我宋乃又称臣。"[①]李元昊所创造的政治谱系得到了辽人和金人的承认。《辽史·西夏传》称西夏"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②]。《金史·西夏传》亦云："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拓跋思恭……历五代至宋，传数世至元昊，始称帝。"[③]辽、金作为北族王朝，自然不在意李元昊所创造的政治谱系对于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合法性所造成的威胁。

李元昊所创造的远支政治谱系主要是指他号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之后裔。《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李元昊自云："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④]《宋史·夏国传》则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⑤]。这种政治谱系被李元昊以后的西夏皇帝所继承。西夏皇族称自己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渊源有自，前文已详细讨论。拓跋思恭在唐末即被目为北魏拓跋力微之后，由于李元昊继承了自拓跋思恭所遗传的定难军衣钵，并以拓跋思恭为先祖，因此其也不得不尊拓跋思恭的"始祖"北魏拓跋氏为始祖。李继迁尊李彝兴为始祖与李元昊尊北魏拓跋氏为始祖在于二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有所不同。李继迁尊李彝兴为始祖旨在恢复定难军旧业，并未想独立建国。但随着李继迁晚年攻占灵州，又被宋廷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其开始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在李德明时期，定难军已成为名义上臣奉北宋，实际上刑赏自专、官吏自免的强藩。李元昊即位后，定难军从强藩升为独立国家的条件业已成熟，但定难军毕竟在名义上臣属北宋，因此李元昊以北魏拓跋氏为始祖更具有称帝图霸的政治合法性。李元昊所创造的远支政治谱系同样不被北宋所承认，北宋大臣夏竦曾谈道："继迁一族，本党项遗种，居呼韩旧地，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⑥]说明在宋人眼中李继迁一族仍是党项羌人。只有辽人承认了李元昊所创造的远支政治谱系，《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⑦]

---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8页。
②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523页。
③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865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正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93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995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六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10页。
⑦ 《辽史》卷一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523页。

第五节 胙土分茅:西夏番姓大族之封爵

一、西夏番姓大族封爵爵称

西夏官制杂糅唐宋,其爵制亦受唐宋影响。唐多以国王、郡王、国公、郡公授封宗室,宋亦以王、嗣王、郡王、国公授封宗室。西夏番姓大族的封爵主要为国王、一字王、嗣王、郡王、院王、平王、国公、郡公等。据《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俄Инв.No.5921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甲种本,"大国王"为上品,仅次于太皇帝(太上皇)、皇帝、皇太子,其封号为"授具足文武法竞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①,为"及授官"。西夏番族大族中的国王见诸史籍和碑刻者主要有晋国王嵬名察哥、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其中,晋国王、可省称为晋王。《西夏书事》卷三一记夏崇宗贞观三年(1103年)九月,夏崇宗乾顺"封弟察哥为晋国王"②。同书卷三六记夏崇宗天盛元年(1149年),外戚任得敬"以金珠赂晋王"③。又记"晋王察哥在朝,得敬犹知顾忌"④。齐国王亦可省称为齐王。《宋史·夏国传下》云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齐国忠武王彦宗之子大都督府主遵顼立"⑤。西夏帝陵汉文残碑N42·021〔P8:196〕亦云"……国忠武王"⑥。但同是汉文残碑的m8CHB:1+275则记"齐王以孺慕"⑦。西夏文残碑M108:5+105中亦记"大使监国忠齐王"⑧。宋代的王与国名相连,一般来说王(一字王)即国王,如《宋会要·帝系二·皇子诸王杂录》云:"准制,益王元杰改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者。……今益王以扬、润二郡建社为吴国王,居大都督之任。"⑨但西夏的国王不等于一字王。西夏的一字王据《西夏书事》主要有濮王嵬名仁忠(其死后又追赠吴王)、舒王嵬名仁礼。《天盛律令》卷首的《颁律表》记载了编纂律令的"北王兼中书令嵬

① 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2页。
⑤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⑦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页。
⑧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⑨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名地暴。”[①]《亥年新法》卷一五记有南王（𗹦𗫂），其云：“诸寺所有常住地及南王奉旨所予田畴等”（𗦳𗥃𗅲𗢳𗏵𗫂𗥃𗹦𗫂𗼻𗥃𗢳𗼻𗏵𗹦𗫂𗼻）[②]。《宋史·夏国传》还记有越王嵬名仁友，云夏襄宗嵬名安全为“越王仁友之子”[③]。元昊太子宁令哥曾为梁王。《儒林公议》云吐蕃邈川大酋一声余龙“复纳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④]。西夏某参知政事碑也提到某“王到此，送荒垅而堪悲伤，营丘坟兮”[⑤]。

另据孙继民先生研究，西夏的国王除上列单字国王外还有双字国王，即俄Инв.No.7779A号《天盛十五年王受贷契等》中的齐赵国王。[⑥]这种双字国王之前仅见于辽、金等北族王朝。如辽道宗之弟耶律和鲁斡为宋魏国王。《辽史·天祚皇帝纪》云：“乾统元年六月壬寅，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⑦]辽兴宗之子耶律洪基为燕赵国王，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为秦晋国王。西夏的国王无论是单字国王外还是双字国王均类似于辽之国王。前述宋代王即国王，但辽代国王在王之上。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进封皇弟越王和鲁斡为鲁国王”[⑧]。《辽史·皇子表》云耶律和鲁斡于“重熙十七年，封越王。清宁初，徙王鲁，进王宋魏”[⑨]。《义和仁寿皇太叔哀册》亦云耶律和鲁斡：“璧假之田，丛台之域。伯禽之地，微子之国。益宋以魏，二邦其式。”[⑩]可见耶律和鲁斡先由越王进为鲁国王，再由鲁国王进为宋魏国王。说明双字国王爵级高于单字国王，单字国王爵级又高于一字王。

西夏汉文本《杂字》“官位部”记有“太王”“嗣王”“郡王”“平王”[⑪]。“太王”与俄Инв.No.5921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甲种本中记载的“太皇帝”意思相近，为嗣王之父。西夏番姓大族中的嗣王仅见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之子嵬名遵顼。史载其于夏桓宗纯佑时参加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⑫]。越王嵬名仁友之子嵬名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② 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88页。赵焕震：《西夏文〈亥年新法〉卷十五“租地夫役”条文释读与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28页。

③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④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⑤ 陈国灿：《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⑥ 孙继民、许会玲：《西夏天盛十五年（1163年）王受贷钱契等考释》，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8页。

⑦ 《辽史》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8页。

⑧ 《辽史》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页。

⑨ 《辽史》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1页。

⑩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⑪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⑫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安全在仁友病薨后曾"冀嗣爵"[①],但未被允许。据《宋史·夏国传》,西夏番姓大族中受封郡王者有越王嵬名仁友之子镇夷郡王嵬名安全,夏献宗嵬名德旺之弟清平郡王。另外,越王嵬名仁友也曾"初封郡王"[②]。

西夏番姓大族中的院王主要指俄藏 Инв.No.4170a《官阶封号表》(乙种本)中"诸王位"下的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③]西夏陵西夏文残碑 M2X:82+307 记有"诸王"[④]。俄藏 Инв.No.7779C《典田地文书》也记有"诸王"[⑤]。《亥年新法》卷十五也记有"帐下诸王节亲"[⑥]。(𗼇𗍫𗥤𗫂𗦳𗅲)

南院、北院、西院、东院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记载,为西夏地方军事机关十七监军司之四个监军司。这几个监军司的驻地及辖区范围据杨蕤先生研究,西院驻今榆林红石峡一带,管辖今鄂尔多斯大部,屈野河、榆溪河中上游;南院驻今宁夏海原县西安乡,管辖今葫芦河流域、屈吴山区。西院驻今甘肃武威,管辖石羊河流域。[⑦]陈炳应先生则认为南院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或天都山。[⑧]这样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似乎都受封于这四个监军司,为四监军司最高统领。但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明确记载南院、北院、西院、东院四监军司的官员为刺史、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并没有提到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又记载西夏政府职司下等司中有北院工院、南院工院、西院转运司、南院行宫三司、西院经治司、西院城司。其中北院工院、南院工院官员为一正、一副、二承旨;西院转运司官员为四正、四承旨;南院行宫三司官员为四正、四承旨;西院经治司官员为二大人、二承旨;西院城司官员为一城主、一同判、一城守,同样没有提到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因此,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中的南院、北院、西院、东院应不是监军司。

西夏的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这种王爵爵称除西夏外仅见于辽代。辽设北院大王与南院大王,但北院大王与南院大王非辽代爵位而为官位,非耶律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③ 文志勇:《西夏官阶封号表残卷新译及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④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23 页。
⑥ 赵焕震:《西夏文〈亥年新法〉卷十五"租地夫役"条文释读与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第 14 页。
⑦ 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54—155 页。
⑧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23 页。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41 页。

氏者亦可担任。《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北面皇族帐"云："肃祖长子洽檀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礼及懿祖仲子帖剌、季子裹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谓之二院皇族。"[①]可见，辽代把远支皇族称之为五院、六院皇族。这种称谓应该应该影响到了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规定西夏"皇太子之弟者，长成升时，国王、三公、诸王等应得何名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②]。而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正属于《官阶封号表》(乙种本)中的"诸王位"。可见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等王爵可授予当朝皇帝的皇子等近支皇族。所谓"南院""北院""西院""东院"应指王宅。把王宅称之为院源于唐代。唐代自唐玄宗以来以皇子、宗室诸王居于王院。史载唐玄宗"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十月，朝廷出嫁"岳阳等一十县主，皆在诸王院而未适人者"[④]。开元以后诸王受封王爵，"王受册讫，归王院"[⑤]。

西夏番姓大族中的平王据《宋史·夏国传》，有"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⑥]。西夏陵汉文残碑M2D:18+354亦记有"平王"[⑦]。灵武窑出土西夏瓷器刻有"东平王衙下"。西夏番姓大族任国公者见于西夏帝陵西夏文残碑M108:40+85中的"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⑧]。另外西夏文残碑M108:5+105中也有"国公"[⑨]二字，汉文残碑N42·021〔P8:88〕则记有"赵国公"[⑩]，汉文残碑N42·021〔P8:198〕记有"国公安国"[⑪]。汉文残碑N42·021〔P8:118〕记有"平郡公"[⑫]。俄藏X24号《温国公令印文》被认为是西夏温国公令印文，[⑬]写有"副使温国公"[⑭]。

---

① 《辽史》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07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③ 《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72页。
④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7页。
⑤ 《旧五代史》卷四一《后唐明宗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67页。
⑥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8页。
⑦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40。
⑧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2页。
⑨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拾补》，《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91页。
⑩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3页。
⑪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⑫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⑬ 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8页。
⑭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二、西夏番姓大族封爵的授受及等级

西夏番姓大族受封王爵者主要是皇族中的皇子王与宗室王。皇子王主要有晋国王嵬名察哥、越王仁友、清平郡王。《宋史·夏国传下》记北宋熙河经略使刘法"遇夏国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骑为三阵以当法前军"①。《西夏书事》亦记察哥为"干顺庶弟"②。则察哥为夏惠宗嵬名秉常之子。《宋史·夏国传下》云夏襄宗嵬名安全为"崇宗之孙,越王仁友之子。"③则越王嵬名仁友为夏崇宗嵬名乾顺之子。《西夏书事》记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国主德旺卒,弟子立。……国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④。则清平郡王为夏神宗嵬名遵顼子。宗室王主要有嗣齐王嵬名遵顼、镇夷郡王嵬名安全、南平王。

无论是皇子王还是宗室王,其所封王爵均由西夏当朝皇帝授予。嵬名察哥为其兄夏崇宗嵬名乾顺"封晋国王"⑤。越王仁友病薨后,夏桓宗纯祐"降封其子安全为镇夷郡王"⑥。嵬名遵顼被夏桓宗纯祐"令嗣齐王爵"⑦。《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还规定:"皇帝之长子者,年幼时曰皇子,长成时依次升顺,国王、太子等应令取何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⑧又规定:"皇太子之弟者,长成升时,国王、三公、诸王等应得何名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⑨说明皇子被封王爵是由朝廷确定佳期来进行册封的。值得注意的是对皇帝诸子的赐封要在其"长成时""长成升"时。晋国王察哥于夏仁宗天盛八年(1156年)"卒年已七十余"⑩,而其于夏崇宗贞观三年(1103年)被封晋国王。可见,其被封王时刚过弱冠之年。《宋史·夏国传下》记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夏襄宗嵬名安全殁时"年四十二"⑪,则其在夏桓宗天庆三年(1196年)被封镇夷郡王时为27岁。《宋史·夏国传下》又载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遵顼殂,年六十四"⑫,则其于夏桓宗天庆十年(1203年)嗣齐王爵位时已经41岁。美国学者贾志扬曾研究南宋宗室谱牒《仙源类谱》,"发现72%的宗子未

①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0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③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7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
⑨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
⑩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2页。
⑪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⑫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得到赐封（不赐封）。这些数字是前近代社会最富裕集团婴幼儿高死亡率的明证”[①]。宋代对宗子的赐封和授官一般同时进行。考虑到西夏的医药水平不是很高，其对皇子赐封时间较晚的原因应与宋代对宗子、宗女赐名、赐封迟缓的原因类似。

西夏番姓大族封王又可分为功封、血缘封及追封。嵬名仁友初封郡王，但因在平定任得敬之乱中剪除其党羽任得聪、任得仁等而“以功封越王”[②]。濮王嵬名仁忠、舒王嵬名仁礼之父嵬名景思曾在夏惠宗嵬名秉常被其母梁太后幽囚时奋力保护，随侍左右。嵬名仁忠在任秘书监、嵬名仁礼在任河南转运使时即“自陈先世功，乃晋爵”[③]。镇夷郡王嵬名安全在受封郡王前曾“上表诵先世功，冀嗣爵”[④]。察哥受封晋国王前曾以精湛的个人武艺保全已经战败的夏军安全撤退，其建言献策又为夏崇宗嵬名乾顺采纳。所以，察哥受封晋国王既是因为战功也是由于其血缘。嵬名安全因是“仁孝弟仁友子”[⑤]而被封为镇夷郡王。血缘封还表现为嗣封，如嵬名遵顼嗣齐王爵，这种嗣封也等于恩封。恩封是“皇帝在贵族临死前延续其爵位的一种形式”[⑥]。濮王仁忠薨后被“赠吴王”[⑦]。西夏陵汉文残碑 N42·021〔P8:17〕记嵬名安惠“尤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⑧]。可见，其殁于夏崇宗正德三年（1129年）。西夏文残碑 M108:40+85 中记有“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⑨]。可知其在夏崇宗正德三年（1129 年）的完整谥号为梁国忠毅公。汉文残碑 N42·021〔P8:1〕又载：“让谨拜秀挺吾家声振兴（光）定五年。”[⑩]而西夏文残碑 M108:41+96 记有“[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⑪]，汉文残碑 N42·021〔P8:1〕亦记有“梁国正献王神道碑”[⑫]。据李范文先生考证，夏神宗光定五年（1215 年）为嵬名安惠神道碑树立之时

① [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4 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80 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6 页。
⑤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871 页。
⑥ [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清代宫廷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26 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18 页。
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5 页。
⑨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82 页。
⑩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2 页。
⑪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82 页。
⑫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间。[①]那么可以推断光定五年(1215年)亦为追封嵬名安惠为梁国王之时间。李元昊称帝时文臣野利仁荣也被追封为王。《宋史·夏国传下》记夏仁宗朝"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②]。

西夏番姓大族封爵之等级从前述嵬名仁友初封郡王，后以功封越王以及嵬名安惠由梁国公被追封梁国正献王可知一字王高于郡王、而单字国王又高于国公。西夏外戚任得敬先为西平公，后晋爵为楚王，最后更进至秦晋国王。可知双字国王又高于一字王。而夏末帝嵬名在登基前为南平王，其父为清平郡王，可知郡王又高于平王。前文曾提到西夏陵汉文残碑中出现"平王""平郡公"字样，可知平王高于郡公。因此西夏番姓大族封爵按爵序高低应为双字国王、单字国王、一字王、郡王、平王、国公、郡公。另俄 Инв.No.4170a《官阶封号表》(乙种本)中诸王位下的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则高于师位、中书位、枢密位。在《官阶封号表》中，大国王高于诸王位。前引《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规定："皇太子之弟者，长成升时，国王、三公、诸王等应得何名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可知国王高于诸王。而根据俄 Инв.No.4170a《官阶封号表》(乙种本)，西夏皇族女封的公主位、帝女位又高于诸王位。

三、西夏番姓后族之王号

西夏王朝在立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皇族与后族共治，后族特别是番姓后族甚至在当朝皇帝年幼孱弱时独揽朝政，权势凌驾于皇族之上。由于番姓后族在西夏的政治地位仅次于皇族，不少番姓后族权臣虽然没有被赐予王爵，但具有王号，被称为大王。野利氏是李元昊一朝权高位重的后族。《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元昊之贵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谋，伪号大王。"[③]《涑水记闻》对野利刚浪凌、野利遇乞的王号有详细记载，"赵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为后，生子宁令，当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荣为谟宁令，号拽利王，刚浪陵为宁令，号天都王，分典左右厢兵马，贵宠用事"[④]。"拽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而刚浪凌勇健有智谋，尤用事。"[⑤]《梦溪笔谈》则记"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⑥]。

①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②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25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仁宗庆历二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30页。
④ [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6页。
⑤ [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页。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梁氏是夏毅宗谅祚、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三朝权势煊赫的后族，不仅有两位梁氏皇太后先后执掌朝政，还有梁乞逋、梁乙埋先后为相。梁氏也具有王号，《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神宗五路伐夏时，刘昌祚"既挟两牌先登，弓弩继前，与贼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战"①。此梁大王为梁乙逋。《梦溪笔谈》云："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②夏毅宗谅祚、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都曾被宋人称为小大王，梁乙逋被称为梁大王，反映了夏惠宗秉常在位期间后权与皇权并立的政治特点。史载梁乙逋"内有篡国之心，然其为人狡而多算，宽而得众，方欲内安酋豪，外结朝廷，俟内外无患，然后徐篡取之"③。在梁氏图谋篡国的背景下，其自称大王以提升其政治名望是不难想象的。

第六节　鸿渐于干：西夏番姓大族的文武仕途

一、西夏番姓大族所任文职官

在中国历史上，以北魏、辽、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特别注重"保护皇帝父系亲属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维护非汉族的优越性，任用那些特别认同权力中心的人"④。西夏皇室号称为元魏后裔，而元魏坚持"皇族成员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只能来源于官职，而官职则由皇帝根据各人的能力和忠诚来任命"⑤。西夏皇室也非常重视对皇族成员授官以培植皇族政治势力。

西夏皇族所任文职官主要分为中央行政机构官员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员。在西夏中央行政机构中，皇族官员多集中于中书门下、御史台、秘书监、礼部、番大学院、受纳司等机构。在属于上司的中书门下任职者计有嵬名守全、濮王嵬名仁忠、北王嵬名地暴、嵬名忠□、嵬名地远、嵬名□□、嵬名德照、李崇德、曲也怯律、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等。夏景宗元昊称帝时，"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⑥。张陟在其时的官衔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七，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8页。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二，哲宗元佑五年十二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50页。

④ Holmgren Jennifer,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Non Han States in China: The Role of Imperial Princes in Wei, Liao, and Yüa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25, no.1(1987):5.

⑤ Holmgren Jennifer,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Non-Han States in China: The Role of Imperial Princes in Wei, Liao, and Yüa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25, no.1(1987):4.

⑥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4页。

章事"[①],即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为相职。而李元昊建国时"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②]。嵬名守全排位又在张陟之前,因此"名列第一的嵬名守全自然是第一级的负责官员侍中和中书令了"[③]。《西夏书事》亦云:"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为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专主谋议。"[④]

濮王嵬名仁忠在中书省任官见于《西夏书事》,是书记载夏崇宗正德八年(1134年)"秋九月,以濮王仁忠为中书令"[⑤]。由于其弹劾晋国王察哥而被"乾顺嘉其风力,使由左枢密进中书令"[⑥]。《天盛律令》卷首的《颁律表》记载有编纂律令的"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中书令赐长艳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嵬名忠□、中书智足赐才盛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嵬名地远、中书副赐义持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嵬名□□"[⑦]。中书令为中书省长官,中书智足、中书副赐皆为中书省官员。《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规定中书省有"大人六: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承旨六"[⑧]。中书令嵬名忠□、中书智足嵬名地远的续赐封号皆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5921号为下品。其续赐封号前的"赐长艳""赐才盛"均是首赐封号。中书副赐嵬名□□的续赐封号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此封号据封号表为末品。据《天盛律令》,西夏官分"及授""及御印""未及御印",自上品至末品之官均属于"及授官"。以上有封号的西夏皇族即为"及授官"。

嵬名德照为西夏文字典《音同》的主持修订者,《音同》序作者御史正、学士兀啰文信言其为"节亲主、德师、中书、知枢密事、授正净、文武业集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倚"[⑨]。中书为其本官,知枢密事为其所兼任的职事官。授正净文武业集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倚为其封号,其中正净按《官阶封号表》为下品。李崇德于夏仁宗人庆四年(1147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史载"崇德,宗室士。仁孝爱其才,特赐之"[⑩]。《金史·交聘表》亦云海陵王元德二年(1150年)"七月戊戌,夏御史

①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⑨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
⑩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中丞杂辣公济、中书舍人李崇德贺登宝位”[①]。

曲也怯律为嵬名察罕之父，《道园类稿》卷四二《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云：“曲也怯律公仕西夏，官至金紫大夫、平章政事”[②]。金紫大夫为金紫光禄大夫省称，乃曲也怯律所任文散官。前述张陟在夏景宗元昊时官衔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为相职。曲也怯律所任平章政事即平章事。平章政事源于唐代，史载唐太宗“任宰臣，天下事皆得平章，谓之平章政事”[③]。宋廷多以金紫光禄大夫为宰臣文散官，如宋神宗以“乔行简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④]。《宋史·宰辅表》记留正自“宣奉大夫、右丞相迁金紫光禄大夫，除左丞相”[⑤]。

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在中书门下所任官为尚书令。西夏帝陵 M182 号陪葬墓出土西夏文残碑 M108:40+85 号记有“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讳安惠”[⑥]。西夏文残碑 M108:4 中有“知枢密事梁国”[⑦]字样。汉文残碑 N42·021〔P8:98+106〕记有“尚父太师”[⑧]。汉文残碑 N42·021〔P8:6+103〕记有“太师尚书令”[⑨]。汉文残碑 N42·021〔P8:185〕记有“书令知”[⑩]。汉文残碑 N42·021〔P8:27〕记有“密院事六”[⑪]。汉文残碑 N42·021〔P8:199〕记有“书令兼中书”[⑫]。综合以上，各残碑可知嵬名安惠在被追封为梁国正献王之前其官职全称为“尚父、太师、尚书令兼中书、知枢密院事、梁国公”。尚父为其尊衔，太师为其荣誉阶官，尚书令为其本官，中书为其兼官。知枢密事则为其所差遣的职事官。

在属于次等司的御史台任官的西夏皇族为嵬名直本、嵬名世安。《妙法莲华

① 《金史》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405 页。
② ［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04 页。
③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四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502 页。
④ 《宋史》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808 页。
⑤ 《宋史》卷二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586 页。
⑥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82 页。
⑦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76 页。
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2 页。
⑩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⑪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⑫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卷一九《金石编·西夏陵残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30 页。

经发愿文》曾提到嵬名直本为“上殿宗室御史台正”①。上殿宗室即《天盛律令》中所云“殿上座节亲主”②，指西夏皇族中官阶、封号兼有者，可以参加朝参。御史台为西夏中央监察机构，按《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御史台设有六正、六承旨、六都案、二十二案头。嵬名直本所任御史正为御史台长官。嵬名世安自武节大夫升至御史大夫，史载“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③。

秘书监为西夏中央执掌图籍、祭祀祝词、天文历数的机构，位于宫内。濮王嵬名仁忠、舒王嵬名仁礼在封王前“始任秘书监”④，释褐为秘书监官员。嵬名仁忠在秘书监任职时又被升为礼部郎中，史载“继擢仁忠礼部郎中”⑤。夏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即设番学、汉学。嵬名文高曾任番大学院学正学士。《德行集》题款记有“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⑥。受纳司为中央执掌仓储收支之机构，为中等司。夏景宗元昊建国时嵬名聿荣任职于此。史载元昊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⑦。

在西夏地方行政机构中，皇族官员多集中于凉州、大都督府、甘州，多为府州守臣。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在夏仁宗仁孝时期曾被任得敬谗害，“贬守凉州。在郡有政绩，蕃、汉畏怀”⑧。俄 Инв.No.6345《乾祐戊年节亲中书西经略使告牒》记有“乾祐戊年节亲中书西经略使授忠安嵬名□□” ⑨。史金波先生考证其于凉州任官，指出其“有‘节亲’的头衔，……还兼有‘中书’的官阶，‘忠安’在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属及授品官，地位很高，可以做中书之类的官”⑩。嗣齐王嵬名遵顼在状元及第后“充大都督府主”⑪。《宋史·夏国传下》亦云遵顼“始以宗室策进士及第，为大都督府主”⑫。大都督府驻灵州。舒王嵬名仁礼在封王前任职于秘书监时被拔擢为河南转运使。河南多指河套地区前套的兴灵平原。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70 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八《为婚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11 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81 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81 页。

⑥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130 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49 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61 页。

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四册《附录·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71 页。

⑩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武威》，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4 页。

⑪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871 页。

⑫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027 页。

位于灵州的大都督府设有转运司，为下等司，设官四正、六承旨。曲也怯律在西夏末年镇守甘州。《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云："岁戊戌，太祖之征回鹘也，夏人不能以兵从，既克回鹘，益日疑惧，金紫守甘州以备焉。"①

西夏番姓后族多任中央机构的宰辅官员。《涑水记闻》记李元昊从父山遇叛逃北宋时，"山遇妹夫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与侍者二人逃归，既济河，集缘河兵断河津三处"②。"易里遇乞令公"即野利遇乞。从野利遇乞被称呼为令公来看，野利遇乞应担任西夏中书令一官。《涑水记闻》称山遇亲家没藏屈己为相公，可见没藏屈己应为中书、枢密之类的宰辅官员。没藏讹庞为西夏国相，《梦溪笔谈》云："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庞相之。"③梁乞逋、梁乙埋先后为相。《续资治通鉴长编》即称梁乙埋为梁相公。凉州感通塔碑铭西夏文部分记凉州感通塔被重修时，西夏朝廷"遣中书正梁行者乜、皇城司正卧皆屈等，命为庆赞"④。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书与枢密属上等司。西夏汉文本《杂字》"司分部"将中书、密院列于朝廷之后。梁行者所任中书正，陈炳应先生认为："这里的'正'应是各机构的长官或正品官，相当汉文的'令''使'之职，即'中书正'是中原王朝的'中书令'。"⑤西夏皇族与后族以外的番姓大族较少担任中央机构的宰辅官员，仅《金史·交聘表》记有参知政事浪讹德光。

西夏后族及其他番姓大族还在属于次等司的御史台、皇城司、匾匣司、三司、中兴府、大都督府以及属于中等司的工院、末等司的刻字司任官。据《金史·交聘表》，罔永德、浪讹文广都为御史中丞，罔氏、梁氏为后族大姓。《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仁多楚清为"御史中丞，常在宰相、枢密之下"⑥。西夏文《义同》记阅校者梁德养为御史承旨番学士。西夏文《同音》序记兀啰文信为"御史正、谏官、校书郎、东南族长、上大学士"⑦。《金史·交聘表》记谋宁光祖为御史大夫。凉州感通塔碑铭西夏文部分记卧皆屈为皇城司正。《天盛律令》颁律表记有"中书内宿司等承旨匾匣司正浪讹心□□"⑧，为律令纂定者之一。西夏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书记有"三司芭

① [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② [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0页。
③ 《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④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三，哲宗元符元年冬十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11977页。
⑦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里你令布”[①]。《金史·交聘表》记罔进忠为知中兴府，讹罗绍甫为中兴尹。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罔仁持为中兴府签判华阳县司检校。《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记有“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府通判芭里居地”[②]。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罔忠敬为工院正。西夏文《大诗》卷尾题款记骨勒善源为“刻字司头监三学院百法座主”[③]。

二、西夏番姓大族所任军政官和军官

西夏番姓大族所任军政官和军官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西夏番姓大族在中央任军政官者主要集中于枢密院、内宿司和殿前司。属于上等司的枢密院为西夏最高军事政务机关，设有南柱、北座、西摄、东拒、副、名入六大人、六承旨。夏景宗元昊之叔山遇曾任职于枢密院，《涑水纪闻》云：“山遇先在元昊处为枢密”[④]。《天盛律令》卷首颁律表中编纂者有“枢密东拒赐覆全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嵬名仁谋、枢密入名赐益盛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嵬名忠信。”[⑤]可知嵬名仁谋担任枢密院六大人之一的枢密东拒，覆全为其首赐封号，续赐封号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在《官阶封号表》中为下品。嵬名忠信担任枢密院六大人之一的枢密入名，益盛为其首赐封号，续赐封号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为下品。濮王嵬名仁忠曾由“左枢密进中书令”[⑥]。可见其担任过左枢密使。西夏皇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也有多人在枢密院任官。如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作者罔长信为“枢密西摄·典礼司正授艺广武孝恭敬东南姓关上柱国”[⑦]，都罗马尾被称为“都枢密都啰”[⑧]。《金史·交聘表》记有左枢密使浪讹进忠。

内宿司和殿前司均属于次等司。内宿司负责守卫大内，殿前司则为西夏京畿的军事政务机关。《天盛律令》卷首颁律表中编纂者有“中书内宿司等承旨中兴府副嵬名盛山”[⑨]。中书为嵬名盛山本官、内宿司等承旨为其兼官，中兴府副为其所差遣的职事官，相当于北宋的开封府少尹。齐国王嵬名彦忠在任得敬伏诛后被朝

① 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1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③ 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④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0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
⑦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0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神宗熙宁四年正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20页。
⑨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廷“召入为马步军太尉”[①]。马步军太尉为殿前司属官，《金史·交聘表》即记有“殿前马步军太尉讹罗绍甫”[②]。另外夏景宗元昊叔嵬名山遇的两个胞弟也号称“二太尉、三太尉”[③]。皇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任官内宿司和殿前司者，主要有《金史·交聘表》所记殿前太尉罔荣忠、殿前太尉讹罗绍先、殿前太尉乃来思聪。《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所记殿前司正卧讹立。

西夏皇族除了在枢密院、内宿司、殿前司等中央军事机构担任武职官员外，还有在中央担任全国性的都统军这一军官的。夏景宗元昊之弟嵬名浪遇曾任都统军，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免嵬名浪遇都统军，徙之下治”[④]。晋国王察哥曾“任都统军镇衙头”[⑤]。衙头指西夏京畿地区。西夏禁军及军官亦多由番姓大族构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李元昊“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伪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⑥]。《儒林公议》云李元昊“常选部下骁勇自卫，分为十队，队各有长：一妹勒，二浪讹遇移，……十没罗埋布”[⑦]。

西夏番姓大族在地方任军官者多集中于监军司，分任监军和统军。西夏皇族中，嵬名山遇曾任“左厢监军”[⑧]。在宋夏边境战争中，“监军嵬名理直误入伏中”[⑨]。“监军嵬名济救洪州，兵败，洪州失守。”[⑩]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夏国左、右厢监军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等以全军十余万扰筑”[⑪]。北宋修筑灵平城、平夏城。舒王嵬名仁礼也曾“监军韦州”[⑫]。西夏后族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梁格嵬为监军使，罔莽讹之侄额伯尔为监军。后族以外，《宋史·韩世忠传》记西夏驸马兀移为监军。《宋史·夏国传下》记仁多保忠为西夏卓罗右厢监军。

西夏番姓大族任地方监军司统军者又分为都统军和统军。西夏皇族中，嵬名济曾致书宋臣卢秉，“其遗秉书称‘‘夏国南都统、昴星嵬名济’”[⑬]。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宋臣熙河路经略使孙路“缴连夏国部落嵬名密赍南路都统嵬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② 《金史》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0页。
③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纪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1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45页。
⑦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⑨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⑩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
⑪ 罗振玉：《山左冢墓遗文·郭景修墓志》，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14916页。
⑫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79页。

名律令书”[①]。在宋神宗五路伐夏之役中，夏军中有“酋首嵬名统军”[②]。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宋军“斩西贼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③]。西夏后族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有“统军国母弟梁大王”[④]，《宋史·夏国传》记有统军梁哆唛。皇族、后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也有多人任统军，如《宋史·夏国传》记仁多唛丁为统军，唛丁战殁后，“侄保宗代为统军”[⑤]。

西夏军队的基层军官主要为首领。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中记载有正首领、首领，《天盛律令》记有溜首领、小首领、首领、军首领。史金波先生指出：“《天盛律令》多次出现溜首领，溜首领应是平时的迁溜，战时的首领或大首领，是西夏社会基层的军事负责人，他们佩戴首领印、大首领印，所辖军队称为溜。”[⑥]西夏皇族所担任的基层军官也为首领，主要分为大首领和首领。史载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西人大首领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⑦]来到宋廷贺正旦。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遣大首领威明阿乌往青唐计事”[⑧]。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北宋熙河兰岷路经略司上言“归顺部落子大首领威明约默，乞特补西头供奉官，带本族巡检”[⑨]。《西夏书事》记嵬名药默为夏崇宗“乾顺疏族，领会州一带蕃部”[⑩]。在宋夏战争中，西夏曾“遣首领嵬名咩布至辽乞兵”[⑪]。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西界首领嵬名特克济沙率兵寇顺宁寨”[⑫]。西夏皇族中的首领还佩有首领印。有两枚西夏皇族的首领印存世于今，一为夏崇宗正德二年（1129年）印，刻有持印者姓名“嵬名那征乐”[⑬]，一为夏崇宗正德三年（1130年）印，刻有持印者姓名“嵬名有势”[⑭]。除首领外，西夏皇族中还有担任钤辖者。元符二年（1099年），宋军曾“生擒伪钤辖嵬名乞遇”[⑮]。

---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六，元符二年二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59页。

②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兵八·出师二·夏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770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辛亥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65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七，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7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三，哲宗元符元年冬十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77页。

⑥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

⑦ [宋]龚鼎臣：《东原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9年，第221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40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八，元符元年五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856页。

⑩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6页。

⑪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一，元符二年六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69页。

⑬ 史金波：《西夏官印姓氏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⑭ 史金波：《西夏官印姓氏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元丰二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88页。

西夏皇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也多有任首领、钤辖者。宁夏博物馆藏西夏文首领印刻有“野利主酉”[①]。宁波市文物局藏首领印刻有“都啰南□”[②]。还有三方存世首领印刻有浪讹嵬名山、骨勒邪行、骨勒那尼征。另外西夏文庚戌四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释“酩布讹成”[③]。西夏文大庆三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释为“酩布驴子黑”[④]。西夏文天盛丙戌十八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释为“首领酩布小狗山”[⑤]。西夏文丙戌十八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释为“酩布势后”[⑥]。西夏天庆亥年六月首领印，刻“酩布屈玉立”[⑦]。西夏文正德四年印行刻西夏文首领姓名，释为“恶恶狗□”[⑧]。西夏文元德二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意为“骨匹势年”[⑨]。西夏文元德九年印刻西夏文首领姓名4字，释“耶酉□吉”[⑩]。另一西夏首领印刻“耶酉筹银”[⑪]。此外《宋史·神宗纪三》记没啰卧沙为大首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卧勃哆为首领，卧瓦哆为钤辖，令介讹遇为都钤辖，伊朗僧鄂为正钤辖。

三、西夏番姓大中的使臣

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后期与金、南宋鼎立，在正式立国后的近两百年时间中，西夏与北宋、辽、金都保持着频繁的使节来往。在西夏出使北宋、辽、金的使节中不乏皇族的身影。西夏出使北宋中央的皇族使节可分为谢恩使、告哀使、贺正旦使、进奉使、陈慰使、进助山陵使。皇族任谢恩使者有嵬名聿、威明裕默（嵬名谕密）、嵬名济。史载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闰五月，“夏国主曩霄遣丁卢、嵬名聿、营吕则依张延寿来谢册命”[⑫]。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夏崇宗乾顺“又差大使扬乌威明裕默、副使恭罗们色勒裕勒等称谢太皇太后”[⑬]。《宋史·夏国传》则云：“夏遣大使映吴嵬名谕密、副使广乐毛示聿等诣太皇太后进驼、

①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②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③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④ 史金波：《西夏官印姓氏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32页。
⑤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⑥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⑦ 范兴梅：《西夏官印小识》，《青海文物》1996年（总第10期）。
⑧ 史金波：《西夏官印姓氏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31页。
⑨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⑩ 杜建录等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⑪ 吴峰云、任永训：《盐池发现西夏官印和钱币》，《宁夏文物》1986年第1期。
⑫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庆历五年五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79页。
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53页。

马以谢奠慰。”[①]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夏国差使副令能嵬名济等诣阙,进上誓表谢恩,及进奉御马”[②]。皇族任告哀使者有嵬名聿则、嵬名怀普、嵬名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夏毅宗谅祚派遣“祖儒嵬名、聿则庆唐及徐舜卿等来告其母没藏氏卒”[③]。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夏惠宗秉常母梁太后薨后,“夏国使吕则嵬名怀普等见于延和殿。以其母梁氏之丧来告也”[④]。夏崇宗乾顺母梁太后薨后,西夏“定差使令逊嵬名济、副使谟程田快庸等诣阙讣告”[⑤]。皇族任贺正旦使者有嵬名聿正,《东原录》云北宋“嘉祐七年,贺正旦,西人大首领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祖儒、枢铭乃西夏之官称大者,姓嵬名聿正”[⑥]。皇族任进奉使者有嵬名荧荣,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夏惠宗秉常“遣使昂聂嵬名荧荣等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⑦]。皇族任陈慰使者有嵬名谟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夏国陈慰使丁努嵬名谟铎、副使吕则陈韦精等,进慰表于皇仪门外,退赴紫宸殿门,赐帛有差”[⑧]。皇族进助山陵使者有嵬名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夏国遣芑良嵬名济、昂聂张聿正进助山陵马一百匹”[⑨]。西夏出使北宋地方官府的皇族使节主要为前往鄜延路的议画疆界使与议和使。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西夏国相梁乙逋“遣亲信嵬名麻胡、乙吉峣丹来”[⑩]与北宋鄜延路经略使卢鼎议画疆界。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夏崇宗乾顺先后派嵬名布聿介、嵬名科逋前往鄜延路议和。史载“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据顺宁寨将李子明等申,有西人创格裕等到,言衙头差大使庆瑭嵬名科逋、副磋迈花结香等来计会,今国主已恭顺朝廷,告早为收接公牒事。审会昨夏国差到嵬名布聿介到来,已降朝旨今进献作过蕃酋珪布默玛、凌吉讹裕等,即许收接告哀谢罪表章,回报去讫”[⑪]。

西夏出使辽朝的皇族使臣限于史料仅见嵬名咩布。夏崇宗天祐民安八年(1097年),因与北宋战事不利,西夏“遣首领嵬名咩布至辽乞兵”[⑫]。西夏出使金

①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15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九,元符二年十二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343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二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62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17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六,元符二年二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54页。
⑥ [宋]龚鼎臣撰:《东原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9年,第221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14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乙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66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05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元佑六年三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923页。
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八,元符二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02页。
⑫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朝的皇族使臣主要为贺金主即位使、贺金主生辰使和贺正旦使。据《金史·交聘表》，金海陵王元德二年（1150年）七月，“夏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中书舍人李崇德贺登宝位”①。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三月，“夏武功大夫嵬名仁显、宣德郎赵崇道来贺万春节”②。万春节为金世宗生辰。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崩，金章宗即位后，“八月丙辰，夏嵬名彦、刘文庆贺天寿节”③。天寿节为金章宗生辰。

出使北宋的西夏皇族使臣多被北宋以西夏语音称呼其官名，如丁卢嵬名聿营、映吴嵬名谕密、令能嵬名济、祖儒嵬名聿则、吕则嵬名怀普、令逊嵬名济、祖儒嵬名聿正、昂聂嵬名荣荣、丁努嵬名谟铎、芭良嵬名济、庆瑭嵬名科逋。据史金波先生研究，《天盛律令》中记载的官名调伏用西夏语音注释为鹰伏，拒邪为丁那，涨围为萼讹。他又指出西夏蕃名官号丁努与《官阶封号表》中的六品第一等“拒邪”音丁那相近。④而嵬名聿营所任丁卢即丁努的汉文异译。另外出使金朝的嵬名仁显所任武功大夫应为西夏武散官。

自古以来使臣奉使外出极为荣耀，所谓“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⑤。但选拔使臣困难重重，曹操《选举令》云：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⑥因此“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⑦。作为使臣，由于担负重要外交使命，为本国重要利益出使，必须首先“磨厉锋锷思不辱命”⑧，具备“辩于辞习于礼”⑨、能专对有智谋等才能。此外，由于使臣代表国家形象，其个人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谈吐优雅，外表风仪也很秀美。西夏皇族中出使北宋的谢恩使、告哀使、贺正旦使、进奉使、陈慰使、进助山陵使在宋廷都得修习礼仪，比如入见朝辞之仪、宴饮之仪、庆贺之仪、入吊之仪，北宋还专门制订有“夏国进奉使见辞仪”。西夏皇族使臣大都能按照宋方要求熟习礼仪，保证了本国形象。出使金朝的李崇德为西夏“宗室士。仁孝爱其才，特赐之”⑩中书舍人一官。可见其为富有才学之士。出使鄜延路的西夏

① 《金史》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5页。
② 《金史》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5页。
③ 《金史》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5页。
④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⑤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9页。
⑥ [魏]曹操：《曹操集》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页。
⑦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965页。
⑧ 《三国志》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6页。
⑨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3页。
⑩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皇族因为担负议定西夏与北宋边界、代表西夏与北宋议和等政治使命而职责颇重，但多有辱使命。如与北宋鄜延路经略使卢鼎议画疆界的嵬名麻胡，在与卢鼎专对时被卢鼎“呼前诘折，开晓累日，麻胡等辞穷”①。先后出使鄜延路的嵬名布聿介、嵬名科逋负有议和使命，但“使人两至鄜延，朝议固却其表，无以示收纳意”②。

在西夏后族中，有很多人曾担任使臣。《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罔聿谟为西夏向北宋告哀使，罔豫章为贺宋帝即位使。《宋会要辑稿》记罔聿则为向北宋贡马的西夏使臣。据《金史·交聘表》，殿前太尉罔荣忠任谢横赐使，武功大夫罔进为贺万春节使，御史中丞罔永德为奏告使，知中兴府罔进忠为谢横赐使，武节大夫罔敦信为贺天寿节使。前述西夏皇族中有多人为贺金帝生日使，而罔进忠和罔敦信也为贺金帝生日使，可见西夏朝廷倾向于选派出身皇族和后族的大臣前往金朝敬贺金帝生日。皇族和后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也有多人担任赴金使臣。据《金史·交聘表》，武功大夫骨勒文昌为贺万春节使，左枢密使浪讹进忠为祈请使，殿前太尉浪讹元智为谢横赐使，御史中丞浪讹文广为报谢使，参知政事浪讹德光为奏告使。武功大夫恧恧存忠、武节大夫恧恧世中为贺正旦使。武功大夫讹罗世为贺正旦使，殿前马步军太尉讹罗绍甫为贺加尊号使，中兴尹讹罗绍甫、殿前太尉讹罗绍先为谢横赐使。武功大夫卧落绍昌为贺正旦使，殿前太尉乃来思聪为谢横赐使，武节大夫吴移遂良、武功大夫谋宁好德为贺正旦使，御史大夫谋宁光祖为谢封册使。

第七节　威柄所向：西夏番姓大族的权力斗争

一、西夏皇族的内争

西夏皇族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斗争可分为皇族内争和皇族与后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西夏皇族的内争主要集中于西夏初期的夏景宗元昊一朝和西夏末年的夏桓宗纯祐、夏襄宗安全两朝。内争的形式分为当朝皇帝之弟谋反、当朝皇帝诛杀皇叔、诛杀皇子、太子谋逆、宗室王篡位五种。

当朝皇帝之弟谋反发生于夏景宗元昊称帝前夕。《涑水纪闻》曾提到元昊叔父山遇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年）谈道：“去年大王弟侍中谋反，欲杀大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元祐六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2102 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54 页。

王，赖我闻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①]可知在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元昊之弟曾经谋反。史载元昊之父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嵬”[②]。可知元昊有弟成遇、成嵬。谋反之人为二者之一，时任侍中。侍中为门下省长官。元昊在即位后广设官员，侍中为其之一。《宋史·夏国传上》云：“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③]元昊之弟的谋反由于山遇的告发以失败告终。

当朝皇帝诛杀皇叔是指元昊在称帝前夕诛杀山遇。李德明在位时与北宋订立景德合约，使夏国与北宋消弭战争，长期保持和平。史称“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④]。但元昊即位后意欲称帝独立建国，遣军在北宋所属府州进行军事挑衅，又不断遣军进攻北宋所属环庆路，设计离间知环州高继嵩，还欲分兵三路入侵鄜延路。但元昊的政治理念并未得到其内部上层的一致支持。元昊之叔山遇屡次劝谏元昊，史载：“山遇者，元昊从父也，数止元昊，不听。”[⑤]山遇以为夏国与北宋相比实力悬殊，且为北宋藩属，应恪守臣职以利于得到景德合约后每年宋廷的岁赐。他提出：“中国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守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蕃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⑥]由于山遇与弟惟永分掌西夏左右厢兵，且“有勇略，国人向之”[⑦]。山遇家族实际上成为阻碍元昊称帝的一大势力。元昊为扫除反对派欲诛除山遇，他先拉拢在其身边“亲近用事”[⑧]的山遇从弟惟序，命他诬告山遇谋反，以谋反罪诛杀山遇成功后将把山遇官爵转赠于惟序。惟序将此告于山遇后，山遇萌发投宋之心，不顾其弟惟永“南朝无人不知兀卒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⑨]的劝说，率全家及弟、侄、从弟奔降于北宋保安军。北宋鄜延路都钤辖司为免滋生边事，不但没有受降，反而“令保安军诘问山遇所以来事故，勒令北归”[⑩]。知延州郭劝、钤辖李渭均认为“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

① [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0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3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86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147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2881页。
⑩ [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1页。

未尝留，共议遣还”[①]。在郭劝、李渭上奏后，宋廷下诏“令士彬等只为彼意婉顺约回，务令安静”[②]。因此山遇被强行遣返，并被北宋监押韩周亲自押送，最后被元昊“集骑射兵射而杀之”[③]。元昊与山遇之争归根结底为党项贵族上层对本民族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之争。山遇为元昊亲族，又掌握兵权，家族势力庞大，可以说为反对元昊称帝派中的领袖人物，对元昊来说可谓一大障碍。山遇被杀后，西夏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大大削弱，元昊称帝在国内再无大的阻挡。因此史载“元昊既杀山遇，遂谋僭号”[④]。

当朝皇帝诛杀皇子发生于夏景宗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八年（1045年）。元昊第四娶妃子咩迷氏生子阿理，但二人均未受宠，另居于夏州王庭镇，远离国都兴庆府。夏州为西夏皇家祖业所在，阿理成人后欲在此举众“谋杀曩霄，为卧香乞所告”[⑤]。在被党羽告发后，元昊遣军将阿理“沈于河，杀咩迷氏于王亭镇”[⑥]。

太子谋逆发生于夏景宗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元昊在太子宁明薨后再立其同母弟宁令哥为太子。宁令哥为皇后野利氏之子，早年颇受元昊宠爱，史载“曩霄以貌类己，特爱之，以为太子”[⑦]。野利氏为党项大族，族中野利旺荣与弟野利遇乞并为元昊军事重臣，在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因北宋种世衡反间计被元昊所杀。皇后野利氏为野利遇乞从女，在风波平息后为野利旺荣与野利遇乞诉冤。元昊访察遗口，仅得野利遇乞妻没藏氏，便将其迎养宫中。此后元昊因与没藏氏私通被皇后野利氏发觉，便将野利氏剃度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居兴庆府戒坛寺。但元昊仍与其暗自往来，致没藏氏生子谅祚。因没藏氏生子，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三月任命没藏氏兄没藏讹庞为国相。此后没藏氏与没藏讹庞处心积虑谋废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本年五月，元昊为宁令哥聘没移氏为妻，但见没移氏貌美而将其立为第二皇后。元昊将没移氏立为皇后后，又在天都山大力营建宫殿与其游处。皇后野利氏受到冷落，后族不满，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没移女，乃为修内”[⑧]。元昊闻知大怒，遂废野利氏，将其贬居冷宫，不复相见。野利旺荣与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② [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1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0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1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1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1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1页。

野利遇乞被杀使后族势力大衰，皇后野利氏又被废，太子宁令哥孤立无依，日夜忧惧，加之夺妻之恨，心怀不满。没藏讹庞"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谋"[①]。在没藏讹庞的教唆下，宁令哥铤而走险，与野利族人野利浪烈入宫弒君，事败而劓元昊鼻而逃，"匿黄芦讹厖家，为讹厖所杀"[②]。宁令哥谋逆既为夺妻之恨，亦为担心己身被废，最为主要的在于后者。元昊诛杀失宠的己子阿里及其母咩迷氏毫不留情是为前车之鉴，而宁令哥母野利氏本身失宠被废，后族势力又因为元昊族诛杀野利旺荣与野利遇乞而无以依靠，所以宁令哥为保有太子地位甚至自己与母亲性命才弒君犯上。

宗室王篡位主要发生于西夏后期的夏桓宗纯祐、夏襄宗安全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宗室透过血缘的连接，成为皇权中永远的特权者，因此也常会成为政权不稳定的来源"[③]。西夏皇族自夏崇宗乾顺创设宗室封王之制后势力不断发展，在经历了西夏中期的后族专政后，皇族势力在西夏后期已对国内朝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皇族势力膨胀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出现两次宗室王篡位。夏桓宗天庆三年(1196年)，夏仁宗仁孝弟仁友薨。嵬名仁友为夏仁宗朝元老，在平定任得敬之乱中立有大功。因此其子嵬名安全"上表诵先世功，冀嗣爵"[④]，但夏桓宗纯祐并未封他为嗣越王，反而降封其为镇夷郡王。封爵的高低对封爵受封者来说代表着其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大小。嵬名安全被降封为镇夷郡王，仁友一族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也随之减弱。仁友一族为皇族近支，夏桓宗纯祐降封仁友子安全为镇夷郡王表明其意图削弱宗室势力，但引起了"天资暴狠，心术险鸷"[⑤]的安全的极大不满，安全因此渐蓄不臣之心。天庆五年(1198年)，蓄有不臣之心的安全势力坐大，开始逐步干涉朝政，并试图拉拢朝中大臣南院宣徽使刘忠亮，结党营私。史载："镇夷郡王安全渐干政，忠亮正色立朝，临朝是非不稍回折。安全诱以甘言，忠亮曰：是饵吾也。终不顾。"[⑥]刘忠亮与安全做了坚决斗争，甚至在朝堂之上的廷辩中毫不相让。他对安全的政治野心多有察觉，但回天无力，临终时教戒其子刘思义"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⑦]。刘忠亮的逝世大大减轻了安全图谋独揽朝

①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2页。
③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政的阻碍，更加刺激了他的政治野心。天庆十一年（公元1204年），安全以夏州出现所谓“祥瑞”，认为皇天眷顾于己，便确定了篡位逆谋。史载天庆十一年“秋八月，夏州豕生麟。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献。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国两主兆也’。安全喜，遂蓄篡谋”①。实际上所谓占卜是为安全篡位制造舆论，目的是让国人信服。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安全发动宫廷政变，强势篡位。一个月之后废帝纯祐离奇死去，极有可能为安全所杀。《宋史·夏国传》云安全于宋宁宗“开禧二年正月，废其主纯祐自立”②。《金史·西夏传》云金章宗“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废纯佑自立，再阅月死于废所”③。藏文史籍《红史》也记载：“西夏国王取其父亲格胡神名字中的格字，起名为格祖王。由他下传六代为西夏杰廓王，他在位时，有流言说将有一个在迥明山（译成汉语为黑心山之意）出生的人担任国王的大臣时杀死国王。杰廓王听说后，向格胡山神请问将此山的人全部杀掉是否可以免祸，格胡神因崇奉佛教，没有同意。国王因此无法再都城居住，迁移尕地方，后来，果然有一个当时没有找到的在那座山出生的人当了大臣，他杀死杰廓王，此后王统断绝。”④陈庆英先生认为：“藏文史籍所说的西夏甲郭（杰廓）王有可能是桓宗纯祐，他被废后两月暴亡，有可能是被臣下杀害。”⑤

关于安全成功篡位的原因，清人吴广成认为是安全受到了纯祐母罗太后的支持。罗太后在夏桓宗纯祐一朝政治地位极高，曾临朝听政，与纯祐一起统治西夏。他谈道：“纯祐之废，罗氏有力焉。”⑥以为夏桓宗纯祐“乃以宗孽擅权，失爱母氏，位遭幽夺，身死废所，哀哉！”⑦《金史·西夏传》云安全篡位后，“使纯祐母罗氏为表，言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⑧。罗太后奏表中明言“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⑨，似乎罗太后乾纲独断，鼎力支持安全登基。但安全是“使纯祐母罗氏为表”，《金史·交聘表》亦云安全“令纯祐母罗氏为表，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等来奏，求封册”⑩。从“使”“令”可看出安全篡位后已位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②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6页。
③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④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噶·罗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25页。
⑤ 陈庆英：《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56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⑧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⑨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⑩ 《金史》卷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4页。

于罗太后之上，罗太后所上奏表乃安全胁迫所为。另外，许成、徐军两位先生指出："安全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一则依赖罗太后的支持，二则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①]由于安全受封镇夷郡，镇夷郡治甘州。因此两位先生认为："安全降封镇夷郡王后，所居甘州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绵亘数千里……安全利用甘州丰饶的资源，厉兵秣马，培育羽翼，权势熏灼。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资本，成就了图谋蓄久的政治野心。"[②]但史书并没有明文记载安全居于甘州，前引"镇夷郡王安全渐干政"，南院宣徽使刘忠亮在朝堂之上与其廷辩毫不退让以及夏州祥瑞被"州民以献"、献上朝廷后安全派人去占卜都说明安全一直在朝中任职。吴广成也指出："安全素操国政。"[③]因此安全所受封镇夷郡王之镇夷郡应指遥封，而不是之国。

安全于夏桓宗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篡位后并未获得宗主国金朝认同，经过三次求封迟至该年九月才被金朝封为夏国王。纯祐在位时期西夏与金朝关系转向冷淡。从西夏应天三年（1208年）开始，金朝停止向西夏派遣贺夏主生日使。应天四年（1209年），安全因蒙古围困中兴府遣使向金朝求援，被金朝拒绝。皇建元年（1210年），为报复金朝，安全遣军攻金葭州。皇建二年（1211年），金卫绍王又大为降低对夏使的外交接待规格，不再向夏使馈赠礼物。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崛起，西夏外患日深。应天二年秋（1207年）蒙古入侵西夏，于冬天攻克斡罗孩城，第二年春才班师凯旋，在西夏境内大肆掳掠达五月之久。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又大举入侵西夏，先大败由安全世子承祯为主帅的夏军，俘死副帅高逸，又攻陷兀剌海城俘获西夏太傅西壁讹答。紧接着在克夷门与夏军大战，先败后胜，生俘西夏大将嵬名令公。最后包围中兴府并引河水灌城。夏襄宗安全纳女请和。从以上可看出安全在位时期西夏与金朝交恶，抵抗蒙古又节节败退，甚至屈辱地签订城下之盟，献上公主博蒙古之欢心。既不能与邻国交好、保持传统友谊，又不能抵抗外侮，这些使安全作为一国之主的名誉大大降低，其统治能力受到怀疑，再加上其本身为篡位登基，所以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在此形势下再次发生了争夺西夏皇位的宫廷政变。

夏襄宗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嗣齐王嵬名遵顼取代安全成为新皇帝。《宋史·夏国传下》云宋宁宗"嘉定四年八月五日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改元应天四年，皇建二年。谥曰敬穆皇帝，庙号襄宗，陵号康陵。有子曰承祯。齐国忠武王彦宗之

①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②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子大都督府主遵顼立”①。遵顼“立在安全薨前一月”②，可见，其即位时安全已经退位。安全退位时世子承祯没有即位，反而是“族子遵顼立。”③安全又在遵顼即位仅一个月后暴薨。可见遵顼即位是一场宫廷政变。因此《西夏纪》云：“皇建二年七月三日，襄宗废。有世子承祯，不立，立遵顼。”④与“天资暴狠，心术险鸷”的夏襄宗相比，遵顼“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⑤“以状元及第”⑥，可谓西夏皇族中的名士。其父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宗曾任职于凉州，“在郡有政绩，蕃汉畏怀”⑦。嵬名彦宗殁后，甘州民众为其建有西夏忠武王庙，“俗名土主庙”⑧。可见遵顼家族自其父以来就在西夏国内声誉隆起。值得注意的是遵顼在发动宫廷政变时任大都督府主一职，大都督府位于灵州。遵顼所任大都督府主为地方官，非朝官。这与安全篡位时把持朝政大不相同。遵顼之父嵬名彦忠曾任职于凉州，而遵顼又生于凉州且任职于大都督府，安全一系自其父越王仁友起即在朝中为官。在地方为官与在朝中为官成为遵顼家族和安全家族的不同传统。遵顼取代安全说明了西夏地方与中央势力的消长。

二、西夏皇族与后族的权力斗争

后族是西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势力，早在定难军时代，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妻渎氏就曾参与政事。《后晋虢王妻渎氏墓志》云渎氏“抱英亲而举善推能，樊妃价寝，蕴高节而挥谦纯孝，邓氏声沉”⑨。李继迁起兵反宋时曾连娶党项豪族女以获得党项诸豪右的支持。在西晋，“权臣本身往往也具有外戚以及当世社会中重要的世家大族身份，其取得社会声望并非来自皇权，甚至有时皇权还要仰赖他们的力量”⑩。在西夏政治史上，西夏的后族外戚也具有权臣与豪右大族领袖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重叠促使他们谋求对国家政治资源的掌控，挑战皇族的世袭性政治权威，双方遂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

①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②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③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④ 戴锡章：《西夏纪》卷二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7页。
⑤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⑥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⑧ [清]钟庚起著，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五《营建坛庙》，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⑩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西夏皇族与后族之间的政治斗争主要围绕着皇帝继嗣、皇帝兴废、政治权力分割、对外政策等方面进行。在皇帝继嗣方面，夏景宗元昊被太子宁令哥劓鼻不治，遗言立从弟委哥宁令为帝。元昊手下大臣皆欲遵遗言奉委哥宁令登基，但为国相没藏讹庞所坚决反对。没藏讹庞认为委哥宁令与元昊血缘关系疏远，非元昊直系亲属，加之没有为国立功，不具备继统资格。他强调继统因遵循传统，认为“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①。顺势搬出出生不久的谅祚，扬言：“今没藏氏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②群臣只好放弃委哥宁令，拥立谅祚为帝。没藏讹庞以冠冕堂皇的法理依据说服群臣拥戴谅祚，但实际上是因其图谋掌控西夏国政，谅祚幼小便于控制；加之没藏一族为谅祚母族，没藏讹庞以其与谅祚的血缘关系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朝政。没藏氏成功拥立谅祚，具有建策之功，其妹没藏氏又为太后，“于是政在没藏矣”③。《宋史·夏国传上》亦云“谅祚幼养于母族讹庞，讹庞因专国政”④。委哥宁令丧失继承帝位资格对皇族势力来说可谓一大打击，没藏氏专政又再次削弱了皇族势力。但在李守贵之乱中，没藏讹庞联合皇族势力讨平李守贵。《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实录》书环庆经略司言：夏国小大王阿叔嵬迷裂皈与没藏、讹荼杀其国母及补细相公，而讹荼挈小大王归其族。”⑤可见没藏讹庞是联合谅祚叔父嵬名裂皈讨平李守贵的。

在夏慧宗秉常崩后，皇族与后族又围绕着继承人问题产生了矛盾。史载：“慧宗薨，乾顺甫三岁，大臣嵬名阿吴等不欲立，独梁乙逋利于恃权，与梁氏立之。”⑥夏慧宗秉常在位时，其母梁太后与兄梁乙埋联合专政，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秉常形同傀儡。梁乙埋卒后其子梁乙逋承袭国相一职，后族势力尾大不掉。因此皇族大臣嵬名阿吴不希望秉常即位，使国家权力仍然集中于梁氏家族手中。但梁乙逋因秉常幼小便于控制，与秉常母梁太后联合拥立，西夏国政继续由梁氏家族把持。

西夏皇族与后族围绕着皇帝兴废发生的斗争主要在夏慧宗秉常一朝。夏慧宗大安七年（1081年），秉常与梁氏因汉礼、蕃礼之争，被梁氏诛杀亲信大臣，自身被幽囚于宫外木寨。消息传出后，皇族大臣纷纷率领手下人马与梁氏相抗。史称在这场变乱中“兴州左右新旧行邪造逆之臣与秉常故时亲党，各拥兵自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2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③ [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六二，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104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0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仁宗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62页。
⑥ 戴锡章：《西夏纪》卷一九，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2页。

斩绝河津，南北阻隔”[①]。梁乙逋数出银牌符招诱，诸皇族大臣坚决不从。随侍秉常的皇族大臣嵬名景思为保护秉常不被梁氏幸臣所害，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抗争。史载濮王“仁忠父景思尝从秉常于木寨，当河津阻绝，罔萌讹等潜使窥伺，欲使鸩毒，景思左右抗护，以计脱者再，秉常德之”[②]。西夏皇族作为坚决拥护秉常的政治势力甚至为宋廷所重视。北宋趁西夏内乱大举伐夏时，宋神宗还“诏谕夏国嵬名诸部首领，能拔身自归及相率共诛国仇，当崇其爵赏”[③]。在北宋的军事压力和皇族势力的支持下，秉常最终被梁氏复位。

西夏皇族与后族围绕政治权力分割发生的斗争主要在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和夏仁宗仁孝三朝。《梦溪笔谈》云：“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④]可见秉常在位初期，皇族嵬名氏与后族梁氏、番姓大族都罗氏、罔氏等联合执政。但随着嵬名浪遇被贬出朝廷，梁氏独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今彼所用谋国者，非梁氏叔伯即兄弟。”[⑤]罔氏等番姓大族纷纷依附于梁氏。《梦溪笔谈》即云：“移逋、萌讹皆以昵幸进。”罔萌讹甚至成为梁氏侵宋的主谋，史载：“梁氏与萌讹首为悖乱。”[⑥]

夏崇宗乾顺即位后由国相梁乙逋与太后梁氏联合专政。梁氏一族把持西夏中央大权，不许皇族大臣染指。史载：“今夏国酋豪，惟梁氏一门而已，凡其中外亲党，靡不持权用事……其余首领，虽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于国事、兵权无得干预，其粗有权位，许其管勾人马者，不过如威明特克济、沙克星多、贝中彻辰之类三数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⑦]皇族大臣嵬名特克济虽然略有权力，被命统领军队，但被梁氏一族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另一皇族大臣嵬名阿乌也与梁氏在政治上保持距离，“其酋长善用兵如威明阿乌辈，皆秉常族党，多反侧顾望”[⑧]。梁氏一族为了保持权力稳固，还笼络其他番姓大族。史载：“夏国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国之心，然其为人狡而多算，宽而得众，方欲内安酋豪，外结朝廷，俟内外无患，然后徐篡取之。”[⑨]但许多番姓大族都不与梁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66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80页。
③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10页。
④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神宗熙宁五年三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613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神宗元丰五年五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57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元祐二年十二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916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五，哲宗元佑二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70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二，哲宗元佑五年十二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50页。

氏合作，史载："西夏顷自秉常之祸，人心离贰，梁氏与人多二族分据东西厢兵马，势力相敌，疑阻日深……今梁氏专国，数与人多不协，内自多难。"①

乾顺即位时宋廷得报"今嵬名革常管勾国事，国母更不管勾"②。但实际上西夏仍由梁氏一族秉政。直到梁乙逋伏诛后，"嵬名族人复预国事"③，重新参预国政。夏仁宗仁孝时期，外戚任得敬始与皇族大臣交好，先以"货贿馈朝贵与宗室执政者"④使其女由嫔妃进至皇后。在任得敬平定萧合达之乱后，濮王嵬名仁忠向仁孝建言："得敬兵威震慑河南，今大乱甫平，遽解兵柄，非所以靖反侧也。宜崇其爵秩，以系军民之望。"⑤仁孝采纳嵬名仁忠之言，封任得敬为翔庆军都统军，爵西平公。随着战功增多，官职节节高升，任得敬希望从地方进入朝廷参与执政。鉴于夏毅宗谅祚、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三朝后族专权，朝中大臣强烈反对。濮王嵬名仁忠"亦言其不可，遂止"⑥，但任得敬始终谋冀入朝，他暗中让女儿任太后授意于支持他的朝臣重新再议此事。由于濮王嵬名仁忠一直反对任得敬入朝，刚直不阿，任太后"惮仁忠严，数年不敢泄于外"⑦，任得敬便转而向嵬名仁忠的政敌晋国王嵬名察哥求助。嵬名仁忠薨后，阻挡任得敬入朝的皇族势力大为削弱，任得敬通过向嵬名察哥行贿而顺利进入朝任尚书令一官。

任得敬在朝中"谄事察哥，两人颇相得"⑧，惮于察哥威势，任得敬尚不敢公开揽权。察哥薨后，皇族大臣中再无元老与任得敬抗衡。任得敬由中书令升为国相，由西平公进爵至楚王，再由楚王进至秦晋国王，位极人臣。自汉代以来，中央朝廷大都实行同姓封王爵政策，非亲不王。异姓封王一般出现在权臣接受当朝皇帝禅让之际，如魏王曹丕代汉、晋王司马炎代魏、宋王刘裕代晋、齐王萧道成代刘宋、梁王萧衍代南齐、陈王陈霸先代南梁、隋王杨坚代北周、唐王李渊代隋、梁王朱温代唐。图谋分国的任得敬以汉人外戚而由国公进为单字王，再进至双字国王无疑是效法以上"故事"。其时皇族势力虽因濮王仁忠、晋国王察哥故去而大减，但仍是任得敬擅权的巨大阻碍，因此他"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⑨。到最后任得敬威逼仁孝分国时，被任得敬严重打击的皇族势力已基本上不能对仁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52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七，元祐三年十一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57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十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46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3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8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⑨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9页。

孝进行有力支持，最终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才平定任得敬之乱。

西夏皇族与后族围绕着对外政策而发生的斗争发生于夏慧宗秉常一朝以及夏崇宗乾顺一朝。夏慧宗秉常朝及夏崇宗乾顺朝，梁氏家族一门二后，梁乙埋、梁乙逋世袭国相，威震朝野。梁氏家族实行穷兵黩武的对宋攻占政策，引起了皇族大臣的反对和不满。夏慧宗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 年)，因不依附于梁氏而被废的都统军嵬名浪遇去世，临终前“坐卧一室，日训子孙以忠义，口不言兵”①。临终时上遗表，表中有“擢用忠良，勿犯中国”之语，被“诸梁恶之，不以闻”②。可见嵬名浪遇对梁氏的穷兵黩武的对宋攻占政策持反对意见，其不依附于梁氏的原因也在于此。夏崇宗乾顺初即位时，梁乙逋因对宋战争多有斩获，常常扬言“嵬名家人管国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③可见皇族大臣并不主张攻宋，因此没有多所建立这种“功劳”。皇族大臣并不与梁氏同心戮力，因此梁乙埋被诛前“因酋渠嵬名阿吴辈多反侧顾望，怀内顾忧，不复自将窥塞”④。梁乙逋与梁太后死后，皇族大臣多劝夏崇宗乾顺与宋恢复和好。史载：“嵬名济等劝乾顺遣大使嵬名布移聿介入告哀，且谢罪。”⑤这一时期出使北宋地方的议和使与出使北宋中央的谢恩使又多为皇族，可见西夏皇族对北宋的政治态度与梁氏家族的对北宋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

西夏皇族在与后族进行权力斗争时，在后族势力强盛时多为后族所折抑，或被罢官，或仕途无望，或身死家亡，或韬光养晦，或被贬官。夏慧宗秉常时期，夏景宗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因不依附于梁氏家族而被废致仕。史载：“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于诸梁，迁下治而死。”⑥其家属也受到牵连，“并其家属徙之”⑦。皇族大臣嵬名景思在秉常被幽囚时护驾有功。秉常复位时本欲拔擢，但“为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⑧。夏崇宗乾顺即位后，梁乙逋“诛逐嵬名亲族”⑨。《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记：“有梁乙逋者擅权立威，凡故主近亲及旧来任事之人，多为所害。”⑩“盖梁氏一族用事国中既已久矣，凡势力之相忌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274 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274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1136 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09 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54 页。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西夏事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209 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80 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270 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九，元祐七年正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1211—11212 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哲宗元祐二年八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837 页。

者，颇已遇害”①。

据李范文先生考证，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在梁氏专权时期最为得势。“死时因他所依附的，梁氏集团的被罢黜，他也随之失势，以致未能树碑立传”②，但西夏陵陪葬墓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 M108:6+13 号记有“后之兄梁乞逋等行弊恶行神器 / 逋处伪敕传以公之位奉合 / 后大未为速敕以徙定远居”③。M108:32+84+134 号西夏文残碑记有“□仁人□□□□□□□□□□日夜勇勤王室心行（以）一夜所梦共居 / 中当坐使（使当中坐）内外大喜臣民相庆一睡醒后公惊以（呼）曰□吾□志至福 / 天下危难奸臣窃（窃名）汝等无罪长远处□朕国柄监（朕监国柄）神器禀持（禀持神器）姻亲奸人”④。可见嵬名安惠被梁氏一族迫害，贬迁于定远县，在梁乙逋被诛杀后才返回朝中。

任得敬于夏仁宗仁孝朝擅权时，仁孝弟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⑤。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被“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语，贬守凉州”⑥。西夏皇族大臣的政治权益被后族以强势剥夺，其经济利益亦随政治权益的被剥夺而势微。因此在西夏皇帝诛除后党的政治斗争中，皇族大臣多有参加并建有殊勋。皇族大臣嵬名阿吴曾率手下部众参与讨杀梁乙逋，史载在梁乙逋显露叛图后，“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知其谋，集部众讨杀之，灭其家”⑦。仁孝弟仁友在仁孝定策诛杀任得敬后，暗自奉仁孝旨意，不动声色地擒拿任得敬党羽殿前太尉任得聪、南院宣徽使任得仁。史载：“及仁孝谋诛得敬，阴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得敬势孤，乃伏诛，以功封越王。”⑧

西夏皇族在与后族进行权力斗争占据上峰时，往往对后族势力采取极为严厉的政治惩罚——族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耽其母杀之，沈山喜之族于河”。除卫慕山喜外，野利遇乞一族也被元昊族诛，《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会有告遇乞兄弟谋以宁令哥娶妇之夕作乱，曩霄遂族遇乞、刚浪凌、城逋等三家。”⑨“元昊既称臣，后二年，旺荣谋杀元昊，事觉夷族”⑩。没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哲宗元祐二年十一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916 页。
②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10 页。
③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33 页。
④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35—136 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61 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38 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57 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仁宗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901 页。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仁宗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021 页。

藏讹庞为夏毅宗谅祚族诛。《东都事略·西夏传》记谅祚“乃举兵诛讹庞，灭其族。并杀其妻没藏氏”。《梦溪笔谈》则记“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族诛后族既是因为后族对当朝皇帝犯有大逆不赦之罪，亦是因为后族当政使皇权被架空，西夏皇帝为了巩固皇权必须严厉打击后族。由于后族出于部落，人数众多，所以采用族诛进行严惩。

小　结

综上所述，党项人与突厥属部中的粟特人在公元 8 世纪时为军事同盟；具体而言，党项与东突厥汗国中的粟特胡原本属于不同区域的民族，二者由于初唐时内亚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而聚集于河套这一地理空间，形成了在灵夏间犬牙交错的居住格局。基于共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形态，双方同受唐朝压迫，六胡州粟特人率先铤而走险，灵夏党项积极响应，组成粟特党项联军，兵锋东指胜州，以联合胜州突厥、党项并希冀获得后突厥汗国的军事支援。粟特、党项结盟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双方均受到突厥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叛乱的政治诉求正在于希冀成为后突厥汗国治下属民。联军最终在唐军、党项拓跋部、吐谷浑慕容部三方夹击下内讧溃灭。唐廷以党项拓跋部为防河军来对抗突厥，长期以来党项拓跋部与突厥形成了敌对态势，因此忠于唐廷的党项拓跋部积极介入平定六胡州之乱，拓跋思泰因而战死，但拓跋氏家族从此在朝野中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其政治影响扩展至其余党项诸部，成为代替唐廷统治党项诸部的合法代表。

党项拓跋部为朔方军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与后突厥汗国对峙时期，党项拓跋部作为防河军而对抗突厥人，拓跋部酋首既世袭静边州都督府都督，又世袭防河军使。拓跋兴宗长期担任朔方军节度副使和陇右节度副使，他还入朝担任禁军将领。安史之乱前，有多名党项拓跋氏成员在长安担任禁军武将。安史之乱后，唐廷以党项拓跋部为天柱军，隶属于朔方军，党项拓跋部参与到朔方军的平叛战斗，拓跋澄泌成为唐室功臣。随着朔方节度辖区被分割为京西北八镇，党项拓跋氏更多地活动于夏州藩镇，自唐德宗贞元年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党项拓跋氏有多人担任银州刺史。由于夏州藩镇自节帅到士兵都具有神策军等禁军背景，党项拓跋氏在夏州藩镇内的政治地位大为下降，党项拓跋氏的许多成员通过加入夏州藩镇军而保证本族的政治利益。唐僖宗乾符年间，时为夏州藩镇教练使的拓跋思恭联合本镇吐谷浑武将，驱逐威逼节度使的客军，被节度使向朝廷荐为宥州刺史。黄巢之乱爆发后，由于夏州节度使诸葛爽远在代北行营，拓跋

思恭得以率夏州藩镇军南下平乱，因功升为定难军节度使。此后党项拓跋氏为唐廷指使，在忠唐旗帜下参与藩镇混战，但最终局促于夏州一地。

窦伯岁家族为史籍未载之夏州地区党项大族，其祖先世代为党项首领，自其曾祖窦罗磨起，窦氏家族世袭担任党项羁縻府州长宁州刺史、都督，均为唐廷敕授。窦罗磨被唐廷敕授大首领及长宁州刺史，是在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党项联合寇唐，仆固怀恩之乱又使唐西北边防局势愈加不稳，唐廷采纳郭子仪建议将党项迁徙、新置羁縻府州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各党项羁縻府州刺史在仆固怀恩之乱后积极入朝，加之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威信大著，安抚党项有力，隶于灵州之长宁州刺史窦罗磨也随势入朝，在长安请求助献灵州军粮以抗吐蕃，显示了对唐王朝的忠贞不二，因此被志文高度称赞。窦罗磨之孙窦铁山继任长宁州都督时，长宁州已由羁縻州升为羁縻府，这与其地党项人口的日益增多密不可分。窦铁山之子窦伯岁继任长宁州都督后，又兼任夏州左厢子弟都知兵马使，这一方面说明其时长宁州已由灵州转隶于夏州，反映了唐廷对内徙党项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表明窦伯岁继承了盛唐以来党项酋豪进入藩镇军事系统，掌握藩镇武力的军事传统。与窦伯岁晚年同时之拓跋思恭正是以夏州藩镇军职教练使升为宥州刺史，在唐末乱世风云际会，通过统率夏州蕃汉军队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最终夺取夏州藩镇最高权力，成为世袭节度使。

野利李延玉家族出自庆州党项野利氏部族上层酋豪。野利氏在党项居于白龙江流域时即为党项八大部之一，在党项内徙庆州后，野利氏在庆州的党项部族中仍然地位崇高，在唐中后期于庆州形成的党项东山部落集团中居于核心领导。野利李延玉先祖在唐开元年间曾前往长安纳贡，或为庆州地区党项羁縻府州的世袭首领。安史之乱后，伴随着吐蕃的大举东进，庆州党项部落的忠唐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大量党项部落加入吐蕃军团，成为吐蕃东进的急先锋。野利李延玉之父野利阿胡仍然坚持效忠唐廷，接受了唐朝的官告，被唐朝委任率庆州下属党项羁縻州静州党项部落防御吐蕃。

由于唐廷以京西北八镇分别统辖各自辖区的党项部落，这些党项部落的上层酋豪多在管辖自己部落的藩镇内仕职。初唐以来，唐廷大用蕃将，进入藩镇时代后，此风不减。野利阿胡终其一生，始终效力于邠宁静难军节镇。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野利阿胡被邠宁节度使李用派遣监护党项部落。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野利阿胡又被静难军节度使朱玫任为庆州凤川、静羌两镇副兵马使。自此野利阿胡进入到静难军武职军将的正式序列，在军事上、政治上直接隶属于静难军节度使。野利阿胡的军将将衔不仅由静难军节度使直接授予，静难军节度使

李继徽还在唐亡梁兴的特殊时期自行授予野利阿胡监察御史这一宪衔，野利阿胡还被授予上柱国这一勋官。

野利阿胡于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任上逝世后，庆州经历了静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之乱、秦岐政权与后梁的争夺战，被后梁置于鄜延都置制使渤海王高万兴辖区，野利李延玉被高万兴委任为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在庆州与鄜延合为一路的特殊历史时期，野利李延玉效力于庆州鄜延制置使，即袭任凤川、静羌两镇镇边使后，又被署命为三交川镇城使，随后升为西北路都指挥使。在庆州独立于鄜延两镇以后，野利李延玉又被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任为本路指挥使。在庆州重新隶属于静难军后，野利李延玉被静难军节度使毛璋任命为都押衙，自此进入藩镇衙庭，以后又被静难军节度使经朝廷授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等检校官及宪衔，最后任节度押司，日益亲近于静难军节度使，不断牢固作为节度使亲随的政治身份。

综观野利阿胡、野利李延玉的仕宦历程，父子二人始终胶着于静难军所属区域。虽然静难军历经朱玫之乱、王行瑜之乱、李彦鲁之乱，静难军所属庆州又被后梁分割与鄜延高万兴，庆州再经窦廷琬之乱，但野利阿胡、野利李延玉基本上是在庆州仕职。他们以部落酋豪担任镇将，又从边镇进入到节度使衙庭，不断靠近藩镇的权力核心，这既是他们的仕宦升迁导致，又是静难军节度使重视本镇党项武力所致。静难军节度使以野利阿胡、野利李延玉为镇将，主要是因为边镇地区党项部落众多，以党项酋豪为镇将便于统治；而以野利李延玉为都押衙、节度押司等节度使亲随，是意图将党项镇将与藩镇权力核心牢固捆绑，化党项武力于藩镇直属军。

唐王朝对拓跋思恭授以王爵，主要是为了奖励他的平乱之功。五代诸王朝则以王爵来羁縻定难军李氏，力图将定难军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避免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发生冲突。北宋对李德明封以夏王，视之为既有王爵，亦有土地人民的真王。但李德明成为真王是有条件的，既承认北宋对定难军的政治领属，而且北宋一直坚持李德明首先是定难军节度使，其次才是夏王。李德明成为合法的真王还在于他接受了北宋的赐姓，因此他是以北宋宗室的身份来统治定难军的。宋、辽双方都争夺对定难军李氏王爵的册封权，显示两国欲将定难军纳入以本国为中心的天下。辽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是承认了李德明具有独立建国的资格。定难军节度使的本官名称自唐末至宋初基本不变，宋、辽都对定难军节度使本官的名称略为改动，以限制定难军节度使的权力。唐、五代、宋、辽诸朝大都对定难军节度使授予检校官、兼官、文散官、功臣号、食邑、赠官，其中李彝殷和李德明的

加授等级是最高的，显示出李彝殷和李德明在定难军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定难军节度使高居本镇职官系统之首，在定难军节度使之下，其亲族大都担任定难军武职军将的都级官长，牢牢掌控了定难军的军事力量。不少定难军节度使都以本镇武职军将起家。定难军节度使掌控了对本镇武职军将的辟署权，为他们向朝廷请求各种朝衔，赢得了本镇武职军将的政治拥护。定难军的高阶文职僚佐大都由定难军的亲族和戚属担任，其中军事化的行军司马一职、武职军将中的衙内都指挥使一职都为定难军的储帅所担任。定难军的戚属往往世袭本镇高阶文职僚佐。定难军的州刺史亦由节度使亲族世袭担任，州刺史的权力在定难军本镇仅次于节度使，定难军历史上的重大变乱都因州刺史挑战节度使政治权威而引起。定难军节度使对于本家族政治谱系的构建也是为了追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自李彝超以下的定难军节度使皆遵拓跋思恭为祖，用以稳固本家族的政治统治。

西夏番姓大族的封爵均由皇帝授予，象征了皇权的神圣性。而其封爵的世袭则使皇权和皇室家族血缘的神圣性永久化。封爵尤其是王爵，成为西夏番姓大族特别是西夏皇族与西夏境内其他社会群体区别的重要政治特征。西夏皇族的封爵由既是皇族“族长”，又是国家元首的皇帝授受，体现了皇室家族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统一。封爵的等级高低则整塑了皇族内部的政治阶序。西夏番姓大族官僚集团作为西夏君主制下的贵族团体，代表着番族的政治利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要害部门担任官员，使西夏番姓大族成为对国家事务拥有决断权的权力精英群体，将嵬名氏家族的统治意志上升至国家政治层面，并贯彻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单位。无论是任官于中央还是任官于地方的西夏番姓大族，其都服务于西夏中央威权体制的整体利益。通过在各级官府参与行政事务，西夏番姓大族的政治能力得到提升，皇室的政治权威也得以自上而下进行流动。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使亲族政治成为西夏番姓大族维持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出身于西夏番姓大族的军官的大量出现不仅体现了西夏军事体系的部落化色彩，还体现了番姓大族对控制军队以确保其尊重皇权、保卫皇权的重视，也说明统治阶级渗透于西夏军队组织体系，西夏军队的指挥层出现了贵族化倾向。

有夏一代，皇族内部以及皇族与后族之间政治理念的互异所导致的激烈冲突使西夏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不断出现异化。皇族与后族之间的激烈冲突来源于后族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严重影响到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皇族的政治权益。在与后族的政治斗争中，皇族官僚群体的抗争缺乏组织因素，而后族则

具有集团精神。皇帝是将皇族与后族连接起来进行国家政治运作的支配链，后族权臣为了取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暂时以皇帝为傀儡，将其架空，实行后族独裁极权统治，这种政治统治的寡头化倾向使后族权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无论是皇族还是其他朝臣，大部分都持有拥护皇帝统治的政治倾向。而后族权臣一旦图谋废帝自立，即违反奉嵬名氏帝子为帝这一集体政治规范准则，完全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将会激发皇族一致反对后族专政的群体意识，武力控制和反控制的暴力元素将在双方的冲突中得到凸显。

第三章　政治化的西夏番姓大族信仰

第一节　梵音西来：灵夏党项与丝路佛教

一、于阗使臣笔下的灵州党项使节

公元7世纪初吐蕃政权于青藏高原兴起后，居于今青海河曲、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部落纷纷内徙至唐陇右道北部诸州和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境内，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则为吐蕃所统治。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进占河陇，于唐初内徙的党项诸部再次向东迁徙，逐渐聚居于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留居陇右的部众又为吐蕃所控制，并随吐蕃势力在河西走廊的发展而进入河西一带。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遍布河西一带的党项成为此处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①]《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咸通十三年）八月，归义节度使张议潮薨，沙州长史曹议金代领军府；制以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②]此"羌"即指党项。《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云："（大历）九年二月，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胡三省注曰："羌，党项之属。浑，吐谷浑也。"[③]

晚唐至五代时的凉州至灵州一线也居住着大量党项部族，后晋高居诲《使于

① 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记碑》载："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89页。S.5697《申报河西政状》残片亦云："缘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61页。S.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云："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②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8164页。

③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7226页。

阗记》云:"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拈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①]灵州地界的党项部落也很多,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六《关西道十二》"灵州"条记载,灵州黄河南岸有清远镇管青天门、泥悉逋、罗泥、罗泥磨庆、噤埋、嗓你也移、封家、宗家、越邦等族;黄河南岸有昌化镇管委尾族;保安镇管拓跋第一族;保静镇管委尾、成悉逋、罗庆、杨尉尉、埋庆、庾子等族;临河镇管嗹悉逋、庾子、埋逋等族;怀远镇管八笣、浪崖、笣音池逋、嗹埋一族、移逋一族、悉笣等族;定远镇管曲守荣、西逋、越啜、遇悉逋等族。

灵州自晚唐以来成为丝路东段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严耕望先生曾谈道:"(唐)中叶以后,陇坂以西陷属吐蕃,长安通西域之南北两驿道皆没蕃境,于是灵州不但为中国北通塞北诸蕃之孔道,亦为西通西域之孔道。"[②]驻于灵州的朔方军节度使作为中央朝廷的代表与河西、西域诸地方政权联系紧密,而灵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也参与到与河西、西域诸族的交往中。由于五代宋初有大量于阗人活动于沙州,现存晚期于阗文文书多记载有公元10世纪河西地区之历史。发现于敦煌,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的P.2741号于阗文文书即记载了两个活动于河西地区的党项使节。该件文书是于阗出使甘州回鹘的使臣给予阗王庭的奏稿的副本,在奏稿中于阗使臣汇报了他在甘州回鹘内乱时的所见所闻,其中提到了:"中国方面的使臣,贱臣也遇到了……这位使臣仅停留很短时间就和两位Tanguts使臣逃掉了,穿经突厥中,从那里他更向前进,他为中国皇帝献给汗的礼物全被突厥人拿走,连同国信及其他物。"[③]

Tanguts即"党项",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碑》即称党项为Tangut。[④]王静如先生认为:"宋辽,金,元史除宋辽仍有称党项者外,率以唐古唐兀以代党项,此则以其音近使然。蒙元建国之际,西亚及欧洲往来东亚者之记载则以Tangut等音以记之,如Marco Polo游记有唐古忒省一章(Tangut),Rashid-eddin《史丛》亦著西夏为Tankut,AL-ai-ediinAtta Mulk,Diuveni《世界征略家传》叙回鹘南迁有Bukulekin征Tanguts事,Hayton I Hetnum遗其弟Sempad(即Simbald)书称Tanchgat盖皆唐古之对音,后世称唐古忒之由来也。"[⑤]

---

①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于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224页。
③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96、P.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④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⑤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1—662页。

P.2741 号文书的年代黄盛璋先生以文书中“司空张尚书”(si khūm cā svā m sī)为张淮深以及文书中出现的“张大庆”之生活年代而考订为公元 886 年。[①]但笔者以为“张尚书”为张承奉,在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称司空者仅有张议潮和张承奉,张承奉在沙州掌权时间为公元 894 年至 910 年,而于阗与沙州归义军往来始于 901 年[②],因此 P.2741 号文书应为张承奉时期文书,具体年代为公元 904 年张承奉称司空至 910 年张承奉建金山国之间。另外,张大庆之名虽然在《张淮深变文》以及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中出现,可以说明他主要活动于张淮深执政时期,但并没有史料证明他随张淮深一门的覆灭而离开仕途。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历仕数主的不乏其人,如张安左“累历三朝,久侍宫闱”[③],所以张大庆是有可能历仕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的,其姓名才会出现于 P.2741 号文书中。

文书中出使甘州回鹘的党项使节应来自灵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在当时的中西交通中,灵州、庆州之间的党项作为抢掠使节、阻断交通的势力引起了朔方军节度使以及河西各地方政权的重视。早在中和四年(884 年),灵州至邠州“中间兼有党项抄掠,全过不得”,归义军使节还在“路上遭贼,落在党项”[④]。10 世纪初,甘州回鹘日渐强盛,谋求成为河西各民族政权之共主,并积极向中央朝廷朝贡,求取封号。凉州、灵庆党项等西路党项成为影响甘州回鹘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为打通朝贡之路以及在丝路中继贸易中取得更大利益,甘州回鹘与灵州党项互派使节往来。P.2741 号文书正反映了此种现象,而文书记载党项使节则标志着灵州党项作为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的重要势力开始为于阗所瞩目,灵州党项开始正式进入到于阗人的政治视野中。

二、灵州党项佛教徒与于阗

公元 9 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后,于阗从吐蕃治下恢复独立,成为 9 世纪中叶至 11 世纪初叶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之间最大的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901 年于阗与归义军政权通使往来后,于阗与沙州之间的道路被打通,双方致力于维护于阗—沙州道的畅通,于阗的佛教文化艺术源源不断地传入沙州,沙州以及毗

①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②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86 页。

③ 颜廷亮:《敦煌遗书 P.3633 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新校》,《敦煌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④ S.2589《肃州防戍都营田康使君县丞张胜君等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485 页。

临河西地区中原边郡的一些僧侣和佛教徒也前往于阗巡礼佛教圣地，其中就包括灵州党项上层贵族。在敦煌发现的现藏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物收集品部（原藏印度事物部图书馆，1991 年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与英图东方部合并，称英国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物收集品部）于阗文 ch.00296 文书第 108 至 120 行为七王子向于阗王庭的奏稿，奏稿写道："七王子谨呈报王庭。我们离开王室的荫蔽，愿将来再来牛首山，诏令我们不要在沙州久留……他没有领我们至甘州，我们的牲畜已全消亡……Chika 不论对于牲畜或灵州的仆射方面都毫无办法，往后我们要到朔方将无礼物或信献给中国皇帝。"①

从 ch.00296 文书第 23 至 108 行于阗使臣奏稿以及七王子奏稿题名可知七位王子分别为 Gumattira、Stama、ttiya-tcuna、yinaya、Svakalai、Druattira、sagai。黄盛璋先生认为这七个名字源于汉藏语系，七王子应为来自灵州的党项人。②从七王子奏稿和于阗使臣奏稿来看，七位党项王子先到于阗牛首山朝敬，离开于阗时于阗王命出使甘州回鹘的于阗使臣 Chika 等护送七位王子同至甘州，"谕令臣等必须照顾旅行中王子们的衣服和牲畜"，在"从萨毗且末到沙州"的途中都被仲云抢掠。③由于甘州回鹘内乱，七位王子于沙州停留，但准备迅速返回灵州，"每一个人必需跳入火坑"④。于阗使臣则表示了对他们到甘州的担心"（甘州）城外的回鹘人和仲云人将不杀他们，而将强迫他们作为牧牛人，没有其他办法！他们是王之子，他们必须走到中国人中去，不管对他们是好是坏，那是他们的父母之邦，这里他们将变为回鹘和仲云的奴隶，什么时候能忍受那种罪名"⑤。

七王子奏稿中提到的"牛首山"，是于阗著名的佛教圣地。据古藏文文献《牛角山授记》（Ri-Glang-ru lung-bstan-pa）、《于阗国授记》（Li-yul lung-bstan-pa），释迦牟尼寂灭前曾在灵鹫山讲述《月藏经》，又率众飞到于阗牛头山，七日七夜为众生说法。另据隋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所译《日藏经》（Sūryagarbha Sūtra），牛头山为诸神守护之圣地。于阗王在牛头山建有牛头山寺（hgehu-to-can），为一大乘佛教寺院。随着于阗与沙州的密切往来，牛头山作为一种瑞像频繁出现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壁画中。七王子到牛首山朝敬说明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七位王子中，Gumattira 的名字源于于阗瞿摩帝寺（Gūma-ttiräś），此王子以瞿摩帝寺寺名作为

①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②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③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④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⑤ 黄盛璋：《敦煌于阗文 P.2741、Ch.00296、P.2790 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自己的称号。另一王子 ttiya-tcuna 为英国学者贝利(H.W.Bailey)译注为大尊[①],为一佛教称号。两个带有佛教意味的名字也说明了党项王子对佛法的虔诚礼敬。

党项在吐蕃时期即信仰佛教,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吐蕃建桑耶寺(bsamyas)时,为调伏神魔,据堪布的教导,在东方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域,迎请了嘎巴多吉熏努。[②]在吐蕃有很多党项僧侣,其前名多冠以"木雅巴(mi nyag pa)""木雅(mi nyag)"或"咱米(rtsa mi)"等,如生于多康之弭药地区的"咱米桑杰查巴(rtsa mi sangs rgyas grags pa)"[③]。内迁至灵州、夏州的党项也遵奉佛教。前述多吉熏努据罗卓仁青森格《嘉洋曲吉传记》和《安多政教史》记载,是来自夏州的党项人,号称多闻子活佛。夏州在唐五代宋初崇佛气氛浓厚。《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云华严三祖康法藏于"永隆元年觐亲于夏州。道次,郡牧邑宰靡不郊迎,缁侣为荣。"[④]《大宋僧史略》卷上云:"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苧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⑤]有许多夏州人出家后成为高僧大德,如康法藏。《宋高僧传》又记长安大兴善寺高僧潜真"为夏州朔方崇道乡人也……年在学数,业尚典坟。幼好佛书,抑从天性。甫及弱冠,投迹空门,开元二十六年隶名于本城灵觉寺"。[⑥]《弘赞法华传》亦记有夏州人智藏为长安大兴善寺僧侣,还记有一夏州僧石法师。在这样的环境下,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中有不少人崇奉佛教,如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子李彝谨妻祁氏"信蓬发以踪横,志灰身而杜阈,日持斋戒,旦夜持经,未及五祀将终"[⑦]。

灵州自唐至五代高僧大德辈出,在唐有释辩才、释无漏、释增忍,在后唐有释无迹,后晋有释道舟,其中释无漏法体至北宋初年仍不崩坏。灵州寺院众多,唐有法华道场、下院、龙兴寺白草院、广福寺、龙兴寺孔雀王院、城南念定院、永兴寺,其中广福寺至后唐时仍存。灵州地方长官朔方军节度使极为礼遇本地的高僧大德,如自唐末至后唐世袭朔方军节度使的韩氏家族就"对于本府的管内的名僧大德给

---

① H.W.Bailey, "The Seven Princ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Ⅻ.3-4, 1948, p.621.

② 止贡巴·贡却丹巴然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版),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39 页。

③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④ [新罗]崔志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卷五〇《史传部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年,第 283 页中。

⑤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五四《事汇部下外部教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年,第 337 页中。

⑥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唐京师兴善寺潜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03 页。

⑦ 《后周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58 页。

予相当的关照和尊崇。”[①]灵州的僧侣对韩氏也非常敬重,敦煌所出朔方节度使韩逊生祠堂碑残卷即云:“今朔方之牧守将吏耆艾淄黄列状,以帅臣韩□善政来上请□□塑像而生事之。”[②]“朔方节度幕府人员亦有礼佛弘法的诸多活动”[③],在敦煌文书中多有体现。灵州本地的汉人百姓和党项部落也崇信佛教、礼敬高僧。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释无迹寂灭时,“筋骨如生,风神若在,蕃汉之人观礼称叹”[④]。道周登坛讲经时,灵州本地“道俗峰屯,檀施山积”“至于番落,无不只畏”[⑤]。释增忍在贺兰山结庐精修时,“羌胡之族,竞臻供献酥酪”[⑥]。这些高僧中,释辩才“追远之荣,声闻塞外”[⑦]。增忍弟子无辙寂灭后被朔方军节度使韩逊“录遗迹奏闻,太祖敕致谥曰法空,别赐紫方袍,塞垣荣之。”[⑧]灵州百姓还参与营建寺庙,如释道舟“乃率信士造永兴寺”[⑨]。值得注意的是释无迹任灵州广福寺住持时,“塞垣间求戒者必请为力生焉”[⑩]。可见唐末五代时灵州一带菩萨戒十分流行。北宋初年,灵州佛教气氛仍然十分浓厚,《大宋僧史略》卷上云:“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夹苧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⑪]加之河西诸政权入贡僧侣、西域印度东来僧侣汇聚于此,北宋初年的灵州堪称梵音渺渺的佛教都市。

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的西夏立国后举国崇奉佛教,其与于阗在佛教文化方面表现出许多相似的文化现象。在数量繁多的西夏文佛经中,有许多是由于阗传入中原的大乘经典转译而来(二次转译),如华严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维摩诘经》以及《佛说阿弥陀经》等。而在现存的于阗文佛教文献中,《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 a-sūtra)以及《佛说阿弥陀经》(Sukhāvatī-vyūha)均有发现。[⑫]现存于阗

①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③ 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④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〇《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2—753页。

⑤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三《晋朔方灵武永福寺道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7页。

⑥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7页。

⑦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六《唐朔方龙兴寺辨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8页。

⑧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8页。

⑨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三《晋朔方灵武永福寺道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6页。

⑩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〇《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2页。

⑪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五四《事汇部下外部教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337页中。[宋]赞宁著,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3页。

⑫ R.E.Emmerick,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Ⅲ), 1st ed., Tokyo, 1979, pp.15—36.

文佛教文献中有一些《金光明最胜王经》[①]，此经在西夏也比较流行。西夏早期即将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西夏文，夏仁宗崽名仁孝时又进行校勘，夏神宗崽名遵顼在光定四年（1214 年）还重开译场进行校译。

于阗对文殊（Mandju rī）十分崇信，相传在五台境界寺还留下了于阗国王的足迹、身影。[②]后唐同光年间（923—926 年），于阗僧人曾长途跋涉到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朝拜，“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并“遣中使供顿”[③]。于阗写卷 P.2782 第 73—80 行为一往五台山朝拜文殊的于阗僧人所写信札。[④]现存的一本《西域旅行者用梵—于阗语会话练习簿》也表明旅行者的目的地为五台山。[⑤]西夏对五台山和文殊也非常崇敬，宋景德四年（1007 年），西平王李德明（夏太宗）向宋廷“请诣五台寺修设”[⑥]，请求修供五台山十寺。西夏还仿内地五台山寺于贺兰山修建五台山寺，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二章第四品“山之名义”中即有“五台净宫”[⑦]。在现存西夏文佛经文献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众多，国家图书馆、西安市文物局、宁夏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日本京都大学均有收藏。而五台山与华严宗关系密切。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被定为西夏时期的绢本彩绘 X.2447《骑狮子的文殊菩萨》[⑧]也表现了西夏人对文殊的崇信。

另外，在于阗十分盛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在西夏也有流传。“在西夏，对多闻天王的崇拜是相当普遍的（哈拉浩特的藏品中有 6 个关于多闻天王的圣像）。”[⑨]在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断代为公元 12—13 世纪西夏时期的多闻天画像就有绢本彩绘 X.2460《多闻天》、绢本彩绘 X.2461《骑白马的多闻天》和绢本彩绘 X.2462《骑白马的多闻天》等。[⑩]而西夏文中的“于阗”释意极具佛教色彩，《文海》释“𗍫𗥃”为

---

① P.Pelliot, “Un fragment du Suvar aprabhāsasūtra en iranien oriental”,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Paris*18, 1913, pp.89—125. 段晴：《新发现的于阗语〈金光明最胜王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22 页。Duan Qing, “Two New Folios of Khotanese Suvarnabhāsottamasūtra”,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10(2006), 2007, pp.325—336+pl.

② 李吟屏：《和田春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99 页。

③《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家人传第二·皇后刘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4 页。

④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59 页。

⑤［日］熊本裕：《西域旅行者用サンスクリット=コータン语会话练习帐》，《西南アジア研究》第 28 号，1988 年，第 53—82 页。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502 页。

⑦［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8 页。

⑧ 金雅声、［俄］谢苗诺夫：《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4 页。

⑨［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黑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事实与假说》，景永时主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49 页。

⑩ 金雅声、［俄］谢苗诺夫：《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4 页。

“此者宝X也，真言及于阗国家之名是也”[①]。

西夏的天王信仰主要流行于京畿兴庆府、沙州、西凉府及黑水镇燕军司，尤以毗沙门天王崇拜为盛。夏景宗李元昊命人在佛舍利金棺上绘刻毗沙门天王。《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Pelliot Xixia 946.1517B 号为介绍多闻天王的木牌。[②]木牌高 120 毫米，宽 70 毫米，正面有白色涂层，上存手写西夏文 19 字，墨色略淡，其中记有“𗅋𗫂𗍫𗹦𗥤𗏁”，译为“多闻天王下香”，所有 19 字连译为“□缘等不同法□多闻天王下香绕庙一叉坐庙美捶□”[③]。木牌背面严重灼烧，上下缘亦有灼痕。从木牌西夏文可知当地信众向毗沙门天王烧香并绕庙礼拜。

该木牌为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发掘所得，而敦煌地区自北魏以来即流行毗沙门天王信仰，至唐宋时期更为兴盛。在西夏占据敦煌前的归义军统治末期，莫高窟尚有天王堂寺、沙州城楼上也有天王堂。莫高窟第 9 窟西壁门北和 170 窟主室东壁门北都绘有属于北宋时代的毗沙门天王像。法国吉美博物馆也藏有敦煌所出宋代纸本毗沙门天王画像。[④]敦煌发现西夏文多闻天王木牌说明西夏治下的沙州监军司仍然延续了唐宋时期即在本地区流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敦煌成为西夏天王信仰流传的重要边州。萨玛秀克即指出“在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西夏人占领敦煌以后，对多闻天的崇拜也流传开来”[⑤]。《英藏黑水城文献》所收录的 Qr.12380-0406RV（K.K.Ⅱ.0285.a.viii）天王、菩萨名牌中，多闻天王也被书于纸质名牌上，记为“𗈪𗫂𗅋𗫂𗍫𗹦”[⑥]，直译为北方多闻天王。黑水城出土的《多闻天曼荼罗》唐卡也出现了供养人形象。

以上都说明上至西夏皇室下至西夏地方边镇民众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极为盛行。西夏以武立国，尊崇佛教，建国后又长期与周边政权冲突不断，而毗沙门天王自唐以来即为佛教战神标志，因此西夏社会各阶层将毗沙门天王作为护国战神来崇奉是不难理解的。另外，黑水城出土的《多闻天陀罗尼仪轨》《多闻天施食仪轨》均能与俄藏 X.2382 号方格粗麻布彩绘多闻天唐卡及《多闻天曼荼罗》唐卡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09 页。

②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91 页。

③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91 页。

④ 党燕妮：《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传》，《敦煌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99—104 页。

⑤ [俄]萨玛秀克：《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54 页。

⑥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57 页。

相对照，并据以解释两幅唐卡的构图及其所反映的宗教含义。无论是作为经典的《多闻天陀罗尼仪轨》《多闻天施食仪轨》，还是作为艺术品的各类多闻天唐卡，其均反映了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密宗信仰对毗沙门天王崇拜的影响。将多闻天作为主尊并置于曼荼罗坛城中的宗教场域，以及多闻天彩画中反复出现的藏传佛教覆钵式宝塔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与此相对，西夏的汉式毗沙门天王形象主要留存于据汉文大藏经翻译而来的各类西夏文佛教经典的卷首封画及插画中。敦煌、武威等河西走廊一带的石窟壁画中出现的各类天王形象也带有浓郁的汉传佛教色彩。无论是卷首封画、插画或石窟壁画，天王大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护法或文殊、普贤菩萨的扈从而出现。各类天王所持神兵的不同也放映了宗教艺术在从依据经典向实践转变中的不断变化。

总之，作为西域最早接受佛教的国家，于阗在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圈中享有盛名。奉佛求法的宗教认同性使灵州党项部落王子跨越了民族差异性来到于阗巡礼，他们在克服诸多困难返回灵州后势必会弘扬于阗佛教之原旨，不断促进于阗佛教在党项部落中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历时性的累积逐渐使于阗佛教的精华融入党项佛教，以致在日后西夏的佛教与于阗佛教出现了诸多相似的文化现象。党项与于阗最终通过宗教交往而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夏州党项与于阗

自唐末以来割据夏、绥、银、宥的党项拓跋氏（唐僖宗赐姓后称李氏）在五代宋初成为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党项割据势力的代表李继迁起兵反宋后连年与宋攻战，为了取得战略空间，“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①]，意欲攻占灵州。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开始进攻灵州外围堡寨，至道二年（996年）、三年（997年）、咸平五年（1002年）又三次攻围灵州，最终于1002年占据了“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的灵州。李继迁与宋的灵州之战使丝绸之路灵州道的畅通受到严重阻碍，河西、西域诸政权多遣使与李继迁交涉。在于阗派出的使者中就有“出使中原、西夏或河西的甘州回鹘的”[③]。

于阗文文书P.2958中记有代表夏州党项政权出使于阗的一名使节。P.2958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二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9页。

②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③ 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号文书第 199—215 行为《朔方王子上于阗朝廷书》,第 216—227 行为《朔方王子禀母书》。两书的时间黄盛璋先生考订为 994 年。[①]据《朔方王子上于阗朝廷书》,朔方王子 Huapa-kyau 因为"去 thamhtta(党项)的道路已被阻断",所以"要离开这里(指沙州)往于阗"。Huapa-kyau"把价值二百匹丝绸的东西,从很远地方带到了大夏国(Tha-Sa),我(指 Huapa-kyau)是作为一个去于阗的信使"[②]。在《朔方王子禀母书》中,也记有"我(指 Huapa-kyau)不能从中国(沙州)再往前走,去 thamhtta(党项)之路已被破坏。我已把这二百匹丝绸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带到夏国……我作为信使在这里周游"[③]。

"朔方"(śa hvā 或śa hvā m)一词在于阗文文书中出现多次,如 StH.、P.2741、P.2786、Ch.00296、Ch0048。[④]朔方王子为灵州(di ttū)一带的党项部落王子,在五代宋初诸党项部落中多有以王子为称号者,如泾州野离(野利)部"野离王子罗虾独"[⑤]、府州尼也族"泥香王子"[⑥]等。夏州党项割据政权与灵州党项部落联系紧密,当后唐政权对灵、庆之间的党项进行围剿时,夏州李氏曾派兵支援灵庆党项。《旧五代史·唐明宗记》云长兴三年(932 年)七月,"灵武奏:夏州界党项七百骑侵扰当道,出师击破之,生擒五十骑,追至贺兰山下"[⑦]。李继迁攻取灵州也得到了灵庆党项的支持,周伟洲先生认为:"淳化五年(994 年)初,继迁在获得灵、庆、环等州党项部众的支持后,将下一步进攻的重点转向了灵、庆等州。"[⑧]

李继迁占领灵州后的战略计划是经营河西,所以在占据灵州的翌年即带兵进攻凉州,其所代表的夏州党项割据势力在攻占灵州前后成为丝绸之路灵州道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影响迅速扩至河西。辽圣宗统和七年(989 年),辽与李继迁和亲,以义成公主嫁之。统和八年(990 年)十二月,辽又"遣使封李继迁为夏国王"[⑨]。《辽韩橘墓志》亦载:"朔方分阃,河右称藩,九重曲降于玺书,一介载驰于册命,以公持节封李继迁为夏国王。"[⑩]辽对李继迁的支持加强了夏州党项对河西各族政权的影响。P.2958 号文书第 182—198 行于阗使臣《上于阗王庭书》即提到甘

①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②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③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④ [日]高田时雄著,钟翀译:《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18—219 页。
⑤ [北宋]王钦若:《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965 页。
⑥ [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64 页。
⑦ 《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本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593 页。
⑧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4 页。
⑨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0 页。
⑩ 陈述:《全辽文》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21 页。

州回鹘可汗遣使于李继迁。[①]辽对于阗也具有政治影响,《辽史》卷七〇《属国表》把于阗列为辽的属国之一,辽还设有于阗国王府。而于阗在公元989年、990年均向辽进贡。另据《宋史·于阗传》,于阗在北宋初年向宋廷进贡5次,分别为公元961年、965年、966年、969年、971年。自公元10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1世纪初,于阗和喀喇汗王朝久战不息,面对喀喇汗王朝军队的步步紧逼,于阗希望获得中原王朝的支持,因此特别注意丝绸之路灵州道的畅通,加上受辽的影响,便和逐渐在灵州道上崛起的夏州党项发生了政治联系。因夏州党项与灵州党项关系紧密,而灵州党项自10世纪初与于阗即存在着友好往来,所以李继迁以朔方王子Huapa-kyau为使节前往于阗。

李继迁派遣使节出使于阗,须路经甘州、沙州。北宋初年的《西天路竟》云:"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 / 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 / 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②]《朔方王子上于阗朝廷书》记载朔方王子Huapa-kyau"托一个叫Suttayqa的甘州人带给王庭一封信"。还谈到Huapa-kyau将Dro-tir寺和Gum-tir寺的两名于阗僧人"引领到中国(沙州)王面前……他们正和我一同在朔方"[③]。《朔方王子禀母书》亦云:"那两名僧侣,一个属Dro-tir(寺),另一个属Gum-tir(寺),同我一起到中国(沙州)大王前。他们回来和我一起住在朔方。"[④]

Dro-tir寺,于阗文写作Drūtir。《于阗国授记》称其是于阗王尉迟达磨(Vijaya Dharma)为其兄尊者达磨难陀(Dharmānanda)所建,奉行摩诃僧只部(Mahāsāmghika)。[⑤]Gum-tir即瞿摩帝,于阗文写作Gūma-ttir ,藏文为Hgum-tir。从文书来看,这位"Dro-tir寺的阿阇梨,他和一位瞿摩帝寺的法师一起,作为于阗的使臣来到沙州,又继续向东到朔方"[⑥]。张广达、荣新江先生更认为:"一些瞿摩帝的法师还肩负着王朝的神圣使命,与政府的使臣一起,出使沙州、甘州、西夏乃至中原王朝。"[⑦]黄盛璋先生据两信内容认为朔方王子Huapa-kyau先从沙州来到夏国(于阗文ha或hara),"而后又作为信使来到朔方,与于阗两僧同住,他还带他们见沙州王,当在以前,由此看来:此朔方王子和沙州、于阗、大夏、朔方都有关系,作为信使,而

①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② 郑柄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5页。
③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④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⑤ R.E.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London Oriental Series 20), London,1967, pp.35—41.
⑥ H.W.Bailey,"Altun Kh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 X X X.1, 1967, p.98.
⑦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佛寺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

又往来于朔方，看来也和朔方使节交往有关。”[①]笔者以为从文书内容来判断，朔方王子作为夏州党项使节出使于阗无疑，且到过于阗，其母 Khi-vyain 居于于阗，为客居于阗的党项人。[②]Khi-vyain 到于阗很可能是巡礼佛教名胜。在回复使命时朔方王子与于阗两大名寺的僧侣同行，这两名僧侣同样也负有使命，双方结伴途径沙州、灵州。在沙州时接待朔方王子的为于阗驻沙州代表 Hvam capstaka。Hvam 为于阗文“王”之意，考虑到于阗在五代宋初有许多皇室成员居于沙州，在沙州还有于阗的太子庄[③]，Hvam capstaka 应属于阗皇室成员，或为太子。

第二节　佛教王权观与西夏皇室的舍利崇拜、佛王传统

一、西夏皇族的舍利崇拜

西夏皇族的佛教圣物崇拜主要体现为崇奉舍利及舍利塔。黄夏年先生指出：“舍利崇拜的基本理论就是视佛存在，供奉舍利就是供奉佛。”[④]舍利崇拜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般泥洹经》《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佛经，佛陀圆寂后有八国为供养舍利而争夺，几乎引起战争，在香姓婆罗门的调解下，八国平分舍利。湛如法师即指出：“一些国王为获得舍利供养的动机，已经超越了宗教上的单一目的，还体现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功能。”[⑤]宋辽夏三朝对峙时期，北宋与辽皇室对舍利都非常重视。北宋建国伊始，宋太祖即“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⑥]。自宋太祖至宋仁宗，不仅西行僧人取回舍利，高昌、天竺入宋僧人也进献舍利。冉万里先生指出北宋皇帝“不仅在宫中供养、瞻礼舍利，大写御赞舍利诗，有些皇帝还亲到现场瘗埋舍利”[⑦]。据他统计，北宋皇帝中参与供养舍利的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和徽宗。据《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铭文》，辽兴宗生母章圣皇太后曾于庆州建塔供养舍利。

---

①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② 《朔方王子禀母书》云：“朔方王子 Huapa-kyau 敬上此书在于阗的我母 Khi-vyain 夫人，向她问安。”参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第 116 页。

③ 沙武田、赵晓星：《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敦煌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45—51 页。

④ 黄夏年：《舍利崇拜历史及其理论基础》，李四龙主编：《释迦塔辽金佛教与舍利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第 84 页。

⑤ 湛如：《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14 页。

⑥ [宋]范成大：《吴船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04 页。

⑦ 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第 374 页。

李元昊在称帝前两个月曾以新获舍利大建宝塔。关于李元昊如何获得舍利，《葬舍利碣铭》云："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钦崇佛道，选述蕃文。柰苑莲宫，悉心修饰；金乘宝界，合掌护持。是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皓，并中指骨一节，献佛手一枝，及顶骨一方。"[①]。可见西夏的官方说法是由于李元昊的人格魅力及其尊崇佛法，以致印度僧侣、中原僧侣进献舍利。这些舍利中的佛指舍利、佛手舍利、佛顶骨舍利都是舍利中的珍品。《葬舍利碣铭》记李元昊将这些舍利"罄以银椁金棺、铁甲石匮，衣以宝物，□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香花永□，金石周陈"[②]。以银椁金棺安葬舍利，外套以铁函，罩以宝帐，在地宫中绘以毗沙门天王，供奉香花，安置志铭都是仿照唐代舍利的瘗葬制度。《葬舍利碣铭》还记有发愿文，称"所愿者，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百僚齐奉主之诚，万姓等安家之恳。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菽麦丰盈"[③]。这些都表现了李元昊借崇奉佛舍利，向佛祖祈求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思想。《碣铭》题："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奉敕撰。"[④]可知李元昊对建舍利塔极为重视，命宰相张陟撰写志铭。

铭文叙述舍利为印度僧侣和中原僧侣所进献，正是强调李元昊所缔构的西夏王朝及西夏佛教已被印度和中原佛教界所认同，而且西夏佛教的地位也将居于印度佛教和中原佛教之上。李元昊借助印度僧侣和中原僧侣之手，获得了佛教圣物舍利，并进而大建宝塔以珍奉舍利，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护持佛法帝王的宗教形象。《碣铭》铭辞云："□□圣主兮，敬其三宝。"[⑤]《宋史·夏国传》亦记李元昊皇帝尊号中有"兴法"二字。此前李元昊还曾扣留从北宋返回印度的印度僧侣，向印度僧侣索要贝叶梵经，正是其想争夺佛教遗物，在宗教领域与北宋抗衡的政治表现。

据《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谅祚即位之初，没藏太后曾下令修建承天寺及塔，在塔下地宫以金棺银椁安放佛顶骨舍利。谅祚为没藏讹庞所拥立，非李元昊遗命继立，因此其统治合法性为时人所质疑。没藏太后新建承天寺塔以安放佛顶骨舍利，正是向世人宣告谅祚继承了李元昊作为西土佛法护持帝王的佛教代言人身份，形塑其脆弱的统治合法性。《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首先

①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154页。
②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③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④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⑤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称颂佛教，再依次论赞西夏、没藏太后、谅祚，暗示西夏及西夏皇室为佛法所护佑。由于没藏太后与谅祚“大崇精舍，中立浮屠”，佛祖才得以对西夏皇室“保圣寿以无疆，俾宗祧而延永”①。

此后秉常也顺继成为西土佛法护持帝王。据《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为阿育王敬造供奉舍利之塔，在前凉张轨、张天锡时即现瑞异。至西夏建国后祥瑞屡现，甚为神异。这些祥瑞主要是在地震后塔自正位，以及在战争中显圣助西夏军队获胜。碑铭汉文铭辞云：“先后临朝，羌犯凉境，亦有雷电，暴作昏瞑。灯现煌煌，炳灵彰圣，寇戎骇异，收迹潜屏。南服不庭，乘舆再讨，前命星使，恭有祈祷。我武既扬，果闻捷报，盖资冥佑，助乎有道。”②碑文西夏文部分云：“又大安八年，东方汉地起恶心，发大军以围武威，羌军亦来凉州。其时黑风冥冥，两手相持莫辨，灯光煌煌，环绕浮屠，二军是以败走，由此不敢前瞻。其后盛德皇太后、仁净皇帝执掌国家。继而天安礼定二年中，时时烧香布施愿文等延续不断。与汉再战，皇太后亲率车骑，尔时夜间灯光灿灿，一出一灭，明耀犹如正午，乃深入汉阵，大败之。”③从汉文铭辞可知西夏皇帝和皇太后亲征北宋前，曾派遣使臣在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下祈求佛祖佑护，随后大败北宋，显示了佛法佑护下西夏王朝的正统性。为了保证藏有舍利的感通塔永世屹立，秉常及第一梁太后、乾顺及第二梁太后都曾在地震后派遣工匠修复感通塔。

凉州护国寺感通塔所显现的种种神异被碑铭作者感叹：“故浮屠梵刹遍满天下，然灵应昭然如兹之特异者，未之闻也。岂佛之威力独厚于此耶？岂神灵拥佑有所偏耶？不然，则我大夏植福深厚，二圣诚德诚感之所至也。”④作者强调了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屡现神异是由于西夏统治的正统性，而凉州护国寺感通塔被西夏皇室修竣之日，正是秉常十岁生日之时，这进一步将秉常与舍利宝塔相联系，暗示秉常被列入自阿育王以来的佛法护持帝王谱系。于秉常在位时期撰写的《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心柱题记》即称在秉常统治下西夏“法轮常转”⑤。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亦称在秉常统治下西夏“四法轮转不绝”⑥。

夏惠宗秉常大安二年（1076年），西夏皇室在贺兰山重修一方塔。此拜寺沟西夏方塔汉文塔心柱铭文云：“今特奉圣旨，差本寺僧判赐绯法忍，理欠都案录事贺

①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③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⑥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80页。

惟信等充都大勾当。”[①]该方塔出土一圭形织锦舍利子包，里面有平纹绢包裹的四粒黑色舍利子以及呈不规则片状的骨灰。在西夏三大神山的贺兰山修建舍利宝塔，表明西夏皇室欲借其护佑京畿。据学者研究，此舍利宝塔可能为西夏五台山寺故址，这又显示了西夏形塑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因为五台山寺为西夏模仿北宋境内五台山佛教建筑而建，西夏皇室在本国的五台山建舍利塔彰显了西夏作为西土佛教中心的正统地位。此外在方塔遗址出土了近 5000 个小泥塔和近 1100 个小泥佛，牛达生先生认为这些小泥塔和小泥佛都属于法身舍利。[②]在舍利较少的情况下以大量的法身舍利代替供奉，同样显示了西夏皇室对舍利的虔诚信仰。

二、西夏皇族的佛王传统

中古时期，佛教与政治联系紧密，无论是西域古国还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利用佛教来治理国家，尤其是利用佛王传统来塑造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佛王传统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对一些崇奉佛教、地跨农耕与游牧世界的胡族王朝也深具影响，为这些胡族王朝所借用来统治本国的胡汉民众。[③]西夏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胡族王朝，佛教盛行一时，上至皇室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佛教顶礼膜拜。西夏王朝统治者积极利用佛教来统治本国的胡汉民众。

1. 敦煌、于阗、吐蕃佛王传统与西夏

在藏文典籍中，西夏皇帝被克什米尔僧人和吐蕃僧人称为法王。来自克什米尔的西夏国师拶也阿难捺在《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扉页题词中写道：“具足利乐，与天界相等的，法王世系延续不断的西夏国，在黄河的岸边和五台山的附近，国王的宫殿和军队一起存在，在被称为‘殊胜王城’的大佛殿之中，由名叫贡噶扎的吐蕃译师，翻译了《入中论颂注疏》。”[④]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曾对人谈到亲信弟子中有一人为“党项法王的喇嘛，名叫迦别半仁摩，又名迦旺秋森巴”[⑤]。八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 360 页。

② 牛达生：《方塔出土小尼婆、小尼塔及汉地是物研究》，《西夏考古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145—171 页。

③ 江上波夫即指出北魏道武帝被称为如来体现了“北方欧亚大陆骑马民族神观中深有根基的‘亦神亦佛’的天子观念，在这里已经与佛化为一体。人间最高君主和灵界至上的佛的一致化，正是北魏佛教的特色”。[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 78 页。

④ [美]范德康著，陈小强、乔天碧译：《拶也阿难捺：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喀什米尔国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4 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40—341 页。

⑤ [美]邓如萍著，聂鸿音、彭玉兰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

思巴在《彰所知论》中写道："广兴佛教：梵天竺国、迦湿弥罗国、勒国、龟兹、捏巴辣国、震旦国、大理国、西夏国等，诸法王众，各于本国兴隆教法。"[①]琼布·洛珠坚赞著《世间本教源流》云："持法大德法王包括：神辛穆时代之历史；赡部洲人类历史，具体说，主要有印度、吐蕃、汉域、西夏、霍尔、东汉之六王等。"[②]

法王即隆尊佛法之王，但往往等同于转轮王。《中阿含经》云："若在家者，必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③]《增一阿含经》云："天报王曰：转轮圣王以法王治，自不杀生，复教他人使不行杀。"[④]《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云："转轮圣王，以十善道化四天下，悉令受持，离十恶业，行十善道，具足成就，名为法王。"[⑤]古正美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圣王既以转金轮的方式降伏四方天下，大乘佛教因此即称其圣王为转轮王。"[⑥]孙英刚先生指出："转轮王与法王，在一些语境是一样的，只不过法王强调的是君主对正法的护持，而转轮王强调统一天下的世界君主含义。"[⑦]

在西夏立国前的公元10世纪，于阗、西州回鹘、敦煌归义军的统治者均以佛王面目示人，借此来标榜统治合法性。日本学者赤木崇敏即指出敦煌发愿文所展现的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称王现象，受到了佛教转轮王思想的影响，这一现象也广泛出现于包括于阗、西州回鹘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⑧]从归义军方面来看，早在张承奉称帝时期，其就被称为天王。S.1563《甲戌年(914年)五月十四日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准邓传嗣女自意出家》钤盖有"敦煌国天王印"。钢和泰藏敦煌藏文卷子称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为天王、天大王。荣新江、朱丽双认为曹议金在敦煌藏文卷子中被称为天王，反映了当时敦煌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将归义军节度使比作转轮王，因此卷子中的天王是藏文语境下的天王，而不是汉语语意的大王。[⑨]曹议金还被称为菩萨，S.1181《长兴二年(93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河西节度使结坛供

① 王启龙：《彰所知论补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琼布·洛珠坚赞、多杰南杰：《世间本教源流》，《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
③ [东晋]瞿云僧迦婆提译：《中阿含经》卷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卷《阿含部上》，第493页上。
④ [东晋]瞿云僧迦婆提译：《增一阿含经》卷四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卷《阿含部下》，816页中。
⑤ [北魏]菩提流支译：《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册，第330页中。
⑥ 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61页。
⑦ 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
⑧ [日]赤木崇敏：《十世纪敦煌の王权と转轮圣王观》，《东洋史研究》第69卷第2号，2010年。[日]赤木崇敏：《金轮圣王から菩萨の人王へ——一〇世纪敦煌の王权と仏教—》，《历史の理论と教育》第139号，2013年。
⑨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僧燃灯舍施祈愿文》记有："又作胜福，次用庄严我河西节度使大王贵位，伏愿南山□□(作寿)，北极标尊，长为菩萨之人主，永应如来之咐嘱。"

西州回鹘可汗也被视为与菩萨同身的天王。S.6551V《佛说阿弥陀讲经文》云："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天王乃名传四海……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①

就于阗而言，敦煌遗书 P.3016《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称于阗君主李圣天为菩萨天子，于阗语作 baudhasattä gyastä。敦煌藏文文书 P.t.1120v 称李圣天为菩萨，《钢和泰卷子》藏文部分称其为天王。文欣指出 gyastä 在于阗语佛教文献中常用作指神佛，此词转用于于阗王，体现了于阗王的神圣性，表明于阗人认为于阗王既是世俗之王，又是转世之神。②赤木崇敏认为李圣天被称为菩萨天子、菩萨、天王都是转轮王观念所导致的。③李圣天之子尉迟苏罗被明确称为转轮王。敦煌所出于阗文文书 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发愿文写道："我愿天竺转轮王尉迟苏罗以此功德而已躬永寿。"④于阗文文书 Ch.00274《佛本生赞》赞文亦称尉迟苏罗为转轮王及"大宝于阗国转轮王"⑤。于阗文文书 Ch.i.0021b.a《金刚乘赞文》则称尉迟苏罗为菩萨。于阗文文书 Ch.i.0021a.a 亦称尉迟苏罗之侄尉迟达磨为菩萨王。

于阗人甚至直接称李圣天及尉迟苏罗、尉迟达磨为佛。于阗汉文文书《天寿二年九月弱婢员娘、佑定牒》称李圣天为佛现皇帝。Ch.00274《佛本生赞》赞文称尉迟苏罗为世尊，世尊即释迦牟尼。于阗文文书 Ch.i.0021a.a 亦称尉迟达磨为世尊。荣新江先生认为敦煌文书 S.4274《管内两厢马步军都校拣使阴某起居状》中的佛现为尉迟苏罗，他指出"所谓'佛现'指的是佛陀现世，这与于阗语文献以 sai tcunä'世尊'来指称尉迟苏罗王(也用于其后的尉迟达磨王)是一致的，是说他如法治理国土，就如同世尊释迦牟尼护持众生一般"⑥。

青唐吐蕃统治者唃厮啰一系亦以佛王传统来治国。《梦溪笔谈》云："唃厮，华言佛也；啰，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⑦"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

①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 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2 期。

②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第 29 页。

③ 〔日〕赤木崇敏：《十世纪敦煌の王权と转轮圣王观》，《东洋史研究》第 69 卷第 2 号，2010 年。

④ H.W.Bailey, *Khotanese Texts*, Ⅱ, London: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54, pp.123—124.

⑤ M.J.Dresden, "Jū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45:5, p.422.

⑥ 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76 页。

⑦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216 页。

天子也。”明确指出唃厮啰以佛子自居的政治含义，即佛子等于佛王。《太平治迹统类》卷一六《神宗开熙河》云：“唃厮啰，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携来吐蕃立文法。言是佛种，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俗尚释教，谓佛为唃，儿子为厮啰，故称唃厮啰。”[①]李立遵通过宣称唃厮啰为佛种赢得了崇信佛教的吐蕃人的政治拥护，可见佛王传统在吐蕃人中影响极深。值得注意的是唃厮啰生长于高昌回鹘，其自称佛子很可能是受到高昌回鹘佛王传统的影响。在唃厮啰之后，溪巴温亦被称为佛种。《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知河州王赡奏议云：“巴温本董毡亲侄，董毡无子，而巴温见疑，遂逃。而董毡死，竟为阿里骨所纂。及瞎征立，而多杀首领，人情不附。又以溪巴温佛种，人颇附之。”[②]可见在青唐吐蕃内部，溪巴温凭借佛种的身份比非董毡血胤的阿里骨更有政治威望。

公元10世纪，于阗作为西域佛国，在宗教上对于西北各割据政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一时期，于阗与灵夏党项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据敦煌所出于阗文文书，灵州党项贵族曾到于阗佛寺巡礼，于阗曾遣使于李继迁处。[③]于阗的天王信仰对西夏的天王信仰具有深刻影响。[④]于阗的佛王传统当也被西夏统治者所模仿、借用。在西夏占领敦煌后，党项人会直接接触到归义军的佛王传统，而归义军的佛王传统正来源于于阗的佛王传统。与西夏处于同时代的青唐吐蕃的佛王传统当也为西夏人所了解。因此转轮王信仰在西夏社会广为流行。从各类佛经来看，转轮王的法宝为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典兵宝、主藏宝，反映转轮王七宝的西夏艺术品多有存世。瓜州东千佛洞西夏壁画中有一供养天金刚马宝图，在供养天的后端绘有马宝，表现为深棕色的宝马驮着红色珍宝徐徐前行，宝马身侧有着铠甲执金刚杖武士护行，宝马背衬红色火光。黑水城出土的绢本彩绘唐卡《咕噜咕咧佛母》绘有马宝与象宝，位于唐卡下方。奥登宝指出：“是宇宙王的七宝的特别画法：中间绿莲花上的七彩圆光中是宝剑，大概表示军官；他的右边红色莲花中一人几已磨掉，这是郡王的谋士；左边也是在红莲花上，看来是王后，再向右是马，再左是象。右面边上是宇宙王的法轮，左面边上是珠宝。”[⑤]在此唐卡中，轮宝与珠宝位于白色莲台之上，笼罩于蓝色火焰中。马宝与象宝位于蓝色莲台之

①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8册，1986年，第424页。

② 陈玮：《公元10—11世纪灵夏党项及西夏与于阗关系史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7—112页。

③ 陈玮：《西夏天王信仰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7—207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一，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72页。

⑤ [俄]萨玛秀克撰，季一坤译：《俄藏黑水城艺术品叙录》，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2页。

上，笼罩于金色背光中。黑水城还出土有单独的纸板彩绘象宝、海螺宝、弓箭宝、砗磲宝。象宝展现的是身披红鞍的宝象位于圆环之中，圆环之外是彩色光芒。

拶也阿难捺在《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中谈到西夏法王世系延续不断，则历代西夏皇帝都为法王或转轮王。佛教中的圣王一般指转轮圣王。《佛般泥洹经》云："其圣王名曰大快见，号飞行皇帝，勒兵光世，都无齐双，相率以道，无违王法，民欲飞行，念即身往。王有七宝自然生：黄金飞轮，神力白象，绀色神马，明月珠，天玉女妻，主宝圣臣，典兵圣臣。"[①]李继迁与李元昊都被称为圣王。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云："天降名君，诞时喷发火焰。国主圣王，生而满室雷霆。婴儿有齿，闻者自然惊奇。"[②]西夏史诗《夏圣根赞歌》云："番细皇，初出生时有二齿，长大后，十种吉祥皆主集。七乘伴导来为帝，呼唤坡地弥药来后是为何？风角圣王神只军，骑在马上奋力以此开国土。"[③]充满佛教色彩的《贤智集》的作者为西夏国师鲜卑宝源，作为高级僧侣的鲜卑宝源称李继迁为圣王，当有深意，即指李继迁为转轮圣王。

《夏圣根赞歌》称李继迁成人后"十种吉祥皆主集。七乘伴导来为帝"[④]。据佛教典籍，十种吉祥为文殊菩萨出生时的祥兆。《广清凉传》记文殊菩萨出生时"有十种吉祥事故，所以菩萨名妙吉祥也。何为十种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三仓变金粟，四庭生金莲，五光明满室，六鸡生鸾凤，七马产麒麟，八牛生白犊，九猪诞龙豚，十六牙象现。"[⑤]《夏圣根赞歌》称李继迁被十种吉祥环绕，即暗指其为文殊菩萨下生。陪伴李继迁的七骑士应为转轮王的七宝。文殊菩萨是否是转轮王的化身呢，《华严经·入法界品》卷五十二云："尔时，智慧转轮王者，岂异人乎？文殊师利童子是也；绍继转轮王姓，诸如来种，使不断绝。"[⑥]古正美先生认为"《华严经·入法界品》视佛教神只与转轮王同身的信仰，即是该经说明王即是佛或佛即是王的佛王信仰内容。所谓佛王信仰，就是佛教转轮王能以佛或菩萨的面貌治世的信仰。上面经文说文殊等《华严经》神祇过去身是转轮王身的意思，因此有指，如果一位帝王也能以文殊等《华严经》神祇的面貌统治天下。"[⑦]可见李继迁

① [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卷《阿含部上》，第169页下—170页上。
②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
④ 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
⑤ [宋]延一编：《广清凉传》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卷《史传部三》，第1102页中。
⑥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二《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卷《华严部上》，第728页下。
⑦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兼具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双重身份。古正美先生曾指出中古时期的于阗曾盛行《华严经》佛王传统[①],而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文殊菩萨与转轮王同身,李继迁既是文殊菩萨又是转轮王,明显是受到于阗《华严经》佛王传统的影响。

由于李继迁兼具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双重身份,而文殊菩萨又是护佑转轮王的重要神祇,因此西夏皇帝极为崇拜文殊菩萨。李德明在位时,曾遣使臣前往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朝拜。李元昊在贺兰山建一文殊殿,《宁夏志》云:"文殊殿,在贺兰山中二十余里。闻之老僧,相传元昊僭居此土之时,梦文殊菩萨乘狮子现于山中,因见殿宇,绘塑其相。"文殊殿中有文殊乘狮子像,"元昊睹之甚喜,恭敬作礼,真梦中所见之相也,于是人皆崇敬"[②]。西夏统治者甚至将北宋境内的五台山移于本国境内,将贺兰山中一处称为北五台山,并建北五台山寺。

史金波、杨富学等先生均认为西夏统治者是因为西夏立国后宋夏交恶,不能前往五台山朝拜,所以在本国建五台山寺。[③]从转轮王信仰的角度,西夏统治者在贺兰山建北五台山寺,无疑是在彰显自己作为转轮王的正统性。古正美先生指出:"中国帝王以转轮王及佛王身朝拜五台文殊的例子很多,而且中国帝王朝拜五台文殊的文化自初唐初武氏奠立后,直到康熙及乾隆统治清朝的时代,都还有以佛王朝拜五台的活动。"[④]在宋辽夏对峙时期,三国统治者对转轮王信仰都极感兴趣。杜斗城先生指出北宋时北天竺人施护曾奉诏翻译《佛说转轮王七宝经》,该经典由"宋真宗亲自护持译出,本身就说明宋真宗对转轮王治世的信仰或方法有特别的兴趣"[⑤]。辽兴宗、辽道宗均以转轮王面貌统治本国,尤李先生认为辽道宗"将自己神化为文殊菩萨,神化为转轮圣王,进而神化皇权"[⑥]。辽亦在境内设五台山,辽圣宗还至此五台山佛寺饭僧。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夏统治者为争夺正统性而在贺兰山建北五台山寺也就不难理解。前述西夏皇室敬造舍利塔也是模仿转轮圣王阿育王的行为,因为阿育王曾广建佛塔供奉舍利。

由于西夏皇室自我标榜为转轮王,西夏帝陵的建筑也极具佛教特色。西夏帝陵的陵台均为八角形塔式建筑。这种建筑式样象征着西夏皇帝为塔葬。据《大般

---

①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② 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3页。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⑤ 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河西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2页。

⑥ 尤李:《应县木塔所藏〈入法界品〉及其相关问题考论》,《山西档案》2013年第6期。

涅槃经后分》,大乘信众要为佛、辟支佛、阿罗汉及转轮王建立葬塔。佛陀的葬法即按转轮圣王的葬仪进行,这为释迦牟向弟子亲自交代,该葬仪的最后一步即在火葬后收视舍利建塔。古正美先生考证达夏西拉的法王塔为贵霜转轮王丘就却的葬塔。[①]作为转轮王的于阗王也为塔葬,《魏书·西域传》云于阗"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复盆浮屠之所"[②]。西夏皇帝陵台为八角形塔式建筑正表明西夏皇帝的转轮王身份。

2. 任得敬与西夏佛王传统

宁夏贺兰县金山乡拜寺口沟口山坡台地耸立着一对西夏佛塔,为西夏京畿地区留存的宝贵文物。拜寺口西夏双塔之西塔为十三层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残高 35.96 米。于存海、何继英先生从西夏双塔朽木的碳十四测定、西塔的藏密遗迹、西塔天宫壁面西夏文题记"上师"(䚉髻)三方面考证出拜寺口双塔始建于西夏中晚期夏仁宗仁孝时代。[③]双塔之西塔塑有转轮王七宝,此七宝位于西塔第十二层八个龛内。南龛内的象宝为一背驮火焰宝珠的大象。西南龛的典兵宝为立于五瓣莲座上的金刚杵。西龛内的女宝为一坐于五瓣莲座上的戴冠女。西北龛内的珠宝为一火焰宝珠。北龛内的马宝为立于五瓣莲座上、背驮宝珠的宝马。东北龛内的金轮,"轮内八根辐条等距离排列,外围饰火焰纹,其下为五瓣莲座"[④]。东龛内为供养人坐像。杜斗城先生认为此供养人为转轮王,塔为转轮王塔。他指出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所云"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转轮不绝"中的"四法轮"为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序文体现了夏仁宗仁孝以转轮王身份治国,但序文"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转轮不绝"主要是指秉常在位时佛法昌盛。十行与四法相对,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十行乃指菩萨之欢喜行、饶益行、无恚恨行、无尽行、离痴乱行、善现行、无着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四法应为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四法转轮不绝"非指四转轮王。他还认为西夏佛教称佛法为法城,把护持佛法的帝王为护城帝,仁宗既称护城帝,就是以转轮王姿态统治西夏。因为西夏历代皇帝均以西夏治国,"特别是仁宗仁孝对佛法的护持,更是尽心尽力。这就是拜寺口西塔的雕像内容有转轮王像及转轮王七宝的原因"[⑤]。

拜寺口西塔确属转轮王塔,但是否表现的是西夏皇帝为转轮王,余以为值得

① 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第 96—158 页。
② 《魏书》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62 页。
③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98—100 页。
④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87 页。
⑤ 杜斗城:《西夏的转轮王塔——宁夏拜寺口西塔之建造背景》,《河西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76 页。

商榷。西塔第十二层东龛内的供养人坐像施合掌印，左腿屈膝后踏于莲座，右腿则平放于莲座。从《西夏佛塔》所收录的彩版供养人坐像[①]来看，坐像的左侧上方有三个西夏文字，其中第一个字为𗼇，汉译为'任'，第二个字残缺不全，难以辨认，第三个字仅存遗迹。可见供养人姓名为任某某。此任某某当为西塔所表现的转轮王。在西夏境内敢于向帝室争夺转轮王名号的任某某只能是任得敬一人。任得敬原为北宋西安州判，在西夏攻占西安州后降于西夏，又向夏崇宗乾顺献女，任静州防御使。任得敬女后为皇后，任得敬本人在平定契丹萧合达之乱后升任翔庆军都统军，被赐爵西平公。此后任得敬入朝担任尚书令、中书令，又由中书令升为国相，由西平公进爵至楚王，再由楚王进至秦晋国王，任得敬女也成为任太后。在权势日盛后，任得敬图谋分国，自居兴灵而迁仁孝于河西。任得敬曾遣亲族出使金朝试探金世宗对西夏分国的态度，又逼迫夏仁宗仁孝向金朝上表分国。在被金世宗断然拒绝后，任得敬又暗通南宋。最后夏仁宗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族诛任得敬。

拜寺口所在的贺兰山可称之为西夏皇室的禁苑，西夏皇室在这里建有许多寺、塔，如北五台山寺、方塔、佛祖院、文殊殿、大度民寺、慈恩寺、奉天寺。任得敬在拜寺口修建转轮王塔不仅显示了其权势已凌驾于西夏皇室之上，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任得敬借修转轮王塔首先表明自己在宗教上已取代西夏皇室，具有转轮圣王的神格。他把拜寺口西塔建造为转轮王塔，是通过自诩为转轮王而顺利取代夏仁宗仁孝的政治宣传。作为新转轮王的任得敬，自然有与旧转轮王西夏皇室分国的政治资格。另一方面，任得敬通过把自己塑造为转轮圣王，可以极大地争取民众支持自己与西夏皇室分国，同时也打击西夏皇室的神圣性。

作为转轮王塔的西塔高度超过东塔，塔身又比东塔雄壮，而且每层都有佛龛，龛内有各种造像，东塔则没有造像。西塔有天宫和木梯，东塔则全无。研究者即指出"东塔和西塔修筑的时间很近，但不是同时所修"[②]，距双塔较近的方塔为西夏皇室敕命重修，东塔也应为西夏皇室修建。为了在神域压过西夏皇室，任得敬大力修建西塔，使西塔在形制上超越东塔，成为其的物化政治宣言。

3. 夏仁宗仁孝与西夏佛王传统

相对于任得敬，夏仁宗仁孝最开始先称自己为佛子。仁孝在《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依经录并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序发愿文》中引《胜相顶尊感应》经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版一五七，第243页。黑白版见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②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云:“贤天子诵持章句,能消七趣畜生之厄。……授菩提记,为佛嫡子。”为了成为佛子,仁孝在发愿文中谈道:“朕亦躬亲而□服,每当竭意而诵持。”[①]这一时期的西夏文文学作品也多有记载仁孝为佛子,如西夏文佚名宫廷诗歌云:“圣贤威仪高所□,佛父母。”(𗍫𗏁𗍫𗥤𗢳𗍫□ 𗂸𗅲𗧓𗍫)[②]西夏文宫廷诗歌《严驾西行烧香歌》云:“宝身御袭菩萨子”“愿令快乐佛父母。”[③]西夏文宫廷诗歌《严整速谏歌》云:“佛父母。”(𗅲𗧓𗍫)[④]西夏文宫廷诗歌《圣威平夷歌》亦云:“国君父母佛菩萨”“快乐人曰佛父母。”[⑤]这些宫廷诗歌都是御用文人歌颂夏仁宗仁孝的文学作品,从中可看出仁孝已被西夏大臣认为是佛子。此后仁孝更进一步升格为菩萨、佛。西夏文宫廷诗歌《赐国宫室歌》云:“天地之间白高国,仁王菩萨发弘愿。”(𘜶𗐱𗤓𗫂𗥃𗏵 𗦳𗰜𗦇𗍊𗤶𗧘)[⑥]另一宫廷诗歌《圣殿俱乐歌》云:“各国帝君不相同,白高国内佛天子。诸处王岂所同?中盛世界菩萨王。”(𗂸𗂸𗍊𗍫𘜶𗿼,𗅲𗏵𗂸𗢳𗅲𗥃𗧓。𗦳𗦳𗰜𗦇𗍊𗤶?𗍊𗦳𗦳𗦇𗦇𗦇𗰜)[⑦]西夏文《德行集》序云:“昔护城皇帝雨降四海。”[⑧]佛教认为佛祖教化众生如降甘露雨水,因此《德行集》称仁孝“雨降四海”,无疑是将其比拟为佛。西夏京畿地区的贺兰山也被比拟为佛祖修行的王舍城。《圣殿俱乐歌》云:“天之高处贺兰山,王舍城合卦象。”(𗍊𗍮𗏁𗏵𗏵𗂸𗂸,𗰜𗦳𗍮𗏁𗍫𗍫)[⑨]仁孝之后的夏襄宗安全、夏神宗遵顼、夏末帝也被称为佛。《蒙古秘史》记夏襄宗安全、夏末帝为亦鲁忽·不儿罕,夏神宗遵顼为不儿罕。捷克学者普哈认为:“‘亦鲁忽’为蒙古语‘得胜’之意,源于佛教用语梵语‘得胜者’,‘亦鲁忽·不儿罕’,为密教‘本初佛’之意。”[⑩]

仁孝对自己神性的塑造,旨在抵消汉族权臣任得敬图谋分国对西夏皇权削弱的不良影响。在任得敬掌权前的天盛初年,吐蕃僧侣尚未在西夏活跃。但任得敬被诛杀后,吐蕃僧侣大量进入西夏,许多人被封为帝师、国师,其地位甚至在西夏番人僧侣、汉僧之上。任得敬图谋分国时,曾意欲将仁孝迁徙至河西走廊,而自

①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②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91页。

③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5期。

④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23页。

⑤ 梁松涛、杨富学:《〈圣威平夷歌〉中所见西夏与克烈和亲事小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6期。

⑥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24页。

⑦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31—132页。

⑧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⑨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34页。

⑩ 余大均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2页。

已在灵夏一带称帝。河西走廊一带居住着大量吐蕃人，现存唯一一块西夏时期的汉藏双壁《黑水建桥碑铭》就立于甘州；而灵夏一带则居住着大量汉人。任得敬欲将仁孝迁徙至河西走廊正说明仁孝的势力范围在于此地。西夏文宫廷诗歌《严驾西行烧香歌》提到仁孝前往凉州烧香时"吐蕃回鹘宴上所坐来侍奉"①。另一首诗歌《严驾向山歌》则记有"今福日，皇天之中无奸邪，奸邪已除天所笑。……一照国门奸已除，天地之中现欢颜"②，说明仁孝前往凉州烧香的背景是其已平定了任得敬之乱。

《黑水建桥碑铭》主要镌刻了仁孝的敕命，上面谈到仁孝曾至甘州。仁孝前往甘州很可能是在离开凉州以后，可见其在平定了任得敬之乱后在河西走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幸。进行巡幸一方面是为了烧香祈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奖赏当地的吐蕃人在动乱中予以自己支持。正是由于和河西走廊吐蕃人的亲密关系，仁孝才大规模地从藏地引进吐蕃僧侣；又由于藏地政教合一，藏地的吐蕃僧侣代表着藏地的政治势力，仁孝将其引进可以消弭由于任得敬谋反而坐大的汉臣势力。同时仁孝又引进了许多印度僧侣，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加上此前在西夏活跃的回鹘僧侣，西夏俨然已成为东土佛教中心。而中原地区自宋仁宗以后就极少出现印度僧侣，回鹘与吐蕃僧侣更是绝少出现。仁孝自称佛子、菩萨以及将吐蕃僧侣、印度僧侣、回鹘僧侣会集于国中正是其挑战中原作为东土佛教中心的政治举措。

第三节　积德累仁：西夏番姓大族的佛教宗教实践及宗教权力结构

一、西夏番姓大族的宗教实践

佛教为西夏皇族的主流信仰。西夏一朝，皇族积极参加佛事活动，或为佛教石窟修福，或建造、翻修佛寺、佛塔，或翻译、散施、抄写佛经，或编纂佛教著作，或积极参与雕印佛经。榆林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榜题外有三行墨书，记为"南方阁梅那国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山，当为修福"③。"阁梅那国"即西夏，"番天子"为西夏皇帝。陈炳应先生认为这三行墨书可还原为"南方阁梅那国番天子

①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5期。
②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19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戒国子、大臣，睹菩萨圣山，当为修福”[①]。如此则说明“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在莫高、榆林二窟的敬佛活动，皇帝直接训诫王子、大臣，要为二窟修福”[②]。莫高窟409窟“东壁门南绘有一幅西夏王者供养像，王者峨冠龙袍，器宇轩昂，后随一群侍从，各持华盖、翠扇和宝剑。门北有盛装的王妃供养像”[③]。可见莫高窟409窟由西夏皇室出资修建。另外莫高窟61窟甬道北壁绘僧人十二身，每身榜题一行汉文、一行西夏文，这些僧人都围绕一戴冕冠的王者，此王者应为西夏皇帝。61窟为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敬造，该窟甬道北壁出现西夏皇帝形象，说明西夏皇帝曾亲临此窟修福。史金波先生认为莫高窟有龙、凤藻井的西夏石窟也为西夏皇室修造。另外榆林第29窟内室西壁门南侧下层供养人榜题第7身写有“……习司……嵬名”[④]可知该石窟供养人中有西夏皇族人士。

佛寺是佛国世界在人间的特殊象征，是分割僧俗两界的标志建筑物。修建寺庙在信奉佛教的僧俗两众来看均为莫大的功德。《葬舍利碣铭》云李元昊“钦崇佛道，选述蕃文。柰苑莲宫，悉心修饰”[⑤]，可见李元昊对佛寺营修十分尽心。李元昊还在国都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屠，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⑥]。据《宁夏志》，李元昊还在贺兰山建文殊殿。没藏太后在夏毅宗谅祚即位后新建承天寺，“大崇精舍，中立浮屠”[⑦]。

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国师嵬名思能于甘州兴建卧佛寺。戴弥《崇庆寺碑记》云：“夏永安元年，有嵬羊国师者，云见佛兹地，因卓锡焉。”《甘州府志校注》卷一三《艺文上·文钞》，P512《甘州府志》云：“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突奥，阃境之内，贵贱耆老，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一日，敛神静居，遂感异瑞，慧光奕煜，焚呗清和。谛听云云，嗈嗈非远，起而求之，四顾无睹，循至崇邱（丘）之侧，其声弥近，若在潜翳之下者。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人。……于是嵬师忻快灵遇，心在感激，欲建宏刹，用崇祇奉。殚厥劳勩，经营缔构，不逾期岁，岿然焕然。”[⑧]值得注意的是嵬名思能于甘州兴建卧佛寺是在充满神异奇瑞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于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5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5页。
③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⑤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⑦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⑧ 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清]钟庚起纂，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一三《艺文上·文钞》，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18—519页。

静修时仿佛听见梵呗,在梵呗的引导下于一高丘之侧挖掘到翠瓦、金甓和古涅槃佛像,于是在此建寺。很明显嵬名思能挖到的是一处古佛寺的遗址,而佛典有云须达与舍利弗修建祇园精舍时,舍利弗惨然忧愁,称自从七佛以来须达皆于此地为佛建立精舍,而地中蚂蚁世世于此,九十一劫,受一种身,不得解脱,说明寺院的建筑空间具有不间断的神圣延续性。嵬名思能先找到古佛寺遗址,在此遗址上修建新佛寺正是延续了这种神圣空间,而且他是在梵呗的引导下找到古佛寺遗址的,更是具有教理法据。

湛如法师指出:"从说一切有部教理角度看,供养佛塔只能往生天界。……而建造佛塔与僧坊的功德则将生于梵福,梵福在部派佛教的经典中是较高的果报。"[①]李元昊曾建高台寺塔和舍利塔。没藏太后建承天寺塔。秉常曾遣人重修拜寺口方塔。秉常及第一梁太后、乾顺及第二梁太后都曾派遣工匠修饰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乾顺与第二梁太后对感通塔的维修长达半年。在感通塔修毕后,乾顺与第二梁太后派遣中书正梁行者乜、皇城司正卧皆屈等赶赴凉州,在护国寺举行庆赞法典。法典包括大斋会、说法忏悔道场、僧人诵经,又剃度三十人为僧,赦免死刑犯五十四人,以香花灯烛等供养感通塔。

佛教造像是佛教法界诸神佛膜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佛教法界诸神佛劝化世人。由于是佛教法界诸神佛的替身,佛教造像一般为僧俗两众所敬畏。建造佛像也成为一种功德。莫高窟340窟甬道北壁存有三行西夏文题记,译为:"亥年六月二十四日,寺庙修盖者嵬名智海,以此善根,上求众相么鹅长寿无病,下求法界有情得福除罪,故修造此佛尊一身,以此善根,随愿具成。"[②]从题记可知嵬名智海于莫高窟修建寺庙,还于石窟中敬造佛像。在武威下西沟岘西夏遗址二号洞曾出土一张修佛像的西夏文字条,译为"换身,弟子嵬□善□,嵬名善势等"[③]。说明嵬名善势为修建佛像之人。拜寺沟方塔出土的佛印还写有一些番姓大族信众的姓名。这些佛印主要是印在白麻纸上的朱红捺印释迦牟尼像。其中一件佛印写有"鲜卑……"[④],一件佛印写有"鲜卑慧茂",一件佛印写有"……施主鲜卑老房□"[⑤],一件佛印写有"鲜卑五□"[⑥]。鲜卑氏族人在佛印上书写姓名体现了对纸质佛像的崇拜。

---

① 湛如:《净法与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5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西夏前期曾六次向北宋求取汉文大藏经，北宋都慷慨赠予，退回西夏求经的礼物。北宋的这种慷慨一方面是为了以汉传佛教之慈悲悯世软化西夏番族的好战性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西夏输入汉族文化，因为北宋大藏经是以汉文写就。但是西夏求得北宋大藏经后，立即着手翻译，成功地创制整藏西夏文大藏经，这些翻译都是在历代西夏帝王的支持下进行的。如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云："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番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①]西夏文《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云："本初风帝始译经。"[②]风角城、风帝均指李元昊。国师白法信及白智光等还被李元昊"令依番译"[③]。《西夏译经图》中还出现了亲临译场的夏惠宗秉常。西夏番文《慈悲道场忏法序》记秉常"设立经院，延僧传译诸法"[④]。秉常还敕命国师白智光"译汉为番"。可见将北宋汉文大藏经翻译为西夏文是在西夏帝王的主导下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翻译是在西夏文被创制后不久即进行的，然后又被西夏皇室大量印施。说明西夏皇室旨在通过将北宋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并大量印施，快速地将西夏文广泛推行于国内各个阶层，使国内各阶层通过持诵西夏文佛经快速掌握西夏文，这样既消除了北宋汉文化的输入影响，又在西夏宗教思想领域内巩固了番族文化。

夏仁宗仁孝及夏神宗遵顼也曾命僧人翻译佛经。《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愿文》记仁孝"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观门施食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⑤]。仁孝还令国师拶也阿难捺、法师周慧海翻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记遵顼"是以开译场，而延请番汉法、国、禅师、译主，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雠，刊印流行"。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刻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卷首《西夏译经图》中，右栏第三助译者为嵬名广慧。[⑥]国师嵬名德源曾奉敕译经，译有《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等持集品》等。[⑦]至觉国师慧护[⑧]也译有《集毕一乘元明心义》并散施此经。鲜卑法源也曾奉仁孝敕命翻译《圣观自在大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0页。
②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56页。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56页。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39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⑦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6页。
⑧ 崔红芬：《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西夏佛经大都为高僧所翻译，但西夏皇帝及太后喜欢在佛经译者题款中标明御译。西夏番文《妙法莲华经序》还记夏惠宗秉常及梁太后将《妙法莲华经》"御手亲译，不足一年，一部译毕，传行国内，人人受持"①。西夏皇帝还经常撰写佛经序言、发愿文。他们的佛学修养广为体现于各类西夏汉文、番文佛经序言及发愿文中。如秉常在其御制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法序》中谈道："朕观诸民，缘贪嗔痴，起诸境欲，虚实不绝。空有执着，因坚不舍，故回转死生界中，常在烦恼海内。无有安康，此即谓之实乐；不修善德，不知后世自欺。"②继又谈到自己对忏法的认识。仁孝在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依经录并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序发愿文》谈到自己对《自在大悲》《顶尊胜相》的认识，又征引《大悲心感应》《胜相顶尊感应》经文，表明对此二经之熟识。他又在汉文《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愿文》中指出此经之真义所在。同样他在汉文《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发愿文》、汉文《圣大乘三皈依经发愿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表现了自己对佛教经典的认识。另外如宗室嵬名直本也在其汉文《妙法莲花经发愿文》中谈到自己对《妙法莲花经》的理解。罔长信在《妙法莲华经序》中对《妙法莲华经》的要旨也进行了阐释。

散施佛经为佛教信徒的重要功德，西夏皇帝也积极散施佛经。通过各类西夏番文、汉文佛经发愿文可知，乾顺在内宫雕印《大乘圣无量寿经》一万卷散施；仁孝雕印《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番文本、汉文本一万五千卷散施，印造《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番文本、汉文本二万卷，《佛说大乘三皈依经》番文本、汉文本五万一千余卷散施；又印造《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番文本、汉文本十万卷，《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五万卷散施。纯祐也曾散施《金刚经》《般若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及《阿弥陀经》共五万卷。

都罗慧性曾雕印《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文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五卷卷尾题款记"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③鲜卑□呢曾印《金刚般若经集》一卷。山嘴沟西夏石窟出土的《金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36页。

②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4页。

③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

刚般若经集》残片记“殿前司西壁□呢赎印”①。至觉国师慧护曾抄写佛经《安立总集》并参与编撰《佛说阿弥陀经》。僧人梁习宝写有《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语》中卷。嵬移师写有《菩提心及常作法事》。皇族人士嵬名瓦于夏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用西夏文撰写富有宗教道德内容的长篇诗歌《忍教搜寻颂》,劝导容忍。

嵬名慧明奉旨编纂有西夏文《三代相照积言文集》。《三代相照言文集》为西夏番文禅宗佛典。文集题跋提到“我们曾听古代德行高尚的人说‘佛经之中饱含人生的哲理’。于是我们的祖先收集了很多禅宗诗歌和八类训令,在我们居住的流沙地带,将精妙的教义世代传承。现在本国非常推崇佛教,三代人皆遵循教义,佛之妙语惠及四海;两位最受尊敬的佛互相保佑,布道之声八方皆闻。在这些精妙的文集中,我们知道了各种奇闻逸事。我们到达了宝山,绝不会空手而归。因此,我们尊敬的朋友慧明和云游僧人道慧和尚等人立下重誓,奉旨完整地收录了原先已有的训令,加以注释,约有50篇;并已多次和大师们一起考校过此书,合理地确定了需要增补之处。‘手书(古训)’6首诗歌、‘今训’3篇和‘以个人名义’13篇缺少主要经文,则用其他经文的内容来解释。‘内增’20篇和‘外修’6篇都是精妙的言语和解释。该文集中有一些我们不理解的地方,还希望我们的亲人和其他善良的朋友,世世代代都能遇到品德高尚的大师,领悟真谛”②。从跋文中来看慧明是被皇室指派收集西夏境内流传的禅宗诗歌和训令的,在此之上编纂《三代相照言文集》。在编纂时慧明先对训令进行注释,再与僧侣中的诸位大师一起考校,还利用了大量佛经进行增补解释。从慧明立重誓完成编纂《三代相照言文集》来看,其本人应为禅宗的虔诚信徒。《三代相照言文集》题跋末尾记有“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清信相发愿沙门道慧,活字新印者陈集金”③。可见出身西夏皇族的僧人慧照与另一僧人道惠共同发起刊印了《三代相照言文集》。

夏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的《妙法莲华经发愿文》谈到“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慧、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同为法友,特露微诚,以上殿宗室御史台正直本为结缘之首,命工镂板,其日费饮食之类,皆宗室给之”④。可见任御史台正的宗室嵬名直本作为“结缘之首”,命王善慧、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工雕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西夏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② [俄]克恰诺夫著,粟瑞雪译:《〈三代相照言文集〉——活字印刷术》,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③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刻《妙法莲华经》,雕刻费用及刻工饮食都由嵬名直本资助。

《妙法莲华经》为天台宗立宗的主要经典,简称为《法华经》,其"妙法"指所说教法微妙无上,"莲华经"则比喻经典之洁白清净。《妙法莲花经》二十八品中,第十品《法师品》宣说聆闻、随喜、受持、解说《法华经》之种种功德;第十一品《见宝塔品》云多宝佛塔从地涌出,赞叹释迦说《法华经》;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提到文殊宣扬《法华经》;第十三品《持品》云大乐说等菩萨、大众和罗汉众等发愿奉持,广说《法华经》;第十七品《分别功德品》宣说十方诸佛集会时与会大众闻法受益,后世受持,读诵、书写、讲写此经,亦皆获诸功德;第十八品《随喜功德品》云随喜听受《法华经》之种种功德;第二十品《常不轻菩萨品》曾提到常不轻菩萨受持、解说《法华经》;第二十一品《如来神力品》谈到佛于众前现其神力,嘱于如来灭后,应对《法华经》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和如说修行;第二十二品《嘱累品》云佛以右手摩大众顶,祝福受持和广宣此经;第二十三品《药王菩萨本事品》谈及药王菩萨受持《法华经》《药王本事经》之功德;第二十四品《妙音菩萨品》宣说妙音菩萨处处现身说此经典之圣显;第二十六品《陀罗尼品》云药王、勇施菩萨等各自说咒拥护受持、讲说《法华经》;第二十八品《普贤菩萨劝发品》宣说成就为佛护念、植众德本、入正定聚、发救众心四法,当得《法华经》。从以上各品可知佛教法界诸神佛上至如来下至罗汉大都修持《妙法莲华经》,对该经极为尊崇。出于对处于神圣空间的佛教法界诸神佛的礼敬,加之《法华经》提倡众生皆可成佛,僧侣和俗世信众认为供奉、护持、诵习、流通、抄写该经具有无量功德,历代均有僧侣专门念诵此经。如僧神皓专诵其达九千余遍;僧延寿诵其一万三千余遍;僧守素诵其三万七千余遍。因之产生了大量的佛教灵验记传说,如《冥报记》《法苑珠林》《法华经传记》《法华经显应录》中所载崔彦武故事。在敦煌遗书 P.3023 号《妙法莲华经继从序》中也出现了相关灵验故事,进一步宣扬了《法华经》的无上威力。

《妙法莲花经》自中原传入西夏后,于夏毅宗谅祚统治时期被翻译为番文。西夏官员枢密西摄旺普信所作番文《妙法莲华经序》云:"先朝所译众多经典,法译中未含此《莲华经》。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敬信三宝,正国行德,令先祖礼兴盛,为后帝所习取。依德行行,与日月同光,以孝治民,总万国归依。发出大愿,以贤手译,年面未转,一部已毕。"《妙法莲华经》被翻译为番文后在西夏"国中传行,各处受持"[①]。流通该经、受持该经使西夏"众生逐日兴盛,患难永代绝离"。在俄藏 TK1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214 页。

西夏时期汉文《妙法莲华经卷第一》、TK3《妙法莲华经卷第三》、TK4《妙法莲华经卷第四》中，各卷卷首还冠有因果报应故事画。

作为刻经的发起者和资助者，嵬名直本无疑对《妙法莲华经》极为崇奉，发愿文中的“诵之则舌变红莲于亿年，供之则帙放华光于满室。诚释门之钥，真苦海之津梁”即体现了这种崇奉。“诚释门之钥”则暗示《法华经》精深奥难。佛曾云其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中唯有《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为诸佛秘要之藏。西夏人即称《妙法莲华经》为“如来之秘藏也。因其法显，佛出世间。集二借乘，入一真中，文才高广，与须弥山等；义趣幽深，与大海水同”①。

发愿文文首云《妙法莲华经》为“入不思议之妙法也”。“不思议之妙法”中的“不思议”指妙法之妙的梵语意义。妙法之妙，梵语为 Sat Su Ma iu，分别音译为萨、苏、曼乳，意为不可思议、绝待、不能比较者。无法比较不可思议之法即称为妙法。所以称为妙法，是指心法为妙，众生法为妙，佛法亦为妙。三法分别而说固然为妙，但没有差别更妙。发愿文续云：“故衣珠设譬，谓自性之无知；火宅导迷，言宦心之罔觉。”“衣珠”“火宅”是指《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三品《譬喻品》中的譬喻系珠、譬喻火宅。譬喻火宅是指该品以火宅四车作譬喻，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之旨。具体而言是举例言一长者有三子。一日长者住处大火不止，其三子仍嬉戏玩耍不觉危险。长者于屋外大呼三子逃出，但三子不信烈火无情，拒不逃出。长者无奈，以羊车、鹿车、牛车各一诱三子逃出。三子出屋后长者大喜，便送与每人一辆七宝车。羊车、鹿车、牛车各自譬喻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七宝车则譬喻佛乘。《妙法莲华经》认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均为让人从生死轮回的烈火中摆脱出来的一种方便说教，只有佛乘才能真正引导信众进入涅槃。

发愿文还谈到《妙法莲花经》“洞究而须推七喻，力穷而在毕三周”。“七喻”是指《妙法莲华经》中的火宅、穷子、药草、化城、系珠、轮王、良医等七个譬喻。前面六喻譬喻迹门的开权显实，良医则譬喻本门的开迹显本。“三周”是指《法华经》弘扬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即佛陀演说正法，依众生不同根性，安排不同次第，初时演说声闻乘，中间演说缘觉乘，最后演说菩萨乘。但三乘皆为方便、善权之说，引导教化一切众生成佛之法唯有佛乘。在番文《妙法莲华经序》中也曾提到“七喻”“三周”，序云“先演三周，诸乘一乘中集；后宣七喻，五性独性中入”。

该发愿文又谈到“以慈悲喜舍之旨，启开示悟入之门，难焚于烈焰之中，永转于法轮之内。二十八品，皆觉皇宣演之书；七万余言，咸真圣玄微之理”“以慈悲喜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214 页。

舍之旨，启开示悟入之门，难焚于烈焰之中，永转于法轮之内”。是指《妙法莲华经》宣称释迦牟尼成佛以来，寿命无限，现各种化身，“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二十八品”则指《妙法莲华经》始于《序品》，终于《普贤菩萨劝发品》，共二十八品。《妙法莲华经》原为二十七品，后增加《提婆达多品》，故为二十八品。

2005年于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的西夏文印本佛经《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残片K2:137记有该经的印面校者、印字取者、作字兼丁者和印本者。其中印字取者有“嵬名善慧”[①]。善慧为常见的佛教僧侣法号。《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残片K2:13所记载的印面校者、印字取者、作字兼丁者和印本者姓名大都具有佛教僧侣法号色彩，如梁释迦喇嘛、慧治、毗慧照、梁慧勇、段慧照、梁慧成、杨慧能、米勒慧盛、魏慧善、□慧明、甲狄慧□、贾罗讹慧宝、梁慧宝、梁慧善等。这些姓名包括嵬名善慧在内都是俗姓加佛教僧侣法号组合而成。在西夏历史上，有许多僧侣出家后仍保留俗姓，如俄藏TK7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经文末尾双行小字记有“僧雕字人王善慧”。另外《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所出土之地为西夏历史上广建寺院的贺兰山麓中的佛教石窟，窟内存有反映佛教题材的壁画，还埋有西夏文印本佛经、西夏文写本佛经、汉文佛经、佛画、擦擦、泥佛像等佛教文物。这些都说明《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的印面校者、印字取者、作字兼丁者和印本者可能为同一僧团的成员，而嵬名善慧也应为僧团中的僧迦。西夏有许多僧人曾参与雕印佛经，如前述王善慧，其不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雕字人，还是夏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的《妙法莲华经发愿文》的雕字人。另外尚有俄藏TK21《施印题记》中的“僧智圆刁字”。作为僧人的嵬名善慧参与刻印《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说明其致力于弘扬此经。

据学者研究，《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与《妙法莲花经玄赞》有密切联系，为西夏僧侣在《妙法莲花经玄赞》基础上编撰的佛经。[②]实际上，《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是对《妙法莲华经》经义的注疏。《妙法莲花经玄赞》即以六门科释《妙法莲华经》，如第一说明此经产生之原因，第二阐述该经宗旨，第三解释各品品名，第四说明该经怎样由鸠摩罗什最初所译二十七品演化为二十八品，第五阐释各品先后次序的编排原因，第六逐句引用经文，详细疏解。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91—292页。

二、西夏番姓大族的宗教权力结构

西夏番姓大族佛教徒分为职业僧侣和普通信众。在职业僧侣中又分为国师、德师(緇髂)、法师、普通僧官和普通僧人。西夏皇族任国师者有兴建甘州卧佛寺的嵬名思能和奉敕翻译《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等持集品》的嵬名德源以及至觉国师嵬名慧护。皇族以外的番姓大族任国师者主要有鲜卑宝源、鲜卑智海。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记有"大白高国大德坛度民之寺院显法国师沙门宝源"和"大度民寺院显法国师沙门鲜卑宝源"[①]。榆林窟25窟内室西壁门南上部供养人西夏文榜题为"真义国师西壁智海"[②]。鲜卑智海又被称为鲜卑真义,元代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云:"次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③]《天盛律令》规定国师为皇帝之师,国师还是西夏中央管理佛教事务的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的司正正职,为高级僧官。嵬名德源即担任功德司正,其封号为"国师、译文证义勾管、讲经、律、令、功德司正"[④]。

德师也为皇帝之师,西夏皇族任德师者仅见《同音》序跋中提到的嵬名德照。西夏皇族任普通僧官者有嵬名慧胜。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十一卷的题款写有"发愿者番汉译主功德司承旨节亲主慧胜"[⑤]。功德司承旨为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僧官。僧人功德司承旨位于国师、合管、副、判之下。出家功德司则位于国师、合管、变道提点之下。西夏后族中,也有僧人在出家功德司任职。西夏番文《胜慧到彼岸要门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题记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没藏法净缀文"[⑥]。鲜卑真义国师也曾任功德司正。山嘴沟西夏石窟出土的《长寿功德颂》记有"真义国师功德司正译主座主五韵切语"[⑦]。史金波先生曾指出:"目前发现西夏担任功德司内职务人中,尚未发现俗人,可能功德

① 聂鸿音:《大度民寺考》,《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③ 白滨:《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华严忏仪〉补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④ 崔红芬:《〈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39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⑥ 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⑦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司的正、副、承旨等职务不是由世俗人担任，而是概由僧人担任。”①

夏神宗遵顼太子德任曾欲出家为僧。前述修建莫高窟寺庙的嵬名智海为普通僧人。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画僧人十二身，榜题各二行，一行汉文，一行西夏文。其中第8身汉文为“助缘僧嵬名智海像”②。黑水城曾出土一件西夏文写本僧人名单，列有僧人姓名讹名折罗、柳罗师、嵬名师、嵬郭行者、契移师、讹利师、讹利修者、嵬移师、没西慧智、西地慧信。③其中嵬名师为出身皇族的僧人。嵬移、没息也为西夏番族大姓。前述为《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刊印取字的嵬名善慧也为普通僧人。西夏后族也有许多僧人。没藏太后曾在兴庆府戒坛寺为尼。梁氏为后族大姓。《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残片K2:13所记的印面校者有梁释迦喇嘛，印字取者有梁慧勇、梁慧成、梁那征，作字兼丁者为梁慧宝，印本者为梁慧善等。这些人都为僧侣。另外，《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文部分记有“修塔寺小监崇圣寺僧正赐绯僧令介成庞”④。

西夏番姓大族中的高阶职业僧侣往往担任政府官员。如德师嵬名德照官衔为“节亲主、德师、中书、知枢密事”，可见嵬名德照以德师身份任官于中书省，又被差遣于枢密院。作为僧人的嵬名德照可以在西夏中央机构宰辅部门任官，可见西夏高阶僧侣与国家政治结合之紧密。嵬名德照获得如此高的政府官衔，一方面是因为他乃德师，西夏皇帝之师，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皇族身份。他的官衔称号中，作为西夏皇族专称的节亲主排于第一位，正是强调了他的皇族身份，而德师这一僧侣称号排于第二位，表明皇族血统高于教职。《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文部分记有“庆寺都大勾当卧则啰正兼顶直啰外母啰正律晶赐绯僧卧屈皆”⑤，西夏文部分记有“皇城司正卧皆屈”⑥，可见僧人卧皆屈任皇城司正，皇城司为西夏政府职司中的次等司。卧皆屈与出身后族的中书正梁行者也代表西夏皇室，在凉州护国寺为感通塔举行庆赞法典，可见卧皆屈与西夏皇室关系亲密。

西夏皇族在国内由于血脉源于皇室，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在宗教世界也享有特权。在皇室及普通百姓祈求福佑的碣文、佛经发愿文中，作为被祈求福佑的对象，皇族大都位列于文武臣僚和庶民之前，反映了皇族在宗教权力结构中处于

①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6页。

②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⑥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上层。夏景宗元昊大臣张陟为皇室所作《葬舍利碣铭》云“所愿者：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百官齐奉主之诚，万姓等安家之恳。”[①]《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文铭辞云：“愿王座坚固，如东方修竹长生长；神谋充盈，如白山金海自高低。”[②]夏仁宗天盛四年（公元1152年）法随所作《注华严法界观门发愿文》云“仰此上乘，遍严法界，延龙算于皇家，曜福星于官庶。”[③]夏仁宗天盛八年（公元1156年）《阿弥陀经发愿文》云“皇后千秋，圣裔蕃茂。文臣武将，福禄咸臻。”[④]夏仁宗仁孝《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发愿文》云“中宫储副，则□保荣昌；率土普天，而同跻富寿。”[⑤]贺宗寿《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发愿文》云：“以此善缘，谨愿太上皇帝往生净土，速至佛宫，复愿皇太后、皇帝圣寿福长，万岁来至，法界含灵，超脱三有。”[⑥]袁宗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发愿文》云“伏愿天威振远，圣寿无疆，金枝郁茂，重臣千秋。”[⑦]夏仁宗仁孝《圣大乘三皈依经发愿文》云“中宫永保于寿龄，圣嗣长增于福步。然后满朝臣庶，共沐慈光”[⑧]。无名氏西夏文《乾祐乙巳年施经发愿文》云：“伏愿当今皇帝圣威振远，贤王寿数绵长，金枝郁茂，大臣千秋常在，含灵蠢动，齐当共成佛道。”[⑨]罗太后《转女身经发愿文》云：“皇女享千春之福，宗亲延万叶之祯。武职文臣，恒荣显于禄位；黎民士庶，克保庆于休祥。”[⑩]其中《葬舍利碣铭》中的“胤嗣”、《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发愿文》中的“储副”、《圣大乘三皈依经发愿文》的“圣嗣”均指太子。《阿弥陀经发愿文》中的“圣裔”、《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发愿文》《乾祐乙巳年施经发愿文》中的“金枝”则指皇族。无论是太子、“皇女”“贤王”，还是宗室，其在西夏宗教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都高于文武臣僚和普通百姓。

---

①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④ 聂鸿音：《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95页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⑥ 聂鸿音：《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西夏学》（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⑧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⑨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⑩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第四节 绍休圣绪:祖先崇拜与西夏皇室权力展演

在中国历史上,皇族的祖先崇拜往往是一种对"世袭统治的宗教表达"[①]。宗庙(嶶䶮)体现着祖先崇拜,为西夏皇族礼仪制度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为西夏皇室最为重要的祭祀礼仪建筑,还是在血缘上连接整个皇族群体的标志性象征物。早在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时期,他就在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②]。在攻占灵州后,李继迁命弟李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③]。西夏正式立国后,皇室在首都兴庆府建有太庙。西夏文《宫廷诗集》中的《新修太学歌》云太学于"壬子岁迁至太庙旧址"[④]。壬子岁据聂鸿音先生考证为西夏晚期的1192年。[⑤]从"太庙旧址"可知太庙在1192年以前就已迁徙。《天盛律令》中记载有宗庙监一职,无疑为管理太庙的官员。关于西夏皇室宗庙的所在地,屠寄认为是在兴庆府城外。《圣武亲征录》云:"庚午夏,上避暑龙庭。秋,复征西夏,入孛王庙,其主失都儿忽出降。"[⑥]屠寄于《蒙兀儿史记·成吉思汗本纪下》的自注写道:"《亲征录》有'入孛王庙'一语,始不解'孛王'何指,继攻蒙文《秘史》,知西夏人称其主曰'不儿罕',例如今内廷称皇帝曰'佛爷'。所谓'孛王庙',如云'不儿罕庙',盖指西夏先王原庙之在城外者。"[⑦]西夏陵陵区规模庞大的北端建筑遗址经考古发掘,学者认为即西夏皇室宗庙。[⑧]但自东汉以来皇室宗庙即远离帝王陵寝建于都城内部,在此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佛像泥塑残块,可见此遗址应不是宗庙遗址。彭向前先生考证认为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是安放西夏帝后神御的圣容寺。[⑨]

在封建时代,皇室宗庙之安危与国家政权之稳固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夏文《宫廷诗集》中的《圣殿俱乐歌》(绡㢮緷䌷緺)中有云"君所念,宗祖庙堂之坚固"[⑩]。西夏皇族大臣嵬名讹计在西夏文《德行集序》中即谈道:"宗庙安乐,社稷坚固,譬若

① [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② [清]吴广成著:《西夏书事校证》卷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③ [清]吴广成著:《西夏书事校证》卷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④ 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9页。
⑤ 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10页。
⑥ [元]佚名著,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隆福寺文殿阁书庄排印本,1937年,第125页。
⑦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页。
⑧ 韩小忙:《西夏王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⑨ 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彭向前:《再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的性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⑩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3页。

大石高山，四方莫之敢视，而庶民敬爱者，何也？”[①]宗庙祭祀代表着宗统延续，宗统延续又与帝国国祚绵远流长具有相应联系。西夏统治者在与北宋的外交表文中经常谈到这一点。如李继迁上表于宋真宗辞让宋廷所授官定难军节度使时，在表文中谈道：“从此，以享以祀，在天对越堪依；斯歌斯哭，没世首丘可乐，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赐也。”[②]夏景宗元昊上宋廷誓表云：“盖欲世世遵承，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③]宗庙制度又是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夏崇宗乾顺《遣使如宋谢罪表》云：“追烈祖之前猷，赐曲全之大德，俾通长贡，获绍先盟。”[④]出于祖先崇拜，西夏皇室在宗庙按时祭祀。《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阴汉文云“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祀，以时以思。”[⑤]在西夏的佛教碣铭与发愿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皇室希冀宗庙、社稷稳固。如《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云“大崇精舍，中立浮屠，保圣寿以无疆，俾宗祧而延永。”[⑥]夏仁宗仁孝《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依经录并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序发愿文》云“延宗社而克永，守历数以无疆，四方期奠枕之安，九有获覆盂之固。”[⑦]

由于皇室宗庙地位重要，西夏统治者对其力行保护。《天盛律令》规定宗庙监为拥有战具者，任职时可以持有武器。《天盛律令·失孝德礼门》规定平民如有在宗庙造次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庶民自身有因，有过错，不念不服，因欲思行抱怨，生恶心，在宗庙、地墓、碑表、堂殿等上动手及损坏官鬘金抄等，一律与向官家谋逆者已行为之罪状相同。若未动手则造意绞死，从犯当迁往异地，在守边城军中无期徒刑，做十二年苦役。”[⑧]“以直接贪财，对宗庙、地墓、堂殿等上动手盗毁，及盗窃隐藏毁官鬘金抄等，不分主从，以剑斩杀，自己妻子、同居子女等当连，迁往异地，当入农牧主中。畜、谷、宝物、地、人等当没收入官。若与父母、节亲等同居，则因不入连坐中，畜、谷、宝物、地、人多少，依分居之份应得多少，当给予。”[⑨]如果

①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② [清]吴广成著：《西夏书事校证》卷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72—73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丑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07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五，元符二年九月庚子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34页。
⑤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⑥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4—115页。
⑨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盗窃宗庙供物或导致宗庙火灾都将被处决,“御衣已成往献,已行及已献,供给穿衣时盗窃,及宗庙前面供物现摆置时拿取,一律主谋绞杀,从犯十二年”①。“内宫中无职人不许擅自燃火,若违律时徒一年。其中无心失误而失火,则量所烧物价多少,自一缗至十缗徒二年,……或火至宫殿、宗庙等,烧多少一律当绞杀。”②

《天盛律令》中所出现的“宗庙”原意为“祖帝之影像”③。西夏诸帝皆有庙号,据《宋史·夏国传》,李继迁庙号太祖,李德明庙号太宗,元昊庙号景宗,谅祚庙号毅宗,秉常庙号慧宗,乾顺庙号崇宗,仁孝庙号仁宗,纯祐庙号襄宗,遵顼庙号神宗,德旺庙号献宗。夏仁宗仁孝在《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愿文》中提到“又愿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④。从李继迁传至仁孝父乾顺正为六代。乾顺母罗太后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中也提到“又愿皇图永驻,帝祚绵延,六祖地久天长,三农风调雨顺”⑤。文中“六祖”即指从夏太祖李继迁至罗太后夫夏仁宗仁孝六代国君。

仁孝在《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发愿文》中又提到“以兹鸿佑,申愿深衷,仰祈艺祖神宗,俱游极乐”⑥。仁孝在《圣大乘三皈依经发愿文》也提到“艺祖神宗,冀齐登于觉道”⑦。这两处的“艺祖”应指夏太祖李继迁。宋太祖赵匡胤即被宋人称为艺祖,《宋史·尤袤传》云“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⑧。“神宗”待考。仁孝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还提到“伏愿一祖四宗,证内宫之宝位”⑨。所谓“一祖四宗”即仁孝之前的夏太祖李继迁、夏太宗李德明、夏毅宗谅祚、夏慧宗秉常、夏崇宗乾顺。皇族大臣嵬名讹计在《德行集序》中还提到“是时慎自养德,抚今追昔;恩德妙光,当存七朝庙内;无尽大功,应立万世嗣中”⑩。《德行集》撰写于夏襄宗纯祐即位初年,序中“七朝庙内”说明西夏七位皇帝的神主都存于宗庙。这七位皇帝即纯佑即位前的夏太祖李继迁、夏太宗李德明、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9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49页。
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77页。
⑤ 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45页。
⑥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⑦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⑧ 《宋史》卷三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25页。
⑨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⑩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夏景宗元昊、夏毅宗谅祚、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夏仁宗仁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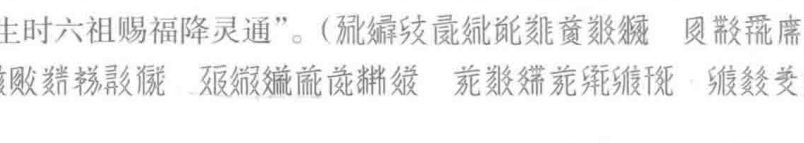
西夏皇室宗庙除皇帝及其家人可以进入外，皇族大臣也可前往礼拜。西夏文《宫廷诗集》中的《节亲大臣歌》(《𗍫𗫂𗥃𗏁》)提到一位皇族大臣在统军出征凯旋后于"族根住处，本族塔庙五色光中令独语"①，或为代皇帝告祭太庙。

西夏建有圣容寺以奉安帝后神御，在圣容寺内长驻官员管理。《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记圣容提举为中等司。《天盛律令》云："一司圣容提举一正、一副。"②"一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倘若违律，不应遣而遣时，遣者、被遣者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③彭向前先生指出："西夏圣容寺是模仿宋代在寺院宫观中普遍设置帝后神御、神御殿的做法，吸取吐蕃民族'佛、祖合一'的思想而创建的。"④《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末尾记有"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诠"⑤，可见圣容寺提举由僧人担任，可谓僧官。药乜永诠以赐绯僧而任圣容寺提举，表明这一僧官地位较高。药乜永诠以行宫三司正兼任圣容寺提举，参与监修西夏皇室极为重视的护国寺感通塔，又参加感通塔重修后的庆赞仪式，表明他与西夏皇室的关系也非常紧密。药乜永诠的题名出现于《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末尾，表明西夏时期的凉州存在一圣容寺。夏仁宗仁孝寿陵西夏文残碑记有"年中西隅，圣容众宫"⑥，可见在西夏的西境建有圣容寺。彭向前先生考证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为圣容寺。这都表明西夏在首都与地方都建有圣容寺。西夏除以圣容寺奉安帝后神御外，还建有影殿奉祀帝后神御。西夏帝陵残碑即记有"影殿"⑦。

西夏皇室的先祖在西夏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夏陵残碑中，祖宗是关于本国政治生活历史记忆的重要主题。西夏三号陵西碑亭西夏文残碑云："汉番三 / 君所为 / 仲祖父 / 皇帝昔。"⑧夏仁宗仁孝寿陵西夏文残碑记有"睦更安天祖院尊变年"。李范文先生指出："'祖'前空格，表示尊敬，疑追其先世。"⑨

①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70 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69 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403 页。
④ 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⑤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⑥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14 页。
⑦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55 页。
⑧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62 页。
⑨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40 页。

寿陵西夏文残碑还记有“祖宗礼具求因取”[①]。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记有“祖胜负”[②]。西夏宫廷诗歌《劝世歌》云:“先祖贤圣先祖君,美名虽在身不存。”[③]可见西夏皇室的先祖在西夏境内美名传颂,这从《夏圣根赞歌》对西夏皇室祖先的歌颂也可看出。

西夏皇室的先祖是西夏帝业及皇族的重要守护者。《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称夏毅宗谅祚“今上皇帝,幼登宸极,夙秉帝图。分四叶之重光,契三灵而眷佑”[④]。“四叶”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至谅祚的四代西夏帝统,“三灵”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夏仁宗仁孝《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依经录并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后序发愿文》云:“以兹胜善,伏愿神考崇宗皇帝,超升三界,乘十地之法云;超度四生,达一真之性海。默助无为之化,潜扶有道之风,之子之孙,益昌益盛。”[⑤]仁孝《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还提到“伏愿一祖四宗,证内宫之宝位。”[⑥]西夏宫廷诗歌《节亲大臣歌》称赞一名宗室大臣“如意珠万德圆满七宝降,八大龙王掌中取。吉祥草五彩光耀一世明,千年时节世间生。大人犹如此国宝,生时六祖赐福降灵通”。()[⑦]

西夏皇帝的权力既来源于天,也来源于祖先。李元昊在上北宋表文中谈道:“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⑧]西夏宫廷诗歌《尊皇喜悦歌》称夏仁宗仁孝“唯独圣君睿思广,弃恶扬善承祖志”[⑨]。《进革故鼎新律表》称夏仁宗仁孝“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敬绍祖功,秉承古德,欲全先圣弘猷,能正大法文义”[⑩]。

祖宗之法在西夏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活动中都被尊为圭臬。在西夏的国内政治中,祖宗之法一般是指尊崇番礼。西夏番文《妙法莲华经序》记夏惠宗秉常和第

①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②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4页。
③ 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④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⑦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67页。
⑧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⑨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01页。
⑩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一梁太后执政时，“今圣母子已袭王位，敬信三宝，治国行德，兴隆先祖之礼，矧为后帝之师”①。《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夏崇宗乾顺和第二梁太后执政时，“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②。在西夏的对宋外交中，祖宗之法一般指以小事大。夏惠宗秉常《贡宋乞绥州表》云：“得遵嗣袭之封，永奉凝严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成执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嗣，敢替先盟！翘仰中宸，愿依旧约。”③夏惠宗秉常在上北宋誓表云：“臣幼叨世绪。遵奉皇猷。……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纳款。坚持归信之诚。载图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事。”④秉承还曾向北宋谈道：“窃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⑤夏国南都统嵬名济致北宋经略使卢秉书云：“夏国主上自朝廷见伐之后，夙宵兴念，谓自祖先至今八十余年，臣事中朝，恩礼无所亏，贡聘无所怠，何期天子一朝见怒，举兵来伐，……盖边臣幸功，上听致惑，使祖宗之盟既阻，若臣之分不交，载省厥由，怅然何已。”⑥以小事大的祖宗之法成为西夏对宋外交的政治准则。

在西夏的文化生活中，西夏皇室的先祖作为西夏番文、番礼的创制者在各种典籍中被反复提及。《三才杂字》序云：“今文字者，番之祖代依四天而三天创毕。”⑦《同音》跋云：“今番文字者，祖帝朝之所搜集。为求其兴盛，故设刻字司，以诸番学士统领，雕刊版以使传行世间。”⑧息齐文智作《新集碎金置掌文序》云：“夫人者，未明文采，则才艺不备；不解律条，故罪乱者多。今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故而节略汇集眼前急用要义一本。”⑨

第五节　河清社鸣：祥瑞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祥瑞作为自然界、动植物的异象在中古时期经天人感应思想的诠释，往往成为宣传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策略。在中古时期的政治语境中，祥瑞的出现宣告了王朝统治者的德政感应于天，天降祥瑞以证明王朝统治者的仁政，王朝统治者借由祥瑞化身为承受天命的圣人，因此天人合一、天下太平。西夏王朝脱胎于夏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0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神宗熙宁四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15页。
④ 《赐夏国主进誓表答诏》，《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六《政事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384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神宗元丰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80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⑧ 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2页。
⑨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州定难军这一藩镇政治体，无论是定难军还是西夏王朝，其统治区域内都曾出现过祥瑞，这些祥瑞在幕府文职僚佐和宫廷文臣的歌颂下，成为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夏诸帝德政感应于天的显著标志，是构建定难军和西夏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政治符号。

一、定难军时期的祥瑞

五代时期，面对唐王朝崩解后的政治权威缺失，北方诸朝和南方诸国都竞相制造祥瑞以彰显本朝本国受命于天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央政治权威较难触及的西北独立强藩，祥瑞之风更为盛行，如归义军辖境内就曾出现过嘉禾、甘露、九尾狐、白雀、白鹰、庆云等诸多祥瑞。相对于归义军，定难军与北方诸朝政治联系紧密，更是熟稔祥瑞这一政治宣传。早在唐代，定难军前身夏绥银宥节度使会府夏州就出现过祥瑞。《唐会要》卷二九《祥瑞下》云唐宪宗元和九年八月，夏州上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锜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军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馆。从之”①。《册府元龟》云元和九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夏绥银节度使今月八日因取土修城，于西北角近仓掘得釜大小共计二百五十四，并容六豆已下五豆以上，俱无破损，如新器物者。伏以人天所资，粒食为本，锜釜之大，火化是因，今大军方兴，此物自出，则知何时藏瘗，盖神诱其衷，今之彰呈，岂天有所助，圣作物感，一何昭然。望付史馆。从之”②。夏州在修城时获得前代之釜，此时朝廷正忙于对吐蕃、回鹘以及河北藩镇的战争，釜的出现预示着军粮充足，唐廷必将获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被作为祥瑞于史馆记录。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曾向后唐明宗进贡白鹰。《旧五代史》记本年十月“丙辰，夏州进白鹰，重诲奏曰：“夏州违诏进贡，臣已止约”。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进焉。”③白鹰为王者之祥瑞。《辽史·太宗纪》云辽太宗耶律德光生时，“神光异常，猎者获白鹿、白鹰，人以为瑞”④。敦煌所出S.1655《白鹰呈祥诗二首并序》明确将白鹰赞为张承奉所建西汉金山国之祥瑞，汪泛舟先生指出白鹰“既是祥瑞，又是作者鼓吹的新兴国家的象征，也是后来金山国崇白的主要原因，（也有西为金，金色白的五行因素）”⑤。李仁福在向后唐明宗

① 《唐会要》卷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6页。
② 《册府元龟》卷二五《帝王部·符瑞第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③ 《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55页。
④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页。
⑤ 汪泛舟：《敦煌诗述异》，《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进献白鹰前后，后唐河南府和宿州都向后唐朝廷进献嘉禾、白兔等祥瑞，但均被后唐枢密使安重诲拒却。《新五代史·安重诲传》云："河南县献嘉禾，一茎五穗，重诲视之曰：'伪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进白鹰，重诲却之，……宿州进白兔，重诲曰："兔阴且狡，虽白何为！"遂却而不白。"[①]安重诲指出拒却李仁福所进白鹰的原因是因为后唐明宗曾下诏"天下毋得献鹰鹞，而仁福违诏献鹰"。但白鹰是稀世之瑞，因此后唐明宗暗自派人取入，此后又"出近郊，试夏州所进白鹰"[②]。

李仁福向后唐明宗进贡白鹰表明了定难军对后唐朝廷的政治拥戴，在定难军内部也开始采用祥瑞来进行政治宣传。李仁福之妻渎氏墓志云："勋墉彩云之五色，诏书频来，仙凤万乘之重重，纶旨继踵。王臣光列国之殊勋，益侯门之盛德。而乃荣升国号，贵适贤王。"[③]从志文可知渎氏被封为吴国太夫人，是由于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德感于天，导致五色祥云这一大瑞，朝廷因此下诏封命。《宋书》卷二九《祥瑞志下》云："云有五色，太平之应也，曰庆云。"[④]《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图》云："景云者，太平之应也，一曰庆云，非气非烟，五色氛氲，谓之庆云。"[⑤]《唐六典》将庆云列为大瑞。庆云使朝廷下诏封命，同时也表明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德感于天，为天所护佑。

李仁福之子李彝谨曾任绥州刺史。李彝谨之妻里氏之墓志称李彝谨在绥州执政时，"民无瘵以可求，化有恩而及物，随轩雨润，逐扇风清，如杨续匪受于馈鱼，似敬祖不燃于官灯，光前绝后，独振徽猷"[⑥]。李彝谨的仁政导致瑞雨。《李彝谨墓志》称李彝谨在绥州时"随轩致雨，扣火回风。感应屡彰，古□□异。……公六年为政，万户承恩。法绝烦严，事惟平允。勐伯之棠阴勿伐，张公之麦秀长闻"[⑦]。《李彝谨墓志》铭辞亦云："青鸟鸣兆，白鹿呈祥。契千载之休征，钟五灵之殊应。桥无白虎，里无飞蝗。"[⑧]"感应屡彰"表明李彝谨在绥州的仁政感动于天，导致大量祥

① 《新五代史》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页。

② 《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55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④ 《宋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页。

⑤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96页。

⑥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⑦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235页。

⑧ 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瑞。这些祥瑞包括麦秀两岐、青鸟、白鹿等。青鸟即青乌,《唐六典》将其列为上瑞。《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云:"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①]《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经》云:"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②]归义军曾以青鸟为祥瑞。余欣先生指出归义军从吐蕃治下归唐,"可与西王母朝见汉武帝相比拟,因而以青鸟为征应"[③]。白鹿为《唐六典》所记之上瑞。《宋书》卷二八《祥瑞志中》云:"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④]《艺文类聚》引《孝经援神契》云:"德至鸟兽,则白鹿见。"又引《瑞应图》云:"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⑤]麦秀两岐、青鸟、白鹿的出现表明李彝谨在绥州的仁政得到了上天的奖赞。

志文"桥无白虎,里无飞蝗"暗指"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孙正军先生指出"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密不可分。[⑥]

李仁福之孙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作为定难军的最高军政首脑,其执政期也出现了嘉禾、瑞雨等祥瑞。《李光睿墓志》云:"于是,征妙道于袁黄,法玄能于廉贾。则兽渡河而蝗越境,未可言其政也,金作粟而马为羊,不足语其清也。仁风大扇,疲俗顿苏,爵有令名,光乎信史。……上遵皇化,下抚黔民,威肃百城,风行千里。仁及于物,嘉禾异亩而同芳,德感于天,膏雨随轩而洒润。"[⑦]"兽渡河而蝗越境"即指"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李光睿的仁政不仅感动于物,还感应于天,使天降嘉禾和瑞雨。《白虎通义》云:"德至地则嘉禾生。"[⑧]《宋书》卷二九《祥瑞志下》云:"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秱;于夏德,异本同秀。"[⑨]《唐六典》将嘉禾列为下瑞。

---

① 钱方韬译注:《山海经》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页。

② 《山海经》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

③ 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④ 《宋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3页。

⑤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九《祥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14页。

⑥ 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⑦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⑧ [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六《封禅·论符瑞之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83页。

⑨ 《宋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7页。

二、李继迁、李德明时期的祥瑞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捧入朝献地后，其族弟李继迁起兵自立。宋太宗遣李继捧回镇夏州剿灭李继迁，但李继捧首鼠两端镇压不力，宋太宗遂遣军将李继捧擒拿归阙。李继捧待罪朝廷后，宋太宗以李继捧属下大将赵光嗣为夏州团练使。赵光嗣在至道元年八月曾向宋廷献上嘉禾。《宋史》卷六四《五行志下》云："夏州团练使赵光嗣献嘉禾一函。"[①]至道元年，全国各地瑞麦、嘉禾大生。《宋史·五行志》云："至道元年六月，嘉禾生眉山县萧德纯田，一本二十四穗。七月，金水县胥罗翊田禾生九穗。舒州监军吴光谦廨粟畦两本，歧分十穗。临涣县民侯正家二禾合成一穗。八月，绵竹县禾生九穗。"[②]赵光嗣在这种情势下进献嘉禾，一方面是附于趋势，一方面表明对北宋的政治忠诚。夏州嘉禾的出现表明宋廷秉承天意统治夏州，昊天肯定了宋廷取代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在夏州的统治地位。

李继迁抗宋自立后，为追求独立合法化，通过宣扬祥瑞将自身神圣化。《宋史·夏国传上》云："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生而有齿。"[③]西夏番文《夏圣根赞歌》云："番细皇，初出生时有二齿，长大后，十种吉祥皆主集。"（𗼇𗥃𗪘，𗼇𗏁𘝦𗦳𗥃𗏁，𗫂𗥤𗅋𗍫𗏁𗥤𗥃𗫂𗥤𗏁𗥤𗥃𗫂𗥤𗏁𗥤𗥃𗫂𗥤

朝的帝王经常以自己出生时的异象来作为自己受命于天的证据,《宋史》记宋太祖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①。宋太宗出生时,"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②。这一政治宣传也被北族王朝所采用。辽太祖"及生,室有神光异香"③。辽太宗出生时,"神光异常"④。西夏既臣属于辽,又臣属于宋,在国家政治文化上也受到两国的强烈影响,自身又发轫于藩镇政治体,因此在王朝的政治叙事中通过祥瑞将李继迁神圣化。这种政治叙事模式也被运用于夏惠宗秉常身上,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称:"皇帝已诞生时光明满室。"⑤

李继迁出生时的异象在藏文史籍中也有记载。《红史》云李继迁出生后被弃于河边草木茂盛处,"每天都有一只大雕飞来覆盖男孩,使其不冻死,又有另外一妇人养有一头挤奶的黄牛,每天前来男孩处给他喂奶"。最后妇人发现黄牛在给男孩喂奶,"知道这男孩必是异人,于是将男孩带回养为义子"⑥。

李德明在位时,也积极利用祥瑞进行政治运作。《宋史·夏国传上》云:"七年,甘露降国中。"⑦《西夏书事》云:"秋七月,夏州甘露降。德明大赦国中。"⑧《白虎通义》云:"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⑨《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云:"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⑩孙氏《瑞应图》云:"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气茂,则甘露降于草木。"⑪《唐六典》将甘露列为上瑞。夏国出现甘露,表明李德明在夏国之执政深为昊天所肯定,德应于天,因此天降甘露。李德明因此顺承天意大赦国内。

李德明定都兴庆府也利用了祥瑞。《西夏书事》云:"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⑫《春秋繁露》云:"王

---

① 《宋史》卷一《太祖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② 《宋史》卷四《太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页。
③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④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页。
⑤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⑥ 《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⑦ 《宋史》卷四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1页。
⑧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
⑨ [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附录三 白虎通义斠补刘师培·卷下·封禅篇》,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64页。
⑩ 《宋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页。
⑪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698页。
⑫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①]《白虎通义》云：“德至渊泉则黄龙见。”[②]《瑞应图》记龙“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游乎天外之野，出入应命，以时上下，有圣则见，无圣则处”[③]。《唐六典》将龙列为大瑞。李继迁攻陷灵州后，将灵州改称西平府，以之为都。但灵州距北宋及河西诸政权距离极近，使夏国战略回旋较小，不利于生存发展。怀远镇有黄河、贺兰山之险，又有灵州作为屏障，以之为都可使夏国具有战略纵深。因此李德明得知怀远镇现龙之后，遣官祭祀，认为怀远镇乃龙兴之地，意欲迁都。

李德明欲谋迁都，在夏国统治层引起了讨论。《西夏书事》云：“德明以龙见之祥，思都其地，谋之于众，佥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焉。”[④]可见地理优势和祥瑞都促成了李德明定都兴庆府，祥瑞的出现使李德明迁都之举成了承受天命的政治行为，以承受天命而迁都消弭了众多反对意见。

三、西夏立国后的祥瑞

李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创建西夏王朝。关于李元昊出生前后的祥瑞，《西夏书事》记李元昊母“卫慕氏，银州大族，尝与德明游贺兰山，夜梦白龙绕体，遂有妊，怀十二月，至是月五日生，啼声英异，两目奕奕有青光。”[⑤]据《圣立义海》，贺兰山为西夏三大山之首。白龙为王者之瑞，后梁太祖朱温曾“梦白龙附于两肩”。南汉刘陟曾因“白龙见于南海，改伪乾亨元年为白龙元年”[⑥]。敦煌所出P.2683《瑞应图》即列有白龙，《瑞应图》云：“王者精贤有德则白龙现。”[⑦]“李元昊既孕于夏国神山，又感白龙之精，在这样的政治宣传下成为天降之圣君。

李元昊称帝前制造大量祥瑞以彰显自己称帝图霸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李元昊称帝前两个月曾建舍利宝塔，《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云：“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

①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页。
②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页
③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03页。
④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一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⑤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⑥ 《旧五代史》卷三五《刘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08页。
⑦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写本P.2683〈瑞应图研究〉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96页。

菽麦丰盈。□于万品之瑞，靡悉一□之□。”[①]“万品之瑞”即是李元昊称帝前制造的众多祥瑞的概括简称，同时也包括李元昊所获之舍利。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将舍利称为祥瑞，体现了西夏已将祥瑞思想与佛教相融合。孙英刚先生指出：“在隋唐时期的政治宣传与政治修辞中，佛教词汇、概念、符号、形象与中国固有的祥瑞思想结合，已经变成一种范式。”[②]这种范式在举国崇佛的西夏体现得尤为明显。《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汉文部分云：“塔之感应，不可殚记。然听闻详熟，质之不谬者云：尝有欹仄，每欲荐整，至夕皆风雨大作，四邻但闻斧凿声，质明，塔已正矣。如是者再。先后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是夕亦大雷电，于冥晦中上现瑞灯，羌人睹之，骇异而退。……前年冬，凉州地大震，因又欹仄，守臣露章，具列厥事，诏命营治，鸠工未集，还复自正。”[③]文铭辞云：“天锡嗣世，灵瑞数起，应感既彰，塔复宫毁。大夏开国，奄有凉土，塔之祥异，不可悉数。尝闻欹仄，神助风雨，每自正焉，得未曾睹。先后临朝，羌犯凉境，亦有雷电，暴作昏瞑。灯现煌煌，炳灵彰圣，寇戎骇异，收迹潜屏。……况属前冬，壬申岁直，武威地震，塔又震仄。凌云势扰，欲治工亿，龙天护持，何假人力？”[④]西夏文部分云：“大安二年中，浮屠基座欹仄。艺净皇太后、珍陵城皇帝种种准备，派遣头监匠人，方欲着手荐整，至夕狂风大作，塔首出现圣灯，天明，其塔自正如初。又大安八年，东方汉地起恶心，发大军以围武威，羌军亦来凉州。其时黑风冥冥，两手相持莫辨，灯光煌煌，环绕浮屠，二军是以败走，由此不敢前瞻。……与汉再战，皇太后亲率车骑，尔时夜间灯光灿灿，一出一灭，明耀犹如正午，乃深入汉阵，大败之。前前后后吉祥多现者，于此不可殚记。……五彩祥云，朝朝伴附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环绕圣灯现。”[⑤]

从碑文汉文部分和西夏文部分可知，传为阿育王所建之护国寺感通塔在前凉时即出现种种祥瑞。护国寺感通塔之祥瑞到了西夏立国后更是频频出现。最著名的四次祥瑞分别是感通塔由于年久失修曾倾斜，当秉常和梁太后派遣工匠欲整修时，在晚上风雨大作，天空中出现灯光和修凿声，第二天清晨塔复归原位；在青唐吐蕃进攻凉州时，感通塔出现瑞灯，使青唐吐蕃不战自退；在乾顺和第二梁太后亲征北宋时，感通塔又出现瑞灯，西夏军大败宋军；在凉州地震时感通塔再次倾斜，没有整修却复归原位。伴随着感通塔还有五色祥云即庆云这一大瑞。作

①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页。
②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9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者认为感通塔出现瑞灯是由于三世诸佛每夜环绕塔身。在这样的文本叙事中，由于感通塔在前凉时即祥瑞不断，在西夏时期出现的祥瑞无疑继承了历史，乃真实事件。感通塔在西夏时期出现的祥瑞又多于前凉时，无疑彰显了西夏王朝相对于前凉王国的正统性。

作者将这些祥瑞都归因于西夏皇帝和皇太后的德感于天，碑文云："故浮屠梵刹遍满天下，然灵应昭然如兹之特异者，未之闻也。岂佛之威力独厚于此耶？岂神灵拥佑有所偏耶？不然，则我大夏植福深厚，二圣诚德诚感之所至也。"[①]碑文铭辞亦云："诚因内积，胜果外彰。"[②]之所以德感于天，出现祥瑞是由于西夏皇帝和皇太后敬天法祖，恪行仁政，尊崇释教。碑文云："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崇奉。"[③]西夏皇室的德政导致天人感应在碑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明灯作为佛教祥瑞还出现于天赐礼胜国庆五年（1073年）惠聪所作《主持榆林窟记》。该记云："端严谷内，甘水常流，树木稠林，白日圣香烟起，夜后明灯出现，本是修行之界。昼无恍惚之心，夜无恶竟之梦，所将上来圣境，原是皇帝圣德圣感。"[④]在文中惠聪将香烟、明灯等祥瑞都归因于西夏皇帝感应于天。

夏崇宗乾顺在位时，灵芝曾生于大臣高守忠家，引发了朝野的庆赞。《宋史·夏国传下》云："九年，夏人陷府州。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⑤]《西夏书事》云："夏四月，灵芝生。在堂后官高守忠家。百官表贺，乾顺作《灵芝歌》，中书相王仁忠等和之，勒石志瑞。"[⑥]《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云："芝草，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⑦]《孝经援神契》云："德至于草木，则芝草生。"由于灵芝为王者德政之瑞，因此乾顺大喜，认为自己德感于天，作诗《灵芝歌》，令中书令王仁宗唱和。乾顺和王仁宗的唱和表明西夏朝野均乐于在祥瑞这一政治语境中追求天下太平，通过将《灵芝歌》刻之于石，更是将天降灵芝这一祥瑞宣告朝野，以志纪念。乾顺所作《灵芝歌》在元代还有遗存，虞集《西夏斡公画像赞》云："兴州有帝庙门榜及夏主灵芝歌石刻。"西夏陵发现的《灵芝歌》残石云："芝颂一首，其辞曰：于皇……俟时孝祉，择地腾芳。金晷晔……德施率土，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⑤ 《宋史》卷四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3页。
⑥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5页。
⑦ 《宋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0页。

赍及多方。既启有……”[①]从“德施率土”来看,《灵芝歌》的主题即是宣扬乾顺德感于天。

夏仁宗仁孝在位时孜孜以治,先后铲除枢密使慕容洧与外戚权相任得敬之乱,又尊孔子为文宣帝,推崇佛教,文化勃兴,西夏王朝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西夏宫廷文臣在诗歌中大量提到祥瑞,祥瑞成为治世的重要政治象征。《处处显瑞歌》云:“空中吉云以气所降甘露雨,地下尘土以露普洒莲花□。山中伏德不召自来所长跪,海边育智不可遏止手已恭。天上鸟王凤凰拜,地上兽君狮子跪。众臣之中无佞者,獬豸兽触何人。八方庶民皆纯善,屈轶草何所指。”[②]《严驾向山歌》云:“瑞室圣殿设宝鼎,施食甘露全境乐。”[③]《赐国宫室歌》云:“九天下,梵王圣君持莲花。十稷内,地祉龙神献甘露。吉云生夜夜绕,霓虹光年年聚。”[④]“万类众生福佑可寻找,如此特处吉祥宫,年年月月现吉兆,乐大人。”[⑤]《圣殿俱乐歌》云:“最乐界四季之时乃游观。旧宫新宫龙凤绕。圣君殿,八方使者惊所见。”[⑥]《君臣和睦歌》云:“治国理性相同,文采谋略四海恭。兵强剑利八,卜长短事犹如龙云来相助。”[⑦]《君臣同德歌》云:“八丘家居,等同龙云力齐。”[⑧]《严驾西行烧香歌》云:“御驾美,千麒麟,千千麒麟,其上虹霓北斗七星天边映;瑞乘强,万香象,万万香象,其上汉铃五更钟鼓地面鸣。左右臣僚金刀戟,禽王凤凰排成队;首尾侍者银弓箭,兽帝狮子列成行。”[⑨]《处处显瑞歌》及《赐国宫室歌》中的吉云即五色云,亦称庆云。《初学记》引《洞冥记》云:“东方朔游吉云之地,汉武帝问朔曰:‘何名吉云?’曰:‘其国俗,常以云气占吉凶。若吉乐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⑩]

《处处显瑞歌》与《赐国宫室歌》中的莲花在祥瑞的政治语境中成为瑞莲。《处处显瑞歌》还出现了凤凰、狮子、獬豸、屈轶草等祥瑞。西夏番文《文海》释凤凰为“此者鸟天子,凤凰之谓也”[⑪]。《孝经援神契》云:“德至鸟兽,凤皇翔。”[⑫]《礼斗威

①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②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99—100页。
③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0页。
④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6页。
⑤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8页。
⑥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4页。
⑦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3页。
⑧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45页。
⑨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⑩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天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页。
⑪ 史金波、黄振华、白滨:《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61页。
⑫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九《祥瑞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07页。

仪》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凤皇集于苑林。"[①]西夏番文《同音文海宝韵合编》称狮子为"兽一切王"[②]。陈怀宇先生指出："狮子作为祥瑞也见于中国僧人供养舍利的活动之中。隋代供养佛舍利出现了诸多嘉瑞，其中狮子乃是重要的主题，可见狮子作为瑞兽伴随佛陀舍利出现的象征意义。"[③]《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云："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④]《唐六典》将獬豸列为大瑞。《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称黄帝时，"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⑤]。《论衡》云："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朱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蓂脯、蓂荚、屈轶之属。"[⑥]《唐六典》将屈轶草列为大瑞。《君臣和睦歌》与《君臣同德歌》中的龙云为龙状的云气。《晋书·天文志》云："天子气，内赤外黄，……在日西，或如龙马。"[⑦]项羽谋臣范增曾遣人"望其(项羽)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⑧]。《严驾西行歌》中的麒麟，《春秋繁露》称人君"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麒麟至"[⑨]。《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云："麒麟者，仁兽也。……明王动静有仪则见。"[⑩]《严驾西行歌》中的香象也为祥瑞。香象在佛经中力大无穷，一香象之力可抵十凡象，但性情狂暴。仁孝西行以香象为瑞乘，又出现狮子，表明仁孝的德政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仁孝的德政也使其尊号为"护城圣德至懿皇帝"，谥号为"圣德皇帝"。

夏仁宗纯祐即位后，西夏出现日月重辉的祥瑞。西夏番文《德行集》序云："依次皇帝承天，袭得宝位，神灵暗佑，日月重辉。安内攘外，成就大功，得人神之依附，同首尾之护持。"[⑪]由吴入晋的纪瞻曾谈道："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只来应，翔凤飘摇，甘露丰坠，醴泉吐液，朱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⑫]可见日月重辉乃圣王德政感应于天的祥瑞。《德行集》即强调纯祐受天神护佑，因为出现日月重辉。

---

①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九《祥瑞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07页。
②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③ 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④ 《宋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7页。
⑤ 《宋书》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0页。
⑥ [汉]王充撰　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一七《是应篇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52页。
⑦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2页。
⑧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页。
⑨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卷一三《五行顺逆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6页。
⑩ 《宋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页。
⑪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⑫ 《晋书》卷六八《纪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7页。

夏襄宗安全即位前为镇夷郡王，在他发动政变夺取帝位时也利用了祥瑞。《西夏书事》云："秋八月，夏州豕生麟。麟一身二首，州民以献。安全使人占之，云'一国两主兆也'。安全喜，遂蓄篡谋。"①《唐六典》将麟列为大瑞。《春秋繁露》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②《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则出于郊，一本云，德及幽隐，不肖斥退，贤者在位则至，明于兴衰，武而仁，仁而有虑，禽兽有垓阱，非时张猎则去，一本曰：明王动则有义，静则有容，乃见。"③麟本为一角瑞兽，但安全所获之麟为二角，因此占者认为代表着一国两主的瑞兆。安全遂利用两角麟的出现代表帝王受命于天这一祥瑞思想，积极制造自己为天所佑，取代纯祐的政治舆论。

西夏诸帝都利用祥瑞来形塑自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表明西夏朝野上下都熟悉祥瑞这一天人感应理念。祥瑞思想确实存在于西夏社会。西夏番文《文海》释"瑞象"为"此者瑞象也，吉祥之谓也"④"此者安乐也，瑞象也，高傲之谓。"⑤《番汉合时掌中珠》记有甘露、瑞雪、凤凰、狮子、龙。《夏国本道门风颂》中提到："暮云浮空月气清新，凤凰羽薄狮子雄壮。独步山林一声长啸，虎豹青龙侍奉其后。"⑥西夏番文《新集锦成对谚语》云："至鸟鹘、老鸧，事前一来皆瑞吉。"⑦陈炳应先生认为这反映了西夏人"认为猫头鹰是吉鸟，它的出现会给人们带来吉利"⑧。西夏的文人士子在诗赋创作中也大量提到祥瑞名物。拜寺沟西夏方塔所出佚名汉文诗集中，《招抚冬至生日上》云："喜见尘寰翔凤鸟，定知天上走麒麟。书云瑞气交相应，庆节悬孤尽举陈。"⑨《皇大》云："瑞云蔼蔼□苍汉，嘉□葱葱绕禁宫。"⑩

《圣利义海》释"现相于天"曰："若吉凶相出时，君之行仪定相合，曰现也。"⑪可见西夏人认为君主的德行会反映于天相。《圣立义海》记圣峰恒时山有"六十贤神以居，供养甘露味雨"⑫。《圣立义海》"十一月之名义"云："观察云色，冬中观云：

①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②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符瑞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7页。
③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八《祥瑞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706页。
④ 史金波、黄振华、白滨：《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19页。
⑤ 史金波、黄振华、白滨：《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8页。
⑥ [俄]克恰诺夫著，粟瑞雪译：《〈三代相照言文集〉——活字印刷术》，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⑦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⑧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72页。
⑩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⑪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⑫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云色黄则大安。"[①]《晋书·天文志中》称："或白气如旌旗，或青云黄云临城。皆有大喜庆。"[②]京房《易飞候占》云："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其下贤人隐也。青云润泽在西北，为举贤良；黄云如覆车，大丰也。"《圣立义海》还将太阳所射之光及其异象与西夏君主之德行相联系。《圣立义海》"日之名义"云："碧广时运，日碧广者，乃天道也。君合德行，光不遮也。""光色，日生五色光，则君德行相合，国兆丰年也。"[③]这样一种观念来源于《晋书·天文志中》所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无主。"[④]

第六节　星旗电戟：星象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中古时期，星象不仅仅是一种天文现象，还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天人感应思想中，列星所在之位象征着地上的人间秩序，星象的变化昭示着帝王的德行是否受到上天肯定，预言着王朝帝业兴隆与否。帝王依天道而治民，而星象运行即是上天传达意旨的反映。帝王敬天，除祭祀昊天外，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观察星象，在政治活动中修省自己。帝王不仅通过星占进行对外战争，还通过星占对内严肃政令。孙英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起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⑤]

一、星象与西夏统治者

在古代天文中，星官之名往往是人间事物，甚至包括帝王将相，因此帝王将相通常被比附为列星用以彰显其神格化形象。五代时期，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成员有不少人被本镇文职僚佐赞为列星。《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称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英威远振，惠化昭彰。外遏番浑，内安黎庶，为国朝之柱础，作边垣之景星"[⑥]。《史记·天官书》云："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②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3页。
③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④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7页。
⑤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国。”[①]《春秋繁露》云:“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②]《唐六典》将景星列为大瑞。墓志称李彝殷为景星是赞扬他在定难军的德治使内外大安。《后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称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之妻渎氏“景曜垂祥,月华表瑞,效葛覃之美称二南,标妇道之成樛木”[③]。定难军文职僚佐借景星出世和月华当空而盛赞渎氏。《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称李仁福之子李彝谨之妻里氏“夫人月淬阴精,霞分异彩。合三星而降惠,成四德以备身,令淑早彰,雍容着美”[④]。志文明赞里氏感月精而生,乃三星而降。三星即阴德星。《史记·天官书》云:“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⑤]阴德星为紫微垣的星官,象征着帝王后宫事务。里氏被称为乃三星而降,表明定难军文职僚佐认为里氏乃王室之人,《后汉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即云:“自适王门,久荣昌运。”铭辞亦云:“恩沾私室,贵显王门。”[⑥]这样一种比附表现了定难军的政治独立性。

《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云:“盖闻,至高者天,环两曜而列群星,昭其象也。至厚者地,立五岳而分四渎,彰其仪也。是故,英灵下降,感之者称帝称王,精气上腾,应之者,为公为伯哉?公盖禀此义而生,为时而出也。”铭辞云:“玄天罔恻,大道宁知。降乎精粹,产作英奇。波澄器量,岳立风仪。公侯绍业,将相传基。银河胤流,玉树分枝。梃生俊德,出佐明时。”[⑦]可见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被认为是感天地之气而生,与星曜关系密切,其家族与本人乃“银河胤流,玉树分枝”[⑧]。李光睿之弟李光遂之墓志则称:“噫!日月丽天,尚有交而有蚀,江河盘地,岂无竭以无枯。幻化攸同,浮生罔究。至于贵贱千古,贤愚一时,旌阅水以难穷藏舟之靡固。……禀天神识,生诸列国。海岳奇姿,星辰秀德。”[⑨]墓志作者将李光遂之殁比附为日月之蚀,李光遂之生比附为星辰当空。

---

①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6页。

②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页。

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④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⑤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0页

⑥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⑦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⑧ 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十八卷《金石编、碑石、题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李继迁出生时，有异星而出象征其创建霸业。藏文史籍《红史》云："最初，西夏地方全部在汉人皇帝的统治之下，在北面都城和尕地方之间，有一座叫曼西的山，此山的山神叫格胡。有一天，北面都城中的一妇人处，来了骑白马的主仆七人，妇人与骑白马的主人同居，一年后生了一个男孩。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以前未曾见过的异星，汉人中管测算天象的人说："北面都城中有一将来夺取皇帝社稷的人出生。"[①]《新红史》亦云："关于（汉政权）失于西夏的情况是：在凉州和弭药嘎之间有一山，其中有一大龙魔称作斯呼，他与凉州城内一食肉罗刹种的女人结合。当其子降生时，见天空出现一颗前所未有之星，于是汉人进行卜算，得知将有一夺取王位之人降生，因此众人惊恐。"[②]此星或为彗星。《文子》云："四时失政，镇星摇荡，日月见谪，五星悖乱，彗星出。"[③]《管子》云："国有彗星，必有流血。"[④]这段传说为西夏国师所述，而国师一般与宫廷关系紧密，国师所述很可能在西夏皇室中广为流传，应为王朝建立后神化李继迁的历史书写，旨在鼓吹李继迁背宋自立的合法性。

李德明曾被宋廷认为是天降英才。《赵德明进尚书令加恩制》称李德明"山河禀粹。象纬储精。识洞兵韬。学该义府。忠纯之性。本自于天资。奇正之机。盖由乎神授"[⑤]。象纬即星象经纬，"象纬储精"即暗指李德明为星宿之灵。

西夏皇帝与象征地上皇权投射的紫微垣联系紧密。西夏陵残碑称西夏皇宫为"紫阁"[⑥]。夏毅宗谅祚登基时被称为"今上皇帝，幼登宸极，夙秉帝图。分四叶之重光，契三灵而眷佑。粤以潜龙震位，受命册封，当绍圣之庆基，乃继天之胜地"[⑦]。"宸极"即北辰、北极星。《春秋繁露》认为人君"故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⑧]。《春秋合诚图》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御四方。"[⑨]"潜龙震位"化用帝出于震的思想。《易·说卦》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⑩]孙英刚先生指出"'帝出乎震'是中古政治修辞的典型

① 《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② 《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③ 王利器撰：《文子疏义·精诚》，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5页
④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轻重丁第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87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页。
⑥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⑦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⑧ [汉]董仲舒撰，[清]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观德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0页。
⑨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1页。
⑩ [清]惠栋撰：《周易述》卷二〇《说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3页。

用语，反映的正是五德终始、天人感应的思想。”“其特别强调君主的统治符合天命，为正朔所在。”①

北斗七星也象征着西夏皇权兴盛。《严驾西行烧香歌》记西夏皇帝离开京师西行烧香时“千麒麟环绕似红霓，七斗星天际明”②。《天象列星图》云：“北斗七星，近紫微宫南，在太微北。是谓帝车，以主号令，运乎中央而临制四方，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北斗。”③西夏宫廷文臣以西夏皇帝出行时天空北斗七星明亮为吉兆，认为西夏皇帝的巡行必当顺利。

西夏皇室对五星神极为重视，在皇宫中建殿祭祀。《严驾向山歌》云：“今福日，皇天之中无奸邪。奸邪已除天所笑。陆南北尘不起，尘不起神人喜。五君星非不远，见贤殿神所主。八盟仙近入住，所置仙乐以耳听。”④“五君星”即五星神。《纂要》云：“五星谓之五纬，五星者，东方岁，南方荧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镇。”⑤五星与王朝治乱密切相关。《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色白圜，为丧旱”，“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⑥正由于五星运行象征着王朝治乱，所以西夏皇室崇祀五星神。行星聚合确实存在于西夏人的观念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函四十卷的函号云：“天地无源，空广皆胜。地深神颠，圣星已聚。”⑦

西夏皇帝与皇后常常被臣民赞为日月星辰。梁吉祥屈所撰《佛说父母恩重经发愿文》云：“皇帝圣容可匹星辰，皇后□□勘同日月。”⑧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云：“所见千星我明星未见，已饮万人我亲主独阙。”陈炳应先生指出：“这里的‘明星’与‘千主’对仗，看来是代表国主或国家的一颗亮星。”⑨没息义显作《万花厅同乐歌》云：“上圣君天遣王，同乐理不可违。庄严皇后福星化，太平事甚喜乐。”⑩将西夏皇后比作福星。《圣殿俱乐歌》则云：“国母善辅国，犹如太阴普照风迹正。”⑪将

①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②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③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天部六·星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9页下。
④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9—120页。
⑤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一《天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⑥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322页。
⑦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⑧ 聂鸿音：《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西夏文献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
⑨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⑩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8页。
⑪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3页。

西夏皇后比作月亮。在《圣立义海》中，太阳的发光发热都象征着西夏君王的德行。《圣立义海》"日之名义"云："日中光大。日光普照，尽皆获利。君德遍施，民庶承恩。""不择皆利。日光普照，不择洁秽。君恩被国，无谓亲疏。""民庶敬爱。冬夏日暖，如君德尽济民庶。夏畏炎热，如惧君之律令也。""光盛。世界日光增胜，故君之圣子繁衍也。"[①]陈炳应先生甚至认为从《圣立义海》"日之名义"所记来看，西夏将太阳定为自己的国星。[②]西夏皇帝与皇后被比拟为日月星辰，正体现了宇宙天体秩序被投射于人间统治秩序，日月星辰对应于西夏皇权，形塑着西夏皇室的至尊地位。

二、星象与西夏对外战争

中古时期，星象对预示战争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吕博指出："通过星占预示战争的得失成败，对军事指挥将领所造成的心理作用和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而且这种作用和影响在唐代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甚为普遍。"[③]韦兵先生认为："星占观念认为异常天象是上天通过天变对显示对军事策略的态度，并预示了战争的胜负，这引起双方在军事决策中对天象的高度重视，从而对宋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④]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十一月"甲寅，有彗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历五诸侯及五车入参，凡三十余日没"[⑤]。彗孛即彗星。《晋书·天文志》云："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⑥]彗星预示兵丧，而这颗彗星出现于东井，夏州属于东井分野。《旧唐书·天文志下》云："今河东郡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为实沈之次，东井之分也。"[⑦]彗星出现于夏州所在的东井，对李继迁定难军政权可谓极为不利。这颗彗星最后进入参星。《晋书·天文志》云参星"又为天狱，主杀伐"[⑧]。彗星进犯参星，意味着军事行动将遭到彻底失败。李继迁对此星变没有在意，于本月率军进攻西凉吐蕃潘啰支政权，结果大败，自己重伤而亡。吴广成认为："孛为兵凶之象。保吉君臣寡学无术，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②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③ 吕博：《唐蕃大非川之役与星象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144页。
④ 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7页。
⑤ 《宋史》卷五六《天文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7页。
⑥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杂星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页。
⑦ 《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3页。
⑧ 《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页。

不能鉴此，宜其及也。”①

李德明在位时，夏国的军事行动与星象密切相关。据考为李德明陵墓的西夏六号陵残碑云：“恩沾 / 星宫资 / 迴天阙军动 / 太宗 / 城。”②表明李德明一朝的军事行动受到星象的极大影响。《宋史·夏国传》记大中祥符二年“出侵回鹘，恒星昼见，德明惧而还”③。恒星在白日出现预示着军队战败。李淳风《观象玩占》云：“恒星者，经星也。三垣二十八舍内外官之名者皆是也。星非一星也。故槩言之：恒星昼见，丧兵俱作。”④《隋书·天文志》云：“一曰星昼见。若星与日并出，名曰嫁女。星与日争光，武且弱，文且强，女子为王，在邑为丧，在野为兵。又曰，臣有奸心，上不明，臣下从横，大水浩洋。”⑤由于星象示变，李德明撤军而还。

《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太白于“七月丁卯，犯水位。庚辰，犯舆鬼”⑥。太白犯舆鬼预示着军事将兴。《晋书·天文志下》云嘉平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一曰：‘兵起。’”⑦李德明利用太白犯舆鬼这一星变亲征甘州回鹘，但不胜而还。《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记：“明道二年七月癸巳，（镇行）犯鬼。”⑧《西夏书事》云：“秋七月，镇星犯鬼。犯东南星，时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心恶之。既，祝曰：凉州其当之乎？九月，取凉州。”⑨韦兵先生认为：“德明对此星象颇感不吉利，因为鬼宿在分野上正属西夏所在的古秦雍之地，而镇星（土星）是星占中的灾星恶曜，照临国家分野，代表国家有灾难之事，德明想把这个灾难移到凉州身上，故祝曰：凉州其当之乎？这是禳解中把灾难移到其他地方、其他人上的常用做法。加之此月据《长编》卷一一一记载，太白昼见经月，星占主有兵事，利于进兵。这些天象因素可能是德明决定用兵凉州的原因之一，九月攻取凉州。”⑩

据《宋史·天文志》和《西夏书事》，李德明在位时先后有太白犯舆鬼、恒星昼见、两月并出、月犯井钺、太白犯辰星、月犯东井、荧惑入东井、星没东井、火星入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③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④ [唐]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三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49册《子部·术数类》，第484页上。
⑤ 《隋书》卷二〇《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2页。
⑥ 《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8页。
⑦ 《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年，第364页。
⑧ 《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2页。
⑨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⑩ 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8页。

南斗、荧惑犯东井、镇星犯舆鬼等十一次星变。吴广成认为："德明自仁宗登极，西州尚属相安。而恒星列曜，垂异分野，史不胜书。盖是时元昊年长，雄图渐启，戎马生郊，战争方始，天文预兆，未始无因也。"[①]将星变与夏国的对外战争明确联系起来。

日食这一天文现象在古代被视为灾难的预兆，"意味着君主的权利将被大臣侵夺，君主的统治受到臣下的挑战而出现了危机"[②]。李元昊却利用日食进行战争动员。《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云："康定元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③]《西夏书事》云："康定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日西先有一珥，杨守素曰：'此吾军胜象也。'力请元昊取延州。"[④]关于日珥，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七《日占三》云："石氏曰：日两傍有气，短小，中赤外青。名为珥。《释名》曰：日珥者，在日两傍之名也。"[⑤]关于日珥对战争的预兆，《唐开元占经》云："甘氏曰：日朝有珥，国有行进之事，其不行凶。……董仲舒曰：日交速而珥，兵大出。……郗萌曰：日珥，人主有喜，兵在外亦有喜。"[⑥]杨守素以日西有珥预示西夏军将战胜宋军，是因为"石氏曰：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东军战败。在日东，东军胜西军败。南北亦然"[⑦]。杨守素是李元昊重要谋臣，曾多次出使北宋。李元昊称帝背宋，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李元昊之叔山遇甚至因此叛逃北宋。李元昊正式称帝后，欲挑起对宋战争。杨守素作为李元昊的心腹大臣，深悉李元昊雄图，为平息内部异见，遂以日珥象征天助夏兴为借口，力主攻宋延州。日珥成了天助西夏胜宋的重要征兆，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

在夏惠宗秉常大安七年（1081年）七月，梁太后不顾太白昼见经天进攻青唐吐蕃。《宋史》卷五六《天文志九》记元丰"四年七月己丑，（太白）昼见"[⑧]。《西夏书事》记本年"秋七月，太白昼见。经天行，识者指为兵象。以兵袭西蕃西罗谷"[⑨]。《后汉书·天文志下》云："太白昼见经天为兵。"[⑩]《金史·天文志》云："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② 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57页。
③ 《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2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⑤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七《日占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⑥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七《日占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⑦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七《日占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⑧ 《宋史》卷五六《天文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5页。
⑨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⑩ 《后汉书·天文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57页。

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①]可见太白昼见经天为战争失败的预兆。但是由于秉常被梁太后囚禁，西夏国内政局不稳，为转移矛盾稳定政局，梁太后发动对青唐吐蕃的战争，但以失败告终。

西夏贞观五年（1105年），夏崇宗利用荧惑犯东井进攻北宋宣威城。《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记北宋崇宁“四年三月壬寅，（荧惑）犯井钺”[②]。《西夏书事》云本年“三月，荧惑犯东井。留井距，入钺。以兵纳西蕃溪赊罗撒，攻宣威城，不克”[③]。荧惑犯井钺乃军事将兴之兆。《宋书》卷二四《天文志二》云晋元帝太兴二年“二月甲申，荧惑犯东井。占曰：‘兵起，贵臣相戮。’”[④]《宋书》卷二四《天文志四》云：“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大将当之。’”[⑤]

星象变化还被西夏统治者用来解释本国为外敌所侵。西夏元德八年（1126年四月），“太白入东井。犯东扇北第一星。金人袭取天德诸城，遣使请和，不许”[⑥]。《唐开元占经》卷五十《太白占六》云：“车频《秦书》曰：符生寿光三年二月，太白犯东井，太史奏曰：必有暴兵。”[⑦]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三月，太白昼见。日者云‘主兵乱’。蒙古初来侵，破力吉里寨”[⑧]。西夏应天四年（1209年）“春二月朔，太白昼见。其光经天。三月，蒙古兵入河西，大都督府主高逸死之”[⑨]。

三、星象与西夏内政

中古时期，星象变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代表着天意示警，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对星象活动极为留意。帝王通过星象变化来进行修省或政治改革，大臣则通过星象变化劝谏帝王施行仁政。星象对于西夏内政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促使帝王修省，解释宫廷政变以及引起大臣进谏等三个方面。

1. 星象与西夏皇帝修省

皇帝作为天子，身负沟通天意与民意的政治使命，秉承天道而治国。星象作为天意表达的特殊方式，促使皇帝不断进行修省。西夏天祐民安八年（1097年），

---

① 《金史》卷二〇《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26页。
② 《宋史》卷五五《天文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3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④ 《宋书》卷二四《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6页。
⑤ 《宋书》卷二四《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53页。
⑥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四，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⑦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五〇《太白占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
⑨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8页。

夏崇宗乾顺以彗星出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修省活动。史称本年"彗星见，肆赦，改明年元。梁氏聚兵，将窥泾原，以彗星见，放散人马。乾顺仿中国制，减膳，避殿，下罪己诏，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安'"①。乾顺模仿中原王朝制度进行修省，而这些修省活动包括修德和修政两个方面。修德即减膳、避殿、下罪己诏，修政即大赦、改元。这些修省活动在中原王朝屡见不鲜。赵贞先生指出："唐五代时期，每当彗星出现后，帝王为减少和弭除灾祸，通常要进行各种修省活动。……就修德而言，皇帝仍然集中于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四个方面。"②乾顺模仿中原王朝制度进行修省，是其形塑西夏王朝正统性的重要政治手段。乾顺颁布罪己诏体现了他承认天意示警，自身在德行以及政治活动上都有所缺失，勇于承担责任。

西夏贞观十二年(1112年)六月，由于白虹贯日，夏崇宗乾顺命臣下进言政治得失。史称本年"夏六月朔，白虹贯日。乾顺命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疏言："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熏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乾顺善之，不能用。"③

白虹贯日预示着国家将发生政治动乱。《唐开元占经》卷九八《虹蜺占》云："《摘亡辟》曰：白虹贯日，四夷为祸，主恐见伐。……白虹贯日，近臣为乱，诸侯有欲反者。……《易妖占》曰：白虹在日为丧，又为兵。"④《宋书》卷三四《五行志》云："永喜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青黄晕五重。占曰：'白虹贯日，近臣不乱，则诸侯有兵，破亡其地。'"⑤因此乾顺命臣下上言议论朝政。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指出西夏与北宋的战争导致两国贸易不通，对西夏经济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宋战争使西夏农业荒歉，人口减少，国土日削。他特别强调了这些情况已引起了天象示警，希望乾顺从西夏国情出发，文武双修。谋宁克任的上疏颇为乾顺所欣赏，但最后仍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② 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80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④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九八《虹蜺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18页。

⑤ 《宋书》卷三四《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8页。

西夏人庆元年(1144年)九月,夏仁宗仁孝由于出现彗星而宣布改元。史载本年"秋九月,彗星见,改元。星见坤宫,五十余日而灭,占其分野在夏国。群臣上言:'彗者,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应之。'遂以大庆五年为人庆元年"①。《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云彗星"见则兵起,大水,除旧布新之兆也"②。赵贞先生指出:"自春秋时期彗星已经被赋予了除旧布新的'革命'意义,因此彗星的出现常被视为天命转移的象征。"③因此西夏群臣上言改元以禳除这一星变,仁孝遂改元人庆。仁孝改元除彗星出现外还应与本年为甲子年有关。孙英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革命'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汤武革命',……其次是尧舜禹的禅让'革命'……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革命与历法有关,为纬学所倡导,似可称为'干支革命'《革命勘文》引《诗纬》云:"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④由于甲子年象征着政治革新,仁孝遂改大庆五年为仁庆元年。

西夏人庆二年(1145年)六月,仁孝由于日食下诏命臣下进言。《西夏书事》云本年"六月朔,日食于井。仁孝下诏求直言"⑤。日食在古代被视为极大的灾异,《隋书》卷二〇《天文志》云:"日食,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见星,有杀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⑥"。仁孝认为日食乃昊天警告自己失德,因而诏命臣下进言。天盛七年(1155年)五月,仁孝又因日食而进行大赦。《西夏书事》记本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越日,大风雨,雷电震坏宫殿鸱尾。仁孝以天变肆赦国中"⑦。仁孝大赦不仅因为日食,还由于雷电击损宫殿鸱吻。《唐开元占经》卷一〇二《雷》云:"(雷)各应其德而起,以应人君行之动静。……京氏《五星占》曰:人君承用节度,即雷风以节,暴行威福,则雷霆击人。其救也,议狱缓死,则灾消矣。"⑧雷击宫殿象征着帝王德行失范,遭到昊天警告,因而仁孝以大赦而禳灾。乾祐四年(1173年)五月,西夏再次发生日食,但被阴云遮盖。西夏大臣纷纷上表庆贺,被仁孝拒却。《西夏书事》云本年"夏五日朔,日食于井。云阴不见,群臣表贺,仁孝却之"⑨。仁孝拒却表贺一方面是由于谦谨,另一方面还应出于日食被阴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② 《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7页。
③ 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92页。
④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
⑥ 《隋书》卷二〇《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5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⑧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一〇二《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31页,732页。
⑨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云遮盖极为不利。东魏前废帝普泰三年“六月己亥朔，日食从西南角起，云阴不见，定相二州表闻。占曰‘主弱，小人持政’。”①

西夏末年军事方殷，乾定二年（1225年）六月，夏献宗德旺因白日出现太白星令臣下上言。《西夏书事》云本年“夏六月，太白昼见。与日争明。德旺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疏陈经国七事”②。《后汉书·天文志》云太白“昼见，阴盛，与君争明”③。刘向《五纪论》称太白“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④。西夏与蒙古连年战争，因而星象变化引起西夏君臣的格外注意。在太白昼见后，殿中御史张公辅上疏所论全为如何防御蒙古进攻，得到德旺赏识，升为御史中丞。

2. 星象与西夏政变

在中古时代的知识、观念中，星象变化不仅代表天意警示君王的德行，对君王的崩逝也具有直接的预示。《宋史·夏国传》云北宋天圣八年“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⑤。火星入南斗对君王来说极为不利。《宋史》记王延范“与广州掌务殿直赵延贵、将作监丞雷说会宿，观天象，延贵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⑥李德明前往贺兰山居住以禳解。《西夏书事》云本年“九月，火星入南斗。西州谣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贺兰山禳之”⑦。但李德明还是于次年逝世。

西夏开运元年（1034年），李元昊因星象有变大肆杀戮。《西夏书事》记本年“填星犯舆鬼。占者云：大臣有变。元昊大肆杀戮”⑧。填星犯舆鬼在星占上对君王非常不利。《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云：“荧惑犯井钺，填星犯舆鬼，遂守之。占曰：大人忧，宗庙改。”……

九月，填星犯舆鬼。占曰：“人主忧。”⑨君王也可借此星变诛杀大臣。《唐开元占经》卷四二《填星占五》云：“甘氏曰：填星犯舆鬼，人君必有所戮。……石氏曰：填星入舆鬼，大臣有诛者。……《南官侯》曰：填星入鬼者，王戮大臣，若将相，若九

① 《魏书》卷一〇五《天象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3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3页。
③ 《后汉书·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45页。
④ 《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1页。
⑤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2页。
⑥ 《宋史》卷二八〇《王延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510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
⑨ 《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页。

亲,臣当之。”[①]李元昊因而严峻刑罚。

西夏开运元年(1034年),“九月,有星如太白出东井。色黄赤,有尾迹,向东,没,光照地。冬十月,杀逆臣山喜,弑母卫慕氏”[②]。“星如太白出东井”实际上就是客星犯东井。《唐开元占经》卷八一《客星占五》云:“一曰:宫中有大忧。《荆州占》曰:客星入东井,贵人死。……一曰:贵人死,以其国占之。”[③]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十二月,有星出弧矢。贯东井,南行没于浊,赤黄有尾迹,光烛地。太子宁明卒”[④]。太子宁明逝世前也有客星入东井的星象变化。

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九月,月入东井。星月相犯,占者云:“大臣忧。”宁令野利旺荣及弟遇乞得罪死”[⑤]。《唐开元占经》卷一三《月占三》云:“《河图帝览嬉》曰:月入东井,诸侯贵人多死。……《郗萌占》曰:月犯东井,军将死。”[⑥]月犯东井为李元昊诛杀野利旺荣及弟野利遇乞提供了天文依据,使李元昊诛杀大臣在表面上成了秉承天命而行的政治行为。

在李元昊驾崩前后,日赤无光对西夏政坛造成了极大震动。《西夏书事》云:“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春正月朔,日赤无光。元旦行朝贺仪,群臣相顾失色。国主曩霄为子宁令哥所弑。”[⑦]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二云:“日赤无光所临之国不昌。”[⑧]《唐开元占经》卷五《日占一》云:“日色赤子生于父,父子同气,今赤气蔽日,子奸父之象也。……京房易妖占曰:日赤无光,君凶也。”[⑨]《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云:“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⑩]由于日赤无光象征着臣乱君崩,因此在西夏大臣中造成了紧张气氛,而李元昊又为太子宁令哥所弑,“应验”了这一征兆,使西夏政坛更为震荡。

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三月朔,日有食之。时乾顺年幼,诸梁恣横,国中皆危之”[⑪]。日食在星占中意味着臣子凌铄君王。《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云:

---

①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四二《填星占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②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③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八一《客星占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577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⑥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一三《月占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⑧ [唐]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49册《子部·术数类》,第165页下。

⑨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五《日占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

⑩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7页。

⑪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日食，为阴蔽阳，食既则大臣忧，臣叛主，兵起。”[①]由于后族梁氏恣意弄权，此时日食又出现，因而引起了西夏大臣与百姓的忧虑。

夏仁宗仁孝在位时期，外戚任得敬权高位重，为谋取最高权力甚至逼迫仁孝分国。日赤成为任得敬之乱的征兆。《金史·纥石烈良弼传》记金世宗“尝问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色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愿陛下修德以应天，则灾变自弭矣。’既而夏国有任得敬之乱，高丽有赵位宠之难，其言皆验云。”[②]《唐开元占经》卷五《日占一》云：“甘氏曰：臣逆君法，日赤如火，其国必乱。”[③]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二《日》云：“日赤如火，君丧臣叛。其国乃乱。”[④]

在西夏国都中兴府被蒙古大军包围时，太白入东井甚至成为西夏灭亡的征兆。《西夏书事》云：“六月，太白入东井。地大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国主睨出降，蒙古执以归。”[⑤]《唐开元占经》卷五〇《太白占六》云：“石氏曰：太白入东井中，大人卫守，国君失政，大臣为乱，兵大起。”[⑥]

3. 星象与西夏大臣进谏

中古时期，由于星象变化对王朝政治有着直接的警示作用，西夏大臣往往借星象而上章言事，劝谏君主施行仁政。夏毅宗谅祚登基后，舅氏没藏讹庞专政。西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西夏出现日食。《西夏书事》记本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讹庞不听”[⑦]。谅祚登基前，元昊被太子宁令哥刺杀，宁令哥又为没藏讹庞所杀。元昊遗命立从弟委哥宁令，但没藏讹庞力排众议，强力扶持谅祚继承帝位。谅祚登基之始，没藏讹庞为保证谅祚帝位稳固，在国内实行高压政治，因此不顾天象示警。

秉常、乾顺在位时期，西夏与北宋连年争战，战争成为西夏对宋关系的政治主题。西夏大臣常借星象变化劝谏最高统治者息战安民。西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闰二月，太白犯荧惑。术者谓“国有兵丧”。群臣上表请禳，秉常不

① 《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9页。
② 《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55页。
③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五《日占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④ [唐]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二《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49册《子部·术数类》，第165页下。
⑤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0页。
⑥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五〇《太白占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许。”[①]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五云:“太白犯荧惑,主病。有兵大战,客败。太白在南,南国败。在北,北国败。东西亦如之。”[②]秉常没有接受群臣进谏禳灾,或是因为军事殷急,但更主要在于他认为西夏军队将会获胜。西夏天仪治平三年(1088年)正月,“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③]。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十二月“月犯东井。犯西扇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④]。韦兵先生指出:“太白昼见经天,星占主人君懦弱失势,女主强,外夷入侵,战争等。”[⑤]《唐开元占经》卷十三《月占三》云:“《荆州占》曰:月入东井,有兵。”[⑥]梁乙逋和梁太后没有采纳司天、太史的意见主要在于对宋战争可以巩固后族在西夏国内的政治地位,对宋战争已经成为西夏后族当政时的主要国策。

梁太后逝后,由于对宋战争已成为西夏的既定国策,乾顺仍然不以星象为意。西夏贞观十年(1110年),“冬十月,太白昼见。群臣咸谓主兵丧,请修省,不报”[⑦]。北宋灭亡后,西夏乘机拓展疆土,蚕食北宋西北边境。乾顺在此期间一意用兵,仍不顾星象示警。《西夏书事》云西夏大德五年(1139年)正月“太白、荧惑合于井。可天谓不利用兵,乾顺不听”[⑧]。

第七节　派衍天潢:天崇拜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天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天至高至远,是天神或上帝所居之处,代表着宇宙的最高秩序,决定自然节气规律的正常运转;历代王朝统治者既通过祭祀天以获得天神垂睐,保证本朝统治在人世与自然两界都取得和谐,又通过宣称自己为天子来树竖立个人在臣民中的神裔化形象,借以塑造本家族、本朝统治的合法化和神圣化;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节,各种天象变化作为神显向人世传达着天神或上帝的旨意,是为天道昭昭。历代王朝统治者作为天子必须遵循这一天道,在天道的指引下进行各种政治活动。

---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② [唐]李淳风:《观象玩占》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49册《子部·术数类》,第215页下。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④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⑤ 韦兵:《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34页。

⑥ [唐]瞿昙悉达撰,常秉义点校:《唐开元占经》卷一三《月占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⑦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⑧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4页。

一、天与西夏帝王

在西夏人眼中，天是世界一切生命的主宰和自然节气规律运转的执行者。《番汉合时掌中珠》记有天乩、皇天、昊天、旻天、上天。《圣立义海·天之名义》云："昊天，世间主宰。""世间为大世界间，天、地、君、礼四种大中，天为始。"[①]西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函号中的《千字文》云："高天不散，空广最胜。幽地神首，圣宫聚集。霄地本源，鸟产卵蛋。"[②]《文海》释"乾"为"乾，此者天也霄也众生覆蔽依处也"[③]。释"天"为"天者乾也天也霄也众生之覆盖遮蔽处也"[④]。《同音文海宝韵合编》释"天"为"天天乾霄众之冠盖蔽固依处天谓"[⑤]。天甚至决定了西夏文的创制。《三才杂字》序云："今文字者，番之祖代依四天而三天创毕。"[⑥]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天空'象征'超越性、力量和亘古不变，仅仅因为它就是那样存在着。它正是因高渺、无限、不可移易、强大而存在。""天空又高又远（在宗教意义上）就意味着神力，意味着其本身充满神圣。"[⑦]正由于天的崇高和遥远，西夏人才将其视为神圣的初始。

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高山经常被视为天空和大地相遇之处，因而也是'中心点'，是世界之轴穿过的地方，是充满神圣的地方，是人们能够从一个宇宙区穿越到另外一个宇宙区的地方。"[⑧]西夏人也认为山是连接天地之处。《圣立义海·山之名义》云："柱天镇地山本昊天圣根，上柱青天，下镇大地。彼青峰山，佛法中称须弥山，亦叫妙高山。"[⑨]西夏皇帝通过在山中开凿神龛来祭祀天神。《圣立义海·山之名义》云："圣峰恒时六十贤神以居，供养甘露味雨，君之神龛显灵守护。"[⑩]

西夏人认为天穹中存在着天尊、天帝、天神。天尊向世间赐福，天帝决定生命

---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② Yulia Mylnikpva、彭向前：《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函号补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05页。

④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43页。

⑤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⑦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⑧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⑨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⑩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长短。《圣立义海·天之名义》云:“天尊福遍凡世。”[①]“析理天君不言命,为定寿命也。”[②]《同义》记有天神。《文海》释“神”为“此者神也天神地神之谓”[③]。“此者神也地只也天神也大神长兕也地母大神之谓也。”[④]《同音文海宝韵合编》释“堂”为“堂帐庭天神有处堂谓”[⑤]。

西夏皇帝在皇宫中供奉天神,祭祀天神。《圣立义海·腊月之名义》云:“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君出行猎,备诸食。星影升。准备供奉天神,赏赐官宰风药。”[⑥]《天盛律令·畜患病门》云:“有神马、祭牛、神牛一种者,年年四月三日于冬夏分别时,于旧宫内天神下当送马中散茶酒。”[⑦]如果用于祭祀天神的神马、祭牛、神牛出现神显,还得专门派遣官巫进行祭祀。《天盛律令·畜患病门》云:“其中有突然死亡及患病等时,牧人当速告局分处派人视之。谓已死之畜有神字迹,是实情,当令视者只关,派一官巫,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当往本土地上,于彼畜所产幼仔之色美好者穿耳以祭祀。生地清净,官巫归送状,其上死畜当注销。”[⑧]

西夏十分重视对天神像、天尊像的保护,严禁盗毁。《天盛律令·大不恭门》云:“盗毁护神、天神,传御旨时不行臣礼,起轻视心,及御前、制、御旨直接唤人往,无故不来等,一律造意以剑斩,从犯无期徒刑。”[⑨]《天盛律令·盗毁佛神地墓门》云:“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毁灭。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其中僧人、道士及军所属管事者损毁时,当比他人罪状增加一等。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若价值很多,则视强盗、偷盗钱数之罪及损毁罪比较,依其重者判断。”[⑩]从中亦可见天神像、天尊像均为西夏官方供奉,以至于有人盗窃私自供养。

西夏皇帝自元昊起皆自称为天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昊正式称帝前“自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元昊既杀山遇,遂谋僭

①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②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3页。
④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01页。
⑤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⑥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3页。
⑧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3页。
⑨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⑩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号”[①]。史金波先生指出：“‘兀卒’二字，考其音、义，的确应是后来创制的西夏文中的‘皇帝’二字。”[②]“第一字除有‘皇’意外，尚有‘天’‘乾’‘霄’之意，与这个字字音相同，文字构造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西夏字又作‘青’字解。因此，这两个字译为‘青帝’‘天子’也有一定道理。”[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昊自称青天子，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青天子与黄天子相对当另有深义。元昊称帝时以北魏鲜卑拓跋氏后裔自居，北魏最初的德运为土德，在孝文帝时改为水德。按五德终始说，继北魏而立的西夏当为木德，而木德尚青，因此元昊自称青天子。

西夏皇帝又称自己为番天子。榆林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榜题外墨书三行：“南方阎梅那国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山，当为修福。”[④]史金波先生指出：“所谓‘南方阎普’即前述南瞻部洲，‘梅那’即minyak。在藏文文献中称建立西夏的主体民族为minyak，即木雅。‘梅那国’也是以族称国。”[⑤]他又指出：“西夏的主体民族，也可以说统治民族为‘番’（或蕃），其语音为‘弥’，西夏人将其译为汉字‘番’。”[⑥]可见西夏皇帝自居为弥药国弥药人的天子。夏仁宗仁孝还被称为佛天子。西夏宫廷诗歌《圣殿俱乐歌》云：“各国帝君不相同，白高国内佛天子。诸处王岂所同？中盛世界菩萨王。”（羲羲刻毅弼鬯，辞尾羲嘏绯膝羌。陇陇席禹彣毗？解彣兖嵕缳席）[⑦]

“天子”一词在西夏辞书中广为出现。《文海》释“君”为“君此者帝也皇上也天子也国主是也”“此者天子也帝君主也君也官也王也主宰也国家主持也”。释“宫”为“此者宫殿也内宫也天子住处宫城之谓”。《同音文海宝韵合编》释“宫”为“天子居处宫城谓”[⑧]“国土天子之居处有谓”[⑨]，释“帝”为“帝王君臣天子国主国主谓”[⑩]，在西夏帝陵残碑中也多次出现“天子”。如神宗遵项陵东碑亭西夏文大字残碑记有“天子”[⑪]。西夏六号陵东碑亭西夏文残碑记有“天子”[⑫]。西夏三号陵西碑亭西夏文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仁宗宝元元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1页。
②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③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
④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⑤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⑥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⑦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1—132页。
⑧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⑨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⑩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⑪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⑫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3页。

残碑也记有“天子”[①]。

西夏皇帝的天子名号来源于西夏皇帝与天神的血缘联系。西夏史诗《夏圣根赞歌》云:“我辈之阿婆娘娘本源处,银腹金乳,善种不绝号嵬名。耶则祖,彼岂知,寻牛而出边境上。其时之后,灵通子与龙匹偶何因由?后代子孙渐渐兴盛。”[②]诗文中的“灵通子”,西田龙雄先生译为“天圣子”。钟焓先生指出:“‘天圣子’一语明显含有天授或天降男子的意味,透露出其与天神的血缘联系,再加上龙的超自然形象,故两者的结合属于与世俗婚姻不同的神婚。”[③]李元昊逝后被称为升入天界。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云:“风帝即位,四海战战兢兢。番地独尊,八山巍巍荡荡。剑刃以磨,地上疆界已正;玉毫绵长,人中番文写成。一日寿终,然后重归天界。”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在人类难以企及且布满星星的地方充满着超越的、绝对真实的、永远存在之神圣尊荣。这些地方乃是人类自身无法抵达之处;某些被赋予特权的人通过仪式而升抵天庭。[④]李元昊的灵魂重新升入天界即体现了他作为天子的神性和特权。

西夏皇帝作为天子的神性主要体现为其获得帝位乃天命所降。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称李继迁为“天降名君,诞时喷发火焰”[⑤]。关于李继迁建立政权,《红史》云:“老妇人回答说:帝释天神已下令让一个西夏国王出世,我们若不归顺,恐汉人将被杀绝,明天将有不计其数的大军前来。”[⑥]《汉藏史集》云:“老太婆说:帝释天已下令立一个名木雅皇帝,若不向他投降,只怕汉人会一个不留都被杀死,明天将有无数军马前来。”[⑦]《西藏王统记》云:“妪答言:天帝告我,已授大命于木雅为王,我等若不归顺,则汉族子孙将无遗类矣。明日即有难以计量之大军将至。”[⑧]在藏文史籍的历史书写中,李继迁创建西夏是受帝释天神之命。

关于谅祚继承帝位。《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云:“以潜龙震位,受命册封,当绍圣之庆基,乃继天之胜地。”[⑨]没藏氏承天。关于夏仁宗仁孝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②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③ 钟焓:《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④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⑤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⑦ 《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⑧ 《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⑨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继承帝位，西夏宫廷诗歌《严驾西行烧香歌》云："白高国内玉身佛，眼内所见，五欲乐天上生。上圣君天所选，腹中思神所明。"[①]没息义显作西夏宫廷诗歌《万花厅同乐歌》云："上圣君天遣王，同乐理不可违。"[②]另一西夏宫廷诗歌《圣殿俱乐歌》云："勇健为业竟攻伐，国父终做君，亦是愿令归天院。"[③]西夏宫廷诗歌反复强调夏仁宗仁孝乃天所选定的圣君。关于夏纯宗纯祐继承帝位，西夏《德行集》序云："依次皇帝承天，袭得宝位，神灵暗佑，日月重辉。安内攘外，成就大功，得人神之依附，同首尾之护持。"[④]夏崇宗乾顺继承帝位也被称为受天之护佑。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云："明城皇帝宝座所袭晓天之尊者。"[⑤]由于天子名号的神圣性，因此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若有位臣僚相斗，于他人等谓'我与万岁御寿同长'等时，徒六年。若谓'我是天子国王'，以尊名显耀，则八年。"[⑥]

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皇帝是'天子'，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中国人的天命和蒙古人的'天的命令'相对应。君主不仅确保一个社会恰到好处的组织机构，而且要确保大地的丰产，以及自然节律的连续性。"[⑦]西夏皇帝被要求遵循天道施行仁政广泛记载于《圣立义海》中。《圣立义海·天之名义》云："现相于天若吉凶相出世，君之行仪定相合，曰现也。"[⑧]《圣立义海·日之名义》云："碧广时运日碧广者，乃天道也。君合德行，光不遮也。"[⑨]《圣立义海·十月之名义》云："御寇行猎十月时，天降霜，使蒲草尽枯死，君依顺于天，率军行猎也。""国昌天赏君依德、智、孝奉天。一切草果不种自成，十月收。国人谓丰年也。"[⑩]可见夏皇帝遵循天道、施行仁政不仅能使天出瑞象，而且还能国富民丰。夏仁宗仁孝寿陵残碑还记有"敬天"[⑪]。

二、天与西夏政治

西夏的祭天属于国家礼制，但政治性极强。李继迁在被宋真宗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派遣属下押衙刘仁谦前往北宋上表感谢，表文云："恭维皇帝陛下，恩

---

① 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5期。
②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8页。
③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3页。
④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⑤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
⑦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⑧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⑨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⑩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⑪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深断绝，度豁包荒。垂念祖祢之功，俾承堂构之旧，全家细小，均沐鸿慈，合族豪酋，同游化宇。从此，以享以祀，在天对越堪依；斯哭斯歌，没世首丘可乐，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赐也。"[①]"在天对越"即对越在天，对越在天指皇帝祭天。班固《曲引篇》云："殷荐宗祀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载。"[②]萧子恭曾谈道："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③]李继迁在上北宋表文中谈到对越在天，表明此时的定难军政权已存在祭天的观念。

西夏正式祭天始于李元昊称帝时。李元昊称帝后，遣使上表北宋。表文谈道："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④]孙英刚先生指出："圣王功成然后'制礼作乐'，曾是许多帝王们的一致追求。"[⑤]制礼作乐是圣王的政治特权，也是普通帝王成为圣王的重要政治手段。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制礼作乐，是正式称帝前的重要政治准备。周边各族各国的臣服以及本国臣民的拥戴，又为李元昊称帝奠定了民意基础。在经过再三礼让这样必要的政治程序后，李元昊通过祭天正式称帝。关于李元昊祭天，西夏《文海宝韵》序云："寅年十月十一[日]，[风]角城皇帝郊坛备礼，增其依仗，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⑥]从"增其依仗"来看典礼极为隆重。

西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曾上奏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⑦]从祭天为李元昊称帝的最后一道政治程序来看，祭天在李元昊称帝的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祭天，李元昊得到天意垂睐，在上天的支持下登上帝位，西夏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上天的确认。由于祭天为历代帝王的政治特权，李元昊通过祭天向全国民众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政治身份。祭天是李元昊从北宋所封之王成为皇帝的重要政治仪式。由于祭天为历代帝王所垄断，因此李元昊在向宋仁宗上表中谈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72—73页。
②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9页。
③ 《魏书》卷四一《萧子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4页。
④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13996页。
⑤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⑥ 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
⑦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第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4页。

到:“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李元昊希望宋仁宗允许他在西郊之地称帝。这等于分割了宋仁宗祭天特权以及他的皇帝名号,对宋仁宗“予一人”的政治权威构成了强烈挑战,对北宋王朝的正统性造成了强烈质疑,因此为北宋朝野所谴责,两国进而爆发战争。在战争爆发至庆历合议之前,北宋朝野对李元昊祭天都极为敏感。韩琦、范仲淹曾上言:“今元昊于天都山营造,所居已逼汉界,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朝、西帝之称,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①]可见北宋朝野都认为李元昊称帝祭天为僭伪之举。

元昊之后的西夏帝王也将祭天视为国家大典。《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云:“今二圣临御,述继先烈,文昭武肃,内外大治。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②]碑文中的二圣指第二梁太后与夏崇宗乾顺,从碑文可知乾顺祭天时极为恭敬。

西夏皇帝的权威被称为天威。西夏《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如来陀罗尼经发愿文》云:“伏愿天威振远,圣寿无疆,金枝郁茂,重臣千秋。”[③]“天威”一词体现了西夏皇帝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天。西夏皇帝的年号大都具有承天受命的政治意涵,如元昊天授礼法延祚,谅祚年号天祐垂圣,秉常年号天赐礼盛国庆、天安礼定,乾顺年号天仪治平、天祐民安,仁孝年号天盛,纯祐年号天庆,安全年号应天。天授礼法延祚表明元昊称帝乃天降神命。保宏彪先生指出该年号“君权神授予祈求天祐色彩十分浓厚”。他认为天祐垂圣“含有祈求上天保佑国泰民安与仰慕效法圣王行迹之意”[④]。史金波先生指出在西夏文中,“天赐礼盛国庆六字意天、赐、礼、盛、国、安,应天意天、依”[⑤]。天赐礼盛国庆表明西夏统治者认为秉常在位时期的番礼崇盛、国家安庆乃上天赐福。应天这一年号则表明通过政变上台的安全希冀以改元来形塑自己称帝的政治合法性。保宏彪先生指出该年号表达了安全“乃‘应天而动’,比‘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更富有正义性”[⑥]。

西夏皇帝和太后的尊号也都具有承天治国、天降神威的政治意涵。李德明追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仁宗庆历三年二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49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③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④ 保宏彪:《从西夏年号西夏文化的阶段性》,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⑤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⑥ 保宏彪:《从西夏年号西夏文化的阶段性》,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尊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①]。这一尊号中的“法天”旨在强调李继迁背宋自立乃遵循天命而为。第一梁氏的徽号有“天生圆能禄番圣佑依法慈睦正国皇太后梁氏”“天生圆能禄番依法正国皇太后”“天生圆能禄番圣佑依法皇太后”[②]。夏惠宗秉常在位时大权旁落,以梁氏为首的后族长期执政。梁氏徽号中的“天生”表明梁氏认为自己乃天降帝母,长期执政乃天降大任。夏仁宗仁孝的尊号有“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惇睦懿恭皇帝”和“天力大治智孝广净宣德去邪纳忠永平皇帝”三种。[③]“奉天显道”表明仁孝认为自己是在承奉天命的基础上治理西夏。“天力大治”与“去邪纳忠”相对应,表明仁孝认为自己受天眷佑,铲除了慕容洧和任得敬之乱。西夏宫廷诗歌《严驾向山歌》云:“今福日,皇天之中无奸邪。奸邪已除天所笑”“一照国门奸已除,天地之中现欢颜。祖帝慧者俱心欢。”[④]可见西夏文臣也认为仁孝铲除任得敬之乱乃天意眷隆。夏崇宗乾顺认为自己铲除后族梁乞逋也是受上天护佑。《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乾顺向北宋上表云:“昨幸蒙上天之佑,假圣朝之威,致凶党之伏诛,获稚躬之反正。”[⑤]

天在西夏对外政治活动中经常扮演着最高神明、盟约仲裁者、见证者的角色。李继迁逝后,李德明继立,与北宋达成景德合约。在上宋誓表中,李德明谈道:“臣立誓之后,若负恩背义,百神怒诛,上天震伐,使其殃祸仍及子孙。”[⑥]宋神宗在《赐夏国主给还绥州誓诏》中谈到秉常曾向宋廷上表云:“臣敢不昭征部族。严戒酋渠。用绝惊骚。俾无侵轶。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坚卫国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懔奉君之体。若乃言亡其寔。祈众神而共诛。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⑦]表文强调西夏由于畏惧天意而尊奉北宋为宗主国,畏天成了西夏以北宋为宗主国的政治依据。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夏崇宗乾顺派遣大臣芭里公亮等向金朝献上誓表,向金表明抛弃辽朝,以金为宗主国的政治态度。表文云:“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

①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1页。
② 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③ 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9,121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九,哲宗元符二年十二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343页。
⑥ [宋]宋庠撰:《元宪集》卷二七《赐西平王赵元昊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87册,第616页。
⑦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6页。

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①]在表文中，乾顺强调自己违背辽亡金兴的天命，派遣军队援助辽天祚帝，遭到失败，是上天的惩罚。西夏以金朝为宗主国乃戴天之举，金朝朝廷为天阙。西夏将按照事辽旧例事金，不再援助亡辽，不再阻挡外国使节朝觐金廷，由上天作为证人。

西夏统治者还以尧天来借指西夏太平盛世。罗太后《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愿品发愿文》云：“兆民贺尧天至庆，万姓享舜日之荣，四生悉运于慈航，八难咸沾于法雨。”[②]西夏使者被称为天使。《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被北宋俘虏的西夏首领伊特香通向北宋通报：“于去年闰月内，梁乙逋统领人马赴麟府路作过去来，至当月尽间到达尔结罗，有带银牌天使报梁乙逋来称，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蓄不知数目，其带牌天使当时却回去。”[③]西夏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也记有“天使”[④]。西夏皇帝所统之军被称为天兵。《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云：“顷为南国失和，乘舆再驾，躬行薄伐，申命王人，稽首潜祷，故天兵累捷，盖冥佑之者矣。”[⑤]无论是尧天、天使、天兵，都体现了西夏统治者借天之名以显示本朝的正统性。

第八节　九龙高卧：龙崇拜与西夏皇室政治统治

在中古时期的知识、信仰体系中，龙作为鳞虫之长，既能升天又能潜渊，行云布雨，神性显著。在王朝政治中，龙一方面作为祥瑞向世人宣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作为皇权的象征存在于诏敕、奏议等各种政治文本，以及皇帝舆服、宫殿、宗庙、陵寝建筑等物质文化中。皇帝作为天子，以龙这一沟通天地的神兽来彰显自己的神圣性与神秘感，鼓吹君权天授。在天人感应的政治舆论中，龙与皇权

①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6页。
②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38页。
④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⑤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密不可分，龙崇拜往往等于皇权崇拜。

一、龙与西夏皇室

在西夏人眼中，龙是真实存在的神兽。《番汉合时掌中珠》记有龙，西夏文《杂字》"野兽"部记有辰龙。《文海》释龙为"此者云中生起，阴晴主也。喜游戏，令陆地降水也"①。《同音文海宝韵合编》释龙为"云中起起嬉戏，爱地上雨行龙"②。这种对龙习性的描述与中原王朝的龙的观念基本一致。西夏谚语集《新集锦成对谚语》云："天下文字圣手书，地上溪涧龙足迹""龙欲青水何时尽，虎奋黑山何时休。"③在西夏人的观念中，龙与水的关系非常紧密。

自西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自诩为或通过政治舆论被打造为龙种。汉高祖刘邦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④。夏太祖李继迁在西夏史诗《夏圣根赞歌》中也被塑造为龙的后裔。《夏圣根赞歌》云："我辈之阿婆娘娘本源处，银腹金乳，善种不绝号嵬名。耶则祖，彼岂知，寻牛而出边境上。其时之后，灵通子与龙匹偶何因由？后代子孙渐渐兴盛。"⑤诗文中的"灵通子"，西田龙雄先生译为"天圣子"。钟焓先生指出："'天圣子'一语明显含有天授或天降男子的意味，透露出其与天神的血缘联系，再加上龙的超自然形象，故两者的结合属于与世俗婚姻不同的神婚。"他还认为天圣子与龙"二者分别代表天神和地方神的形象，其结合也促成了子孙的兴盛和王业的肇兴"⑥。

在《夏圣根赞歌》中，龙还只是西夏皇室的母系祖先，而在藏文史籍中直接成了西夏皇室的父系祖先。《王统世系明鉴》称李继迁之父为龙魔，母为食肉罗刹女。《新红史》云："关于（汉政权）失于西夏的情况是：在凉州和弭药嘎之间有一山，其中有一大龙魔称作斯呼，他与凉州城内一食肉罗刹种的女人结合。当其子降生时，见天空出现一颗前所未有之星，于是汉人进行卜算，得知将有一夺取王位之人降生，因此众人惊恐。当此子长大成人之时，遵循一位非人之老妇的言论，带领众多骑士抵达宫廷，随即得到王臣逐一交出的印玺，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死，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11页。
②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③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
④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1页。
⑤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⑥ 钟焓：《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因此汉地疆土则由西夏做主。其名亦由父系之名命名，故称斯乌王。”[①]《西藏王统记》则称李继迁为毒龙之子，母为食肉魔妇。在藏文史籍的历史书写中，龙从西夏皇室的母系祖先转变为西夏皇室的父系祖先，无疑更加强调了西夏皇室血缘的神圣性。

李元昊正式称帝后，西夏历朝皇帝更是屡屡被比附为龙。西夏番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云：“风帝即位，四海战战兢兢。番地独尊，八山巍巍荡荡。剑刃以磨，地上疆界已正；玉毫绵长，人中番文写成。一日寿终，然后重归天界；其时乌鸦，飞入藏龙冢中。”[②]李元昊的陵墓被称为藏龙冢。谅祚即位时被称为潜龙。《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云：“今上皇帝，幼登宸极，夙秉帝图。分四叶之重光，契三灵而眷佑。粤以潜龙震位，受命册封，当绍圣之庆基，乃继天之胜地。”[③]夏崇宗乾顺之威势被称为龙威。西夏番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云：“先圣求德，万国赞歌不尽；理智无匹，超越古代今朝。俗文佛法，犹如珠串于心；巧治阴阳，一似观丸于掌。忽然辞世，龙威犹如云散；不觉寿夭，乃是虚无形相。”[④]

西夏宫廷被称为龙廷。西夏大臣撰写的用来劝导皇帝的番文《德行集序》云：“是以始于‘学师’，至于‘立政’，分为八章，引古代言行以求其本，名曰《德行集》。谨为书写，献于龙廷。”[⑤]西夏宫殿中还有龙墀。明御史王逊曾凭吊西夏皇宫，他在《夏宫秋草》中写到“坏宫秋草满，犹说李王朝。鸳瓦埋兵碎，龙墀没火焦。霜摧晨惨惨，雨腐夜迢迢。知有英雄在，为营吊寂寥”[⑥]。西夏的皇权被称为龙图。西夏太后罗氏《转女身经发愿文》云：“仍愿龙图永霸，等南山而崇高；帝业长隆，齐北海而深广。”[⑦]龙图本意为河图洛书之河图，为王者之祥瑞，在此引申为皇权。西夏皇帝的寿命被称为龙算。《注华严法界观门发愿文》云：“仰此上乘，遍严法界，延龙算于皇家，曜福星于官庶。”[⑧]西夏汉文本《杂字》“音乐部”还记有龙笛。孙星群先生指出：“以笛声似水中龙鸣，故名龙笛。……后世有龙笛，制如笛，七孔，横吹。管首制龙头，衔同心结带。”[⑨]由于龙纹为西夏皇帝御用，龙笛应为西夏宫廷乐器。

施爱东先生指出：“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却始终

① 《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48页。
②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④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
⑤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⑥ [明]胡如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6页。
⑦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⑧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5页。
⑨ 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否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①]龙纹被广泛用于西夏皇帝的御衣,并成为王朝敕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云:"一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汉语石黄、鸟足赤汉语石红、杏黄汉语杏黄、骚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汉语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汉语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举告赏当给十缗现钱。"[②]可见西夏官民衣冠上都严禁使用龙纹。西夏后族权臣没藏讹庞就曾族诛私自穿盘龙服的毛惟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谅祚出生后"以毛惟昌、高怀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没藏氏。惟昌、怀正皆汉人,本遇乞帐下,故亲待之。已而怀正贷银夏人,惟昌窃衣曩霄所与盘龙服,皆为讹厖所族"[③]。曩霄即元昊,可知元昊时就有盘龙服。

团身龙为西夏皇帝御衣的重要纹饰。敦煌莫高窟第 409 窟东壁门南之供养人被认为是西夏皇帝形象,史金波先生指出:"此皇帝形象身穿圆领窄袖袍,上绣团形团龙。西夏法典规定绣团龙图案也是皇室的专利。"[④]萨玛秀克指出黑水城艺术品中《官员及其侍从图》为关于西夏皇帝的绘画,在绘画中"'官员'身着龙形团花图案的外衣"[⑤]。她还认为黑水城艺术品中《水月观音》图中的"男祈祷者穿着绿袍,上面饰有金龙圆形图案",为西夏皇帝。[⑥]

西夏皇帝的御车中还有九龙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 年)十月"乙卯,契丹遣林牙保静军节度使耶律翰,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王纲来献西征所获马三百匹、羊二万口,又献九龙车一乘"[⑦]。在庆历五年的前一年,辽兴宗御驾亲征西夏,李元昊亲率大军拒敌,先败后胜。《宋史·夏国传》云:"八月五日,韩国王自贺兰北与元昊接战,数胜之。"[⑧]《辽史·萧惠传》云:"夏人列拒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击败之。元昊走,惠麾先锋及右翼邀之。夏人千余溃围出,我师逆击。"[⑨]辽朝赠予北宋的西夏九龙车当在辽军战胜元昊时所获,可见元

① 施爱东:《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25 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82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仁宗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902 页。
④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69 页。
⑤ [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黑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事实与假说》,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42 页。
⑥ [俄]萨玛秀克著,胡鸿雁译:《西夏王朝的艺术——历史及风格阐释》,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29 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仁宗庆历五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802 页。
⑧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999—14000 页。
⑨ 《辽史》卷九三《萧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374—1375 页。

昊称帝后制造了九龙车。

《天盛改旧新订律令》记载御车主为能手持战具者。西夏极为重视对皇帝御车的制作、保养。《天盛改旧新订律令》云："御车与辇汉语轿子等已造完毕，未成实用，及因检验时未视虚假，谓无损伤，行用时不牢等，一律营造者匠人徒三年，小监、检校等徒二年。检验者已见有虚假，受贿徇情而未验出者，罪与小监相当，若无受贿徇情则徒一年。其中进时坚固，库内放置年月久而行用时已变劣，因公出行中不牢时，行前修造序未提醒，则局分大小之罪一律徒二年。若已行，视前导道呼声道不安而不呼，及驾车者驾不牢而颠仆等，一律徒三个月。其中车辆辇毁不牢时，每种应加二等，依时节，视其情节轻重，奏报实行。若局分以外人等故意损毁盗坏时，造意徒十年，徒犯徒六年。……又业已旧损折毁，不堪行用，置于库内而窃取者，当依内外盗次第，以偷盗法论。"①

九龙自汉以来就经常被统治者用来装饰皇权。东汉皇宫有九龙门，曹魏洛阳宫殿有九龙殿，北魏灵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②。北齐在邺城也建有九龙殿。武则天在东都建明堂以九龙装饰。马楚建有九龙殿，闽国王鏻"命锦工作九龙帐"③。北宋皇家之景钟"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④。北宋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寇饰以九龙四凤"⑤。辽圣宗皇后萧氏"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屠，各有巧思"⑥。金朝也以九龙车为皇后之车，乃皇后六车之一。陈怀宇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数字的象征和规范作用，数字和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密切相关，象征指数字的大小象征社会空间的大小和人物权力的大小，如三皇五帝中的数字，如九鼎、九锡、九龙中的数字九等。九是单数中最大的数字，因而九龙也用来象征皇权。"⑦西夏制造九龙车明显受到前朝以九龙装饰皇权的思想的影响，也体现了西夏统治者欲以九龙来显示本朝的正统性。

在西夏皇帝逝后，龙车也是将西夏皇帝之灵魂载入极乐世界的重要交通工具。西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发愿文》云："将兹胜善，伏愿仁宗皇帝，佛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② 《魏书》卷八三下《胡国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4页。
③ 《新五代史》卷六八《闽世家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9页。
④ 《宋史》卷一二八《乐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999页。
⑤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5页。
⑥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2页。
⑦ 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光照体，驾龙轩以游净方；法味滋神，运辕乘而御梵刹。”[①]施爱东先生指出：“上古帝王和神巫多以龙为驾”[②]“负载死者的灵魂升天是龙的另一项重要职能”“龙是背负亡魂飞升的天地使者。”[③]西夏太后罗氏希冀逝去的夏仁宗仁孝驾龙车进入极乐世界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西夏王朝在国家行政事务中广泛使用符牌，西夏皇室曾制有龙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军曾“及夺到监军已下铜印共二十四面，伪国母梁氏随行衣服龙牌等”[④]。西夏宫廷诗集中有一首《敕牌赞歌》，诗称西夏的敕走马牌乃“皇宫圣物”[⑤]。梁松涛先生指出该诗所记之敕走马牌银牌“与同期辽金时期的银牌制度大致相同，主要用于军事及对外使节中；由皇帝亲授，可以调动驿马，索取物资；在对外使节中，这类牌符是国家及帝王的象征，在邻国中亦有很高的地位，代表国家的权威”[⑥]。宋军所获西夏梁太后之龙牌当比此敕走马牌银牌等级更高。

二、龙与西夏帝陵、寺窟

龙在历代帝王陵寝中不仅在礼制上象征着逝去君王的权威，还是构成帝王陵寝神圣空间的瑞兽和保卫这一神圣空间的驱恶者。施爱东先生指出：“龙在皇家的护卫作用可以从龙在龙柱、龙椅、龙床、龙幔、龙铺首、龙锁等物什上看出，一般来说，龙总是成双成对地护卫在主人的门前、墓前、棺椁前后。”[⑦]西夏帝王汉文、西夏文残碑记有“龙”“巨 / 龙”[⑧]“龙海”[⑨]字样。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有六块绿釉龙纹残方砖，砖面浮雕云龙纹。“可看出龙身、龙尾、龙爪、后肢及部分云纹，龙爪三趾，爪内握一圆珠，爪心镂空。”[⑩]彭向前先生指出此北端建筑遗址“与西夏王室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是一处安放有西夏帝后神御的特殊寺庙，即西夏文献记载中的‘圣容寺’”[⑪]。

龙纹还广泛装饰于西夏帝陵的残碑中。西夏三号陵西碑亭出土十三块碑额

①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61 页。
② 施爱东：《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4 页。
③ 施爱东：《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7 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九，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1409 页
⑤ 梁松涛：《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⑥ 梁松涛：《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⑦ 施爱东：《16—20 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9 页。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93 页。
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18 页。
⑩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95 页。
⑪ 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 年第 5 期。

残块，其中龙纹七块。“龙纹残存纹饰可辨的有头、躯干、爪及尾部，至少代表左右两条龙。”[①]最大的一块 XB②:78“碑额纹饰带为剔刻云龙纹，……残碑左侧为龙纹，残存后肢和尾部。龙爪三趾。龙纹上下空白处填以小朵云纹。右侧，龙纹后接大朵云纹”[②]。该残块中的龙还有背鳍。另一残块 XB②:306“残存龙头部双角、耳腮、少部下颌及前肢、爪部，龙面向右；右侧存火焰宝珠纹”[③]。西夏七号陵东、西碑亭所出汉文、番文残碑，“花纹内容是以蔓草、云纹衬底的龙纹图案，龙身弯曲腾跃向前，蔓草翻卷，置于两龙之间，一龙一草为一组”[④]。七号陵残碑中的龙都有鳞甲、背鳍，龙爪三趾。

西夏六号陵地宫出土有四件雕龙石栏柱，其中三件为双龙戏珠石栏柱，一件为单龙绕柱石栏柱。双龙戏珠石栏柱中的双龙身有鳞甲、背鳍，颌下有须，头顶有角，嘴形大张，下肢也有须毛，脚有三趾。双龙在云雾缭绕中环围宝珠。关于龙珠，《庄子·列御寇》云：“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⑤]《述异记》云：“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⑥]双龙戏珠图案在汉代即已流行。西夏圣容寺的单龙握珠残砖和六号陵地宫的双龙戏珠石栏柱，都表明西夏接受了中原典籍和艺术中的龙珠观念。另一单龙绕柱石栏柱“仅雕刻有一条龙缠绕柱身，龙身无鳞，旁有云气缭绕”[⑦]，这条无鳞龙也有发、须及背鳍，脚有三趾。

西夏六号陵南门址出土有一件琉璃鸱吻，东西南北四门址、角阙、碑亭和献殿出土有灰陶鸱吻，这些鸱吻均为龙首鱼身形。“龙首张口吞脊，獠牙外露，上颌突出翻翘，上下颌之间竖一挡板；腮部刻画有半圆形鳞篇纹，颈部有连弧状须毛，两眼长圆鼓凸，中空，眼睑翻卷，平眉粗壮，眉梢上卷，两耳肥大上竖；上额顶置一桥形兽鼻，其后两侧有双角”[⑧]。鸱吻即螭吻，为龙之第九子。将螭吻置于屋脊两端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

③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2 页。

④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28 页。

⑤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列御寇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1061 页

⑥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〇二百《宝三·鲸鱼目》，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3236 页。

⑦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98 页。

⑧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13 页。

起于西汉。《太平御览》引《唐会要》云："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时人或谓鸱吻非也。"[①]西夏三号陵东、南、北三门均出土有鸱吻残片，西门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灰陶质鸱吻，亦为龙首鱼身形。"龙首张口吞脊，下颌露出两颗粗壮的牙齿，上颌的门齿、犬齿及獠牙外露，腮部刻鳞片纹；颈部浅浮雕若干宽带状须毛，边缘饰鳍状纹；两眼长圆鼓凸，两条粗壮的蚕卧式眉毛平智于双眼之上，眉稍微卷曲上翘，两眼之后突出两只斜上竖耳；上额顶突出一桥纽形兽鼻"[②]。

西夏六号陵南门、北门、西北角阙均出土有较为完整的长方形龙头状套兽。这些套兽装饰于建筑侧脊顶端，分为灰陶和琉璃两种，有的兽角为红陶。龙头"上下颌紧闭，上颌上翘，颌面宽大，呈弧三角形；宽扁下颌贴近于上颌牙齿处，两侧嘴角咧开，口中空；门齿与上下犬齿外露，獠牙向上弯曲至鼻两侧，紧贴上颌部；粗鼻隆起，鼻孔圆张；双目鼓凸，眼珠中空，目视前方，眼眶向外翻，粗眉横置；双耳竖于眉后；两腮饰鳞片纹与连弧状须毛"[③]。西夏三号陵出土的套兽大部分为残件，分为红陶、灰陶、釉陶。东南角阙出土有一件完整的灰陶直筒长方颈套兽。"上腭较短，皱鼻，鼻后有褶纹；长眼，蚕状眉细长且较平直；两侧獠牙较短，颈部较长，……两侧壁有弧曲状凸棱纹饰"[④]。

西夏六号陵西阙台、南门、西门、北门、西南角阙、西北角阙出土有八件较完整的龙头状脊兽。这些脊兽上颌翻起，嘴大张，露出门齿、犬齿和獠牙。"舌从根部卷曲伸至下颌前端；两眼鼓凸圆张，粗眉平置于双眼之上；桥形鼻，鼻孔大张；尖状双耳竖于脑后，与向下卷曲的角黏贴一处；口部边缘及耳内均以竖向刻划纹。"[⑤]这些刻纹都象征胡须。

西夏宏佛塔天宫内出土一只绿色琉璃五趾龙爪，五趾稍向内曲。夯筑地基内有六层建筑残件垫层，其中第五层出土有圆雕绿色琉璃龙首二十余件，龙爪一百余只，龙牙八颗，龙耳五只，龙尾六条，龙眼四只，龙首残块五块。一些龙首粗眉隆眼，上下颌紧闭；另一些龙首嘴型大张，长舌上卷至鼻部。还出土有浮雕绿色琉璃龙首残件五件、龙身残块四块、龙爪残块四块；黄色琉璃龙眼两只。龙身有鳞甲、

①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八八《居处部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912页上。

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③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14页。

腹甲。于存海、何继英先生指出："夯土地基内出土大量绿色、黄色琉璃建筑构件，说明在修建宏佛塔之前，这里曾经有大规模较大的殿堂建筑。……天宫内发现的绿色琉璃龙爪、滴水与夯筑地基中的绿色琉璃龙爪、滴水一模一样。分析这批文物，很可能就是原殿堂内的遗物。由此推测，宏佛塔原址曾经是一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西夏皇家寺院。"①

史金波先生指出敦煌莫高窟"西夏洞窟中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十分普遍，龙、凤藻井成为西夏壁画的一大特点"②。敦煌莫高窟中，五代初建、西夏重修的第6窟主室窟顶藻井画有团龙鹦鹉井心。晚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16窟窟顶藻井有"西夏浮雕彩绘团凤四龙井心，回纹、卷草铺于四披"。晚唐初建、西夏重修的29窟主室窟顶藻井画有团龙卷瓣莲花井心。北宋初建、西夏重修的第55窟窟顶藻井画有双龙卷瓣莲花井心。唐代初建、西夏重修的第65窟窟顶藻井浮塑团龙井心。中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69窟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初唐修建、西夏重修的第78窟窟顶藻井有浮塑团龙井心。盛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83窟主室窟顶藻井有浮塑团龙井心。唐代初建、西夏重修的第97窟主室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盛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130窟主室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北宋初建、西夏重修的第152窟窟顶藻井画法轮四龙井心。盛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223窟窟顶藻井有浮塑团龙井心。中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234窟窟顶藻井画五龙井心。中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237窟前室顶有浮塑团龙。中唐初建、西夏重修的第238窟主室窟顶藻井画盘龙团花井心。西夏建第245窟主室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唐代初建、西夏重修的第252窟窟顶藻井画团龙莲花井心。隋代初建、西夏重修的第310窟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西夏建造的第327窟主室窟顶藻井浮塑团龙莲花井心。唐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344窟主室窟顶藻井浮塑团龙井心。盛唐始建、西夏重修的第345窟主室窟顶藻井浮塑团龙卷瓣连花井心。盛唐始建、西夏重修的第347窟主室窟顶藻井浮塑团龙井心。五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351窟主室窟顶藻井浮塑二龙戏珠井心。中唐始建、西夏重修的第363窟主室窟顶藻井画团龙井心。隋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00窟主室窟顶藻井画双龙井心。隋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19窟西壁斜顶圆券龛两侧浮塑龙首龛梁。隋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20窟西壁外层方口龛两侧浮塑龙首龛梁。隋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22窟西壁圆券龛两侧

① 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② 史金波：《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第四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存龙首龛梁。隋代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23窟同422窟。西魏始建、西夏重修的432窟主室中心东向面圆券龛下浮塑龙首龛梁。盛唐始建、西夏重修的第450窟主室窟顶藻井画二龙戏珠井心。史金波先生认为这些有龙纹藻井的西夏石窟都为西夏皇室修造。

三、龙与西夏地方信仰、佛教信仰

夏仁宗仁孝曾巡游河西走廊。刻立于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的)《黑水建桥碑铭》云:"敕镇夷郡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神,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菩萨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发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磬虔恳,躬祭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佑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①

从碑文可知西夏时期甘州黑水河水害频繁,贤觉菩萨在黑水河上建桥以利渡运。夏仁宗仁孝曾亲临甘州黑水河,十分赞赏贤觉菩萨建桥之功,自己又亲自祭祀黑水河上游、下游的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在祭祀之后水患大为减少。仁孝认为水患减少是由于自己祭祀得到诸神感应,便再次下敕命诸神继续护佑黑水河桥梁,使水患彻底消失。《黑水建桥碑铭》立于龙王庙中。《重镇甘镇志》云:"黑河桥。城西三十里。按夏主乾祐七年敕黑河诸神之文曰:昔贤觉菩萨兴建此桥,免徒涉之患,朕曾亲临此桥。今载启精虔,冀神威力,水患永息,桥道久长。立石于龙王庙中。"②崔云胜先生考证甘州在西夏时有上龙王庙、中龙王庙、下龙王庙。③《甘州府志》云:"上龙王庙。城西南八十里,张掖河水经流处,旧名河渎神庙。前有水涡,入小出大,莫测浅深,旱祷辄应。西夏时建""中龙王庙。城西三十里,西夏时建""下龙王庙。城西十余里,西夏乾祐七年,夏主李仁孝有敕谕碑。"④可见,龙王信仰在甘州地区颇为风靡。在夏仁宗仁孝的敕命中,龙神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0页。

② [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③ 崔云胜:《西夏建张掖龙王庙史迹考述》,《西夏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④ [清]钟庚起纂,张志纯等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一三《艺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18—519页。

位于山神、水神之后，树神、土地神之前，地位较高，与水神一道是黑水河的主要护佑神灵。从夏仁宗仁孝敕谕碑立于下龙王庙中可知夏仁宗仁孝及甘州官民对黑水河龙王更为崇奉。自先秦以来，龙即被认为是水中神灵。《礼记》云："龟龙在宫沼。"[①]《左传》云："龙，水物也。"[②]《管子》云："龙生乾水，被五色而游，故神。"[③]西夏时期甘州的龙神信仰与龙的喜水神性密切相关。

甘肃景泰曾出土有一件抄本西夏番文水陆法会祭祀文。"在第一页的第3小页，画有三条龙的造型，其中一条化作了流水，浇地灌苗。两条现形。""第二页的第4小页，将一整页画了龙、水、宅、雨、田苗、风云等。"[④]这些画有龙的绘图都体现了龙兴云作雨的神性。关于龙能兴云作雨，《山海经》云："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⑤]《论衡》云："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⑥]又云："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同气共类，动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影应形而去。"[⑦]

画龙祈雨在宋代极为流行。宋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刊行"[⑧]。宋孝宗乾道十四年"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画龙祈雨法"[⑨]。这种官方颁布的画龙祈雨法极为繁复。西夏水陆法会祭祀文中出现的龙图可以说西夏民间的一种简易的画龙祈雨，体现了西夏百姓祈求龙神降雨以使田亩丰收、家业兴旺的心理。在这件水陆法会祭祀文中明确写到"沙漠众神皆得到了安稳，守家门神还能听到什么呢？把守卫我家的龙神请进来"[⑩]。龙神不仅兴云作雨使西夏百姓粮食大收，还是百姓家庭祛邪避凶的守护者。孙寿龄先生指出："这次发现的西夏文发愿文记载得很清楚，悬挂起四大天王，请来坐地龙王、元始天尊、三皇、圣僧、

① [清]朱彬撰：《礼记训纂》卷九《礼运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56页。
② [清]洪亮吉撰：《春秋左传诂》卷一八《传 昭公四·二十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94页。
③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水地第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27页。
④ 孙寿龄：《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⑤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三〇《鳞介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8—739页。
⑥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一六《乱龙篇第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94页。
⑦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一四《寒温篇第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7页。
⑧ 《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00页。
⑨ 《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86页。
⑩ 孙寿龄：《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比丘、和尚，念经诵佛，发愿祝咒神灵、天王、坐地龙王保佑全家平安。”[①]龙神与元始天尊、三皇共同成为祭祀祈祷者家庭的守护者。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二号墓曾出土二十九幅版画，二十九幅版画中有一幅彩绘双头连体龙版画。在版画中，双头龙为青、红、黄、白、粉五色彩绘而成，“一身二首成长方形，身在下，首在上，二龙首中间有空隙”[②]。两龙头对视，头有毛须，身有鳞甲。于光建先生考证该双头连体龙为明器，乃墓葬神煞中的墓龙。关于墓龙，《大汉原陵秘葬经》云：“墓龙长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墓龙用于镇墓，保护墓主人灵魂之安宁。在墓中置龙是由于“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③]。墓龙一般为陶俑，武威西夏墓的墓龙绘于木板上或是因为墓室狭小，该墓龙乃五色彩绘而成还体现了五行相胜的思想。

龙作为佛教神物在西夏宫廷诗歌中也频频出现。西夏宫廷诗集中《严整速谏歌》云：“高天中金翅龙，头冠宝珠胸王字。举翼一开至千里，鹫雕善飞所不及。”[④]诗歌中的金翅龙头戴宝珠，胸刻王字，在青云之上飞翔，张开双翼可至千里之外，连善于飞翔的鹫雕也无法相比。关于金翅龙，《月灯三昧经》云：“百千诸天咸赞叹，百千诸梵亦复然。夜叉罗刹等净心，摩睺金翅龙欣喜。”[⑤]西夏宫廷诗歌《赐国宫室歌》云：“九天下，梵王圣君持莲花。十稷内，地祉龙神献甘露。”[⑥]此处的龙神向圣王献上甘露实际上是比附龙王向佛陀奉献物品。在梵文本《普曜经》中，“释迦太子入河沐浴起身之后，有龙王从地而起为其奉上自己王冠作为坐具”[⑦]。

小　结

综上所述，公元10世纪初随着于阗—沙州道的重新开通，于阗尉迟氏王国与活跃在丝绸之路东段的灵州党项发生了初步联系，在于阗使臣的奏稿中留下了党项使者的身影。在双方交往日深的情势下，受于阗佛教文化的吸引，不少灵州党项上层贵族前往于阗佛教圣地巡礼朝拜，甚至留居于阗，他们把于阗佛教文

① 孙寿龄：《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8页。

③ 徐萍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④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21页。

⑤ [北齐]那连提耶舍译：《月灯三昧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五卷《经集部二》，第567页上。

⑥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⑦ 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

化中的精华传回本土，以至于在日后西夏的佛教文化中渗杂着一些于阗佛教文化的因素，两地以丝绸之路为媒介发生了文化碰撞、文化交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夏佛教部分地继承了于阗佛教中丰厚的文化积淀，佛教在于阗令人扼腕地灭绝后却在西夏不断趋于兴盛，西夏通过佛教再次架起了中西交流的桥梁。

圣物崇拜、佛王传统都是西夏皇室为塑造政治统治正统性而采用的政治策略。西夏的佛王传统是西夏皇室为塑造政治统治正统性而采用的政治策略，这一传统来源于10世纪的于阗。在公元10世纪的西北地区，于阗、高昌回鹘、归义军的统治者均以佛王传统治国，进而影响到西夏和青唐吐蕃。受于阗《华严经》佛王传统影响，李继迁被塑造为文殊菩萨与转轮王的同身，李德明、李元昊也极为崇拜文殊菩萨。西夏皇帝被尊称为法王，即转轮王。西夏帝陵的佛塔式陵台象征着西夏皇帝的转轮王身份。拜寺口西塔因其影塑中有转轮王七宝而为转轮王塔，从塔龛供养人坐像题名来看，拜寺口西塔为西夏权臣任得敬所建。任得敬建造转轮王塔，是向世人宣告自己为当世的转轮王，为佛法护佑而取代夏仁宗仁孝。任得敬大力塑造自己的转轮王身份，是利用西夏的佛王传统将自己的政治权力扩展进佛教神域，同夏仁宗仁孝争夺统治西夏民众的政治合法性。夏仁宗仁孝既被认为是佛子，又被认为是菩萨、佛，在他之后的夏襄宗安全、夏神宗遵顼、夏末帝也都被称为佛，体现了西夏佛王传统对西夏皇室的深刻影响。

西夏番姓大族的大部分佛事活动是在宗教王化基础上的积极宗教实践。通过为佛教石窟修福，修建佛寺，翻译佛经，编纂佛教经典，雕印佛经，西夏番姓大族试图以其宗教功业确立信众与佛教法界之间的和谐秩序。为佛教石窟修福，修建佛寺，翻译佛经，编纂佛教经典，雕印佛经等都成为西夏番姓大族宗教功德的重要象征。西夏番姓大族中任国师、德师及其他僧官，处于西夏僧侣阶层的上层，由于其父系血缘来源于大族，因此大族的势力范围通过他们得以从世俗社会扩展至宗教神圣社会，世俗权威逐渐影响到了宗教权威。西夏番姓大族中的普通僧人分布于京畿、敦煌和黑水城，反映了西夏番姓大族已经分别加入到各地的信仰社群，是各地信仰社群中具有大族身份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存在，对将地方信仰社群纳入到西夏官方信仰系统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表征意义。西夏皇室通过佛教发愿文来进行人佛交流。在佛教发愿文中，作为佛法护佑对象的皇族、大臣、百姓其阶序的构成反映了西夏皇权对佛教法界秩序的干涉。皇族、大臣、百姓同时出现于发愿文中又说明西夏皇室力图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整合为同一信仰集团。在发愿文中，佛教不仅是皇室宗教，还是推动统治精英与被统治者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

西夏皇室的祖先崇拜主要体现于建宗庙奉祀祖先神主，建圣容寺及影殿奉祀祖先御容。李继迁背宋自立后，在对北宋的上表中不断请求北宋割赐夏州以使自己能够祭祀先祖。李继迁被北宋任为定难军节度使后，重返夏州，他首先进行的就是修复宗庙，再安抚宗族，使宗族全体成员在战乱后得以安稳，可见宗庙对于李氏家族在血缘和政治上的高度凝聚作用。李继迁在攻占灵州后，在灵州首先进行的还是建立宗庙，再设置官署，最后迁徙宗族成员在此建都。李氏宗族成员的迁徙表面上是李继迁的行政命令导致，但实际上是宗庙的地理所在吸引着李氏宗族成员自夏州迁往灵州。西夏正式立国后，在首都兴庆府建有太庙，《天盛律令》记为宗庙。从《天盛律令》的记载来看，宗庙距西夏皇宫距离较近。西夏专门设有级别较高的宗庙监来管理宗庙。西夏皇室通过国家大法将宗庙升格为与皇宫同等的神圣空间，任何官民以任何形式对宗庙的侵犯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西夏皇室在宗庙这一神圣空间祭祀祖先，西夏皇室的祭祖在国家祀仪中仅次于祭天祭地。按时祭祀、宗庙安稳象征着西夏王朝的长治久安、西夏帝室血脉的垂绵不绝。西夏皇室的祖先在宗庙祭祀中被神圣化。西夏皇室祖先的形象通过设于首都及各地的圣容寺向全国官民展示，这样一种展示既是西夏皇权自首都向地方的延伸，又使地方官民得以瞻仰天颜，扩大了西夏皇室在地方的影响，使西夏中央与地方连为一体。圣容寺作为西夏皇权在地方的代表，以佛教奉祀的方式将西夏皇帝佛祖合一的观念推行于地方，成为西夏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场所。

西夏皇室的祖先在《夏圣根赞歌》和西夏宫廷赞歌中被极力称颂，成为番人圣贤的完美化身和番族礼仪、道德的完美代表。在西夏帝陵碑刻的宏大叙事中，祖宗是西夏皇室历史记忆的重要母题。西夏皇室祖先的神圣化还体现为西夏皇室将祖先视为帝国和本家族的保护神，在各类宗教文本和世俗文本中虔诚祈祷。西夏皇室既强调权力来源于天，又将权力的传承系于本家族血脉的世代流传，祖先成为权力传承的起源和赋予者，这样一种赋予象征着国家政治传统和统治秩序的保持和安稳。祖宗之法是西夏对内对外政治活动的神圣准则。在国家内部政治生活中，祖宗之法与尊崇番礼相联系；在对宋外交中则代表着以小事大的国策。在对宋外交表文中，西夏不断强调本国自先祖以来的以小事大，并以此谴责北宋对西夏的侵略。西夏皇室的先祖还被视为西夏文化的开创者，作为西夏番文、番礼的创制者在各种典籍中被反复提及。

天人感应作为中古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对历代王朝的政治宣传具有重要影响。在天人感应学说的阐释下，祥瑞成为上天奖赞帝王施行仁政的异象。正因

为祥瑞代表着帝王施行仁政感应于天，许多帝王及其臣子都积极制造祥瑞以应天命，从而形塑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神圣性。西夏的祥瑞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早在唐代，西夏的龙兴之地夏州就曾出现祥瑞，但此种祥瑞实际上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古物发掘，但被夏州节度使附会为祥瑞，以响应朝廷的军事行动。五代时期，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在各地竞相向后唐朝廷进献祥瑞的情势下，也向后唐明宗进献白鹰，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忠诚。在定难军统治阶层弥漫着的祥瑞思想，主要反映于定难军李氏家族成员的墓志中，这些墓志的主人包括定难军节度使、节度使夫人、节度使之子。定难军幕府文职僚佐通过在墓志中大肆宣扬祥瑞，模式化地塑造了定难军节度使、节度使夫人、节度使之子通过施行仁政感应于天的神圣形象。

西夏王朝帝业的奠基者李继迁生而有齿。在西夏王朝建立后，生而有齿与光焰异常、满室雷霆相结合，共同成为李继迁抗宋自立、称王图霸的祥瑞。这些祥瑞被记载于王朝史诗和与西夏宫廷关系紧密的国师之劝善诗集中，在王朝疆域内广为流传，自上而下地确认了李继迁秉承天命创建西夏王朝的神圣性。李德明在位时，不仅通过祥瑞进行大赦，还利用祥瑞制造政治舆论以顺利迁都。李元昊称帝前，文臣大赞祥瑞，为李元昊称帝制造政治舆论。秉常、乾顺在位时，西夏与北宋、青唐吐蕃连年战争，国势日衰。在这一时期，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却屡屡出现祥瑞。凉州官员在《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中详细记载了这些与佛教密切相关的祥瑞，通过将护国寺感通塔的祥瑞追溯至前凉，以肯定祥瑞在感通塔出现的历史真实性，又直接歌颂乾顺、梁太后敬天法祖、施行仁政、崇奉释教感应于天，因此出现了祥瑞。西夏皇帝经《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的赞述成了承命于天的圣王，整个西夏王朝因此得到了上天佑护，西夏的帝业也将隆兴不败。

夏仁宗仁孝作为西夏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帝王之一，粲平内乱，尊崇儒释，在其统治期内西夏长期和平。因此宫廷文臣在诗歌中多以祥瑞来象征其文治武功感应于天。这些祥瑞既有传统典籍记载之异物，又有佛教名物，反映了西夏的儒释融合，也反映了西夏文臣认为夏仁宗仁孝的德治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真正顺天治民的圣王。在仁孝之后的纯祐、安全也都利用祥瑞来表现自己为上天所选定的圣君。西夏统治者积极以祥瑞来宣传自己为天命所佑，在西夏社会也弥漫着祥瑞思想，祥瑞名物广泛记载于西夏文字书、官方辞书、谚语和文人士子的诗赋中，为西夏统治者利用祥瑞来进行政治宣传奠定了社会基础。

星象与西夏国家政治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在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体系中，星象变化代表着天意垂鉴，人君治国莫不遵循天意，依天道而施仁政将使人

君成为圣王。西夏作为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的多族群帝国，儒释交融，西夏朝野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以星象变化为借鉴，积极治理国家。天在西夏社会中神性显著。在西夏人的观念中，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中心，决定着各种自然节气的运转。西夏人在各种辞书、类书中对天主宰万物进行了准确定义，明确指出天为世间最大，高于地、君王与礼。在这样的阶序下，西夏皇帝必须借助于天来对本国进行统治。西夏人认为天穹中的天尊、天帝、天神等各种天界神祇威力无穷，决定着人间祸福。西夏皇帝不仅在皇宫中供奉天神，祭祀天神，还在山中开凿神龛来祭祀天神。西夏皇帝对祭祀天神的神马、祭牛、神牛出现神显十分重视，专门派遣官巫进行祭祀。西夏官方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垄断了对天神像、天尊像的供奉，严禁民间私藏或盗毁天神像、天尊像，对违反者予以严惩。

西夏皇帝自元昊起皆自称为天子。天子这一政治名号在西夏为西夏皇帝所垄断，西夏的各类辞书都将君主对应于天子。西夏的“天子”一词作为政治名号既受到中原皇权观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西夏主体民族番人的民族特点，还具有较为浓烈的佛教色彩。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元昊自称青天子乃是由于继承北魏水德，以西夏为木德。“南方阁梅那国番天子”的题记则反映了西夏皇帝以弥药国弥药人的天子自居，体现了西夏作为非汉王朝的政治特点。夏仁宗仁孝被西夏宫廷诗歌称为佛天子则反映了西夏举国崇佛的宗教特色。西夏皇帝获得帝位乃天命所降，集中体现了西夏皇帝作为天子的神性。这一神话在西夏国师的劝善诗集和后世的藏文史籍中反复出现，成为西夏圣王能够突破重重困难、成功立国的重要政治背景。历代西夏皇帝的权力来源也被归因于天降大任、天授皇权于君。在上天的监察下，西夏皇帝必须遵循天道以施行仁政，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西夏的祭天不仅是隆重的国家大典，还是确认西夏皇帝天子身份的重要政治仪式。在李继迁时代，定难军政权即有祭天的观念。西夏正式祭天始于元昊称帝。元昊通过创制西夏文、改正衣冠、制礼作乐获得了圣王的文化资格，强调周边各族各国的臣服、本国臣民的拥戴，又获得了民意基础，在经过再三礼让后，最终通过祭天正式称帝。祭天作为元昊称帝的最后一道政治程序，是元昊成为皇帝的最关键的政治仪式。元昊借祭天宣告人神相通，昊天降命使自己成为皇帝，权力的来源得以合法化、神圣化。祭天彻底颠覆了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政治权力来源于北宋朝廷，宣告了自元昊之始的西夏皇帝的政治权力都来源于天，同时也向本国臣民、周边各族各国、原宗主国北宋展示了元昊作为天子的新的政治身份。这样一种政治宣言分裂了北宋皇帝的天子身份，对北宋王朝的正统性造成了

极大打击，因此为北宋朝野所不能容忍，两国遂爆发战争。

西夏皇帝的年号以及西夏皇帝、太后的尊号大都具有承天受命的政治意涵。年号、尊号颁行于本国境内，西夏臣民得以获知当朝皇帝乃承天受命之君，本国乃天佑神圣之国，西夏皇帝的天子身份得以进一步强化。在西夏中后期的政治动乱中，具有承天受命政治意涵的年号往往又塑造了当权者的统治合法性。

西夏以天朝自居，西夏的太平盛世被称为尧天来，西夏的宫廷使臣被称为天使，西夏皇帝所统之军被称为天兵。但西夏在对外政治活动中奉行以小事大的原则，称北宋皇帝为天子，金朝朝廷为天阙，体现了西夏灵活的外交政策。天在西夏对外政治活动中以最高神明而担任西夏与宗主国盟约的仲裁者、见证者，体现了盟约的神圣性与不可毁弃性。

西夏人在番文字书、谚语中集中对龙兴云作雨的神性及龙喜水的习性都进行了细致描述，表明在西夏人的知识体系中存在龙这一神兽。在西夏史诗和藏文史籍的历史书写中，夏太祖李继迁作为龙的后裔而成功建立西夏王朝，李继迁的神格形象在西夏人中世代相传，直至王朝灭亡之后。龙是西夏皇室的直系祖先成为西夏王朝政治叙事的固定主题，李元昊也被称为卫慕氏受白龙感孕而生。西夏皇室通过这样的政治宣传得以成为神裔，从而塑造王朝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西夏皇室尤其是西夏皇帝作为世上真龙的神格化形象既为西夏皇室所提倡，又为西夏群臣所广泛承认。罗太后称西夏皇权为龙图，西夏国师称李元昊的陵墓为藏龙冢，夏崇宗乾顺之威势为龙威。西夏大臣称初即位的谅祚为潜龙。西夏百姓称西夏皇帝的寿命为龙算。

西夏皇权的专制属性决定了西夏皇室将龙纹垄断为御用。西夏皇宫中建有龙墀，宫廷乐器中有龙笛。西夏皇室对龙纹的垄断，集中体现为通过国家大法明确规定龙纹为王朝敕禁。《天盛律令》规定西夏官民衣冠上都严禁使用龙纹。谅祚宠臣毛惟昌曾因私穿盘龙服为权相没藏讹庞族诛，体现了龙纹作为西夏皇权标志的不可僭越性。龙纹被广泛用于西夏皇帝的御衣，元昊在位时期即有盘龙服。敦煌莫高窟的西夏皇帝像、黑水城艺术品中《官员及其侍从图》《水月观音》图中的西夏皇帝形象都身着团龙服。元昊在位时还创制了九龙车，作为皇室御车。西夏制造九龙车乃受前朝以九龙装饰皇宫建筑、车舆器服观念的影响，也表明西夏统治者欲以九龙来烘托本朝皇帝九五之尊的身份。在西夏皇室的佛经发愿文中，龙车还是将西夏皇帝灵魂载入极乐世界的重要交通工具。西夏皇室还制作龙牌在国家行政事务中使用。

西夏帝陵作为逝去西夏帝王的安寝之所，安置有不少龙形器物。这些龙形器

物体现了西夏帝陵作为皇室建筑的尊贵特性，象征着保卫西夏帝陵神圣空间的瑞兽，是西夏皇权于冥界的延伸。西夏帝陵的龙形器物主要包括雕龙石栏柱、龙首鱼身形鸱吻、龙头状套兽、龙头状脊兽，这些器物或竖立于西夏帝陵建筑群的地面，或装饰于各类建筑的屋脊，给人以神圣威严之感，让人深感西夏君王虽逝但龙威依在，是塑造西夏帝陵神圣空间的重要器物。西夏帝陵残碑的“龙”“龙海”字样、各类残碑的龙纹装饰、陵区北端圣容寺遗址龙纹残方砖也都显示了西夏帝王在世时为真龙，逝世后为睡龙的神圣特性。

圆雕、浮雕绿色琉璃龙出现于西夏宏佛塔天宫内及夯筑地基内，表明宏佛塔身为西夏皇家寺院的特殊属性。敦煌莫高窟中西夏重修及西夏新建的洞窟中，主室窟顶藻井或彩绘或浮雕团龙井心、双龙井心、四龙井心、五龙井心、二龙戏珠井心；一些洞窟中圆券龛浮塑龙首龛梁，这些都表明西夏皇室与敦煌莫高窟联系紧密。

龙在西夏河西走廊统治区主要作为民间信仰而存在，深受中原文化风俗的影响。立于甘州下龙王庙的《黑水建桥碑铭》所记载的甘州黑水河龙神，以及《甘州府志》记载的上龙王庙、中龙王庙、下龙王庙都表明西夏时期的甘州盛行龙神信仰。黑水河的龙神是以水神面目出现的，这种龙神信仰得到了西夏官方的认可和崇祀，夏仁宗仁孝巡游河西时就曾躬祭黑水河龙神，但又敕命黑水河龙神保护河运安全，体现了西夏皇权对河西地方信仰的强力支配。

甘肃景泰出土的西夏番文水陆法会祭祀文图文并茂。龙在绘图中占据中心位置，绘图主题为龙兴云作雨使田亩丰收，乃西夏人简易的画龙祈雨。在祭祀文中，龙神与元始天尊、三皇共同成为祭祀祈祷者家庭的守护者，为祈祷者家庭祛邪避凶。武威西夏版画墓中的出土的双头连体龙版画为简易的镇墓神煞墓龙，用以保护墓主人灵魂之安宁。

西夏宫廷诗歌中的龙既为皇权象征，又为祥瑞，亦为佛教神物。《严整速谏歌》中的佛教神物金翅龙用以歌颂西夏帝业隆昌。《赐国宫室歌》中的龙神献甘肃则是比附龙王向佛陀奉献物品，暗指西夏皇帝为现世佛陀。

结 语

在西夏帝制政体下，西夏番姓大族作为统治者集团精英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西夏王朝的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在西夏社会中，西夏番姓大族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在西夏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说明了世家大族本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世家大族本身作为宗族的枝分叶布、断续升沉、世业家风。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反映了党项人自公元 8 世纪至公元 12 世纪族群意识的觉醒、转变及自我界定，其权力建构也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二者在党项人由唐代依附于边郡的内藩向缔造西北内陆多族群统一帝国的主体民族的转变过程中相辅相成。西夏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项人族群意识的觉醒，而此种族群意识的核心在于党项内徙后其身份认同观念的萌发。

作为非汉民族的党项人在内徙后成为大唐帝国治下的羁縻府州部民，唐廷借用党项上层之手以党项部族武力消弭六胡州之乱、安史之乱、朱泚之乱、黄巢之乱，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大族在政治上不断融入唐官僚系统，在文化上也日益亲近于华夏，在居住形态上由游牧于野转为定居于城。与唐廷紧密的政治联系使拓跋氏等党项大族接受了唐朝官方界定的党项源出西羌。但伴随着安史之乱后仇视胡人以及当时崇尚门第阀阅的社会风气，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大族的身份认同观念经历了由羌到鲜卑的转变。这一转变也发生于安史之乱吐蕃大举东进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河陇失陷，党项人所聚居的河曲地带和鄂尔多斯南缘成为抗击吐蕃进扰唐廷的前沿阵地，唐廷将在此地区的朔方军分割为京西北八镇以对抗吐蕃，而原归朔方军统辖的党项诸部也被分隶于京西北八镇，以拓跋氏为首的党项大族因而开始更深地与西北缘边藩镇相结合，大族成员本身或成为藩镇军将，或成为藩镇属州刺史，大族官贵之下的普通部族成员也成为藩镇军人。黄巢之乱爆发后，拓跋思恭正是以杂糅党项部族武力的夏州藩镇军队进击长安，随之获得藩镇节度使节钺，成功地使党项大族的政治势力在西北缘边藩镇中发展壮大。

唐帝国崩溃后，整个10世纪都处于各民族势力和各藩镇势力争夺唐朝政治遗产的动荡中。伴随着主掌中原的沙陀人汉化，曾受唐廷赐姓，作为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拓跋氏在五代也不断攀附华夏，至宋初更是自居为与其所统治的党项羌部众血缘疏离的陇西李氏。北宋的建立及其并吞十国标志着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政治时代的结束，作为藩镇政治及世族政治遗绪的定难军，其被北宋中央统一成为历史大势。但李继迁起兵抗宋打破了这一历程，其以党项羌作为抗宋的军事资本以及广泛与党项酋豪联姻，正说明他由华夏转回本族。在宋廷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节钺后，定难军已成为被中央羁縻、独立性极强的强藩，以党项羌为主体民族的多族群王朝逐渐在这一强藩体制中发育。李元昊称帝后，为了使原来身为汉地内藩的党项人去华夏化，不仅命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还将佛教作为统治民众的意识形态大力倡导。圣物崇拜、佛王传统被西夏嵬名氏用以塑造其正统性，西夏文大藏经及番学文化也成为嵬名氏家族对内实行党项人族群凝聚的工具。

唐代党项拓跋氏、窦氏，定难军李氏，西夏嵬名氏的群体属性既体现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又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权力扩展中，还通过佛教信仰得以神格化。西夏番姓大族与本国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在西夏立国初期，番姓大族大都世居京城，但随着西夏享国日久，大族逐渐由京城流向地方，如沙州、西凉府及黑水镇燕军司，地域元素逐渐影响到了大族的宗族结构，大族中的地方精英开始出现在了基层社会。从大族的政治生活来看，其所享有的特权超过本国任何一个番姓小族及其他民族。封爵高低、任官大小、财富拥有数量成为构成大族内部阶层等第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番姓大族成员进行授爵与任官，使其成为贵族世家与官僚世家，辅弼皇室掌握国家政权，积极影响国家统治秩序的构建。血缘、封爵、官位共同构成了西夏番姓大族跻身于西夏贵族阶层的政治基础。

有夏二百年，在朝堂上，番姓大族官员冠盖如云，在军队中大族军官被士兵景从云集。朝堂与地方府州均成为大族政治活动的场域，其政治空间也由朝堂、地方府州向国家军事领域扩展。在君主独裁政体下，皇权与大族相辅相成。西夏皇帝为维护皇室利益和番族统治，在国家大典中制定诸多优惠番族的政策，使西夏番姓大族在西夏国内享受着法律特权和丰厚的物质生活。西夏番姓大族中，皇族、后族与其他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所享受的特权迥然有别，又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等级差别。西夏的国家权力虽高度集中于西夏皇帝一人之手，但由于皇帝身为嵬名氏家族的最高“族长”，母系血统又出于后族，因此皇族、后族地位崇高，皇族、后族事务成为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皇族、后族成员掌握军国实权，对西夏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皇族、后族的发展与西夏王

朝的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

佛教信仰为西夏番姓大族宗教文化所承载的主要内容。西夏番姓大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由佛教信仰组成，佛教对于西夏番姓大族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西夏番姓大族的文化生活既在佛寺等静态环境展开，又通过具体的功德实践等动态活动而得以呈现。西夏皇室以信仰作为社会控制工具来规范番姓大族的意识形态，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狄宇宙指出："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广泛地为人们所信奉的帝王的'神圣'性和政治领袖的权力是由一个神的存在所授予的观念，也被游牧民族所借鉴。"[①]西夏皇帝的神圣性集中体现于世袭的天子名号和佛王名号。这两种名号表明西夏皇帝受到中原皇权观和佛教王权观的双重影响。西夏国家疆域乃汉唐旧疆，无论是灵州还是河西走廊都深受儒学和佛教的影响，是儒学和佛教文化积淀之区域。西夏的番人、汉人不仅尊崇儒学，还和回鹘人、吐蕃人一起崇奉佛教。在这样一种多族群、多信仰的的社会环境下，西夏皇帝以天子和佛王的双重政治面目来治理国家，借用祥瑞、星象等政治舆论来塑造神圣性和合法性，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狄宇宙认为："'超部落'首领的圣礼授权是政治集权化过程的关键。"[②]西夏皇帝通过祭天大典获得了天授之权，将权力集中于己手，以天子的身份治理国家，但他还需要化身为神来应对本国多族群、多信仰的复杂社会环境。J·G·弗雷泽指出古代国王"不只是被当成祭司，即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而受到尊崇，而是被当作神灵。他能降福给他的臣民和崇拜者，这种赐福通常被认为是凡人力所不及的，只有向超人或神灵祈求并贡献祭品才能获得。因而国王们又经常被期望着能赐予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等"[③]。西夏皇帝通过自称及被他称为佛王而化身为神，将佛教神权扩张进世俗社会，以其为一种支配力量来稳定自己的统治。

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往往被分为"征服型"王朝和"渗透型"王朝。征服型王朝兼具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和中原王朝政治形态，"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作为本族群人力与作为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④]。渗透型王朝仅具中原王朝政治形态，它的建立者"多在

①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②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③ [英]J·G·弗雷泽著，汪培基等译：《金枝》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页。

④ 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vi页。

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①。由北族化羌系民族党项人创建的西夏王朝兼具内亚性和中原性，但王朝本身没有辽阔的后方根据地，且王朝的前身源于唐朝的边疆藩镇，因此西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北族王朝。傅海波即指出：“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那里成为了他们的国家中心。党项人从人种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的是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同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较小的种族集团。同样，当他们在11世纪中叶正式独立时，人们不能根据不着边际的假定把他们形容为未开化的野蛮人。”②

西夏番姓大族的身份认同、权力构建及信仰世界集中体现了西夏王朝的内亚性与中原性。西夏前期，番姓大族往往联合执政，后族权势长期压过皇族，后族不仅决定国家对外政策，还控制西夏皇位继承，皇权微弱。皇族享有王爵，后族也拥有王号，番姓大族在西夏官僚系统中大都是世官世禄，即使在实行科举制之后，世官制的特色仍然十分明显。狄宇宙指出：“部落和氏族的联系是内亚政治体系的一个核心特征。只有某些世系的成员才能拥有最高的政治职位，一般来说，最高的政治权力是为一个氏族所垄断的，那是一种‘神赐’的领导者，他将许多部落联合成一个国家。政府官职世袭之位的获得，作为内亚政治的一种实质性的方面，一直延续到清朝（1644—1911年）。”③对于西夏而言，西夏皇帝虽然享有天子和转轮王的政治名号，但仍必须与后族等其他番姓大族分享权力，集中体现在西夏政治史上皇族与后族长期的双极统治。

番姓大族的部落武装不仅是李继迁抗宋自立的政治资本，也是西夏独立后本国的主体军事力量。番姓大族重复仇，重盟誓，崇奉大巫、小巫。从《天盛律令》来看，巫在西夏宫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都体现了内亚世界的政治传统、文化传统。西夏禁卫军的构成尤其体现了这一传统。杉山正明指出中央欧陆亚国家的一大特色即是“在作为游牧部族联合体之核心的君主周边，组织有由将来成为各部族下一代首领的少年阶层所组成的近卫军，他们和多元人种组成的策士阶

① 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vi页。

②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③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8—209页。

层一同构成中央权力。此一中央宫廷、中央政府里存在独特的游牧性质官制”。元昊的近卫部队即由番姓大族子弟构成。《天盛律令》专门谈到宿卫西夏宫廷的禁军必须人根鲜洁,即必须出身于番族。史金波先生认为:“大约西夏时期的番族也以大族的人根为优,最为鲜洁,最可信任,可充宿卫。”

杉山正明认为:“就算是由党项族为主要核心构成的西夏,也纳入了汉族、回鹘族及西藏系众族等,不论是人民的生计或是国家的性格,也都具有游牧、畜牧、农耕及商业等多面向,实在难以单纯化。而且,以这样的存在样貌,事实上西夏是假装成‘中华王朝’。”[①]实际上,西夏并没有假装成中华王朝,而是致力于成为中华王朝。由于西夏王朝脱胎于唐朝的边疆藩镇夏州藩镇,夏州藩镇自公元 787 年一直持续至公元 1038 年,堪称中古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藩镇。党项大族在夏州藩镇的政治经历使他们深受中原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西夏王朝的中原性极为显著。西夏皇室在对外政治交往中长期使用李姓,定本国德运为继承唐朝德运之金德,以儒家思想制定国家礼制,运用祥瑞、星象等政治舆论极力塑造本国的正统性,始终坚持皇帝的天子名号,拒用内亚世界的可汗名号,力图将本国打造为中原正统王朝谱系中的一员。这些都体现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文化传统。

元昊称帝后,北宋朝野予以强烈谴责。范仲淹在延州致信与元昊,要求元昊停止使用皇帝名号,改用内亚世界的可汗名号。范仲淹谈到:“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天子侔儗!名岂正而言岂顺乎?汉、唐故事,单于、可汗皆极尊之称。大王以北朝为比,且北朝称帝,其来久矣,与国家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国封王之大恩,如诸蕃有叛朝廷者,大王当率国人以伐之,则世世有功,乃欲拟北朝之称帝乎?”[②]由于北宋一直视西夏为本朝藩镇,因此元昊称帝是宋廷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元昊虽然声称近代有契丹称帝故事,自己援引此例称帝,但仍然被范仲淹驳斥。西夏与北宋爆发战争后,北宋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接连惨败,宋廷不得不默许元昊称帝,但仍然希望元昊能够改用可汗名号。宋仁宗曾密诏庞籍招抚元昊,《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于是密诏籍招纳元昊:元昊苟称臣,虽仍其僭号亦无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③]定川寨之战后,宋夏双方开始进行议和。元昊致北宋的外交文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④]。“邦泥定国”即西夏番人对本国的自

①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年,第 239 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〇,仁宗庆历元年春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087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仁宗庆历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332 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仁宗庆历三年春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343 页。

称“白高国”的音译，“兀卒”在西夏番语文中乃“皇帝之意”，因此“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实际上就是“男白高国皇帝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元昊虽然称宋仁宗为父，如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但是仍然与宋仁宗分享皇帝名号。但是宋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仅以为“兀卒”音同“吾祖”，元昊使用这一称号是对宋廷的大不敬。元昊使臣贺从勖则坚称兀卒就是宋廷所认为的古代单于、可汗，实际上他非常清楚“兀卒”就是“皇帝之意”。

宋夏庆历和议达成后，北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对北宋称臣，但元昊在西夏境内始终坚持皇帝的天子名号。元昊及其后的夏惠宗秉常、夏崇宗乾顺、夏仁宗仁孝的皇帝名号都分为尊号和城号两种，如元昊尊号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圣文英武崇拜仁至孝皇帝，城号为风角城皇帝；秉常尊号为就德主国广智增福民正久安大明皇帝、就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城号为明城皇帝、白城皇帝。西夏皇帝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番文佛经发愿文中都自称为“朕”。西夏皇帝的天子名号在辽末、金末时分别被辽天祚帝及金哀宗所承认。在蒙古汗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金人甚至认为本朝与西夏均为“诸夏”。

梁启超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所认为的正统王朝具有六大特征，分别是得地者、据位久者、有前代之血胤、据前代之旧都、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统或出身为中国种族者。他认为：“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埒，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谁为伪也？”[①]杉山正明指出：“匈奴帝国解体或消灭后，对于匈奴王室血脉的尊崇仍在亚洲东方存在，在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甚至是隋、唐为止的一系列鲜卑拓跋系王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拓跋国家’中一脉相传。”[②]西夏皇室以李唐后裔自居，正是借用唐朝灭亡后亚洲东部特别是河西走廊各部族、各政权对唐朝皇室的尊崇来塑造本朝的正统形象，在与北宋、辽，南宋、金争夺王朝正统性上占据有利地位，使本朝在亚洲东部三极政权时代成为最具资格继承唐帝国遗产的国家。

西夏人视本国皇帝为正统。西夏番文韵书《同音》释“君”为“正君，正统”[③]。西夏皇室除自称北魏拓跋氏之后及在对外政治交往中采用李唐皇姓外，还表现出对汉唐旧都长安乃至中原的浓厚政治兴趣。元昊重臣、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代元昊所作致北宋边境露布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中原。”[④]《续资治通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0页。
② [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颠覆世界史的蒙古》，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62—163页。
③ 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页。
④ [宋]王巩：《闻见近录》，《全宋笔记》（第二编六），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鉴长编》亦云:“元昊有作伪诏谕镇戎兵民,有定关辅之言。”[①]中原地区乃历代正统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域,象征着正朔所在,元昊的露布体现了他意欲进据中原,使西夏成为正统王朝的政治野心。元昊之子夏毅宗谅祚也怀有进据中原之心。吕大防对宋英宗的奏言中曾谈到:“今谅祚少年继袭,多招亡命,与之为谋,有窥关辅、剑南之意。”[②]

儒学教育往往是中原正统王朝最重要的文化建设。西夏统治者对番姓大族的儒学教育极为重视。夏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在宫中设立小学,又号宫学,“凡宗室子孙七岁到十五岁皆得入学”[③]。宫学设有教授负责教导皇族学子,仁孝与其皇后罔氏也亲自参加教学,“亲为教导”[④]。人庆五年(1148年),仁孝“复建内学,以名儒主之”[⑤]。此内学即前述宫学,由国内名儒主持教学可见此宫学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白滨先生认为:“‘内学’即人庆元年设于‘禁中’的‘宫学’,原为仁孝与皇后亲自条教训导,其时仁孝又立‘太学’,把注意力放在‘太学’之中,另选名儒主持‘内学’,故史称其时‘复建内学’。”[⑥]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规定了西夏皇帝诸子老师的名谓及其地位,“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皇太子之师仁师等,与次等位当”“诸王之师忠师等,与中等位当”[⑦]。以“忠”“仁”来命以师名说明西夏皇室尊崇儒学,并以儒学标榜来教育皇室子弟。《天盛律令》颁布于夏仁宗嵬名仁孝天盛(𗥃𗏁)年间(1149—1169年),而仁孝以崇儒闻名,他不仅在西夏太学亲自释奠孔子,还在人庆(𗍫𗥤)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体现了西夏以儒治国的特点。

西夏番姓大族子弟由于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多有在国内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者。嗣齐王遵顼“始以宗室策进士及第”[⑧],参加夏桓宗纯祐主持的针对进士的廷试,“唱名第一”[⑨]。《金史·西夏传》亦云其“以状元及第”[⑩],堪称皇族中的文魁。嵬名察罕之兄曲也怯祖在西夏末年也曾夺得状元首魁,史称其“于夏国尝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仁宗庆历三年二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二版,第3350页。
②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论》卷四一《天道门·灾异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9页。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五,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都412—413页。
④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4页。
⑤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5页。
⑥ 白滨:《西夏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5—366页。
⑧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⑩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1页。

举进士第一人”[①]。西夏番姓大族除了在本国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还有在邻国科举考试中表现良好的。先世为“西夏国族子”[②]的李桢在西夏末年被其父带入金国，在金末考中经童试，史载“金末，桢以经童中选”[③]。

从上可见优越的教育环境培养了西夏番姓大族优良的文化教养，儒学教育使西夏皇族成为本国的智识阶层，朝廷奖掖科举使不少番姓大族志在功名。科举成为番姓大族求取仕进之道与晋升之阶。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建构了西夏番姓大族的家族文化系统，并且对其行为规范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学教育使儒家道德在番姓大族的价值观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最终推动了番姓大族士人群体忠义士风的形成。

西夏以武立国，举国上下武风颇炽，史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④]。西夏皇帝在对外战争中多次御驾亲征，皇族中的国公、国王、太子也大都尚武并有统兵出战的戎旅经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 NHB·NO·876 号西夏文《宫廷诗集》甲种本《䒤䥫䶵䓏䗤》(《节亲大臣歌》)曾提到一位皇族大臣领兵“兵威所至，四方夷类甘伏死……国势军威，高天所撑风云角”。(䗤䗤䐃䍲䘏䗤䌴䓏䗤……䍲䘏䶵　䩜䘋䎽厗䗤䗤䗤䒤)[⑤]《天盛律令·军持兵器供给门》还规定“□地节亲王”[⑥]为拥有战具者。西夏陵 M182 号陪葬墓 N42·021〔P8:71+74+95〕号汉文残碑中记有“旷日持久兵 / 裨将嵬名革宁等□人□轨 / 天两军杂沓剑戟纷下如雨公 / 太后亲征怀德军分遣诸将公”[⑦]。N42·021〔P8:17〕号汉文残碑记有“统军九万攻之”[⑧]。残碑中的“公”指梁国公嵬名安惠。从碑文来看嵬名安惠曾亲身参与残酷的战争，他在夏崇宗天祐民安八年(1098 年)作为梁太后麾下大将，随梁太后出征北宋怀德军，以后又担任过“统军九万”的大将。晋国王察哥颇具武勇，“雄毅多权略，引弓二石余，射洞穿甲”[⑨]。他屡立战功，曾率军大胜北宋熙河经略使刘法并将其击杀。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材器英敏，善骑射，饶武略，遇事敢为”[⑩]。北宋靖康元年

① [元]虞集：《立智理威忠慧公神道碑》，《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05 页。
② 《元史》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051 页。
③ 《元史》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051 页。
④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877 页。
⑤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69 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24 页。
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21 页。
⑧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15 页。
⑨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361 页。
⑩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卷 461 页。

(1126年),西夏太子率大军出征怀德军,将其攻拔并俘死守将北宋西北著名武臣刘怀德。《三朝北盟会编》引《刘怀德死节录》曰:"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师率皆勤王,关辅一空。夏人乘虚遣太子及其国相李遇昌,诱三瓜诸部合二十余万入寇怀德军。"[①]在蒙古入侵西夏的战争中,夏襄宗安全太子承祯独当一面,《元史》记有"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②]。在西夏与金朝的战争中,夏神宗遵顼欲让太子德任出征金朝,史载"遵顼使其太子德任来伐"[③]。

以上表明西夏番族的尚武文化传统与皇室以武立国、以儒治国的政治传统相结合,使西夏番姓大族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既重视文采炳焕,又精习六韬三略,追求文通武达、才兼文武在番姓大族中蔚然成风。

西夏番姓大族与辽朝、金朝、宋朝的世家大族在教育上都受到儒学的影响,文章饱满之士在四国世家大族中济济如林,科举也称为四国世家大族的仕进之阶,但西夏、辽、金的番人、契丹人、女真人世家大族除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外,对以本民族文字创造的所谓番学也颇为精通,尤其是西夏、辽的番人、契丹人世家大族。西夏与辽、金的番人、契丹人、女真人世家大族都存在以军功入仕者,加以本身为游牧民族,因此三国世家大族都存在着便习弓马的尚武风俗,比宋朝世家大族更加注重戎伍之事。这些都体现了西夏、辽、金的番人、契丹人、女真人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二元性极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番姓大族在文化上的二元性与西夏国家统治区域经济形态上的二元性,以及西夏统治阶层以儒术及佛王传统治国的政治统治的二元性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二元性使西夏作为番族华夏化王朝在中原王朝谱系中别具特色。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3页。
② 《元史》卷一《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页。
③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75页。

参考文献

[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

[清]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唐]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新罗]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党银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年。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元]脱脱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宋]曾巩著,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宋]王称:《东都事略》,济南:齐鲁书社二十五别史本,2000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元]佚名:《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校注,隆福寺文殿阁书庄排印本,1937年。

[元]虞集:《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明]胡汝砺、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清]周春著,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戴锡章著、罗矛昆校点:《西夏纪》,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清]钟庚起编:《甘州府志校注》,张志纯等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

[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噶·罗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至2012年。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至2010年。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西北民族第二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1—20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张宝玺主编:《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

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孙继民等著:《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西夏]梁德养、王仁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闽宁村西夏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西夏六号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1—9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杜建录主编:《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词目索引、注释与异名对照》,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罗福苌、罗福颐注,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史金波:《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李范文:《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台北:允晨出版社,2005年。

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俄]A.Ⅱ.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著,崔红芬、文志勇译:《西夏物质文化》,北

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

韩小忙:《西夏王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

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白滨:《元昊传》,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

白滨:《党项史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王天顺:《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结项报告,2011 年。

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鲁仁勇:《西夏地理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

崔红芬:《文化融合与延续: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年。

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

胡若飞:《西夏军事制度研究·本续密咒释考》,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

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日]井上充幸、加藤雄三、森谷一树,乌云格日勒等编:《黑水城两千年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王德忠:《西夏对外政策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陈庆英:《陈庆英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

沈卫荣:《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祝启源:《青唐盛衰:唃厮啰政权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祝启源:《祝启源藏学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

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3 年。

[日]守屋美都雄著,钱杭、杨晓芬译:《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甘怀真主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 台大出版中心,2012 年。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 年。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刘静贞:《北宋前期的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稻乡出版社,1996 年。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骆晓倩:《两宋宗室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王善军:《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7 年。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

汤开建:《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年。

王小甫:《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 年。

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年。

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

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彭丰文著:《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

陶晋生:《女真史论》,稻乡出版社,2003 年。

陶晋生:《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年。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 年。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

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允晨文化出版社,1993 年。

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 年。

[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年。

[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

[苏联]弗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0 年。

[法]石泰安著，耿升译：《汉藏走廊古部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年。

[美]托马斯·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美]路康乐著，王琴、刘润堂译，李恭忠校：《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英]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美]格尔茨编：《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

[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二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三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四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 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年。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薪火相传: 史金波先生 70 寿辰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文集》,2012 年。

佟建荣:《西夏姓氏研究》,宁夏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

许伟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研究》,宁夏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

樊丽莎:《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影响》,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

翟丽萍:《西夏职官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何兆泉:《宋代宗室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

白雪:《西夏后期的后族与政治》,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翟丽萍:《西夏官僚机构及其职掌与属官考论》,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

陈玮:《西夏皇族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赵焕震:《西夏文〈亥年新法〉卷十五"租地夫役"条文释读与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

范立君:《俄藏黑水城发愿文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许会玲:《黑水城所出西夏汉文榷场文书考释》,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历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史金波:《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以俄藏黑水城出土军籍文书为例》,《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史金波:《关于西夏佛与儒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2010 年第 10 期。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杜建录:《黑水城出土的几件汉文西夏文书考释》,《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杜建录:《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杜建录:《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考释》,《西夏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历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孙继民:《西夏汉文干佑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江汉论坛》2010 年第 10 期。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1 期。

陈学霖:《八十年来西夏史研究评议》,《宋史论集》附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陈玮:《公元 10—11 世纪灵夏党项及西夏与于阗关系史研究》, 杜建录主编《西夏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陈玮:《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皇族》,《西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陈国灿:《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梁松涛、杨富学:《圣威平夷歌》中所见西夏与克烈和亲事小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保宏彪:《从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看唐朝与党项的关系》,《西夏研究》2011 年第 2 期。

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 年第 3 期。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辨"初探》,《西夏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孙伯君:《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民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

文志勇:《西夏官阶封号表残卷新译及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彭向前:《再论西夏陵区北端建筑的性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陈庆英:《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崔红芬:《〈俄藏黑水城出土传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西

北民族第二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年第 4 期。

杨蕤:《论西夏的基层组织与社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

[美]邓如萍著,聂鸿音译:《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第 3 期。

[俄](俄)克恰若夫著,杨富学、裴蕾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西夏文文献之收藏与研究》,《西夏研究》2010 年第 3 期。

[德]弗兰克著,岳海涌编译:《论 11—13 世纪西夏军法〈贞观玉镜统〉》,《西夏研究》2012 年第 1 期。

Ksenia Borisovna Keeping, The name of the Tangut Empire, *T'oung Pao*, Vol.80, facs.4–5, 1994.

Ksenia Borisovna Keeping,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Tangut Empire as Reflected in the Native Tangut Texts, *Manuscripta Orientatia*, Vol.1, No.3, 1995.

K.J.Solonin, The Tang Heritage of the Tangut Buddhism,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6, No.3, 2000.

Ruth W.Dunnel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Ruth W.Dunnell, Locating the Tangut Military Establishment:Uraqai(Wulahai) and the Heishui Zhenyan Army, *Monumenta* Serica40(1992).

E.I.Kyeanov, A Tangut Document of 1224 from Khara-Khoto, *Acta Orientar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XIV(2), 1971.

冈崎精郎:《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72 年。

佐藤贵保:《西夏の二つの官僚集团——十二世纪后半における官僚登用法》,《东洋史研究》66(3), 2007 年。

佐藤贵保、赤木崇敏、坂尻彰宏、吴正科:《汉蔵合璧西夏「黒水桥碑」再考》,《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2 号,2007 年。

佐藤贵保:《西夏王国の军制部族制度の研究——西夏语军籍文书群解読による》,财团法人三岛海云记念财团研究报告书,2010 年。

佐藤贵保:《ロシア蔵西夏文『天盛禁令』第 2585 号断片について》,《西北出土文献》第 7 号,2009 年。

岩崎力:《夏州定难军节度使の建置と前后の政情——西夏建国前史の再検讨(2)》,《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 26 号,2002 年。

后 记

本书是在我个人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2011年3月上旬，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登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第19层，认真瞻仰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贴在该层走廊墙壁上的前贤大家如周谷城先生、谭其骧先生、周予同先生、杨宽先生的影像，又环顾了墙壁上很多反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发展历史的老照片，深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是国内史学界的研究重镇，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入学笔试、复试。在复试时，我汇报了拟在攻读博士时的研究计划，姚大力先生、余欣老师均予以提问。复试后的第二天，我在参观周公馆时，接到系里电话，被通知拟录取，不禁欣喜异常。

回顾在复旦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首先要感谢的是导师姚大力先生。2011年承蒙先生不弃，我得以忝列姚门，继续学习喜欢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我在博一、博二、博四时，先后上过先生主讲的北方民族史文献讲读、专业外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宏阔，既讲究审音勘同的历史语言学考据方法，又擅于利用民族社会学相关理论，还注重分子人类学这一学术前沿。他的北方民族史文献讲读可以从塞人、匈奴、拓跋鲜卑、突厥讲到蒙古、后金，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可以从先秦的西北讲到清代的新疆、东北。他的这两门课程都贯穿着历史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他经常向我和同门推荐阅读拉铁摩尔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埃德蒙·R·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他十分重视我和同门的外语学习，经常在聚餐时问我们是否考过托福、雅思，让我们认真阅读每一期美国《亚洲研究季刊》和牟复礼的《帝制中国：900—1800》。他每次给我们上专业外语课时，都会点名让我和同门现场朗读并翻译一段英文论文。

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安排我和同门每半个月一次找他面对面沟通交流，向他汇报近期的阅读和学习情况。我和同门的学术作品小到书评大到论文，

被他修改十几遍皆是常态。记得博一有一次在先生办公室面谈时，他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回答说最近认真看了《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其实这本书我在硕士三年级就已经购买阅读，找先生面聊前又读了第二遍，但是面对先生的几个提问我仍然答不上来，实在是惭愧得很。

先生是严肃而又和蔼的，四年间，他无论是讲授专业课、专业外语，还是开设讲座，都希望我们这些弟子积极参与、认真学习。他不仅通过聚餐、喝咖啡、定时约谈、批改论文、定期举行姚门学生毕业论文讨论会、外出开会考察时座谈等各种方式来教导我们怎样治学和怎样为人处世；还通过赠书、资助参加学术会议来希望我们扩大学术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本研究领域的时段和方向。他对我们这些弟子非常大方，但是自己十分节俭。曾有同门在学校评选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时，写到先生每天早上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上班。我在2017年5月参加于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边疆中国论坛暨“社会转型、知识话语与新边疆学”学术研讨会时，亲眼看见先生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离会，感慨不已。如果说我在复旦四年于专业学习方面略有进步的话，跟先生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分不开的。惭愧的是，个人天资愚钝、兴趣庞杂，又有些固执，在专业学习上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唯有在博士后期间以及日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在博士学习期间，曾获得许多老师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是本系的余欣、余蔚、仇鹿鸣老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杜建录先生、杨浣老师、章治宁老师、王培培老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史金波先生、周峰老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孟彦弘老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侯甬坚老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沙武田老师，敦煌研究院杨富学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老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冯培红老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吴英喆老师。在校期间，个人曾于一些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对这些刊物的主编、责任编辑老师及匿名评审专家老师也致以衷心感谢，恕不一一列出尊名。课余时，与本校在读及已经毕业的王庆卫、陶兴华、魏毅、林皓、程秀金、靳珏、吕晓闻、李春园、刘灵坪、胡方艳、韩正、黄璐、楼正豪，渭南博物馆刘永刚，宁夏人民出版社姚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晓飞，定边中学刘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于光建和张笑峰，敦煌研究院张海娟，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高建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翟禹，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陈晓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晓林，其乐融融。此外还要感谢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的资助，使我购买了《二十四史》《册府元龟》《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等数套大型专业图书，并以参加学术会议的方式北至额尔古纳河，西至那

拉提草原，南至金马碧鸡坊，考察了祖国边疆的文物古迹。

在博士毕业学年寻觅工作遇到重重困难时，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小忙先生予以大力提携，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在我工作后，他在诸多方面予以帮助，并教导我怎样为人处世。对于博士毕业后的去向，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芮传明老师也予以关心。在我博士毕业两年后，他仍然对我谈道："希望你有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以益于事业发展。"令我十分感动。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在明知不孝子学习中国古代史不能扬名立万时，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在他们的引导下，我自幼便养成了阅读历史类书籍、观摩文物、考察古迹的兴趣爱好。我将努力学习、工作以肩负起家庭的责任。